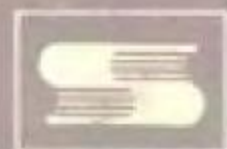


顾长南著

从马礼逊
到
司徒雷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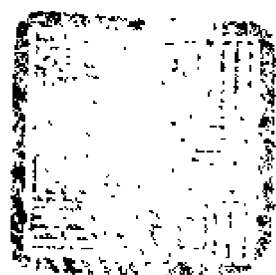
——来华新教
传教士评传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

顾长声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44447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44447

责任编辑 曹剑英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

顾长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5 插页 6 字数 343,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11074·658 定价 2.60元

序

本书是继《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出版后，另一部有关传教士问题的书，它试图从横向对外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进行考察。

不论从纵向或从横向进行考察，我认为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地剖析，不应当就事论事和把人物放在真空中说长道短。本书所选的二十九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就是本着上述原则，对他们各自的生平加以评述的。

这些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面很广，涉及到军事、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出版和慈善事业等各个领域。他们中有象郭实腊、李提摩太、梅子明等披着宗教外衣、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分子；也有象傅兰雅、乐灵生、文幼章等支持过中国人民进步事业的友好人士；更多的则是无意识地执行了西方殖民主义侵华政策，只是在程度上有深有浅。这表明，来华外国传教士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只有根据他们自己留下的历史记录，来评价他们的生平，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从事文化教育和出版方面的活动是很突出的，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曾经起过桥梁作用。西方的科学文化以至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输入中国；中国的文化和典籍，也由他们介绍到西方。

例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所编的《华英字典》，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起了奠基石的作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著名学者和改革家王韬协助下，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几乎全部翻译成英文，并作了详细注释和介绍，在西方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用毕生精力，与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徐寿等人合作，翻译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还做了大量的科学普及工作，推动过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浪潮；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在中国著名的第一个西医黄宽协助下，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西医和护士。这些事实，都是应该加以承认的。

但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长期在华致力于文化教育和出版方面的活动，其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由外国传教士自己来回答。

长期担任基督教出版机构广学会总干事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中国所需要的新道德的动力。”（《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英文版第99页。）

曾经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半个世纪之久的美国传教士卜舛济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一八九〇年大会记录》，英文版第457—459页。）

这表明，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从事文教事业，是为了发展外国在华教会势力所采用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的主观动机不是要把落后的封建的中国，通过文化教育和出版方面的努力，改造成先进的资本主义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传教士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在很大

程度上与他们的主观动机不相一致。许多中国人在接受了传教士传播的西学后,并没有充当他们的代理人,而是成了外国在华侵略势力的掘墓人,这是传教士始料所不及的,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违背的。

传教士问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国外有“传教学”这门学科,且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西方各国从十六世纪开始就陆续向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派遣传教士,充当开拓殖民地的先锋。早在一五五〇年,葡萄牙殖民当局就计划派遣传教士前来中国,到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已经深入中国宫廷。进入近代以后,英、美等国基督教传教士相继踏上中国领土,帮助西方殖民主义者打开中国的大门,然后深入中国腹地发展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革中,他们从各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对于这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完全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和科学的研究,探索其来龙去脉,得出活动的规律。

由于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仅仅开了个头,本书的出版连同以前出版的书和发表的文章,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唤起国内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同行们,重视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得到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的帮助,周谷城教授为本书题了字,谨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顾长声

一九八五年元旦

目 录

序.....	1
1. 马礼逊.....	1
2. 裨治文.....	20
3. 郭实腊.....	50
4. 雅裨理.....	62
5. 伯驾.....	70
6. 布朗.....	94
7. 雒魏林.....	103
8. 罗孝全.....	112
9. 理雅各.....	123
10. 晏玛太.....	139
11. 戴德生.....	150
12. 倪维思.....	170
13. 嘉约翰.....	178
14. 杨格非.....	186
15. 丁韪良.....	200
16. 傅兰雅.....	222
17. 林乐知.....	263
18. 狄考文.....	281
19. 花之安.....	298

20.	谢卫楼	304
21.	李提摩太	315
22.	明恩溥	357
23.	梅子明	369
24.	李佳白	381
25.	卜舛济	392
26.	乐灵生	412
27.	穆德	427
28.	文幼章	446
29.	司徒雷登	461

马 礼 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马礼逊是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英国人,一八〇七年九月八日抵达广州,在我国活动二十五年。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下,为英国殖民主义的对华经济掠夺,为迫使独立的封建主义的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为西方基督教的强行输入,竭尽全力,据他自己声称:“我是冒着个人生命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服务的。”^①

来 华 背 景

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宣称信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总称,包括旧教(我国称天主教)、新教(我国称耶稣教或基督教)、正教和其他一些小教派。基督教最早输入中国是在公元五世纪末,到七世纪传播至中原一带,属聂斯脱利派,在中国称景教。十三世纪时,除景教再次来华外,开始输入旧教,当时在中国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十六世纪中叶,旧教再次来华,并定名为天主教。十七世纪末,俄国正教输入中国。到十九世纪初,新教才开始输入中国,首先是英国,后来是德国和美国。它

^① 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2卷,第841页,附录。

们分别派遣传教士到广州、澳门和邻近中国的南洋群岛建立传教据点，为欧美在东方扩展殖民主义势力效劳。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正进行着一场产业革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英国以更大规模实行对外殖民扩张，海外传教事业由此应运而生。当时英国国教会先后成立了基督教知识传播会和非洲与东方行教会等海外传教组织，到一七九五年，英国国教会又与长老会、公理会合作成立了伦敦传教会。这些传教组织起初都以非洲作为海外传教区。

当时英国已取代法国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国家，在驱除了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后，印度遂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传教士相继长驱直入印度活动。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给人们以启示。他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在程度上不知要深多少倍。”英国“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关系。”^①

早在十七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中国广州和澳门设立商馆，长时期垄断着英国的对华贸易。到十八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又获得英国政府给予的鸦片专卖权，开始与年俱增地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造成大量毒品泛滥，戕害中国人民。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英国政府又图谋接收法国在华天主教的传教事业，为此，英国政府在一七九三年在派遣马戛尔尼专使来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64页。

向清政府提出过这项要求，但遭到乾隆帝的拒绝。

到十九世纪初，英国伦敦传教会首先策划派遣传教士直接到中国活动。一八〇四年，伦敦传教会物色到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罗伯特·马礼逊，当时他正在伦敦念神学。马礼逊受该校牧师的鼓动，立志要到海外传教。他在同年五月间向伦敦传教会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接收他为传教士。伦敦传教会同意了他的申请，命他再接受两年更为严格的训练，然后派往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区，作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派赴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一七八二年一月五日，马礼逊出生在大不列颠岛北部的小镇莫佩思的一个贫雇农家里，在他之前已有七个兄弟姐妹，他排行最小，家境极为贫困。后来，他父亲把全家搬到纽开斯尔谋生，专以制鞋坯为业，一家老小全都参加劳动。马礼逊也从小劳动，过着下层社会的穷困生活，经常是缺衣缺食，并且从小就受到宗教的灌输，但是他却勤奋读书，从小就学会拉丁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后来他考入伦敦霍克斯顿神学校，转入高斯坡神学院后，除攻读神学课程外，还学习了天文、医学和初等汉语，并听取了英国传教士在非洲和印度等地传教经验的介绍。

一八〇七年一月八日，二十五岁的马礼逊自神学院毕业，随即被封立为牧师，一切来华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就向东印度公司订购前往中国的船票，竟遭到该公司的拒绝。于是伦敦传教会决定命他乘船前往美国，要求美国方面给予协助，同时给他开了许多介绍信。同年一月三十一日，马礼逊告别亲友和伦敦会负责人，乘“雷米登兹”号货船前往美国。据马礼逊回忆：当时“我带了许多封介绍信，到纽约去会见几位先生，请他们帮助我

到广州后可以上岸”。^① 四月二十日，马礼逊抵达纽约，受到美国基督教界的接待，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到国务院谒见了国务卿。

十九世纪初的美国，正是向北美西部大规模扩张领土的时期，美国方面还没有派遣传教士到太平洋以东活动的意图。马礼逊的到来，使得美国教会和政府对英国率先派遣传教士赴华表示了兴趣，国务卿麦迪逊在接见马礼逊时，详细垂询了英国传教士在非洲、印度等地活动的情况以及到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区的意图。国务卿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当即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广州美国商馆的卡林顿，命他在马礼逊到达广州后给以一切方便，使他得以在中国立足。^②

到达广州之后

马礼逊在美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和美国基督教界的帮助下，于一八〇七年五月十二日搭乘美国货船“三叉戟”号，经过近四个月的海上颠簸，终于在九月八日抵达中国广州。马礼逊凭着美国政府的介绍信，受到在广州的美国人的接待，把他藏匿在美国商馆里，隐瞒了他的传教士身份，还供给他食宿，为他请来了汉语教师。就这样，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在美国的具体帮助下，得以潜入中国领土并非法居留下来。

马礼逊临离英国之前，伦敦会还通过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巴克斯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斯当

① 梅益威、周云路译述：《马礼逊传》，第7—8页。

② 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1卷，第91, 129, 131页；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中译本），第83页。

东，要他给予马礼逊在中国进行活动时以方便，并希望东印度公司不要干涉他。斯当东接信后，当即在公司内部进行了疏通。马礼逊跟随美国商人在澳门隐居期间，巧遇东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摩顿的女儿玛丽，他俩在经过一段恋爱之后，于一八〇九年二月二十日举行婚礼，从此消除了东印度公司对这位传教士的冷遇。在结婚的仪式上，公司负责人还当场宣布正式聘用马礼逊为公司的翻译，年俸五百英镑。这样，马礼逊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身份，并可以此为掩护，为在中国开辟传教区而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写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我已接受了东印度公司的聘请，这样可以有住的地方，可以有固定的收入，以减轻英国差会的负担；而且当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为公司的利益服务时，就可以消除他们对传教士的鄙视。”^① 马礼逊同玛丽小姐的结婚，标志着东印度公司所代表的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殖民扩张与传教事业的结合，实践证明，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与西方殖民主义血肉相连。

马礼逊从此不再到处躲藏了，他以英国商人的名义，公开出来活动。他为东印度公司积极效劳，不到三年就加薪一倍，从原来的五百英镑加到一千英镑一年。

翻译《圣经》和编纂《华英字典》

一八〇七年伦敦会给即将前来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的“指示”中称：“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给你，可根据你的机智和判断，在各个场合方便行事。……我们坚信你能住在广州而不致遭到

^① 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1卷,第62页。

反对，一直等到你能达到学会汉语的巨大目标。……你也许有幸可以编一本汉语字典，……或更有幸地能翻译《圣经》。”^①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大部分。“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原文为希伯来文，共有三十九卷；“新约”原为希腊文，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四个部分，共有二十七卷，原是耶稣的门徒等著述的汇编。天主教传教士自从明末清初陆续来华后，直到十七世纪末，从未从事过《圣经》的译述工作。约在一七〇〇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巴设，译述了一部分“新约”。到十八世纪末，耶稣会的传教士贺清泰才陆续将《圣经》进行翻译，可是并未刊行，未得流传。

马礼逊来中国之前，曾在伦敦博物馆查到了巴设翻译的一部译稿，并把它抄录下来。巴设译本是在一七三九年由一个英国人霍奇森带到伦敦的，藏在伦敦博物馆，大英圣书公会因它是天主教传教士翻译的，而且不全，没有采用。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后，于一八〇八年即根据伦敦会的指示，开始翻译。他先根据带来的巴设译本翻译“新约”，并把一部分译稿寄给伦敦大英圣书公会，请求他们的财政支援。马礼逊经过五年努力，在一八一三年译完了《新约全书》，在广州秘密雇用了几名刻版工人，一共排印了二千部，工本费共用去三千八百十八元西班牙银币。从一八一四年起，马礼逊又着手翻译“旧约”，这次他是和另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米怜合作的。米怜当时在南洋，他们前后共化了五年时间，到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全部译完，在马六甲陆

^① 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1卷，第95—97页，1807年1月20日伦敦会给马礼逊的“指示”。

续排印，一八二三年出版，取名为《神天圣书》，共装订成二十一卷线装书正式出版。基督教的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马礼逊是第一人。^① 马礼逊在翻译和印刷《圣经》的过程中，英国方面捐赠了六千六百英镑，美国方面捐赠了三千六百多元西班牙银币，东印度公司捐赠了一千元西班牙银币。

《华英字典》的编纂工作，马礼逊也是从一八〇八年开始逐年积累的。一八〇九年十二月四日，马礼逊写给伦敦教会的一份“报告”中说：自从加入东印度公司后，“在翻译官方文件的同时，我可以编纂字典。我希望这部字典会给以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极为重要的帮助”。^② 可见他编这部字典的初衷，是给以后到中国活动的传教士提供方便。但是东印度公司对这项工作也非常重视，认为这对于英国今后扩大侵华有直接的用途，为此拨了一万二千英镑给马礼逊，并同意由东印度公司设立在澳门的印刷所承担印刷。^③

马礼逊经过七年的艰苦劳动，在一八一五年出版了第一卷，书名为《字典》。这卷是马礼逊按照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英译的，汉、英对照，按汉字笔划分成二百四十个字根排列，书后还附有字母索引。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在一八一九年出版，书名为《五车韵府》，根据音标按英文字母编排。一八二〇年续出第二卷的第二部分，在附录中把汉文书写体，按拼音分别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列出。第三卷于一八二二年出版，书名为《英汉字典》，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解释颇为详尽，例句都有汉译。整部字典在一八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5年10月，第249—261页。

② 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1卷，第70页。

③ Chinese Repository. 1834年6月，第82页。

二三年出齐，共有六大本，合计四千五百九十五页，工程浩大，全部由马礼逊独自编纂，成为中国英汉字典的嚆矢。据马礼逊在这部字典卷末的“跋”中声称，他主要是根据中国出版的《康熙字典》编译的，经过长年的日积月累，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完成了这部巨著。^①

此外，马礼逊还为他的后继者来华后便于学习汉语和广东土话，编写了《汉语语法》（英文版）一书，一八一五年出版，英文版《广东土话字汇》一书，在一八二八年出版。马礼逊编纂这批工具书的目的，虽然只是供给来华传教士和东印度公司使用，但客观上却为沟通中外文化作出了贡献。

在南洋建立对华传教基地

清政府早在康熙、雍正年间就实行禁教政策，一七五七年以来又一直实行闭关政策，到马礼逊来华时，这些政策并未改变。为此，马礼逊未能公开活动。马礼逊秘密吸收的中国第一个新教教徒蔡高，是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六日在澳门海滨一座小山旁的泉水中举行洗礼的，蔡高当时受雇于澳门东印度公司印刷厂为雕版工人。不久，他的哥哥蔡兴、弟弟蔡三也先后入教。另一个雕版工人梁发，是由米怜在马六甲为他施洗的，那是在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日，他先在马礼逊处工作，后到南洋帮助刻印《圣经》，一八一九年又回到广东继续在马礼逊手下当雕版工人，并开始撰写一些布道小册子，经过多年考察和培养，马礼逊在一八二三年在澳门封授他圣职，成为新教第一个中国籍牧师。从此梁发在英国人的庇护和指使下，不断深入广东内地散发布道小

^① 参阅夏燮：《中西纪事》卷 8，第 10 页；卷 16，第 5 页。

册子和进行传教，秘密发展教徒。^①

由于一时无法在中国大陆公开活动和建立据点，根据伦敦会的指示，马礼逊决定先在华侨聚居较多而又邻近中国的南洋群岛上建立基地，让准备来华的传教士到南洋先学习中国语文，伺机潜入中国。于是，马礼逊命米怜在马六甲建立一座印刷所，和开办一所训练学校。印刷所在一八一五年正式建成，开始印刷汉文《圣经》和布道书，除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外，大部分偷运入中国大陆，利用梁发等中国人，在广州向参加乡试的知识分子散发，也带到内地去散发。由梁发撰写、马礼逊修改的《劝世良言》一书，是一八三二年在南洋马六甲印刷所印刷的，一八三六年在广州偶然发到了洪秀全手中，成为后来他发动农民起义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

马礼逊命米怜筹建的学校，于一八一八年在马六甲举行奠基仪式，由当时驻马六甲的英军司令福尔克哈上校主持，学校的地皮是英国殖民政府所圈赠，并答应定期给予经费补助。学校被命名为英华书院，主要目标是培养到中国去传教的欧籍传教士，也吸收一部分华侨学生，经过若干年的训练后，伺机派往中国活动。

一八二〇年，马六甲英华书院正式开学。马礼逊说：“我希望，在使中国信奉基督教之前，这一工作（指英华书院）不会中止。”^②曾任英华书院校长的伊文思也说：“我确信，我们必须在这个书院中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为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来到他们愚昧无知的同胞中间。”^③

① 参阅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第8章。

② Marshall Broom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BUILDER. 第164页。

③ The Report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第42卷，第28页。

这是开设英华书院的主要目的。另一个目的是向入学的欧美人提供学习中国语文的场所，并帮助他们熟悉中国的社会状况。^①

但自英华书院开学后，入学的欧美人很少，多数是旅居南洋的华侨子弟。从一八二〇年开始招生，到一八三四年的十四年间，完成学业的学生共四十名，其中欧美籍学生可以查到名字的仅有三人，他们是马儒翰、亨德和墨尔。马儒翰是马礼逊的儿子，一八二六年到该校学习中国语文。美国商人亨德在该校学习结业后，到广州旗昌洋行任职，后曾一度担任中英交涉时的英方译员，写过英文的《广州番鬼录》一书。墨尔是荷兰人，在该校结业后，在马六甲经商及办报。华侨学生中有个袁德辉，在一八二七年结业后，回到北京任理藩院通事。一八三八年底，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通译，跟随到广州参与外事活动。华侨学生回到中国工作的寥寥无几，并没有一个肯充当传教士的，即使他们中有一些人回国，也多数在广州或澳门的东印度公司或外国商馆工作。英华书院于一八四四年迁往香港，校长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

马礼逊的政治活动

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是公司的主要译员，曾多次代表公司与中国方面进行交涉，他始终站在英国殖民主义者一边。他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本身，就带有政治性，同时，他对东印度公司非法输入鸦片的罪恶行径是亲眼目睹的，但他却从未进行过谴责，相反地，他还不断接受东印度公司和其他鸦片贩子

^① Julia H. Johnson: *Fifty Missionary Heroes*. 第 299 页。

的捐赠,用来接济他开辟传教区的活动。

臭名昭著的领事裁判权,就是由马礼逊首次提出的。所谓领事裁判权,就是在华外国人可以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束和制裁的特权,外国人犯了罪,只受他们所属国的领事审讯和拘留,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这是任何一个独立国家所不能容许的,是一种直接侵犯国家主权的行爲。

早在一八一四年,马礼逊就写过一篇题为《从中国政府对广州东印度公司雇员的举动所想到的》文章。他在列举了清政府的腐败、中英交涉中的“不公正”,和中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等之后,公然提出英国政府“可否授予公司大班以行政兼司法长官的权力,或最好指派一名推事驻节广州,专对英国侨民负有民事权威,不只限于商业方面,而且能成为对所有事件进行交涉的权力机构。中国的民政官与英国官员接触时处于同等地位。”^①

从一八二一年发生的所谓“土巴资”号炮轰中国领土事件,可以看出马礼逊当时不但鼓吹,而且已经实行外国人在华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侵犯中国主权的活动了。这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国军舰“土巴资”号上的一批水手,在中国伶仃岛登陆骚扰,遭到当地村民还击。舰上闻讯后,竟增派一队武装水手重行登上该岛进行报复,同时下令军舰向岛上开炮,致使中国村民二人死亡、四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提出必须按照中国法律惩处,中国人死亡二人,英方必须交出二名凶手。可是英国舰长竟扬言,人不能交出,此案须按英国法律处理。据当时东印度

① 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2卷,附录; *Chinese Repository*, 1840年9月,第615—619页。

公司大班马尔姆斯顿证实：“在这一事件处理的过程中，东印度公司遇到了与中国人最严重和最麻烦的一次谈判，马礼逊博士表现的热忱和努力，是始终如一的。”^①这个由马礼逊首先鼓吹的领事裁判权，后来全都写进了清政府与英、法、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八一六年，英国政府决定派遣阿美士德为使臣，前来中国。英国外交大臣罗加事里给阿美士德的训令（一八一六年一月一日）中指示，这次出使除要求中国当局保护英国商人不受地方政府的侵犯，并在广州以北另辟一通商口岸外，还提出“在北京设置一名办理英国人民事务的长驻使臣”。他还要求阿美士德“留在中国期间，应竭力搜集有关中国商业政策和政府实际情况的情报”。^②马礼逊被英国政府任命为这个使团的中文翻译，中国方面称之为汉文正使。

马礼逊在接到此项任命后随即先行到达天津，与中国官员会晤，为英使进京作准备。他向中国官员隐瞒了他的传教士身份，声称他是“在澳贸易夷商”的身份受英国使臣之命前来商谈进京事宜的。^③阿美士德使团随后于八月十二日抵达天津。据八月三十日的“上谕”叙述此次英国使团进京的情况称：嘉庆帝特派苏楞额、广惠二大臣前往天津赏给筵宴，并向英国使团提出觐见中国皇帝时须行三跪九叩之礼，以谢皇恩，但遭到英国使团的拒绝。可是在前往北京的途中，阿美士德忽又表示愿行跪叩之礼。于是，嘉庆帝“降旨于七月初七日令尔使臣瞻觐，初八

① 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2卷, 第146—147页。

②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第3卷, 第277—284页。

③ 参阅清嘉庆朝《外交史料》第5册, 第8页。

日于正大光明殿赐宴颁赏，再于同乐园赐食，初九日陛辞，并于是日赐游万寿山，十一日在太和殿颁赏，再赴礼部筵宴，十二日遣行。”英国使团到北京后，在瞻觐皇帝的那天，“正使忽称急病不能动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只令副使入见，乃副使二人亦同称患病，其为无礼，莫此为甚。朕不加深责，即日遣令归国”。^① 谈判未开，英国使团即行折回。马礼逊对于向中国皇帝行跪叩礼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他说：“就我们国王的代表而言，即使在皇帝面前，这种表示敬意的行为，也被认为是不可行的。”^② 英国使团的成员表示，他们只能向上帝和女人跪拜，决不向中国皇帝叩头。这次出使的谈判任务没有实现，但在马礼逊的随行下，阿美士德在沿途仍搜集到不少中国的情报，完成了英国外交大臣指示的后半部分要求。

英王的嘉奖

一八二四年，马礼逊回到英国休假。他向英王乔治第四呈献了一部他翻译的汉文《圣经》——《神天圣书》，和一幅北京地图，并呈报了他在中国活动十七年的情况。国王通过大臣传旨：“对这位绅士的卓越和有用的工作，表示国王的高度嘉奖。”^③ 马礼逊带回从中国千方百计收集到的一万余册汉文图书，后来全部捐赠给伦敦大学图书馆。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总部给予马礼

① 参阅清嘉庆朝《外交史料》第5册，第58页；梁廷枏：《粤海关志》第25卷，第23—25页，页脚5。

② Robert Morrison: *Chinese Miscellany*. 一书中未发表的阿美士德使团赴京纪要。

③ 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2卷，第254—255页。

逊以隆重接待，表彰他为公司的竭力效劳所取得的利益。伦敦传教会选举他为委员，请他到各地教堂报告中国情况和鼓动增派传教士去中国。一八一七年格拉斯哥大学曾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这次他又被英国皇家学会吸收为会员。马礼逊趁这次回国的机会组织了一个“东方文社”，吸收有志于到东方充当传教士的英国男女青年入社，接受训练。由于他的原配夫人玛丽已在一八二一年因病去世，这次在英国又与伊莱札·阿姆斯特朗小姐结了婚。

英美合作的继续

马礼逊在英国休整一段时期后，在一八二六年五月五日再次向伦敦告别，带了新夫人乘船前往中国。他现在已是蜚声英、美的传教士了，且已提升为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高级职员。在华创刊的第一份英文日报《广州纪事报》（又称《澳门杂录》，Canton Register，一八二七年创刊）的老板英国鸦片巨商马地臣，也决定聘请马礼逊为该报的副编辑。当然，马礼逊此时再回广州，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根据伦敦会的指示，还是如何在中国开拓传教事业的问题。

当时东印度公司正热衷于扩大鸦片走私，攫取更多的暴利，不可能容许英国传教士有更多的活动余地，于是马礼逊想到，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国求援，要求美国方面继续同他合作，共谋打开对中国传教的局面。

自从美国政府和教会团体帮助马礼逊在中国立足之后，马礼逊一直与美国方面保持联系，报告他在华活动的情况。美国教会刊物也经常刊载他在中国活动的情况，对他翻译《圣经》也

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一八二〇年，美国公理会通过了聘请马礼逊为该会的通讯委员。^①同年，在广州开设同孚行的著名美国商人奥立芬，同马礼逊取得了联络，在十月十五日写给马礼逊的信中，说：“我的目标是商业性的。……但我确信我懂得一点上帝在基督里的爱，对于传他名的人所肩负的传教的职责，我不是麻木不仁的。”^②他赞成马礼逊关于增派美国传教士前往中国与英国传教士合作开辟中国传教区的建议。马礼逊于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写了两封信，向美国呼吁赶紧派遣美国传教士来华，美国方面在奥立芬等资本家的资助下，于一八三〇年派出第一批两名美国传教士，前来广州。马礼逊给予他们最热忱的款待，并提供了一切帮助。

由于当时清政府并未取消禁教政策，马礼逊在广州的传教活动仍然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主要是编写一些汉文布道小册子，从事出版活动。由马礼逊筹办、米怜负责编辑，在南洋出版的第一份汉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于一八一五年八月五日发行，共出了七卷，一八二一年停刊。撰稿人除马礼逊外，还有米怜、麦都思等英国传教士。最初每期印五百本，后增至二千本，除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外，主要偷运至广州、澳门一带散发。

马礼逊还鼓励和支持后来来华的传教士，在广州办报。一八三三年在广州创刊的、国内最早的汉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和一八三二年在广州创刊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都是由马礼逊倡议的。前者由郭实腊——一个德国传教士编辑；后者由裨治文——一个美国传教士负责。

① 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2卷, 第83页。

② 同上书, 第87页。

从传教士到副领事

一八三四年，英国政府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这是英国自由商人自一八一三年以来经过长期斗争的结果，他们要求“作为所有英国人之天赋权利的商业自由”。^①其目的是要适应英国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打开中国市场。这年七月十六日，英国政府委派的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广州。律劳卑随即召集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侨民，当众宣读英王的命令和任命书，马礼逊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商务监督的秘书和翻译，年俸一千三百英镑，可以穿上副领事的官服，缀上皇家的领扣。

马礼逊当天在给他妻子的信中，说：“律劳卑宣布这项任命后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我立即告诉他说，我愿意……请你为我祈祷，使我在必须担负的新岗位上，忠于赐福给我的救主。这对于一个传教士来说是颇不寻常的，穿上一身副领事的制服，而不是传教士的道袍！”^②

这确实是一件“颇不寻常”的事，从一八〇七年算起，马礼逊在中国共活动了二十五年（其中有二年在英国未计在内），为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和经济侵华活动，为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开拓新的传教地区，作出了“颇不寻常”的贡献，尽到了他作为先锋的作用，所以英国政府才决定赏给他一个副领事的官职。

①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第165页。

② Mrs. Eliza 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2卷，第524页。

马礼逊从此格外忠心耿耿地为英国政府的侵华政策效劳，他冒着盛暑奔走于澳门、广州之间，为律劳卑当译员和联络员。十天之后，即七月二十五日，马礼逊已感到身体不适，但仍不顾此，七月二十六日又忙了一整天，参加开会，为律劳卑写给广州总督的信进行翻译，又在律劳卑与浩官会谈时当译员。七月二十七日，律劳卑正式公布任命他为商务监督翻译兼秘书，官衔为副领事的英国政府公文。由于他的过度兴奋和拚命工作，终于在七月三十日发高烧病倒，八月一日夜间突然与世长辞。

由于他的后妻在去年十二月带了六个孩子一起回到英国，只有前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马儒翰守在病榻旁边。马礼逊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二岁。律劳卑决定把他的遗体送往澳门，举行丧礼，由马儒翰负责护送。八月五日，律劳卑和在澳门的英美商人及传教士，以及葡萄牙殖民当局和天主教一部分传教士参加了丧礼，马礼逊与他的前妻玛丽一同被安葬在澳门。

马礼逊共有子女九人，前妻玛丽生三个，夭折一个，后妻伊莱札生六个。^①其中以前妻所生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和后妻所生马理生（Martin C. Morrison）两个儿子与中国有关。马儒翰在一八一四年出生在澳门，七岁时因母亲去世被送回英国上学，一八二六年从英国到马六甲英华书院读书。^②三年后回到广州，当时马儒翰年仅十六岁，就担任英国商人的翻译。他父亲本打算培养他为接班人，曾令他参加一部分修订《圣经》译本的工作。马儒翰在担任英商翻译时，曾编有《英华行名录》和《对华商务指南》两书，先后在一八三二年和一八三四年出版。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4年8月，第177—184页。

^② 同上书，1843年9月，第459—460页。

马儒翰不是传教士，一八三四年夏他父亲去世后，正式进入英国政界，律劳卑任命他继任商务监督的秘书兼翻译，当时他年仅二十岁。从此，他同他父亲一样，积极为英国对华侵略政策效劳，在清政府禁烟和反对英国入侵的过程中，马儒翰站在英国侵略者的立场上，敌视中国。

马儒翰对于非法的传教活动，也曾经支持过。一八三四年秋，当传教士利用梁发等人在广州乡试的考棚外散发布道小书时，官方派巡卒来追捕，押走了几个人。马儒翰得悉后，就插手干涉，并行贿八百元，要官府把犯人释放。当巡抚确认梁发是“通敌卖国之人”，下令逮捕时，马儒翰会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竟用英国船把梁发送往新加坡逃遁。诬指中国政府捉拿犯人归案是“迫害”，说“此次迫害之起，与其说是由于宗教之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之原因”。^①

鸦片战争爆发后，马儒翰担任英国全权代表懿律和商务监督义律的翻译，在一八四〇年夏天跟随他们乘英舰到天津与直隶总督琦善举行会谈。马儒翰对清廷代表极尽威胁之能事，结果在投降派琦善的让步下，双方达成回南方举行谈判的协议。

一八四一年秋，英国委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马儒翰又担任了这个英国侵略军头目的翻译，跟随他乘英舰北上。在英国侵略军进攻中国沿海各城时，马儒翰积极为璞鼎查出谋划策，到处勒索巨额赎城费和饷糈银两。一八四二年八月，英国侵略军开到南京，马儒翰多次参与与牛鉴举行的和谈预备性会议，起草和翻译中、英条约的条文，然后随同璞鼎查与耆英、伊里布举行正式会谈，确定了中、英《南京条约》，并在八月二十九日到英舰“皋华丽”号上参加条约的签订仪式。马儒翰首先代表英国政府全权

^① 参阅麦洁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第18章。

代表在中外文本上盖印, 后由璞鼎查签字。^①

由于马儒翰(中国史书上称他为秧马礼逊、马里臣、马履逊、马利逊和马礼逊)在英国首次侵华的鸦片战争中立了“功”, 英国政府任命他为香港殖民政府的立法与行政委员会委员, 兼代辅政司官职。正当他官运亨通之时, 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因患急性疟疾而突然去世, 终年二十九岁。

马理生是一八二六年出生的。他二十岁时, 即在一八四六年, 英国政府任命他为驻福州领事馆翻译, 一八五五年又调他出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秘书兼翻译。一年之后, 他奉调到广州任英领事馆的领事, 一八五八年他又被调到厦门任领事, 同年十二月再被调回福州任领事。马理生是在一八七〇年去世的, 终年四十四岁。

罗伯特·马礼逊在一八三四年去世后, 他的后妻伊莱札根据马礼逊遗留的日记、信件、报告、文章等资料, 加上她自己的回忆, 编写了《马礼逊回忆录》(英文本)两卷, 一八三九年在伦敦出版, 成为研究马礼逊生平的重要文献。来华的传教士也有为马礼逊写传的, 其中有英国在华内地会传教士海恩波编写的《马礼逊传》(英文本), 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出版, 后由梅益盛、周云路译成汉文, 一九三二年由广学会出版。

马礼逊作为西方新教派遣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 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有它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当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实行扩张时, 必然地会利用它欺骗麻醉其本国人民的工具——基督教及其传教士, 充当侵略的先遣队, 为资本主义的入侵、迫使中国开放门户服务, 这是已为历史所证明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42年10月, 第569—576页。

裨 治 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裨治文是美国方面派遣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他主编过在广州创刊的英文《中国丛报》，曾参与美国政府专使顾盛的使团，同清政府签订第一个中、美条约——《望厦条约》，又曾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亲赴太平天国考察，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

来 华 之 前

裨治文在一八〇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尔彻城的一个基督教徒家庭里。他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自己老家度过的，后来考入阿默斯特大学，一八二六年毕业。他在大学读书时即有志于到海外传教，毕业后经过教会介绍，考入安多弗神学院，在那里接受了三年严格训练。一八二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是他学完全部神学课程的日子，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结束了我在这所神学院的全部课程。上午八点钟，美国公理会差会部的助理干事大卫·格林先生到我的房间来访问，希望单独同我谈话。我们随即一同进入我的卧室，格林先生向我提出到中国去传教的打算。他说公理会的咨询委员会早就

急于要派遣一位传教士到中国去,由于某些原因,当前他们比以前更为急迫要实现这一要求。纽约的奥立芬先生已向委员会提供了最慷慨的捐助,他们希望我能承担这一使命。……”^①裨治文答应格林先生,他将慎重考虑此事。

五天之后,裨治文来到纽约。他已决定接受这项使命,他和另外一位申请到中国去的雅裨理,一同到公理会差会部出席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公理会的负责人外,正在纽约的广州美国巨商奥立芬也在座。会上,“他们要我和雅裨理在会上说明,我们打算前往中国传教的想法和感受。雅裨理说他对中国感到强烈的兴趣,他已经作好准备,如条件合适的话,愿意为之贡献出他自己。至于提到我个人的看法和感受,我表示我已下定决心要承担此项使命。说完之后,主席要求我们两人退席。几分钟之后,我们回到会场,他们把讨论结果向我们两人宣布:根据我的意愿,他们要求我立即参加美国公理会的工作。建议雅裨理先参加海员之友会的工作一年,期满后可与公理会取得联系,看是否能被接受为该会工作。”^②这是美国历史上派出第一批传教士到中国活动的历史记录。^③

散会之后,裨治文和雅裨理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进行出国前的准备。一八二九年十月初,裨治文在贝尔彻城的教会被封立为牧师,然后告别亲朋,前往奥尔巴尼公理会差会部报到。

公理会于一八二九年十月七日签发给裨治文一封很长的“指示”信,要点如下:

-
- ①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2页。
 - ② 同上书,第14—15页。
 - ③ 有关雅裨理来华情况,参看英文版《裨治文传》。

致裨治文牧师 亲爱的先生：公理会咨询委员会任命你为美国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感到这是他们指定你去担任具有巨大利益和责任的一项事业。……

终有一天，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你要以此自勉，让那神圣的热情在你胸中燃烧，竭尽所能和坚忍不拔。作为基督的一个战士，你要抱着希望，在这个成就中高兴地有你的份。

关于在这样一个从未试验过的地域，你的处境将如何，本委员会感到无法掌握足够的情况，因此，要对你的计划和工作下指示就不可能很具体，如何行动必须要在上帝的引导和帮助下，由你自己来判定。你特别要向伦敦传教会的马礼逊牧师请教，……一切重要的行动，你都应当和他商议。……

本委员会料定你的注意力将有数年时间放在掌握中国语言文字上。……希望广州或澳门能作为你常住或永久居住的地方。

本委员会要你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希望你利用一部分时间去散发传单和书籍，特别是《圣经》。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容许公开传教，介绍福音知识的最好手段，乃是印好的传单和书籍。……

除了别的工作外，要牢记你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当前拦住去路的障碍必须扫除，准备工作必须完成。我们仍然认为，不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福音的影响就将在中国觉察到，虽则我们并不企求奇迹的出现，可是上帝的旨意会迅速打开一个宽敞而有效的门户。过去三

十年的政治革命,可作为他人的先驱,其影响将扩充到那些建立得最长久、最安全的政府中去。因此,要抱着希望而工作。……

由于你要去的地方范围大、利益广,你将比几乎所有的兄弟们有更多的便利,为此,在你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求你把有关中国人民的特征、状况、风俗、习惯等等,特别要对这些情况受他们的宗教影响,向公理会差会部作出完整的报告。……^①

以上“指示”中,特别提到所谓“过去三十年的政治革命”问题,是指美国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推行扩张政策所经历的三十年,其间攫取了北美的大部分土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进程;现在已到了跃跃欲试向海外扩张的时机,因此,美国企图把其影响渗入建立得最长久、最安全的中国政府中去。而传教士是美国向东方伸展的最理想的角色。这封“指示”信,就是利用传教士到中国扫除障碍,为美国的入侵做准备工作的“进军令”。

美国对华传教事业所以能开始进行,除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不断向美国教会发出呼吁,并保证提供帮助之外,美国大资本家奥立芬的大力提倡和巨额捐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促进。十九世纪初,奥立芬在广州经营进出口贸易,为同孚行老板。当时不少在广州的美国商人,都从事罪恶的鸦片走私,但是奥立芬却反对输入鸦片,他曾经宣布:“我之所以要谴责,是因为鸦片贸易象一座隔离基督教与这个拥有世界上四亿人民的坚固壁垒,是那些商品市场的破坏者。如果没有那些商品市场,西方国家的技

^①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20—27页。

术工人将会失却生计。”^① 这表明，这位美国资本家和疯狂输入鸦片的英、美商人相比，在如何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使之变为欧美的一块新的殖民地，更具有“远见”。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精辟指出的，非法的鸦片贸易所导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不是扩大了美国 and 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而只是加速和加深了一八四七年的商业危机”。“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②

奥立芬很早就对新教如何输入中国感到兴趣，就是从他所说的观点出发的。一八二〇年十月十五日，奥立芬曾主动写信给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我的目标是商业性的……但我确信我懂得一点上帝在基督里的爱，对于传他名的人所肩负的传教职责，我不是麻木不仁的。”^③ 他和马礼逊此后曾多次商讨如何加强英、美合作，以开辟对华传教事业。正是在奥立芬的不断提倡和愿意提供经费的情况下，美国方面才开始考虑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

美国公理会从神学院里物色到了裨治文，当时奥立芬正在纽约，他答应给予裨治文一切必要的支持。一八二九年十月十日，他在寓所接见裨治文。据裨治文当天写的“日记”说：“我遇上了奥立芬先生那样的人。如果所有的商人都是那样的人，那么宗教、爱国和传教事业将会大大地促进。”^④ 奥立芬在当时的

① 卡宾特：《早期中国贸易》，第93页；Chinese Repository, 1837年1月，第4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24页。着重号是顾长声所加。

③ Mrs. Eliza Morrison compiled: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第2卷，第87页。

④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27页。

美国被称为“美国对华传教之父”。他给予赴华传教士免费乘坐他公司的船在二十年间达五十人次，并且在其他方面尽他所能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支援。奥立芬在一八五一年六月十日死在回美途中的开罗，《中国丛报》哀悼说：“这使传教事业失去了一位最热心的支持者和最精明的顾问。”^①以上事实说明，美国对华传教事业，从一开始就是与美国大资本家相联结的。资本家既然出了钱，传教事业就必然地要受到美国资本主义直接或间接的控制。

一八二九年十月十四日，停泊在纽约码头旁的“罗马”号货船的甲板上，聚集了几十个为裨治文和雅裨理送行的人。这是一艘属于同孚行老板奥立芬的船，正满载着美国货物，将要驶往中国。他们在船上举行了欢送仪式，克拉克牧师领祷，“他为中国人，为海员，为传教士，为船长和水手，为我们的朋友们祈祷，结尾时把我们全体付托给上帝。埃瓦茨牧师又同我和雅裨理谈了数分钟，叮嘱我俩要团结，象弟兄般地互相帮助，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我们的事业。在我们一切工作、收获以及陈述中，都要保持忠诚和严谨”。

奥立芬还特意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广州同孚行的负责人塔尔伯特，内称：“我很乐意向你介绍裨治文牧师，他是受美国公理会的委任，作为传教士前往中国的，他为此事业已献身。他的首要任务是掌握语言，使他有能力使用中国话担任上帝的传道者，在情况需要时也要在外国侨民中传福音。公理会决定开始在中国传教，是由于我的捐助而成功的。我愿意对凡愿担任此项工作的人，免费乘船并在中国免费居住我的房子一年。这是我和公理会为裨治文订的合同。我命你一定要为我做到：给裨治文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51年9月，第509—511页。

一个房间，一名仆人，给他洗衣服，在你的办公桌旁添一张椅子，所有开支全由我负责。由于你已经晓得我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也了解我的意图，我就不必在此作解释了。裨治文先生为了完成他的传教目标所需要的其他款项，公理会已给了他一张支票，我将感激你以最好的兑换率给他提款。……”^①

“罗马”号汽笛声响，送行的人都上了岸，裨治文和雅裨理在甲板上频频向送行者挥手告别，船徐徐驶出了纽约港，先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颠簸，在绕过好望角后，又向印度洋进发，航行了四个多月之后，终于在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二日驶抵中国澳门，受到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欢迎和接待。二十五日乘船离开澳门，当晚九点到达广州，由美国商人把他接进了美国商馆。从此，第一批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开始了他们在华的冒险家和先遣队的生涯。

英文《中国丛报》的出版

裨治文在广州美国商馆里，受到塔尔伯特和其他美国商人的款待。他们按照奥立芬的指示，为他安排了生活。裨治文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直接指导下，开始学习中文。广州的一切与马礼逊二十三年前到此时并没有多大改变，外国人仍被限制在十三行进行贸易，只是鸦片走私大幅度地增加了。中国依然是一个封建闭关的独立国家，视洋人为蛮夷，禁教政策仍然不变，经济落后，人民受着地主阶级及其代表清朝皇帝的残酷压迫，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权继续顽固地用一切手段维持其固有的

^①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37—38页。

社会秩序,阻碍着中国的进步。

但是,欧、美资本主义却比二十多年前更加发展了。英国的自由商人一直在呼吁停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英国的工厂主正在海外寻找新的市场,第一艘使用蒸汽机发动的火轮船“福布斯”号,已经首次出现在广州与澳门的水域上;美国正在步英国之后尘,到东方来进行新的扩张。

外国资产阶级颇为懂得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为了入侵中国,必先了解中国。马礼逊早已看到这一点,他虽然已经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但一个人究竟力量有限,现在美国传教士来了,不久美国公理会又送来了一部印刷机和一套英文活字。他于是倡议由美国人在广州办一份英文刊物,以便向欧、美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为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提供依据。马礼逊的倡议,得到美商奥立芬的积极响应,除了答应免费使用公理会送来的印刷机器外,还表示“愿意承担出版方面的亏损”,免费拨给一所楼房,作为编辑、印刷的用途。^①他们决定聘请裨治文为编辑,并把刊物定名为 The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每月出版一期。

英文《中国丛报》创刊号于一八三二年五月在广州出版,裨治文在当天写的“日记”中说:“今天开始编辑中国丛报,愿它从开始时起以及在前进的过程中,全部地成为上帝的工作;愿它所有的印页都充满真理,将能促进上帝的荣耀,和他所造人类的幸福。”^②

《中国丛报》旧译《中国文库》、《澳门月报》,日本人译作《支

① Frederick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第78页。

②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74页。

那丛报》。一八三二年五月到一八三九年五月在广州出版,由于英国武装入侵广州局势趋紧而迁往澳门出版,一八四四年又从澳门迁往香港出版,一八四五年七月重返广州出版,到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停刊,前后连续出版长达二十年,也正值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二十年。由于《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调查报告,刊登了有关鸦片贸易、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提出了各种侵华的主张,因此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发轫和早期中外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各国史学家都很重视这个刊物。日本丸善株式会社在岩井大慧主持下,曾于一九四一年起将该刊重新翻印,出版至第十五卷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化而未印完。它与林则徐在广州辑译的《澳门月报》无关,事实上也没有出版过《澳门月报》。

裨治文自始至终担任这个刊物的编辑,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一八三三年十月到达广州后,被指定为该刊的印刷者和发行人,不久他也参与了编辑工作,一直到停刊时为止。所有参加编辑和为该刊撰稿的人,都不拿津贴和稿费,这个刊物不属于任何基督教差会,经费除奥立芬承担一部分外,广州的基督教联合会也支援一部分。发行对象为欧、美各国政府及商业团体和在华外侨,以及在南洋活动的传教士等。

《中国丛报》的创刊号“发刊词”,是由裨治文执笔的。他向英语读者说明该刊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进行评论,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关于博物方面,最适宜和有利的是,调查下列情报:气象,包括气温、风、雨及气象对健康的影响;土地,包括矿藏、植物、畜产、土地肥沃程度及耕作状况,还包括江、河、海中的出产;……关于商业方面,必须特别引起关注的是,要调查其过去到现在的发展情况,特别

要考察当前商业状况的利弊；……关于社会关系方面，必须对社会结构详细调查，在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时，要求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仔细地和时间不间断地观察。……我们对中国人的宗教特征也感到兴趣，将给予非常强烈的关注。……”^①

由此可见，《中国丛报》主要目标是搜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提供给资本主义各国参考，在此基础上，该刊还提出各种政治主张，为资本主义的入侵出谋画策，报道和反映中外贸易的发展情况；与此同时，《中国丛报》还翻译介绍了有关中国历史、宗教、农业、儒家典籍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作品，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桥梁作用。

英国资本主义最后使用大炮轰开封建中国的大门，这是与《中国丛报》长期鼓吹对清政府采用强硬政策，煽动使用武力以入侵中国，是分不开的。从一八三四年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对清政府官员进行讹诈遭到失败后，《中国丛报》就不断出现好战的言论。这年十二月九日，在广州的全体英侨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竟然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军舰和军队，来华迫使清廷签订条约，要求增辟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等。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公开表示支持，说：“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能达到他们所提出的全部要求。”“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她的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②

过了一个月，裨治文就迫不及待地叫嚷：“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2年5月，第1—5页。

^② 同上书，1834年12月，第345—363页。

往。”^①一年之后,《中国丛报》在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一文中,明确主张使用武力强迫中国订立一项不平等条约。裨治文为该文写了编者按语。该文在追述中外关系的历史后,写道:

“最近在沿海的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货船。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些他们自吹自擂的英雄们,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有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中国虽然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有三亿六千万众多的人口,却是一个极端孱弱的国家。……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她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编者按语]我们完全同意我们的通讯员所说的,我们还是学会应该怎样对付一个高傲、半开化、专横的政府。……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②

一八三六年十一月,《中国丛报》登载了格拉斯哥东印度协会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一份《备忘录》,其中所提的八条意见,后来成为中英不平等条约的雏型。^③

鸦片战争爆发后,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报道了战况,和交涉的全过程,而且还编撰了每月大事记。裨治文狂妄地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④在随后的岁月里,一直到一八五一年停刊时止,《中国丛报》继续向欧、美报道中外关系和中国社会变迁的情况,直到最后出现有关太平军在广西起义的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5年1月,第406—416页。

② 同上书,1836年2月,第441—449页。

③ 同上书,1836年11月,第334—336页。

④ 同上书,1849年5月,第2页;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114页。

一些报道。由于裨治文一八四七年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活动,《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主要由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负责。但卫三畏后来也直接参与了美国对华的外交活动,没有多少时间兼管。另外也由于在华各开放口岸陆续出版了一些其它的外文报刊,《中国丛报》的发行量随之逐渐减少,裨治文经过与在华各方面的外侨商议,决定于一八五一年年底停刊。裨治文如果没有一点事业心,在一个没有经费保证和处在激烈动荡的时期内坚持办报二十年,是难以想象的。这一套有二十卷、厚达一米的英文《中国丛报》,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研究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的第一手资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早期广州外侨成立的几个团体

早期在广州的外侨,为了配合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日益加紧的政治和经济的入侵,曾联合发起组织一些团体,裨治文在这些团体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是由广州外侨于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成立的,推举英商马地臣为会长,美商奥立芬为司库,裨治文、郭实腊、马儒翰为秘书,英国商务监督德庇时和驻广州各国领事为名誉会员。该会标榜的主要宗旨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报给他们”。^①在该会的通报中写道:“我们现在作这个试验,是在把天朝带进与世界文明各国联盟的一切努力失败之后,天朝是否会在智力的炮弹前让步,给知识以胜利的棕榈枝。……我们欢呼这项事业的开始,并欣然参与这一场战争。我们必定是胜利者,而被征服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4年12月,第378—384页。

者遇到的只能是共同的雀跃与欢乐。”^①

这个团体成立之后一年，在广州举行了年会，裨治文在年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称：“本会迄今还没有出版过一本书给中国人看。”会上改选另一英商查顿为会长。^②又过了两年，一八三七年三月十日在广州举行第二届年会，裨治文在所作的会务报告中，首先摆了一大堆困难，来为该会成立以来并没有“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中国人辩解，然后提出了一个看来规模不小的出版计划。可是直到一八三八年年底，虽有英、美商人的捐助，仅仅出版了二卷在新加坡编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把别人出版的《伊索寓言》节译本，拿过来算作是该会的出版物；另外出版了由裨治文翻译的《美利哥合省国志略》，可算是一本比较有价值的书，向中国人初次介绍了美国的历史、地理等一般知识，合起来一共出了七种书。裨治文这本书初版于一八三八年，在新加坡印刷、出版，署名高理文；后经增订，书名改称《亚墨理格合省国志略》，于一八四四年在香港再版；一八六一年，书名又改称《大美联邦志略》，在上海出版，署名裨治文。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都曾参考过该书的早期版本。

一八三九年以后，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武装入侵，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名存实亡，该会所宣称的要利用所谓西方“智力的炮弹”征服中国，及制订的颇为吸引人的出版计划，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几任会长都是大鸦片商，走私鸦片还来不及呢。

另一个团体是马礼逊教育会，这是广州外侨为了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去世，在一八三五年一月发起的。它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51年9月，第509—511页。

^② 同上书，1835年12月，第354—361页。

外,还要教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① 裨治文任筹备会的秘书。

一八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马礼逊教育会在广州美国商馆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理事会。十一月九日,理事会开会推举英商颠地为会长,英商查顿为司库,裨治文为通讯秘书,马儒翰为文书。^②

裨治文在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认为:“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荣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他的结论是:“以上的简要叙述,已足够表明对中国的高等和普通教育的各部门作出改进的前景,几乎是无止境的。……按照中国的俗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旦开始行动,就必须继续干下去。这样做,教育将被推广。如此,整个中国人将会受益,我们的事业最终会成功。”^③

裨治文连续向英国和美国发了信,呼吁派遣教师到中国来办学,一切经费均由马礼逊教育会负担。英国方面没有反应,美国方面在耶鲁大学几位热心的教授们帮助下,推荐了该校毕业生塞缪尔·布朗到中国办学。布朗带了夫人,于一八三九年二月到达澳门,在裨治文的领导下,筹办起一所马礼逊学堂,于同年十一月四日开学。中国著名的改良家容闳,以及著名西医黄宽等,曾经是该校的学生。在布朗的主持下,马礼逊学堂不但教中文,还教西学,包括数学、历史、地理等知识和英语,学生的知识面远比当时一般的学塾开阔。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6年12月,第376页。

② 同上书,1836年9月,第298页;1836年12月,第376—381页。

③ 同上书,1836年12月,第379—381页。

鸦片战争结束后，马礼逊学堂迁至香港继续开办，仍由裨治文负责监督。一八四五年之前，马礼逊教育会一直由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在这之后，改由裨治文任会长，香港总督德庇士为监护人。一八四七年，布朗回美时带了容闳、黄胜和黄宽三名学生赴美留学，后来布朗没有再到中国办学，不久由于师资和经费缺乏，马礼逊学堂于一八四九年停办，裨治文这时已不在香港。马礼逊教育会在一八四八年九月三十日举行了第十届年会后，就再也没有开过会。

一八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广州成立的另一个外侨团体是中华医药传教会。裨治文也插手其间，担任该团体的副主席，但主要业务由美国传教医生伯驾负责。以上几个团体，除了马礼逊教育会办了一所学校外，其余团体并未开展多少活动，而参与的头面人物，却都是些鸦片贩子，随着英国直接使用武力入侵，这些团体先后销声匿迹。

裨治文赴虎门观察销毁鸦片

一八三九年年初，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到广州禁烟，到五月份共缴获英、美鸦片走私贩二万余箱鸦片，经清廷批准，定于六月三日起在虎门陆续全部销毁。林则徐邀请在澳门的外国人，前来观察。裨治文经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人商议，并事先拟好了呈钦差大臣的文书后，偕金查理等人于六月十五日乘“马礼逊”号从澳门出发，前往虎门。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写了一份关于这次观察的极为详尽的报告，前半部分讲的是检查销烟的情况，主要内容如下：

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

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这就更希望能容许外国人前往销毁烟土的现场察看。因此，我欣然利用这次机会，决心到那从未见过的场面，去作一个目击者。对钦差大臣直接监督之下进行销烟工作的忠实性，作一番详尽而实际的调查和考察。……

镇口是一座位于小河东的狭长的村庄，由北而南约三分之一英里长。被选择堆放和销毁鸦片的地点，是在小河岸边离村子北头不远的山坡顶上，包括一块四周种满竹子的约四、五百平方英尺的空地。当我们的船经过村子时，出现了成群的观众，有的在船上，有的在屋顶，有的在山坡上。在我们驶近登岸处时，战船和帆船一齐擂鼓致敬。……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中国人好象很高兴看到我们小艇的到来。我们周围的场面，总的说来是愉快的，和有点令人赞叹的。但这项工作的本身，仍有些使我感到忧愁和烦恼……

我们可先去详烟检查整个销毁烟土的过程，然后再谒见钦差大臣……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检查每一个部分，需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需要多么详细就多么详细……

到十一点半钟，我们已反复检查了销毁烟土过程的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中进行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各方面的监督工作，要比外国人扣留在广州时明显地严格得多……

我对在沟里销毁烟土的检查，感到非常满意。在这之后，又问我们是否已准备好去谒见钦差大臣。他们给金查理夫人在靠近船处的一间哨所里，放了一把椅子，给她沏了茶和端来了茶点，让弁逊船长陪着她。面金氏和我二人，则

由卢和王带领前往围场东面钦差大臣的驻地。

裨治文报告的后半部分，讲的是林则徐接见他和金氏的经过情形，主要内容如下：

当我们离开澳门时，我们简直没有料到，我们会那么快被引到现在所面对的、如此显赫高贵的人物面前。不管怎么样，我们决意充分利用中国人的温和，拉长我们的会谈，看一看和弄清楚这次机会究竟能有什么收获。我们按照中国方式，抱着适当的冷漠和应有的庄重，朝着接见厅的西首走去。我们在那里脱了帽，面向钦差大臣行了鞠躬礼……

尊贵的钦差大臣说，鸦片的毒害是逐步地、秘密地滋长起来的，过去由于当局制止不力，现在已到了不能再容忍的时候了。他说，这种违法交易，现在必须制止；而其它贸易，则应受到保护。钦差大臣在这一点上，热烈地谈了很长时间，接下去他写下了以下条书面意见：

凡各船进行正当的和体面的贸易，并确与夹带鸦片的有害行为无关者，保证给予加倍的照顾，而且不受任何阻难。

凡各船进行秘密的鸦片买卖，将坚决查验和严厉处分，决不向他们开恩和宽容。

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善者放下一切担心，自由地经商，不必疑惧会受到阻难。对于那些作恶的人，只准他们及早回头，改变经营，抛弃他们所有的幻想。

在谈话的过程中，金氏呈上钦差大臣两个文书，一是涉及他自己的几条船，请求批准进港经商，如同以前一样。对此，钦差大臣说可以批准。在第二个文书中，在婉转地提到最近事态所造成的不愉快和危险形势之后，敦促对不公正

地蒙受的一切损失应予从速赔偿,应提供充分的安全保证,不再干扰正当的贸易。应明确宣布,只反对鸦片贸易并从严处分。为了革除目前存在的坏事,并防止其再次发生,为了维护和平和发展商业,本文书建议:港口税应根据货物量固定其税额;在北方增辟三个港口,对一切外国人开放;准许商人带家属住在一起;所有一切犯罪案件,被告人应由其本国领事审讯,并和中国地方法官一同会审;允许在京都驻节全权使节,接近皇帝,等等。

钦差大臣极为具体地询问了关于从港口撤退的英国人的意图,还询问了同英国女王和其他欧洲君主们通信,应采用何种最相宜的方式,以取得他们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合作。他还向我索取地图、地理书和别种外国书,特别要一本马礼逊编的字典的完整本。

在会谈中,从谈话和询问的整个倾向看来,似乎非常明显:钦差大臣的唯一目的,过去是,现在还是,要禁绝鸦片贸易,而对合法的、体面的贸易则加以保护和维持。这从他的谈话的态度和内容,都充分地体现出来。说实在的,不时地、或多或少地对祖国和君主的偏爱,以及对一切别的国家的漠视,乃为大政治家所特有。在整个过程中,钦差大臣是和蔼的、轻松愉快的,一点也没有表现是“野蛮的或粗鲁的”。看样子,他不超过四十五岁,矮矮的个子,但相当结实,有一副光滑全圆的脸庞,细长的黑胡须和一对敏锐、乌黑的眼睛。他发音清晰,语气明确。他的容貌显示出是一个习惯于深思熟虑的人。他只笑了一次,几乎笑出声来,那是在金氏拒绝回答公行或员的特征的时候。他提问说,公行内那些人是不是好人?金氏没有回答。他对我们提供的英国海军实力,特

别是火轮船的实力，似乎很不合他的口味，有一两次他皱起了眉头。

在向钦差大臣告别之后，我们和先前进来时的方式一样被带领出去，随后又给我们送来了一大批礼物。下午五点钟，我们已在回澳门的途中……第二天日落时分，我们抵达澳门。我们对这次旅行感到非常高兴。^①

裨治文写的这份报告表明，林则徐严格地执行了销毁烟土的命令，使传教士和其他在现场观察的外国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加忠实的了。”诚如著名的马克思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说：“这一伟大行动，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坚决心，一洗百余年来被贪污卑劣的官吏所给予中国的耻辱。”^②

与此同时，林则徐还向裨治文明确地重申清政府的政策，即严格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从金查理呈给钦差大臣的第二个文书中，值得注意的是：是美国人向清政府第一次提出了未来中、英不平等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裨治文在其中是主要的谋士。

同年九月，林则徐曾致函裨治文，约裨治文到虎门口，会见他的一个代表。裨治文于九月十一日到镇口，会晤了钦差大臣的代表，但没有公布谈话内容。据英文《中国丛报》一八四〇年初的记载透露：“在去年六月和九月两次访问镇口时，对或许会发生战争，曾作为会谈的一个题目。我们方面极力主张，目前存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9年6月，第70—77页。

^②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20页。

在的纠葛，不应当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试用兵力只能加重目前的祸害，根本不可能使它缓和。一旦掀起战争风暴，无人能预料它将何时和如何终止。每次争论都常常给我们反复地回答说：打仗不怕。当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显然准备孤注一掷于‘战争的运气’，令我们很是痛心。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证明一点也不切望应予避免的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① 裨治文是在向林则徐进行战争讹诈，而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林则徐，用“打仗不怕”的凛然正气的回答，击退了传教士的“和平经”的说教，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已是不可避免。林则徐在发动群众一起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旬日之内，大小接仗六次，俱系全胜”。^② 迫使英国侵略军改变作战路线，沿海北上向防务空虚的福建、浙江进攻。恰巧在这时，美国纽约大学决定授予裨治文神学博士学位的通知书，送到了澳门。

《望厦条约》签订期间的裨治文

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留在广州的全体美国侨民联合上书美国国会，要求美国政府利用这个时机，迅速派军舰前来中国，以便在中、英冲突中，伺机捞到好处。他们提出的具体要求有：一，准许外国使节驻在北京宫廷附近，并享有外交特权。二，公布而定税则。三，关栈制度，或某种货物转船复出口的章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40年1月，第444页；1839年9月，第270页。

^②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册，第241—243页。

程。四,在中国其他一个口岸或数个口岸自由通商。五,封禁合法贸易所受损失的赔偿,及今后的保证。六,领事裁判权的要求等。美国政府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派遣加尼海军副少将,率领两艘军舰到中国,给英国侵略军助威。裨治文被任命为加尼的翻译和助手。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裨治文就怂恿加尼向清政府勒索“最惠国待遇”。这个所谓“最惠国待遇”,是美国的发明,最初写进了一八四三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后来写进了每一个中外条约之中。

一八四三年五月,美国政府决定派出以顾盛为首的使团来华。他们一行于一八四四年二月到达香港,顾盛曾聘裨治文和伯驾,担任使团的秘书和翻译,后来又请卫三畏帮办中文函札事宜,裨治文还被推为使团的牧师。这几个传教士竭力为美国使团出谋画策,终于签订了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据裨治文的“每月纪事”中写道:“中、美《望厦条约》已在七月三日在望厦村缔结并签字……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整个举止,改变得多么大啊!中国与其余世界的关系,又改变得多么大啊!在华外国人的处境和状况,改变得又有多么大啊!显而易见,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全能者之手明显地导演着这些运动,上帝的旨意将获得推行,而不再受到阻挠。……”^①以征服者自居的、极端狂妄的姿态,溢于言表。《望厦条约》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同时还确立了所谓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裨治文和其他美国传教士,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顾盛专使回美国后,在一八四五年二月十日写信给裨治文,除通知他美国国会已批准《望厦条约》外,还告诉他已向美国政

^①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126页。

府为裨治文和伯驾请功领赏。因他们为美国政府作出了“无法估价的服务”。过了一个星期，顾盛又写信给美国国会的牧师塔斯廷，告诉他在华美国传教士在条约谈判中所起的作用，顾盛写道：“事实是，此和中国的谈判，美国传教士特别是裨治文和伯驾，所提供的服务，若非不可缺少，亦是最重要的。他们具备懂得中国语文的稀有资格，使他们能担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详细了解，使他们成为无法估价的顾问。”^①

裨治文这时已在中国活动了十五年，初来中国时是二十九岁，现在已是四十四岁的中年人了，风尘仆仆，为了美国在华利益还顾不上结婚。这次《望厦条约》签订，既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表彰，又在香港遇到了年轻貌美的伊莱沙小姐，他们终成眷属，一八四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在香港教堂举行婚礼。^②裨治文夫妇在香港活动了两年，于一八四七年六月奉差会之命，调往上海参加修改《圣经》译本，和开辟上海传教区的活动，同时还兼任英文《中国丛报》的编辑。一八五二年，裨治文曾带家眷回国休假一年，一八五三年五月重返上海。

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一八五八年向美国国务卿卡斯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得不再说一句，传教士与那些和传教事业有关人们的学识，对于美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充当翻译，公务就无法办理。我在这里尽责办事，若不是传教士们从

①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130—134页。

② 同上书，第135页。

旁协助，就寸步难行，对于往来公文或条约规定，我一个字也不识、不懂和不会写。一八四四年的情形就是如此，顾盛的翻译和公务上的助手，也都是出诸这一类人的手。裨治文博士在一八五三年之于马沙利，在一八五四年之于麦莲，于一应公务上都是主要的助手，他现在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对他不时地给予的帮助和经常最可贵的出谋画策，我得藉此机会向他表示感谢。”^①可见裨治文到上海后，并非埋头书桌翻译《圣经》，而是继续为美国政府在华利益效劳，并且得到美国公使的赞赏。

这时英、美、法等国政府对同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所给予的特权，早已不满足。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为此与裨治文等商议后，于一八五三年七月会见两江总督怡良，要求修约，“要求中国皇帝宣布中国境内容许宗教自由，批准一切同中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的外国人，在中国全境来去自由”，“开放长江及其支流”，和“设立外交机构”等。一八五四年，美国政府政派麦莲任驻华公使，继续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

但是，新兴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运动，自一八五一年金田起义后，所向披靡，于一八五三年建都南京。为了探明太平天国的虚实，英国和法国的驻华公使先后亲赴太平军辖区，进行实地调查，并在表面上都宣布了中立政策。于是，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也决定亲赴太平军辖区调查。为此，他带了裨治文同行，乘坐美国军舰“塞斯克哈”号于一八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经过镇江到达南京。他们作了为期六天的详细考察，裨治文除担任翻译外，竭尽所能搜集天京的一切情报。

麦莲一行返回上海后，裨治文把在太平军辖区调查所得材料，写成一份长篇报告，分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北华捷报》

^①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472页。

和美国出版的《传教先驱报》上。《北华捷报》上登载的内容，主要如下：

一、他们的政府是神治主义的，是由他们所相信的一种新宗教制度发展起来的，是和以色列人一样的。他们自以为是受着一个人所指导，此人为上帝所高举以行施其旨意于世上者。他们相信其政治组织是受天神直接指导的，据称他们的领袖们有时被召上天，而有时天神降临附在他们的身上。

二、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换句话说，也许是一个既可见又不可见的机构……

三、他们的政府又是王族的专制政体……

四、这个王族的兄弟辈，还号称为天下万王之王。至于世上各国各族究竟是怎么样的，究竟有多少，权力如何，诸王与其弟兄们无疑地是毫无所知的。然而，他们宣称统治天下的话却直截了当，毫不含糊……万国既然都应当服从和敬拜独一无二真神，那就必须臣服天王，并用珍异百宝向他进贡……

五、他们的政府，当前在行政管理方面是强有力的……

六、他们维持秩序与执行纪律，同行政管理同样得力。在新政权下，鸦片和烟草一律严禁，烈性的饮料也被禁止。……在他们的圣城中，秩序与纪律堪称完善……凡不规矩的行动，或犯法的行为，皆迅速纠正或惩罚，这在中国是罕见的……

七、他们的宗教信条虽也承认《圣经》的全部或大部分

教义,但由于无知或刚愎自用,或两者兼而有之,因此错误甚大。他们的政体虽是混杂的,但其宗教性很强。他们仍无一个教会……也许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而其实则都是严格的打倒偶像主义者。他们已大概得到《圣经》的新、旧约,并且正在印行郭实腊的译本……。我们的礼拜六,却是他们的礼拜天,但他们并没有公众礼拜的会堂,也没有牧师,他们举行家庭礼拜,编有各种祈祷文和感恩文等。人人都要背熟和施用,甚至不识字的,也不能例外。我们多次看到他们的礼拜仪式,有些极为恭敬和虔诚,有些则相反。多数一被询问,迅即能背诵十款天条,即在他们官书上所载的。关于天神,他们一致称呼为天父。

八、有人问及他们文学上的特征或性质如何,他们的一般智力如何。答复这个问题,只可于其书籍及文告中得到唯一的资料……他们并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世界各国……

九、他们的社会状况我们获知甚少,他们至少有共同的利益。古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似乎仍是他们的概念。但不知这个概念有何法律根据……

十、他们的实力的数目和领土的界限,并不是不可计算的。据称他们已占有镇江沿江上游达四百英里,除了驻防在镇江、瓜州和天京的大军外,尚有四支大军在外作战,进攻各处,两支北伐,一支在运河沿岸,一支西征。四支大军是分途合作的。计划北伐军光复北京,并摧毁它之后,即向西直入山西、陕西、甘肃,而进入四川。于此即与其他二支大军会合,因预计其他二支大军将由江西、湖南、湖北,沿长江南岸西上,与先前入川的二支大军会合。

十一、他们的装束，男子的武装与女子的骑马，确是创见……他们的兵器与军服，类皆采用中国古式的。他们头戴红色或黄色头巾，蓄长发，穿绸缎的袍服，与黑髮军大不相同，好象这些革命军人属于另一种族。所有我们遇见的人，都是有衣有食，百物供应也不匮乏。他们满意而精神饱满，深信必定能够成功。

十二、在上帝的奇妙旨意下，可能他们将攻克十八行省，攻破各大城，杀戮满人，扫灭清政府统治的一切痕迹。当他们每到一处，其地的人民与旧政权的人物，必定魂飞魄散，造成极大恐怖，而皆逃避一空，象暴风中的飞絮一样。至于企图创立与巩固一个新的帝国，象咸丰的祖宗所创之业那般辽阔与富庶，却未必能成功，是大不可必之事。

十三、至以目前事实而论，他们对于外国人的态度如何，乃成为极严重的事件，和颇令人感到兴奋的问题……这般结为兄弟的王爷和大臣们……如果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他们会承认原来中国同英、美、法各国所签订的条约吗？可以断言，他们必定不会承认的。除非是在压力之下，或他们肯由高超地位自行降低……①

从以上裨治文写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裨治文对太平天国革命是敌视的。麦莲同裨治文考察太平军辖区返回上海的途中，即打算由美国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昆山停留时，他偕裨治文一同会见两江总督怡良，公然提出：“如蒙大皇帝钦派便宜行事之重权大臣前来，议定规条，美国情愿随同官兵，从上海起一路剿办逆匪，开通长江。”② 美国后来公然利用洋

① North China Herald. 第208号, 1864年7月22日。

②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册, 第33页。

枪队与清军联合镇压太平军，以及利用传教士不断地到太平军辖区刺探情报，和企图说服其领袖的一系列的侵略中国的行动，就是所谓“洋兄弟”对待太平天国革命的态度。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裨治文继续充当美国驻华使馆的重要谋士，特别在决定英、法联军一同北上，对清政府进行战争恫吓中，裨治文“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受到当时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的褒奖。与此同时，他在上海还频频与英、法、俄等国驻华公使接触，提出侵华主张和代译文件等。^①可见，这位由美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对于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的兴趣，已大大超过其传教的热忱。他早已把公理会差会部给他的指示：“到中国人中间去推广福音”，置之脑后了。

晚年在上海

一八五六年，上海外侨组织了一个学术性团体——上海文理学会，推举裨治文为第一任会长。裨治文致开幕词，他一开头就以轻蔑的语气，声称中国“无论在文学和科学各个方面的成就，都远远不及基督教国家”。他提出，要以上海作为东半球的中心，把欧、美的影响扩展到这个巨大帝国的最远方去。他要求所有参加学会的成员，“竭尽全力，使所做的一切工作，能立下光荣的功绩，有益于我们这一代人，在各个方面增添上帝的荣光”。^②这是外国人在上海建立的一个学术性团体，一八五八年改属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为该会的上海分会，中文名称为亚

①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 234 页。

② 同上书，第 215—217 页。

洲文会,它的宗旨是考察中国的社会,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向欧美介绍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接待各国学者的来访或考察,出版学会年刊(英文全名为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创办图书馆和博物馆等。一八五九年裨治文辞去会长职务。^①

一八五七年,裨治文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盛大招待会,以纪念马礼逊来华五十周年。应邀参加的传教士、外国使团和商业团体的负责人,共有七十一人。裨治文主持了纪念活动,并发表了长篇演说。裨治文是他们当中唯一与马礼逊有过交往的传教士。他在演说中回顾了基督教在古代曾有两次输入中国的历史状况,第一次是景教在唐代的传播,第二次是天主教在十三世纪的输入。而半个世纪之前马礼逊输入新教的状况,则与前大不相同。基督教已经在开放的五口和香港建立了基地。但是,裨治文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所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困难重重,难以前进。为此,他向与会者竭力打气,新教传教士既已在此开辟了基地,就必须“勇往直前”。其他各派新教的负责人,也在会上介绍他们在中国活动的情况。传教士们寄希望于英、美、法政府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迫使清政府给予进入内地活动的特权。虽然在会上一再有人领祷,祈求上帝的帮助,但他们的信心却是不足的。^②

由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与英、法、

① 亚洲文会在—八七—年由英国政府拨款在上海虎丘路建造永久会所。到—九三—五年,该会拥有一个藏有一万册图书的图书馆,和收藏中国博物的博物馆,会员有八百五十二人。亚洲文会在—九五—〇年停办,藏书及文物分别划归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

②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220—222页。

俄、美四国于一八五八年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传教士从此获得深入中国内地活动的特权。裨治文迫不及待地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的母校全体师生，向他们报告条约的这个内容，称它是“出于耶和華之手，是上帝的旨意，使这件事取得成功。在我们的眼里，这项工作做得很出色。由于这个奇妙的开放，我们将称颂他的圣名，并鼓起勇气来。”接下去，裨治文向他的母校发出呼吁，特别向神学生们呼吁：“你们来吧，快点来吧，愈快愈好。你们到教堂里去，到牧师的家里去，到海外传教团体那里去，对他们说：‘请派遣我们，’‘请派遣我们到中国去。’”信的末尾，裨治文引了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中，“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一句，要求美国基督教青年，能大批地前来中国活动。^①

自从裨治文在美国资本家奥立芬资助下到中国以后，一直与奥立芬家族保持联系，向他们汇报在华活动的情况，以及提供他所搜集到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的情报，并且还向他们请示机宜和要求继续捐款。一八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裨治文写给小奥立芬的信，可能是他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了。信中处处流露出殖民主义者的做态。^②从一八四七年起，裨治文就开始着手对《圣经》译本的修订，经过十余年时间，直到他去世之前，还只修订到“旧约”《以赛亚书》。

裨治文于一八六一年十月患痢疾，不久就卧床不起。守候在旁的，除他妻子外，还有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文惠廉，和刚从日本来访的前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到十一月二日，裨治文在上

①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 228—232 页。

② 同上书，第 257—258 页。

海去世，遗体葬在上海，终年六十岁。

文惠廉在上海英文《北华捷报》上发了个讣告，简单叙述了裨治文的生平，对他备加赞扬。文中特别提到裨治文曾经画过一张极为详细的长江流域的地图，这是耐人寻味的。^①裨治文去世的消息传到美国，前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和梁发的儿子梁进德等，先后向他夫人发来了慰问信。梁进德还汇来二百元墨银给裨治文夫人，要她在裨治文的坟上树一块“美丽而坚固的石碑，以纪念这位已故的我的父亲和老师”。^②

裨治文的夫人根据她保存的一部分裨治文遗留的资料，编写了一本《裨治文传》（英文本），于一八六四年在纽约出版。同年，裨治文夫人还在北京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贝满女塾，以纪念她的亡夫。

① North China Herald. 第 208 号, 1861 年 11 月 9 日。

② Eliza Bridgman ed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第 267—270 页。

郭 实 腊

(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

郭实腊(又译作郭士立、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是普鲁士传教士。他既传教,又充当间谍,走私鸦片,直接参加过英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他曾大言不惭地宣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①

来 华 之 前

郭实腊于一八〇三年出生在普鲁士东边一个人口约五千余人的小市镇普立兹。他小时候当过铜匠的学徒,但他向往到外国游历,为此目的,他苦学了不少航海知识。消息传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一七九七——一八四〇年在位)的耳中,国王传旨命他学习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准备将来派他到君士坦丁堡,参加普备士使馆的工作。但郭实腊并未遵照国王的旨意,而是放弃了这个未来的美差,选择了献身宗教事业的道路,前往荷兰,考入鹿特丹神学院读神学。

一八二六年,郭实腊二十三岁,在鹿特丹神学院毕业,接着被封立为牧师。他决意到海外去充当一名传教士,于是接受了荷兰布道会的派遣,到东方荷属殖民地去传教。一八二七年,郭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2年8月,第140页。

实腊抵达爪哇，在日惹开始传教活动。但郭实腊的主要目标是想到中国传教，因此开始学习福建话和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一八二八年四月，郭实腊乘船前往暹罗，在曼谷受到葡萄牙领事的接待，并给予活动场所，使他得以在华侨中间开展传教活动，并继续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

一八二九年，郭实腊脱离荷兰布道会，接受伦敦传教会传教士史密斯的邀请，到新加坡活动。不久又前往马六甲，参观伦敦会在那里建立的活动基地，但他并未正式加入伦敦传教会。^①郭实腊只是协助伦敦会的部分工作，接受过该会的一些津贴。他这时已成为独立活动的一个普鲁士传教士。一八三〇年，他在马六甲与一位英国小姐纽厄尔邂逅，不久举行婚礼。但好景不长，他的新婚夫人一年之后就在曼谷去世，使他孑然一身，从此下决心当一名冒险家，到中国沿海开始他的间谍生涯。

郭实腊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

郭实腊第一次窜到中国沿海侦察，是在一八三一年前后。伦敦会得知他将冒险赴中国沿海活动，赠给他一大箱《圣经》和福音书及一些药品，他自己还携带了航海图和测给仪器，同时改用了中国姓名，穿上了中国服装，冒充中国人。据郭实腊自己说：“我早在离开暹罗之前就已归化中华帝国，成为其国民了。我采用了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取名士立，偶而也穿中国服，已被认可为该大国的一份子。”^②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51年8—12月，第551页。

^② C.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第71页。

一八三一年六月三日，郭实腊登上一艘二百五十吨的中国货船。这艘船是一个前来曼谷做生意的福建商人的，他征得了这位商人的同意，住进了水手的船舱里。在船启航后，郭实腊就与水手们混在一起，给他们看病，通过聊天了解中国沿海情况。

这艘货船航行的路线第一站是海南岛，然后沿海北上，经过厦门、台湾、定海、宁波、上海，终点站是天津。郭实腊一路上记录航海路线和港口水域的情报，并利用向群众散发宗教书籍和治病的机会，接近中国人，了解各停靠口岸的民俗风情和经济情况。

到达天津后，郭实腊暂时住在船上继续他的侦察活动。那年中秋节，一位住在天津的福建商人邀请郭实腊到他家过节。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很快就被人们认出，他不是一个人。

郭实腊此行的另一目的，是企图潜入北京城，刺探清政府所在地的情报。但他苦于不会说北方话，又不认识高级官吏，与福建商人商议，也无法解决。于是，他在天津搜集到足够的情报后，于同年十月十七日乘船离开天津南下，十二月十三日抵达澳门，受到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的接待，向马礼逊汇报了此行的详细经过。

郭实腊在总结这次在中国沿海侦察的经验时，写道：“读者们读了这些叙述之后，应该记住，这不过是今后必须继续要做的事情的一个微弱的开始，我们盼望和祈求仁慈的上帝能很快地打开更为宽阔的入口，只要上帝赐给我们健康、力量和机会，我们将为此努力下去。为了打开一个与中国自由交往的局面，我真诚地希望能采取一些更为有效的措施。如果我能够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加速这件事的进程，我将感到极为荣幸。”^①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2年6月，第61—64页；1832年7月，第81—99页；1832年8月，第122—140页；1832年9月，第180—196页。

郭实腊首次在中国沿海航行的消息，迅速被在澳门的英、美商人获悉，郭实腊为此应邀向东印度公司和鸦片商人们详细报告他在中国沿海停靠的各个口岸的情况，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东印度公司决定聘请郭实腊陪同该公司的高级职员胡夏米等，乘坐该公司的走私鸦片的“阿美士德”号到中国沿海作第二次侦察航行。郭实腊说：“此行目的，是搜集中国各港口是否有可能开展贸易的情报。公司方面指示我们不准使用武力，除非出于自卫。要采用各种方式安抚当地百姓，以便建立永久性的贸易关系。”公司任命郭实腊为此次航行的向导兼船医，船长李士“是一位能干的水手和测量员，他急于要绘制中国各个港口的精确的航海图。我们还带了一名制图员”。^①

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郭实腊带了东印度公司胡夏米一行，乘船从澳门出发。临行前，东印度公司大班马治平，还给胡夏米专门发了一个“秘密指示”，要求他“查明这个帝国北方能逐步地最适应于向英国商品开放的口岸，究竟可以达到多远，中国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英国。”大班要求他还须弄清楚中国人对西方商品的“大致需求和可以开出的价格”，和中国出口货的价格，以及运输方面的问题。^②

郭实腊决定这次航行的路线是从澳门出发，沿途在厦门、台湾、福州、宁波、上海停靠，然后北上，经朝鲜、日本折返澳门。参照第一次沿海航行的经验，郭实腊随船带了不少基督教的宣传品、一些药物和大米，此外还有鸦片和测绘仪器等。

东印度公司对这次情报调查的要求是：探明中国沿海港口

① C.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第153—154页。

②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第4卷, 第332页。

的航道，测绘较准确的海域图，侦察港口及沿海地带清政府的防务和兵力布置，调查各地出产、商业状况、风土人情，及沿海走私鸦片的可能性等。郭实腊竭尽所能为这个罪恶的侵略行径效劳。

东印度公司的这艘间谍船驶经福建、浙江沿海时，胡夏米等已发现清政府的防务松懈，沿海城镇的经济技术都很落后。六月二十日凌晨四点，“阿美士德”号驶进了中国的重要港口吴淞口，企图到上海进行刺探，吴淞炮台的守军鸣炮十五响，警告该船离开。但是郭实腊不顾警告，命船继续前进。他们把船一直开到上海县城附近的黄浦江上，并立即登岸求见上海道台，但未能见到道台，于是郭实腊对胡夏米等说，既然进了城，就要利用这个机会“全面考察一下这个中亚细亚的巨大商业中心上海”。道台获悉他们擅自在城内活动，就令士卒去把他们领到道台府会见：

道台：“你们为什么不到广州去，在那里做买卖？”

胡夏米：“广州的买卖正处在混乱状态中，但这与江南省无影响。因为我们容许上海来的帆船驶入我们（英国）的港口，我认为我们的船也有权利开到这里来。”

道台（发怒）：“你们可以不准上海的船驶进你们的港口，把他们驱逐出去就可以了。”

胡夏米：“这是不行的。”

道台命令胡夏米立即把船驶离上海，但胡夏米、郭实腊阳奉阴违，一出衙门又在县城里乱窜，以后几天又跑到宝山、吴淞、崇明一带刺探情报。

郭实腊在六月三十日写的《日记》中，说：

我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的左侧，考察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这座炮台是一个极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

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差，点火口太宽，制造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要比炮手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由于中国长期享有和平，所有他们的军事工作已经陷于腐败。……我们还巡视了兵营……他们的武器极不一致，有些兵用大刀，其余用火绳枪，少数用矛等等……大部分军官都没有受过教育……工资低，收入极少，他们的地位一点不值得羡慕。许多将官都是满人，享有极高的工资。”^①

他们在刺探情报的过程中，如遇到有军人出来阻拦，就散发基督教传单，借口传教掩人耳目。郭实腊得出结论，说：“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到这里来，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②

到七月五日，郭实腊等再次窜入上海县城，购买了不少绸缎样品。郭实腊认为苏、松、浙是中国的商业要地，上海的重要性不亚于广州，使他感到必须想方设法渗入这个地区，才符合侵略者的利益。郭实腊等一行在上海作了充分的调查后，于八月八日上船继续向北驶去。

东印度公司利用郭实腊进行的这次间谍航行，共用了七个月时间。他们在九月五日返回澳门，向公司和英国政府作了详细的汇报。郭实腊写道：“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已充分调查清楚，并向商人和传教士作了报告，要他们对这些有利可图的地方引起重视。”^③

①②③ C.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and 1833. 第153—154、282—310页。

郭实腊在澳门顿时成为红人，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大鸦片商查顿以最优厚的待遇雇佣郭实腊，命他乘坐该商的走私鸦片飞剪船“气仙”号再次到中国沿海进行间谍和走私活动。于是，郭实腊在澳门住了一个月后，即起身参加第三次航行。

据大鸦片商查顿说，此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侦察如何在中国沿海扩大鸦片走私。查顿还答应愿意捐钱给郭实腊，用作传教之用。这次郭实腊北上，一直窜到东北奉天地区沿海一带，进行罪恶活动。直到次年（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才折返澳门。

郭实腊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在中国沿海进行间谍活动至少有十次，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仅他协助一个鸦片商到福建泉州走私鸦片，一次就使该商人净赚价值达五万三千英镑的银元，并在泉州建立了走私鸦片的秘密据点。^① 他向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提供的大量第一手有关我国沿海重要港口的军事、地理、政治和经济情报，成为日后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依据。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帮凶

自从第一个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一八三四年去世后，他的儿子马儒翰就接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翻译，到一八三五年二月，商务监督律劳卑又增聘郭实腊为翻译，年俸八百英镑。一八三六年，义律升为商务监督时，曾多次与郭实腊商议，如何在清廷内部销售鸦片。郭实腊献计道：“要路显官，尽为私人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尚。朝廷命官都嗜好鸦片，故倘以贿赂扩

^① Jack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 第61—62, 141—142页。

张贩路，必能达到目的。”^①

在郭实腊受雇于英国政府之前，郭实腊在一八三四年三月曾到马六甲去，同后来驻华的英国外交官巴夏礼的表姐沃恩斯托小姐结婚，这是他的第二位夫人。

一八三七年和一八三八年，郭实腊受英国商务监督之命，曾前往琉球、日本和中国福建沿海活动。从一八三九年起，英国开始采用武装入侵中国的手段，直至一八四〇年发动鸦片战争。郭实腊参与了这次侵华战争的全过程。

郭实腊主要充任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卧乌古的翻译，除了这个任务外，还担任参谋和向导，在英国占领宁波和舟山期间，他被英国侵略军任命为该地区的民政官。当英国侵略军在舟山群岛进行扫荡时，曾遭到当地人民的坚决抵抗，于是郭实腊亲赴该地，企图安抚百姓，劝说人民停止反抗。当地老百姓当面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末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使得郭实腊哑口无言，于是指使英军对百姓肆意屠杀。郭实腊还向浙江人民勒索供应品，和收买奸细为英国侵略军提供内地的情报。

当英国侵略军入侵上海时，郭实腊担任向导和协助指挥作战，代表侵略军在城里出安民告示和强筹粮草，并且勒索三十万银两赎城费。郭实腊随英舰沿长江西上时，又一路勒索供应品和赎城费。到达镇江后，英国侵略军遇到中国军民最强烈的抵抗，又是这个郭实腊出谋划策，并亲自带路围攻镇江城垣。侵略军冲入城内后，即沿街烧屋和实行残酷屠杀。

英国侵略军侵犯南京时，郭实腊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作

^① 武育千，《鸦片战争史·义律小传》，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10—11页。

为英方翻译，参与谈判，并参与起草和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在条约签字仪式完毕后，清政府官员通过郭实腊，曾向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英国政府不禁止在印度种植鸦片？”璞鼎查回答说（由郭实腊翻译）：“不行的。因为这是符合英国宪法的，不能禁止。”璞鼎查随后又说：“事实上，这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如果贵国的百姓是有德行的，他们会戒掉这个恶习；如果贵国的官员是廉洁的，能遵守你们的命令，鸦片就不会输入贵国。在英国的领土内断绝种植罂粟，这主要有赖于你们，因为在印度出产的鸦片，几乎全部向东方输送到中国。”^①这就是英国侵略者的逻辑。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以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这与他们所派的传教士作为先遣队有密切关系，郭实腊在中国沿海的多次侦察活动，以及作战期间充当翻译、向导和参谋，给了英国侵略军有力的支持。很明显，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外国传教士的侵略罪行是分不开的。

在传教和文化方面的活动

郭实腊在频繁的侵华活动过程中，还写过书，编过刊物，翻译《圣经》和“文字布道”等。联邦德国慕尼黑大学藏有他编写的大部分作品。他的中外文著述大约有七十余种，其中较著名的有《三次航行中国沿海记》、《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道光皇帝传》等。

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郭实腊在一八三三年七月在广州编辑出版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44年2月，第67—69页。

的，一八三四年因恐清廷查获封闭，迁至新加坡继续出版，到一八三七年停刊，共出四卷。该刊主要内容为宣传宗教，但也报道一些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和广州外贸的情况。郭实腊在一八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为该刊写的《创刊计划书》中说：“当文明几乎在全球各处战胜愚昧和邪恶，并取得广泛进展之时……只有中国人还同过去千百年来一样停滞不前……出版这份月刊的目的，是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技艺、科学和准则之后，可以消除他们高傲的排外思想。”^①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间，广州外国侨民发起组织“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推举郭实腊担任秘书，另外两个秘书是裨治文和马儒翰。由郭实腊签署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宗旨》中，写道：“本会主要宗旨将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智力的一类书籍，并把西方的技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要采取适当措施，使之不仅能在广州，而且能在全中国流通。”^②这个组织尽管宣扬的宗旨颇为动听，实际上没有出版几本书，郭实腊把他负责编辑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转让给该会，仍由他负责。迁至新加坡后，改由另一个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负责。另外郭实腊还写了一本《英国史》的小册子，也被列为该会的出版物之一。^③

郭实腊曾参与翻译一部分《圣经》的工作。由于他忙于搞间谍活动，坐下来搞翻译的时间极为有限，所谓“郭实腊译本”的《圣经》，实际上主要由裨治文、麦都思、马儒翰合译，郭实腊只翻译了其中“旧约”的一部分。一八三七年在南洋先出版了“新约”，定名为《新遗诏书》，后来又出版了“旧约”。一八四〇年郭实腊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3年8月，第181—187页。

② 同上书，1834年12月，第378—384页。

③ Samuel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第2卷，第353—354页。

又将“新约”译本稍加修改后出版，定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这部“新约”《圣经》曾为太平天国采用，并作了许多删改。

郭实腊认为利用文字布道，是向全中国传教的一个有效手段。鸦片战争结束，他被香港殖民当局任命为翻译后，在一八四四年自己出资成立了汉会（又称福汉会）组织，招募华人为他深入内地散发基督教传教宣传品，当时他吹嘘，从此“要将福音传遍中华帝国十八个省的每个角落”。^①

汉会成立之初，郭实腊雇用了二十名华人为该会成员，派他们到内地去散发宗教书报。一八四五年该会成员增至八十名，一八四六年增至一百七十九名，一八四七年增至三百名，一八四八年增至一千一百名，一八四九年无统计数字，但据报道拥有正式传道人达二百名。^②从表面看，郭实腊的汉会发展迅速，短短四年成员就已超过一千名，分配给他们的印刷品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但据说这批被雇用的华人，多数是游民和鸦片烟吸食者，他们领取了宣传品和路费、津贴后，并未深入内地认真派送，只是暂时避开外国人的耳目，把宣传品按斤两出售给邻近广东省的杂货铺，作为包装商品之用，所得之款连同郭实腊发给的津贴，都一并花在吸食毒品上了。

一八四九年，郭实腊的第二位夫人又在新加坡去世，他决定回到欧洲去“度假”。这年，他在英国又组织了一个中国协会，“宗旨自然是雇佣本国布道者并同任何差会合作，特别是和郭实腊在香港的一个团体（汉会）合作，去解决进入中国内地传播福

① Dr. and Mrs. Howard Taylor: *Hudson Taylor in Early Years*. 第 88—93 页。

② Herman Schlyter: *Karl Gutzlaff, Als Missionar in China*. 第 297 页。

音的难题。”^①接着，郭实腊又前往荷兰、俄国、瑞典、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国游说，大肆吹嘘使全中国基督化的计划，声称他在香港组织的议会成员，已将福音传遍中国。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使他大为扫兴。一八五〇年，他与一位英国人加里布尔小姐结婚，这是他的第三位夫人。

一八五一年二月，郭实腊带了新娘又回到香港，继续在殖民政府充当翻译。英国政府并没有因为郭实腊在侵华战争中立了“功勋”而对他加官晋爵，可是他却继续为英国扩大对华侵略效劳。郭实腊婚后未及半年，突然在同年夏天得病去世，终年四十八岁，遗体葬在香港。

郭实腊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唯一提到的一个传教士。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一)》一文中写道：“最后，再谈一谈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郭实腊)从中国回来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而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居茨拉夫先生离开二十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②

① Dr. and Mrs. Howard Taylor: Hudson Taylor in Early Years. 第88—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页。

雅 裨 理

(David Abeel, 1804—1846)

雅裨理是美国派遣来华的首批传教士之一。他在华活动时间较短,除传教和为英国侵略军效劳外,还曾向中国介绍过世界地理等知识,起过文化交流的作用。

军官的儿子

雅裨理于一八〇四年六月十二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新布仑斯威克市,父亲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是一名海军军官。雅裨理在十五岁时打算继承父志,向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报了名,可是当看到考生太多时却犹豫起来,结果放弃了这个打算而改学医科。十七岁时,他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会,开始对宗教产生浓厚兴趣,又改变学医志愿,而想读神学。十九岁时,即一八二三年,经过教会推荐,他考入新布仑斯威克神学院。在裨学院的三年学习期间,他对世界地理和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对资本主义世界向殖民地派遣传教士的状况有所了解。一八二六年四月,二十二岁的雅裨理被封立为牧师,并被美国荷兰归正会介绍到纽约一家公司担任传教工作。他在该公司工作了两年半。

由于这家公司对雅裨理的传教工作不满,迫使他不得不接受归正教派他到海外殖民地去做传教士,以谋出路。他被派往

荷属东印度群岛，一八二八年冬天离开美国，抵达圣约翰岛。他企图在岛上建立传教据点，可是不到两个月，就遭到当地政府的驱逐，不得已于一八二九年八月又回到纽约。

这时，美国基督教(新教)团体中的公理会差会部，在资本家奥立芬等的资助下，正在物色一些年轻的神学院毕业生，派往中国。在纽约街头徬徨的雅裨理闻讯后，立即前往报名。经过公理会差会部面试后，雅裨理被美国公理会推荐给海员之友会，派往广州在海员中充当传教士，合同期为一年，期满后再向差会部提出申请。

一八二九年十月十四日，二十五岁的雅裨理随同裨治文一起，乘坐“罗马”号货船从纽约出发，经过长达四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于一八三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抵达中国广州。在美国商人的支持下，开始在中国活动的生涯。

在广州向外国海员传教

当时，美国商人除奥立芬的同孚行外，在中国走私鸦片已经十分猖獗，在雅裨理抵达广州后一年内，美国输华鸦片达一千四百二十八箱，攫走白银八十万七千元。但在雅裨理的有关文献中，却没有发现他写过任何谴责美国商人和海员的贩毒罪行。相反，雅裨理却指责中国人民“处在极端黑暗之中”，“天天在坠入坟墓”，“是可怜复可悲的人民”，等等。^①

一八三〇年年底，雅裨理与海员之友会签订的合同期满，公理会差会部决定聘请他担任公理会传教士，先派他到南洋去勘察，目的是建立传教根据地。因为当时清政府仍实行禁教政策，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49年5月，第262—263页。

在华活动颇感困难。

雅裨理于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到达巴达维亚，在那里会见先期在该处建立根据地的伦敦传教会传教士麦都思。麦都思在家里接待了他，要他学习厦门话，并给予在华侨中进行传教的必要的指导。雅裨理在南洋期间，先后到过爪哇、新加坡、马六甲、曼谷等地，但却并未给公理会建立什么根据地。

一八三四年九月，雅裨理因健康原因回美国度假。他在纽约和其他城市各教堂巡回演讲，鼓动美国派传教士到中国活动；在此期内，他把过去几年在中国和南洋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旅居中国及其邻国纪事，1830—1834》一书，在一八三四年出版，一八三六年在英国重印。他这次在美国逗留了四年。^①

到福建开辟传教区

一八三八年十月十七日，雅裨理在美国资本家奥立芬的再次资助下，乘“马礼逊”号前来中国继续活动，一八三九年二月二十日抵达广州。这时正值英、中关系紧张，英国企图武装入侵中国，而雅裨理由于在海上长途颠簸，到广州后突然心脏病发作，不得已移居澳门养病，并等待时局的发展。

一八四〇年，英国终于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这明显是一场侵略战争，而雅裨理却认为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②按照雅裨理的逻辑：“同中国人打交道有一条准则，即中国人难得肯答应一项请求，但如果下点决心，表示点勇敢，去夺取的话，中国人也难得会反对，或固执地反对下去。”在大门被大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49年5月，第268页。

^② 同上书，1849年5月，第270页。

炮轰开之后，雅裨理主张“必须派遣传教士到中华帝国，进入每一处可以进得去的地方，包括中国沿海每一个可以通商的市场。海岸必须侵入，海港必须进去，这是因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受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所驱使。这一条通路必须搜寻出来，每一个可以据守的阵地必须占领。”^①这是出自美国第一批来华传教士的口的典型的殖民主义“理论”。

当英国侵略军占领厦门对海的鼓浪屿后，雅裨理本着这个“理论”，即与另一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文惠廉进行策划，准备到那里去建立传教据点。他们在香港获得英国占领军当局的批准后，即乘坐英国兵船，于一八四二年二月七日抵达鼓浪屿。雅裨理和文惠廉都能讲厦门话，这对英国占领军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他们不但可以充当译员，把侵略者的意图强加给地方官员，还可向当地人民为英国的侵华行径进行辩护。雅裨理曾说，“经过多年在中国受束缚和舌焦唇敝”却徒劳无功，而今在英军保护下“如此完全自由”，和“取得这么多的利益”，实在是“上帝的恩赐”。他们两人在鼓浪屿建立据点后，还前往厦门、同安，甚至坐了兵船到台湾去作调查。^②

一八四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与往常一样，有不少人因好奇，来到鼓浪屿的教堂，听雅裨理宣讲西方的上帝。在他讲完之后，有一位中年男子要求同雅裨理单独商谈一件极为秘密的事。雅裨理把他带进后屋，那人就说明来意。据雅裨理当天写的“日记”中记载：

“他此来的目的是要作出安排，向当政的清政府发动进

① Benson L. Grayson edited: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 第78—83页。

② *Chinese Repository*. 1849年5月，第272页。

攻。他本人是被当今篡权者所推翻的明朝的后裔。他对我说，如果我能援助他，只需征募一万兵力，不必伤害一条人命，就可向漳州推进，然后向省城福州进军。我们所到之处，所有地方当局只要一见到少数洋人，就都将惊慌失措而四处奔命。……他认为，既然我们（传教士）的到来负有仁慈的使命，就不会反对，就会同我们的感受和能提出的计划完全协调。以上就是此人对我再三请求的事。我真是难以说服他，他所抱有的仁慈观点，和我们的仁慈观点完全相反，这样的援助连一霎那的想望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到中国来，是要宣扬和平和教导得救的道路。”^①

这表明，企求外国传教士支持推翻清政府，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敢于违抗派遣国政府和差会的意愿；而外国传教士支持英国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却被认为是“仁慈的观点”，是“上帝的手段”。这些在传教士的“日记”中记载的，确实是他们的心里话，对于了解传教士来华的真实意图，可以获得可靠的依据。

与徐继畲的会见与交往

一八四四年一月，清政府官员徐继畲来到厦门，他原在广东任按察使，这时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负责该省的洋务事宜。当徐继畲约见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时，雅裨理被任命为通译，参加这次会见。这是他们的首次会晤。

雅裨理利用这次会晤徐继畲的机会，向他宣传基督教教义，却不期由此而引而了徐继畲向他询问许多有关中国外部世界的情况。据雅裨理在一八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写的“日记”记载：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44年5月,第235页。

“我们会见布政使已有多次。……这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喜欢提问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吏。在他提出有关外国的许多问题之后，我们提议将带一本地图册来，把他最感兴趣的地点、方位及范围，指点给他看。对此，他高兴地同意了。一天下午，我们带了尽可能多的资料送给他，这是在他约定的极短时间内尽力为他提供的。我们答应赠送给他有关基督教的一些书。昨天为他捆了一包，其中有《新约全书》和一些别的书。”^①

同年二月十九日，徐继畲因公又来到厦门，雅裨理在“日记”中写道：“获悉布政使已返回，我们去拜会了他，这是特别令人喜悦的会晤。他说他已在阅读基督教的书，并请求容许他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他所看到的一些有关的地名和特征方面的情形。他显然已用心阅读了《新约全书》，给了我一次机会能够向他解释许多最要紧的真理，这是我祈祷上帝铭刻在他心中的。”^②

同年五月，徐继畲再次来到厦门，雅裨理又得到机会与他会面，继续向他介绍外国的地理、历史和政治知识。徐继畲虚心求教，雅裨理热心回答，两人交谈了整个下午。雅裨理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显而易见，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要远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他画的地图还不够准确。他不但要查对经度和纬度以便标出确切的地理位置，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各国版图的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特别是同中国的商务关系上。英国、美国和法国要比其他国家给予更为详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44年5月，第236页。

② 同上书，1844年5月，第236—237页。

尽的考察。”^①

徐继畲在厦门与雅裨理数度会晤后，对世界各国的地理及其他一些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为此，他决心继续搜集和研究这个专题，不断向他遇见的一切外国人学习。除雅裨理外，徐继畲还向一八四三年到厦门传教、行医的传教士甘威廉请教，甘威廉向他提供了关于瑞士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地理知识。他还向一八四四年被英国政府派到福州任领事的李太郭请教，李太郭向他提供了关于中东地区的地理和政治情况。他还多次向接替李太郭任驻福州领事的阿礼国夫妇请教，徐继畲常常一连数小时同他们讨论和学习外国地理知识。阿礼国夫妇向徐尽可能地介绍西方的情况，并答应赠送他一个地球仪，阿礼国夫人还答应徐的请求，为他画了一幅世界地图，用不同的颜色标明各国的疆界。此外，徐继畲还参考了一些书籍，其中包括裨治文编译的《美利哥合省国志略》一书，从中获得了比较详细的有关美国的地理、政治和历史知识。徐继畲作为一个有心人，经过五年的努力，撰写了一部地理学专著《瀛环志略》，于一八四八年刊刻问世，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介绍世界地理及各国概况的科学著作之一。王韬后来为此书所作的“跋”中，写道：“此诚当今有用之书，而吾人所宜盱衡而矚远者也。”^②魏源在增订其专著《海国图志》时，曾从该书辑录了不少材料。《瀛环志略》出版不久，即传入日本，产生很大影响。

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一书中，曾先后七次提到雅裨理的名字，没有抹煞他提供的资料、地图及有关的知识。但雅裨理的动机却出自传教，雅裨理认为传教士最关注的应当是“使中国皈依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51年4月，第169—170页。

^② 《皇朝蓄艾文编》卷47，地学2，第2—3页。

上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介绍一些科学知识。雅裨理认为：“中国人是读书明理的人，这就更要让他们熟悉一般文献中各个分支的最有用的东西；要让中国人熟悉其他民族的历史和别国的地理。……因此，不论依据若何假定，传教士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来很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①徐继畲接受了雅裨理传授的科学知识，扬弃了他介绍的西方的上帝。

雅裨理在鼓浪屿活动了二年十个月，由于心脏病的不断折磨，不得不离开中国。一八四六年初，他在香港和广州作了短暂停留，就乘船回到美国去。

雅裨理在美国几乎过着飘忽不定的生活，心脏病仍不时地给他痛苦，加上无妻室儿女照顾，每到一处就寄居在朋友或教徒的家中。那时，他仍想到中国去，想到他和徐继畲的友谊，但是再也去不成了。一八四六年九月四日，当他起程到南方去养病，路过奥尔巴尼时，突然心脏停止了跳动，结束了他四十二年的生命。

雅裨理在中国前后一共七年时间，曾为中国人开眼认识世界作出了一些贡献。他的生前友好把他安葬在纽约的大洋山上，并为他树了一块墓碑。

^① Benson L. Grayson edited: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 第81—83页。

5

伯 驾

(Peter Parker, 1804—1889)

伯驾是美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医生,除在中国行医外,还出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多年。他是第一个主张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的美国官方人士,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是一个较重要的外国传教士。

青少年时代

伯驾在一八〇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弗兰明罕,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他排行第二。伯驾的父亲是农民,拥有一个小农场,家庭经济情况并不宽裕。伯驾从小就在父亲的农场劳动,到教堂接受宗教灌输,在本乡读小学。一八二〇年四月十五日,伯驾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那年他才十五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首先想到的是异教徒,我想我也许可为印第安人做一些事,譬如当个教师或传道人。由于我父亲的处境,我连想都不敢想进大学念书,虽然我是非常向往的。”^①伯驾进中学念书时,常利用寒假到外校教书,并把所赚的钱全部交给父亲,以贴补家用。一八二六年三月,当地教堂的牧师介绍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第14页。

他进享受完全免费待遇的雷恩森中学念书，读了不到半年，他突然收到父亲病重的信，不得不辍学赶回家乡。一到家里，发现父亲已经去世，一家人经过商议，决定把父亲遗留的农场，交给他姐夫负责经营。

一年之后，伯驾考进阿默斯特学院，开始他的大学生活。他在校住读三年，主要依靠自己挣钱读书。他在十五岁时萌发当传教士的念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时更想能到海外去闯一闯。为此，他决心要进一所名牌大学去深造。一八三〇年，他考入耶鲁大学，插入四年级。十月十九日他写信给他母亲和姐姐说：“我终于来到了纽海文……我指望今年可以有一段时间在食堂里当个服务员，这样就可以解决我的伙食费。有一个慈善团体答应代付我的书费，另一个慈善团体供给了我床上用品。”^①

在耶鲁大学，伯驾学习了解剖学、化学、植物学、地质学、天文学、哲学和神学课程，一八三一年九月十四日参加毕业典礼，获得学士学位。伯驾毕业之前，曾和他的老师古德里奇教授商议到海外去传教的问题，老师认为，如果要到海外传教，最好能接受医学训练，并且答应设法免费给他进修医学课程。

伯驾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向亲友正式宣布打算到海外去传教。十月间，他即返回耶鲁，进入神学院，接受神学和医学的专门训练。与此同时，他向美国公理会差会申请，要求派他到土耳其或中国去，当传教士。公理会不久就批准了他的申请，要他去中国。

伯驾在校期间，曾于一八三三年四月前往康涅狄克州，会见刚从广州回美国的旗昌行老板撒母耳·拉塞尔，向他了解有关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第36页。

中国的情况。这位老板对伯驾有志于到中国活动，倍加赞赏。同年十二月底，伯驾又前往纽约会见同孚行老板奥立芬。奥立芬已在大前年资助首批美国传教士前往中国开辟传教区，得知这位来访者也有志于去中国，而且正在学习医科，大为高兴，立即答应给他经济上的支持。伯驾在日记中写道：“我在十二月三日来到纽约，在那里逗留到今年元旦。在这次很短的访问中，我结识了‘马礼逊’号的船主奥立芬先生。他准备要带两名家属一同乘该船到中国去，在那里住几年。他极为慷慨地答应我，可以免费乘他的船，这不过是他许多友好的建议之一。”^①

一八三四年三月八日，伯驾通过了医学课程的答辩，学校授给他医学博士学位。他实际上只读了两年多医科，也没有到医院实习，就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这在当时的美国，是不合标准的。同年五月，伯驾被封立为牧师，六月一日在纽约长老会堂被正式任命为传教士。

美国公理会差会部负责人，在会上宣读了一份给伯驾的指示：

你如遇机会，可运用你的内外科知识，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你也可随时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但是，你绝对不要忘记，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引起你的注视。医生的特性决不能替代或干扰你作为一个传教士的特性，不管作为一个懂得科学的人怎样受到尊敬，或是对中国传教有多少好处……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掌握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与此同时，你如有机会，要熟悉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搜集情况，以利于你未来的工作。……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第76—77页。

本委员会还希望你, 或你的其他同事, 能在短期内在中国境内的某个合适地方建立一个据点。……根据郭实腊介绍, 应在宁波或天津建立这样的据点。……亲爱的弟兄, 奉上帝之命和仗着神的力量, 去罢!

伯驾当即向大会表示: “我期待如此之久的时辰, 终于来临。……我可用我的一生给百万中国人的肉身需要施医给药, 虽然我有理由重视解除肉身的痛苦这个愿望。可是, 千年之后, 肉身的痛苦依然如故, 效果甚微。倘若能与拯救灵魂联系起来, 那就有万世不易的重要性。中国的需要是巨大的。她有智慧, 她有财富, 她有文明, 她有千百万不灭的生灵! 事业是伟大的, ……美国必须在这项事业中大有作为。我最大的荣誉是, 我到中国去是作为耶稣基督的传教士去的。”^①

经过一番准备, 伯驾在一八三四年六月四日告别亲友和送行的差会负责人等, 登上了“马礼逊”号货船, 跟着同孚行老板奥立芬一家, 一同从纽约起程, 绕道好望角前往中国。

广州新豆栏医局

伯驾在船上度过了一百四十三天, 于一八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到达澳门, 十月二十六日在广州登岸, 住在奥立芬的商馆里, 受到先期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等欢迎。裨治文对伯驾说: “你的医学技术将可赢得许多朋友。我可以很快地给你介绍一百个病人。”伯驾说他在广州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 “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街上乞丐成群, 吸食鸦片者甚众, 许多人栖居在船上, 无衣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第82—84页。

无食。”^①伯驾在广州住了一个多月，经过同奥立芬、裨治文等商议，决定先到新加坡去学习中文和行医，然后伺机到福建活动。

伯驾到新加坡住了不到十个月，在一八三五年九月又回到广州，经过向公理会差会部请示，决定在广州开设医局，待稍后伺机再进入内地活动。医局的经费由在华英、美商人捐助，在广州的行商伍怡和答应将他在新豆栏街上的丰泰行房产，出租一部分给伯驾开设医局，每年租金五百元。经过一番筹备，由伯驾创立的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于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四日在广州开业。这是外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设的第一所西医医院。在这之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哥利支（又译作郭雷枢），曾于一八二七年在澳门自费开设过一所眼科门诊所，并曾向中国介绍过牛痘疫苗。

为什么要选择眼科呢？这是因为传教士发现，广州患眼疾的人相当普遍。根据当时中国官方统计，广州一地就有四千七百五十名盲人，还有许多患其他眼疾的病人。其次，由于伯驾刚开始行医，医术并不高明，在东印度公司的医生们帮助之下先设眼科门诊，即使施行手术，也无需很复杂的技术。另外，由于大多数眼疾是因不讲卫生致使细菌感染，只要采取消毒杀菌的简易治疗即可痊愈，这容易使患者对外国人产生好感。再加上采取免费治疗以广招徕，远近来就医者自然会逐渐增多。这样可以扩大影响，便于开展传教和搜集情报的活动。

新豆栏医局开张后，六个星期内就有四百五十人次来该医局看病，病人不仅要求治眼疾，也要求治疗别种疾病。

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在家长陪同下来到新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eking, M. D.* 第101—106页。

豆栏医局，要求伯驾诊治女孩右部面颊上生的一个重约一斤的大肉瘤。伯驾本来不想收容这样的病人，但在家长的恳求下，就把她留下。经过诊断，伯驾认为需要动手术切除。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手术，伯驾经过周密的准备，在家长的同意下，于一八三六年一月十九日进行切除手术。当时还没有麻醉剂，只在动手术之前十五分钟给病人口服一点鸦片剂，作为镇静之用，然后把她的眼睛蒙住，把手和脚都捆绑在手术台上，进行忍痛切割。伯驾用了八分钟时间，成功地割除了这个大肉瘤，病人在医局里经过十八天疗养后，病愈出院。这是伯驾所施行的第一次正式外科手术。^①伯驾在医局开设的第一年，一共诊治病人二千一百五十二人次，其中诊治眼疾的种类有四十七种，其他疾病种类有二十三种。到医局来访问、参观者，不下六、七千人次。^②

伯驾的医局开张后取得的成效，曾博得广州一些老百姓的好感，也引起了地方官和行商的疑惧。为此，他们专门派了一名密探，到医局去刺探外国医生的意图。而在外国人方面，除了得到美国商人的支持外，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也表示对医局的支持。他写信给东印度公司医生哥利支，请他转交给伯驾一百元捐款，以表示对伯驾医疗事业的支持，并在信中写道：“我坚决相信，他（伯驾）在地球上这一大片黑暗的地区，正在推进真理和文明的伟大事业，所采取的是最安全、最聪明和最迅速的手段。”由此，东印度公司医生哥利支起草了一份“呼吁书”，于一八三五年冬天同时寄发至英、美，要求尽可能多派一些传教医生到中国来。“呼吁书”中写道：“我所建议的是，所有各教派的基督

① W. W. Cadbury and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100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第42—43页。

② 同上书，第46页。

教徒们，为了改善中国人世俗的和社会的状况，而联合起来吧。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这个帝国的亿万生灵，要求我们的关注。为此，让我们学习在他们中间行善，向他们展示莫基于基督教原理的慈善和人道的工作。这样，基督教的传播，就是它必然的结果。”^①

一八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哥利支的倡议下，中华医药传教会在广州成立。哥利支当选为会长，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伍怡和等，为终身董事。同年四月，由哥利支、伯驾和裨治文三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该会的“宣言”，内称：“本会的宗旨，如同在成立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的，是要鼓励在中国人当中行医，并将赐给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舞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消除偏见和推倒长期以来所持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我们称呼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推进传教事业。……利用这样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平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及一切往来，置于更加期望所要达到的地位，也可以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我们可以提出的第一个好处是，医学科学移植于中国，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第二个好处将是，利用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可与中国人民交往，可以听到大部分真实情况，回答我们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现在我们感兴趣要提出的，而且可以获得答案。因为一个病人在医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5年2月，第386—389页。

生面前，往往是坦率对待的，尽管对别人可能有意隐瞒事实或掩饰真相。……”^①这份“宣言”宣布了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医疗事业的真实目的。

一八三九年以前，新豆栏医局一直为广州及其附近的老百姓免费治病。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伯驾的医术逐渐熟练，名声也愈传愈远。但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伯驾不敢公开传教，只是通过免费治疗，以赢得老百姓对外国人的好感，同时尽可能地 向病人搜集中国内地的情报，记录南方各种常见病和传染病的发病数据。

在鸦片战争期间的活动

一八三九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伯驾在广州的医局照常开诊，到一八四〇年六月之前，到医局来治病的近一万人次。在中、英关系渐趋紧张时，伯驾在同年七月写了一封信给林则徐，全文如下：

呈钦差大臣阁下林，因他的久经考验的忠诚，已经赢得大皇帝的信任，这是他的功绩所应得的。他授命到广东禁绝鸦片烟害，是因为鸦片已经威胁要毁坏他的国家的昌盛与幸福。

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全人类的朋友，特别是中国的朋友，我怀着深切的敬意和感激，蒙准向钦差大臣禀奏：在到达广州之前，已有许多人称道阁下的清廉、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我自第一次获悉这样一位大臣即将光临，心中感到非常高兴。慈悲的上帝给予他的国家一位拯救者，来消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8年6月，第37—44页。

除如此令人忧虑的罪恶。我每天向上帝倾诉最热忱的祈祷，求上帝引导钦差大臣，能够胜任这项困难的事业。我常常目睹鸦片造成的悲惨以致使我感到痛苦。为此我常问道，从哪里可以找到力量，来制止鸦片的泛滥呢？也许是（我说）要从西方国家来，所以我曾写了事实经过，发表了声明，向西方国家的大人物和善良的人们发出呼吁，要他们大声疾呼反对鸦片毒害。我的尊敬的朋友奥立芬和金查理以及别位，也都尽到他们的力量，以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在远方的援助还未来到之前，尊严的大皇帝的愤慨已达顶点，通过他的忠实的使者林的执法如山，使大皇帝龙颜大悦。但是，钦差大臣由于不了解各国的法律，不晓得他们的强大，无意识地采取了与友好国家的惯例相抵触的措施，已经程度不轻地得罪了英国。最近英国在一次比这较小的事件中，就封锁了南美洲两边的海岸，并炮轰了那里的城市和村落。痛感到中国将可能发生的事件，鄙人认为简捷的解决办法，就是只需了解各个外国的特性和形势。鄙人愿不惜个人生命的安危，采取任何手段帮助在大国之间恢复和好。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全人类的朋友，只有一个目标使我的生命感到宝贵，那就是竭尽全力做一切善事。这就是我强使我自己向阁下——如此伟大的政治家，对这样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求情的最大原因。斯一鹅曾拯救古罗马免遭敌人攻击，所以，处在我这样地位的人，虽然微不足道，只要能为我所爱的人做善事，我一定乐意去做。现今向阁下——伟大的政治家所禀奏的，完全是出自肺腑之言，如有不当，决非故意。

有经验的医生，首先要问的是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如

果他能避免或消除它，就有把握把病完全治好。那末，当前中国与别国之间存在的的天，其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对国家之间的相互意图和性格产生的误会所造成的。那末，补救的办法是什么呢？只要两个词可以表达：“光荣的条约”。这种条约存在于一切友好国家之间。（例如美、英条约和美、法条约等）。愿一切过去的怨恨全忘却吧。愿每一个国家，不论是中国、英国、荷兰、法国或美国，都用彼此永久不变的友谊，对待别的国家，协调地遵循条约规定的条款。

我还要进而向阁下建议，最好能预见到战争的害处，撇开“强硬的语言”（这就是骄矜与傲慢），采取和平的解决办法。英国已经准备提出她认为公正的要求，倘若不肯欣然答应的话，随之而来的将是流血。英国已在世界各地占领许多国家，我担心英国也希望占领中国。但是，我很荣幸地向钦差大臣阁下保证，英国只希望能根据所缔结的“光荣的条约”所规定的，进行贸易。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将不准她的船只输入鸦片，也不准她的百姓制造或贩卖鸦片，其结果将是双方都可获得最大的幸福。

我不知该如何快乐，得以传递外国真实意图的确实消息给阁下。倘若伟大的钦差大臣对鄙意的友好情感表示赞许，我将最乐意再次向阁下请愿，或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尽量为阁下效劳。^①

林则徐收到伯驾的信后没有答复，但派人请伯驾翻译有关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第170—172页。

国际法的一些规定，和开出治疗吸食鸦片中毒者的药方。有关前者，已载入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这说明林则徐还是仔细阅读了伯驾的信。但对于信中用英国的强大进行讹诈，却未加置理。

伯驾除了写信给林则徐，表示愿意充当调人之外，还曾请林则徐的一个翻译梁进德（即梁发的儿子，他小时候的英语是跟裨治文学习的），向钦差大臣提出愿意充任英、中两国之间的调停者，但被林则徐拒绝。^①

林则徐本来患有疝病，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曾经派他的部属间接请伯驾诊治。伯驾专为林则徐立了一张病历书，编号是六五六五，其中提到一八三九年七月，林则徐曾要伯驾翻译滑达尔著《各国律例》一书中，有关交战国之间实行封锁和禁运等有关规定，并要伯驾陈述鸦片的危害性，和对吸食者如何治疗等问题。信中还提到，他给林则徐送去一些治疗气喘的药，和一副托绑肚子的带子。伯驾虽然希望能直接拜谒林则徐，但却未能如愿。^②

伯驾在一八四〇年四月中旬写给在美国的亲属的信中说：“中国和大不列颠的战争，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了，而且在不远的日子就会爆发。我已经施加了我一点小小的影响，让中国能预见和避免这次不幸，但是他们太骄傲，不肯屈从，而且是深深地陷在无知之中，对已经被他们从兽穴里弄醒的狮子（英国）的力量，仍然毫无感觉。”^③

① W. W. Cadbury and M.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100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第66页。

② *Chinese Repository.* 1840年4月，第624—639页。

③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ker, M. D.* 第175页。

这封信发出不到两个月，英国终于发动侵华战争。伯驾在这年的六月十五日，不得不关闭他新豆栏医局，离开广州前往澳门。临走的前一天，伯驾去向伍怡和告辞，伍曾问他，英国人可能会采取什么措施？伯驾回答说：即将开仗。

第一次返回美国

伯驾到澳门后，与其他传教士和美国商人商议，战局可能发展的趋势。深感必须赶紧回美国，向政府和教会当局陈述中国的局势，采取有利于美国的措施。一八四〇年七月五日，他乘坐一艘开往美国的货船回国，十二月十日抵达纽约。上岸后，伯驾迫不及待地先到支持对华传教事业的美国巨商奥立芬家里，受到奥立芬和金查理等人的接待。伯驾汇报了中国的战局，然后到纽海文的母校耶鲁大学，本来打算进修一些医学课程，但是没有住几天，就被他的朋友们带到华盛顿。一八四一年一月十七日，伯驾在给他姐姐的信中透露他活动的情况：“明天一早我就要跟培根牧师出发，前往华盛顿。我的目标是向我国政府报告，我居住在中国期间所能提供的情报，如有可能，促使政府感兴趣能及时采取行动，以便与中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也许可以在英、中之间提出调停，这就可挽救巨大的生命损失，间接地在中华帝国推进传播福音的事业。”^①

美国国务卿但尼尔·韦伯斯脱在国务院接见伯驾，听取了他对中国局势的汇报和提出的建议。国务卿要他写成书面意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第182—183页。

见，送呈国务院，以便详细研究。伯驾回到寓所后，立即起草意见书，于一月三十日呈递国务院，其要点如下：

我竭诚建议美国政府执政当局考虑，为了把握住美国政府与中国关系中目前的、从未有过的紧要关头，应立即派遣一位全权使节，直赴道光朝廷。……促请派遣一位这样的使节，有以下数点考虑。一，不论英国政府采取什么方针，或通过谈判，或用强制手段，所取得的结果，并不能解决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二，具备在年资、能力和级别上所必要的资格的美国使节，将能最及时促使中、英双方，都接受美国为调停者，以解决该两国的纷争，并在对全体都有利和光荣的条件下，恢复外国的贸易。……三，受到轻视的中国人，毕竟仍然表示要同外国人做生意的。……我相信，继续对外贸易的愿望，是强烈的和普遍的。……四，中国人只是希望寻求一个绥靖的办法，在不使政府“丢失面子”的情况下恢复贸易，同时能有效地制止鸦片贸易。……五，有重要的理由可以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处理，所有的对外国的交往，都将被切断。……切不可忘记，每年大约有一千二百万元的（美、中）贸易，是值得维持和保护。……六，中国人对美国的信任，可能要超出对其它任何国家。^①

国务卿对伯驾呈递的意见书，表示赞赏。经过推荐，伯驾还被邀请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伯驾要求国会议员敦促政府立即派使节，前赴中国调停英、中纷争，维护美国对华贸易的利益。伯驾还拜会了在华盛顿的其他政界人物，进行游说。这是伯驾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第184—188页。

最初进行的政治活动。

伯驾在华盛顿活动期间，在一次社交场合中，巧遇国务卿韦伯斯脱的侄女哈利特·韦伯斯脱小姐，被她看中。经过闪电式的恋爱，三月二十九日两人就举行了婚礼。从初次见面到正式结婚，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使这位年已三十七岁的冒险家，当上了国务卿的侄女婿，并从此跻身于美国政界，青云直上。在刚刚度过蜜月之后，国务卿就派他前往欧洲游说，了解英、法政府的意图，和各界的舆论。于是，伯驾急忙整理行装，吻别爱妻，带了国务卿的介绍信，匆匆出使欧洲。

伯驾先在英国活动了六个星期，会见了英国的政界人士和贵族，其中包括即将带兵赴华的英国侵略军头目璞鼎查。当时，英国已经发动侵华战争，这年（一八四一年）的一月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已经使用战争手段迫使钦差大臣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但因攫取到的利益和特权不多，英国政府对义律极为不满，决定把义律撤职，改派璞鼎查去扩大侵略战争，以迫使清政府给予更大的特权和利益。

伯驾除在伦敦活动外，还先后到剑桥、伯明翰、利物浦、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地，发表演说和进行活动，包括向听众报告他在广州开设医局的情况，鼓动英国增派传教士和传教医生，前往中国活动。并要求各个教会的教徒们，为海外传教事业多多捐钱。

伯驾随后又前往法国，在凡尔赛宫拜谒了法国国王路易·腓利普。六月二十九日，伯驾写给他在美国的妻子的信中，叙述了这次会见：

“你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吗？”这是法国国王问的第一句话。

“你到过北京、见到过皇帝吗？”这是国王的第二句问话。

“已有好几年了。”这是伯驾对国王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我还没有去过北京，但我希望能去北京访问。”这是伯驾对国王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中国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民族吗？”

“显然是的。”

“气候一定很热吧？”

“在室内，气温表上的温度，有好几个月一直停留在华氏九十六度。”

国王表示了他很高兴见到我之后，又同别位寒暄起来……过了一些时候，宾客们开始向国王告辞，国王又重新问起我关于中国的情况。他问我对英国与中国作战有何看法。我回答说，鸦片问题不过是原因之一。这是我以前在美国和英国总是这样回答的。

国王对此问题的看法，要比许多人更为明智。他讥讽英国所举行的多次谈判，迄今全都是失败的。他还不止一次地讥讽英国，在距离如此之远的地方作战，军费的开支必然是浩繁的，英国是不可能持久打下去的。他也提到，中国人有可能从沿海撤退然后击败他们的敌人的看法。……他特别垂询我关于中国的人口和军事力量。法国官员曾禀报过他，仅仅从广州看到的情况，是无法想象中国人口之多的。

我同意这个看法。我告诉国王，我估计中国有三亿六千万人口的依据。

国王批评了英国的征服精神。他记得哈斯丁有一次曾

对他说过，倘若英国的征服超越了孟加拉，英国将会自取灭亡。国王意味深长地说，“当我从西边的波斯一直观察到东边的黄海，并思考印度被征服时，我就联想到中华帝国的那件小事（国王这时笑了）。我说这将使英国大伤元气，就象花菜一样被剥落。当我登基王位时，我曾说过：不要征服，三千三百万足矣。还是把已经取得的领土保管好，和加以巩固就行了。”

“是的，国王陛下，能有一个足以保护自己不受世上任何国家侵犯的帝国，陛下一定心满意足了。”这是站在国王旁的一位大臣应声而说的插话。国王再次表示他非常高兴能见到我，问我何时重返中国，并祝愿我的未来昌隆亨通。”^①

这段对话表明了法王路易·腓利浦对英、中战争的看法，他当时担心英国远征中国，可能会被击败。因为他估计，英国不可能进行持久性战争，如果中国的抵抗能采取林则徐的战略战术，英国要想取胜，确是很难的。但是，昏庸的满政府不久就被英国侵略军打败，法国政府继美国之后迫不及待地派军舰前来中国，进行讹诈，攫取特权，西且不费一兵一卒，就捞到与英、美同等的利益。

同年八月初，伯驾回到美国，向国务院汇报英、法之行的情况。九月十六日，伯驾拜谒了美国总统泰勒。伯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总统非常和蔼，极为客气地询问了我住在中国的情况，又询问了我这次英、法之行的印象，征求了我对英、中战争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第207—209页。

可能产生的结果和意见。……关于中国，(美国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总统无权指派一个新的使团，只有向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总统说国会担心被派去的使节遭到拒绝，而使美国丢脸。因此曾考虑是否派一位‘流动使节’。我委婉地向总统说，我感到中国是被忽视了，我们在中国的贸易，没有受到同南美程度相当的重视。在告辞之前，总统还询问我在中国是怎样工作的？我把在那里行医的一些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接着，伯驾又去拜谒国务卿，将欧洲之行作了详细陈述，再次强调美国政府应该立即派遣专使前往中国。国务卿也早有此意，告知伯驾，将见机行事。^①事实上，美国政府这时还处在观望之中，对于英国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的结果，尚不能预料。美国政界的意见，还没有取得一致。但是，随着战争的急转直下，美国政府的態度也随之明朗起来。

参与中美条约的谈判活动

伯驾在美国活动了两年后，决定重返中国。他带了夫人，在一八四二年六月十三日从纽约上船，十一月十五日到达广州。伯驾夫人是第一个在广州定居的美国妇女。伯驾经过迅速的整顿，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使新豆栏医局重新开诊。这时，中、英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已经签订，美国政府获得消息后，国会迅速作出反应，授权泰勒总统，派遣一个使团赴华。

一八四三年五月，美国政府组成以顾盛为首的使团，经过筹备和接受训令后，即乘兵舰首途赴华，于一八四四年二月二十日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第220—223页。

抵达澳门。顾盛在澳门聘请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传教医生伯驾为中文秘书，后又增聘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帮办中文函札事宜。伯驾因是美国国务卿的侄女婿，受到顾盛的特别重用，宣布由美国政府支付给伯驾年薪一千五百美元。顾盛在美国兵舰上单独接见伯驾时表示，不仅要伯驾担任秘书，而且还要他当机要顾问。伯驾表示，他将竭尽全力效忠美国政府，为美国的利益“寸土必争”。^①伯驾和裨治文等陪同顾盛，在与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举行的多次会谈中，确实发挥了美国外交官当时不能发挥的作用，“时而恭顺，时而桀骜，情词甚为闪烁，……动辄以北驶为挟制之词”。^②并且唆使顾盛以武力相恫吓，迫使耆英于七月三日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中、美不平等的《望厦条约》。这个条约达到伯驾以前到美国去鼓动的目的，除了获得英国在《南京条约》规定的特权外，还获得领事裁判权，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和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特权。

伯驾在事后写道：“顾盛先生最初在澳门登陆时，我去欢迎了他。六个月之后，我又在同一码头上为他送行。这是我莫大的光荣。在和他话别时，我们谈到过去一段时期的活动及其成果，顾盛带着得意的微笑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但愿我们是为这个世界做了一点好事。’”^③

顾盛回美国后，美国政府任命璧珥为美国驻华代理专使，伯驾为使团秘书兼翻译。璧珥到广州后不久，因健康原因离职，美国政府指派伯驾照管使团业务。不久，美国政府任命义华业为

①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第250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2卷，第2,7页。

③ G. B. Stevens and W. F.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 D.* 第254—255页。

驻华使节，可是他到广州上任的第二年，即一八四七年，突然因病去世。美国政府训令伯驾升格为美国驻华代办。事实上从一八四四年起，伯驾参与外交工作后，一直在美国驻华使馆服务，直到一八五五年。

美国公理会差会部得知他大部分时间在从事外交政治活动后，就停发他的薪金，但是他还抽空去新豆栏医局治病。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伯驾在中国首次使用麻醉剂含硫乙醚为病人施行手术的事。这种新麻醉剂的使用，当时在美国也刚刚开始，有两位热心的美国医生斯普纳和杰克逊，特地给伯驾寄赠了相当数量的含硫乙醚和麻醉器材。时间是在一八四七年，伯驾根据美国寄赠的麻醉剂和使用说明，首次成功地为位年约三十五岁的病人，割除了右臂上生的脂肪瘤，大大减轻了病人的痛楚。这在中、美科学交流史上，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以前，伯驾施行手术时，只能用鸦片剂起到一些镇定作用，但病人还是痛楚非凡。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伯驾在医局内进行公开的传教活动，向病人散发福音书，劝说他们信仰基督教。从一八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开始，第一个中国籍牧师梁发正式定期到医局传教，和举行礼拜仪式。“这种礼拜持续了三年半，参加者达一万五千余人次，但在这许多人中，真心研究教义者仅三人，受洗入教者竟无一人。”^①伯驾在医局时断时续地工作至一八五五年止。在这之前，他的外交活动主要还有：与英、法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一八五四年跟随美使麦莲北上，到白河与清政府代表崇纶和文谦谈判修约问题，可是都没有达到目的。伯驾对早期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态度，与多数在华传教士一样，持所谓“同情”态

^① 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第18章。

度,但他并未到太平军辖区去。

第二次返美接受正式外交任命

美国驻华全权委员麦莲,在一八五五年一月返回美国,国务院任命伯驾为代理委员。同年五月,伯驾应总统之召回美述职,这是他第二次返美。伯驾向总统汇报了在华修约所遇到的困难,建议美国政府与英、法联合采取强硬手段,迫使清政府就范。由于麦莲不再担任驻华全权委员,总统拟任命伯驾接替,命他及早到中国去完成修改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

一八五五年八月十六日,总统正式宣布伯驾为美国驻华全权委员,并颁发了任命书,九月五日总统将美国政府致中国皇帝书交给了伯驾。美国政府任命传教士出任驻华外交代表,伯驾为第一人。

当时,因《望厦条约》将在一八五六年期满,美国政府训令伯驾,到中国后从清政府手里取得三点让与:准许外交官长驻北京;最大限度地扩大贸易;取消对美国人的一切人身限制。为了与英、法联合行动,训令他在赴华途中绕道伦敦和巴黎,与英、法政府共同磋商对策。

伯驾当时认为:“过去十二年的经验证明,为了达到各国政府获得最大利益的目标,……必须采取强硬手段。”^①同年十月,伯驾在伦敦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勋爵,向他游说联合行动的必要性。克拉兰敦表示:“本人甚愿在议会开会时,能涉及三国联盟问题。”这就是说,英国表示了对美国建议的赞赏。

伯驾然后前往巴黎,会见法国外长瓦尔斯基,同样得到法国

^① W. C. Costi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1860. 第195页。

政府的支持。随后,伯驾启程赴华,在路过香港时,受到英国驻华公使包令的接待,讨论了修约的具体步骤,还同法国驻华代办顾随磋商。

一八五六年一月,伯驾抵达广州,采用强硬手段企图达到修约的目的,但当时在广州的叶名琛,仍持傲慢态度,拒不接见伯驾。于是,伯驾又前往福州进行讹诈,也未取得成功。他不罢休,直到一八五七年八月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一直采取多种手段,会同英、法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包括发动武装入侵,以求达到扩大对中国侵略的目的。这时的伯驾,已完全不是个传教医生,而是充当美国政府侵华的主角。

公然提出由美国占领台湾的主张

伯驾是第一个公然提出由美国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的美国外交官。一八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伯驾向美国国务卿麻西建议:“如果英、法、美三国代表亲临白河,而未能被邀前往北京,法国即可占领高丽,英国可再次占领舟山,美国就可占领台湾,直到对过去种种获得满意解决,对将来有了正确谅解时为止。”伯驾说这是一种“最后手段”。

早在一八四七年,美国会同英国海军已潜赴台湾进行情报活动,企图夺取那里丰富的煤矿资源。一八四九年七月,一艘美国船又到台湾活动。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潘理“访问”了台湾,并擅自在港口升起美国国旗,一些美国商人甚至建议在台湾成立一个“独立政府”。^①伯驾对此甚表赞同。但他未收到国务

^① 《伯驾来往函件》,第1063页,转引自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246页。

1

卿的复函和任何指示，于是一八五七年二月十二日又向麻西提出：“台湾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许多有事业心的人，寄以极大兴趣的一个问题，它应受到西方各国比以往更多的重视，甚盼美国政府不致畏缩不前，不肯对有关台湾方面的这种人道、文明、航海和商业关系等问题，采取应有的行动。”

这个呈文发出不到一个月，伯驾又向国务院发出第三个呈文，称：

“美丽的(台湾)岛是最有价值的—一个岛屿，因为它有丰富的矿藏和繁荣的农业。煤矿看来是无尽藏的，非常容易开采，质量也好。在目前的蒸汽航行时代，是一件具有特殊利害关系的事实。从商业和政治的观点看，它的位置也说明，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向往的岛屿。一旦加利福尼亚、日本和中国之间开辟航线，这个煤炭供应的来源，是最有利的。台湾岛可能不会归属清帝国太久，它一旦在政治上象地理上一样同清帝国脱离，那么美国就显然必须占领该岛，特别是从各国均势的重大原则而言。……美国若有意这样做，并且能为占领台湾进行准备，英国当然不能反对。不管对或不对，我已经做的和我所建议的有关台湾问题，我都忠实地写了出来，并呈报国务院，恭请转呈总统考虑和政府决策，并请及早给我明确批复。”^①

伯驾在等候美国政府复示时，还写信给在香港的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声称：“如果台湾岛在政治上和中华帝国脱离关系，我深信美国方面可以实现它对该岛的优先权利和主张。第一，是根据美国公民和该岛帝国官吏已经缔结的契约。第二，是根据

① 参看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241—251页；另见B.L. Grayson edited: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 第95—97页。

他们在中国方面的允准下已经在该岛真正定居，而且美国国旗已经在台湾岛上悬挂一年多了。”^①

当时美国正在进行总统竞选，国务卿麻西奉总统之命，批驳了伯驾由美国占领台湾岛的呈文，和他的所谓“最后手段”的提法。麻西在批示中指出，美国总统并不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有采取你所说的‘最后手段’的必要。即使有些必要，非有国会授权，也不得使用美国的海陆军。‘最后手段’无异是战争，本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并无宣战之权。”

不到一个星期，美国本届政府宣布下台，由新当选的布卡南出任总统，卡斯任国务卿，伯驾也随之失宠。新政府改派列卫廉为正式驻华公使，伯驾企图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野心，没有得逞。^②

第三次返回美国和晚年生活

一八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美国政府正式任命列卫廉为驻华公使后，伯驾随即奉召返回美国，从此结束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伯驾带了家眷于一八五七年年底回到美国，脱离了美国政界。

伯驾在鸦片战争期间第一次返美时，曾被选为华盛顿国家科学促进会的通讯会士，以表彰他在中国行医的功绩。这次返美后，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被芝加哥历史学会选为通讯会员，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又被选为麻省医学会名誉会员。

伯驾自从一八三四年被派到中国后，从一名传教医生，逐步

① 参看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第248—249页。

② 同上书，第250—251页。

晋升为一名高级外交官，他为美国政府的侵华利益奔波，真是席不暇暖。这次返美不到两年，竟然添了一个盼望已久的老来子，这时伯驾已经是五十五岁了。

伯驾在美国度过了漫长的晚年，这期间主要担任传教联盟美国分部的委员，曾于一八七一年随该分部的代表团到俄国彼得堡访问。他对在华医疗事业，也一直是关注的，一八八五年广州博济医院为纪念伯驾开设医疗事业五十周年时，他写了一封祝贺信给博济医院。

一八八九年一月十日伯驾在美国华盛顿寓所去世，终年八十四岁。

6

布 朗

(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

布朗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主要在创办马礼逊学堂和帮助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资产阶级改良家的容闳到美国留学等活动上，曾经留下了历史记录。

布朗于一八一〇年六月十六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的东温泽。他从小就接受基督教洗礼，成为美国长老会的教徒。一八三二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又先后在哥伦比亚神学院和纽约联合神学院攻读神学。自神学院毕业后，在纽约聋哑学校当教师。一八三九年被封为牧师。同年由耶鲁大学推荐，接受广州马礼逊教育会的聘请，带了新婚的夫人前来中国。

马礼逊教育会的成立

马礼逊教育会，是为纪念来华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成立的。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广州的一部分外侨发出通告，建议成立马礼逊教育会，到二月二十四日已有二十二名签名赞助，并募得四千八百六十元捐款。临时委员会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罗宾臣，英商查顿、颠地，美商奥立芬，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组成，裨治文任通讯秘书，怡和洋行为司库。马礼逊教育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除要中

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读写英文，并以此为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传授给他们。这些学校还将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①

一八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广州美国商馆举行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了理事会，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发表了长篇演说。该会章程共有十三条，附则十七条。其第二条称：“本教育会的目标，是采用开办学校和其他办法，改进和推动中国的教育。”第三条规定：“任何人捐款不少于二十五元，或每年捐款不少于十元者，得为本会会员。”十一月九日，理事会开会，推举英商颠地为会长，英商查顿为司库，裨治文为通讯秘书，马儒翰为文书。^②

裨治文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认为：“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海陆军力量、最繁荣的商业刺激以及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③

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后，即向英、美发出呼吁，要求派遣教师前来中国开办学校，经费由该会负责。同时继续募捐和征集图书，并对传教士收留的少数学生，包括对在澳门由郭实腊妻子开设的读书班给予一些裨贴。英国方面对马礼逊教育会的呼吁没有答复，美国方商作出了反应，耶鲁大学有三位教授答应为它物色适当的教师。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36年12月，第374页。

② 同上书，1836年9月，第238页；1836年12月，第376—381页。

③ 同上书，1836年12月，第373—381页。

创办马礼逊学堂

耶鲁大学的三位教授，在一八三八年物色到一位布朗。他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当时在纽约聋哑学校教书。布朗接受广州马礼逊教育会的聘请，经过一番筹备，于一八三八年十月十七日带了妻子，乘美国商人奥立芬的货船“马礼逊”号从纽约出发，一八三九年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受到马礼逊教育会的秘书裨治文等人的接待。他在广州逗留四天，经马礼逊教育会的负责人商量，决定要布朗到澳门去，一面学习中文，一面为创办学堂，进行积极的筹备。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开学，首批学生共六名，均为男生，年龄最大的十五岁，全部住在校内，免收学杂费并供给食宿和必要的衣物。据布朗在一八四〇年四月的报告中称：“根据马礼逊教育会章程的规定，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这不仅是教学，而且是一个教育团体，目标是训练整个的人，包括德、智、体。遵照这个目标，我安排学生们半天读中文，半天读英文。早晨六点钟开始，到晚上九点钟结束，其中读书八小时，其余三、四小时在户外场地上运动和娱乐。……孩子们和我的家庭融合在一起，我们待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鼓励他们对我们产生亲密无间的信任，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来或者不来参加我家的早晚礼拜。”^①

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布朗向马礼逊教育会所作的第二个报告中，称：“自从学堂开办以来，我仍按照去年四月所作的第一个报告中所说的基本方针和计划进行教学，英文和中文的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41年10月,第564—569页。

五
五

学习时间仍如既往,每天各半,上午专心致力于中文,下午和晚上读英文。……自从教育会的理事们于今年三月四日到校访问以来,学生们的英文学习有明显的进步,其中有两名即将学完帕利的厚达二百七十四页的《地理》书,包括先前已学完的一本较薄的地理课本。还有四名学生在读完这本地理课本之后,已经把帕利的《地理》书读了将近有一半了。在算术方面,他们已经学完了心算,现在学习戈登的《算术》课本。通过基本笔算法,学习加减乘除。每周有两次用一部分时间练习写字。”^①

以上是布朗在澳门举行的马礼逊教育会第三届年会上所作的报告。当时英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正在进行,会上在讨论马礼逊学堂是否要从澳门迁往南洋开办时,布朗强调学堂应继续设在中国。他说:“我可以肯定,本教育会的成员们一定会同意这样一种感情,即我们的岗位是在这里,我们的攻击点——事实上全部是友好的——应当在中国本土,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要在此地坚决维持教育会的名字,运用一切值得称赞的手段,努力使他们相信这些礼物的价值。为此事业,我准备辛勤工作直到死去。”^②

在这一届年会上,颠地仍被选为会长,而司库则改选马地臣充任。众所周知,这几个英国商人都是对华走私鸦片的巨商。

鸦片战争结束后,马礼逊教育会在英国侵略军头目璞鼎查支持下,把学堂迁到香港。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一日,马礼逊学堂在香港开始上课,学生有二十余人,大部分从澳门迁来,小部分是在香港招收的。这时,学堂的课程已渐趋正规,除中文课外,西学课有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41年10月,第570—573页。

② 同上书,1841年10月,第584页。

学、音乐等，一八四六年还曾开过一学期化学课。这些西学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学生经过三、四年学习之后，除熟悉中文外，对英语的读、写、听、讲和翻译，都有相当的基础，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有了大概的了解，对数学、机械原理等知识，也略知一、二。同时还接受了基督教教义的灌输和滋长了对洋人崇拜的心理。这批学生所获得的知识，远比当时的封建学塾丰富得多。他们虽受到基督教的熏染，但没有一个学生接受洗礼。

到一八四三年，马礼逊学堂学生人数发展到四十二名，分成四班上课，同时把《圣经》课列为必修科目。学堂里已有一个小规模的图书室，藏书四千一百四十二册。学堂规定学制八年，但不少学生的英文有了一定的水平，就被英国商人请去当翻译或买办，而中途辍学。

一八四五年九月，马礼逊教育会举行第七届年会，选举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为会长，并公推香港总督德庇士为该会的监护人，小马地臣出任司库。在这届年会期间，马礼逊学堂举办了一个学生成绩展览会，汇报学生在该校的学习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展出了不少学生用英文写的习作，其中有六篇代表作，都是在该校读了五年的学生写的。虽然都没有作者姓名，但反映了学生的英文程度，和具有的一些新思想。例如，一篇题为《知识就是力量》的习作，写道：

知识是幸福和快乐的源泉，它是驱除一个国家无知迷雾的亮光，它能博得荣誉，它可增进民族的财富，而且归根到底，它是一个国家最强有力的国防。民族繁荣的永久性基础，可以安放在它的上面。

另一名学生在题为《中国政府的不公正》的习作中说：

中国不能说有一个好的政府，它与英、美或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相差很远。中国当权者有成千上万，据说，从最高级到最基层，只有极少数人在履行官职时诚实忠心，想到人民的利益，并公正地对待百姓。……公认的意见是：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官员，全都是敲诈者。对他们能抓到的每一个人，都进行勒索。如不给他们行贿，几乎无一人能挣脱他们的手指头而滑走。

学生的习作也反映了他们在校期间曾受到基督教的灌输，例如在一篇题为《劳动》的习作里，一方面说，“劳动应被认为是人生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却又说，“这是造物主所设计，人类必须去工作，要劳动到夜晚，只有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①

带容闳等赴美留学

在一八四六年九月三十日马礼逊教育会举行的第八届年会上，布朗向教育会请求批准他一家回美国休假，主要原因是因他妻子久病未愈，需要回美治疗。马礼逊教育会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在二月间由美来华到该校教书的马西负责校务。^②

布朗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据后来成为中国著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容闳用英文写的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一书中，对他得以成行的经过，写道：

“布朗是在一八四六年冬天离开中国的。在他走之前四个月，有一天，他突然宣布了一个使全校震惊的消息。他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45年10月，第455—454页。

② 同上书，1846年12月，第601—618页。

声称由于他和他的家属健康不佳，打算要回到美国去。最后他说，他对学堂工作怀有深切的感情，他说他愿意带几名年岁比较大的学生和他一起回去，让他们在美国完成他们的学业。凡是表示希望和他同去的同学，可以站起来。……当布朗提出谁愿意跟他到美国去就站起来时，我第一个起立，黄宽是第二个，最后是黄胜。……在这里有必要插一句，那就是说，如果要靠我们自己出钱，我们是决不可能到美国完成学业的，因为我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在布朗的努力下，决定在我们留美期间给我们的父母亲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我们的赞助人负责偿付我们在美国的一切费用，为期不超过两年。”

帮助容闳等三名学生留美的主要赞助人，是香港《孖刺报》的主人兼编辑肖德锐，他是一位苏格兰人。另外美商奥立芬答应给他们免费乘坐公司运载茶叶的“女猎人”号货船，从香港到纽约。容闳等收拾好行李和辞别家长以后，跟布朗于一八四七年一月四日上船，经过九十八天的航程，于四月十二日到达美国纽约。^①

容闳回忆道：“我们的老校长布朗老师，把我们这三个人托付给他母亲负责照料，我们在她家里吃饭，又安排我们到她住宅马路对面的房间住宿。”布朗把他们保送进了麻省芒松学校读高中，除黄胜因病不久折返香港外，容闳和黄宽在该校学习两年，于一八五〇年毕业。在考虑今后去向的问题上，容闳决意在美国考大学，而黄宽则在肖德锐的继续资助下，前往苏格兰。后来，黄宽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七年医科，于一八五七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在广州博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第二章。

济医院服务。

容闳在考取大学之前有一个插曲，他要进大学读书，学费和生活费从何而来？当时有人向他建议，只要肯读神学，并答应在毕业后回到中国充当传教士的誓约上签字，就可以获得全部津贴。他们还同他约定了日子，到一位牧师家中去和董事们见面。那天，董事们还以为他已经同意签字了，但容闳却向他们明确表示，决不在这种誓约上签字。容闳陈述的理由如下：“首先，这将阻碍和限制发挥我的才能。我要有最充分的行动自由，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中国最大的利益，贡献我的力量。……召唤我充当一名传教士，这并非在生活中可在中国或别处造福于人的唯一领域。在一个如此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里，对于一个造福者的抱负，是很难给以任何限制的。”^①容闳还写道：“我固然很穷，但我决不容许在困境中被别人占上风，迫使我为了暂时的一餐浓汤而出卖我应尽的天职。”这是多么有志气的一段话啊！后来，在布朗的支持下，容闳考取了著名的耶鲁大学。布朗通过学校当局，帮助他在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可以勤工俭学。容闳经过四年学习，于一八五四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布朗专程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并在十一月间容闳乘船回中国时，赶到码头为他送行。

布朗回国后就没有再回到澳门办学，他所创办的马礼逊学堂，后来因师资和经费缺乏，于一八四九年停办。马礼逊教育会也因成员分散，而停止活动。

布朗在美国休假一段时间后，曾在纽约洛漠学校执教，并与友人一起筹建埃尔米拉大学。从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九年的二十年内，他受美国归正会的派遣，去日本当传教士，长期从事教

^①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第五章。

育工作，并负责把《圣经》翻译成日文。一八六一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布朗访问上海时，正赶上裨治文病故，参加了他的葬礼。一八七八年布朗再次访问中国，在广州受到黄宽等校友的欢迎。他们并集资请布朗到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旅游。一八七九年，他自日本退休回美国，一八八〇年六月二十日在美国病故，终年七十岁。

布朗在中国活动前后共八年，正值鸦片战争进行期间，他当时对中国的政治观点，同其他在华外国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同样迫不及待地要求英国迅速武装入侵中国，以便打开中国大门。举办马礼逊学堂的钱，主要来自英、美的鸦片走私巨贩，布朗也不会不知道。但在他历次学校工作报告中，却没有一句谴责这种罪恶交易的话。^① 布朗离开中国后，主要活动是在日本，因此对于后来的中国政局，他没有发表过多少议论。

威廉·格里费思曾为布朗写传，书名上夸张地称他为《新东方的创造者——塞缪尔·布朗》，一九〇二年在纽约出版。

^① William E. Griffis: A Maker of the Orient—Samuel R. Brown, 第71页。

雒 魏 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雒魏林是英国传教医生，一八一一年出生在利物浦。一八三八年奉伦敦传教会之命前来中国，长期从事医药传教活动，是青浦教案的罪魁祸首。

奉 命 来 华

自从英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一八三四年去世后，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传教士都是在南洋马六甲、巴达维亚、檳榔嶼、新加坡等地活动。到一八三八年，伦敦传教会看到美国方面派遣的传教医生，在华活动有明显的效果，才决定也派遣传教医生前来中国。雒魏林表示愿意献身于英国对华传教事业，经伦敦传教会的批准和短期筹备后，即乘船离英来华。

当时在广州开设医局的美国传教医生伯驾，在鸦片巨商英国人颠地的资助下，于一八三八年在澳门又开设一所教会医院。伯驾在澳门这所新医院行医三个月，到十月份因回广州开业，不得已把澳门医院歇闭。雒魏林于一八三九年年初到澳门后，英、美商人和伯驾一致主张澳门医院请雒魏林重新开诊营业。但到了八月间，中、英关系渐趋紧张，雒魏林把医院停业后前往巴达维亚，在那里跟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学习中文。

一八四〇年，英国正式发动鸦片战争，雒魏林又回到澳门，奉命跟随英国侵略军乘兵船前往浙江定海，开设医院。英军于九月间占领舟山群岛，雒魏林乘机在定海开设一个诊所。开始，当地老百姓都不愿去看病，雒魏林居然走街穿巷，施医给药，企图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好感。到次年二月，英国侵略军从舟山撤退，雒魏林害怕没有保护，就把刚开了四个多月的诊所关掉，跟随英国兵船又回到澳门。

据雒魏林在写信给广州医药传教会关于定海医院的报告中称：“舟山群岛已置于英国势力之下，医药传教会认为，有必要派出一位代理人，到该地区的首府定海建立医院，尽可能为解除当地百姓的病痛和实现医药传教会的目的，以便在这个新的军港试验这种手段，以获取老百姓思想上有益的影响。”^①通过这次在定海的短期试验，雒魏林建议英国侵略军以后每占领一块地方，医药传教会应随即派代理人去建立医院。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赢得人心”，以巩固英国侵略军的占领。

雒魏林回到澳门后，又开始把澳门医院继续办下去。当香港被英国割据后，他又转到香港开设医院，直到一八四三年夏天。这时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签订，新开放的五口，已陆续有英、美、法等国侨民经商或传教，雒魏林奉伦敦传教会之命，再次到舟山开设诊所。在这期间，他乘英国兵船两次到上海，调查建立传教据点和医院的可能性。他向香港伦敦传教会的负责人报告，认为上海的战略地位远比舟山重要，应在上海建立永久性的医院设施。经过伦敦传教会研究，决定关闭舟山诊所，命令雒魏林立即到上海觅址创办医院。

^① Chinese Repository. 1841年8月，第453—465页。

上海仁济医院的创立

上海仁济医院是基督教新教在上海开设的第一所医院，创办人就是雒魏林。当英国政府派驻上海的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在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到达上海的消息传到舟山后，雒魏林随即于十二月前往上海，在县城南门附近租用了一座房屋办起了医院，开始向周围居民送医给药并传教。

开业后不久，在上海的伦敦传教会传教士开会讨论并通过雒魏林的提案，决定在靠近租界的北门，购地自建医院。接着，他们向上海的英商募捐，在募得二千八百余元之后，一八四六年十二月召开了捐款人会议，成立了理事会，负责监督建造新院事宜。过了十五年，由于医院业务扩大，房屋不敷应用，才决定在山东路择地另建新院。把北门院址出售。这已是一八六一年的事了。这样又过了十二年，即到一八七三年，院舍又翻修一次。一九二六年上海著名英国地产商雷士德去世，按照他的遗嘱，将遗产的一部分二百万两银子，捐赠给仁济医院，要求把院名改称雷士德中国人医院。以上就是上海仁济医院大致的沿革。^①

传教士开设教会医院，是为了接近群众，通过医治疾病以取得病人的好感，从而达到发展外国教会势力，和缓和或消除中国人民反抗外国入侵的目的。早期在上海活动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慕维廉、艾约瑟等，就经常轮流到仁济医院向病人传教和散发福音书。同时也到设在上海县城内的分诊所去，向病人传教。雒魏林规定医院每天早晨七点半打铃，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动者，都必须到大厅内集合，听外国牧师讲道并参加祈祷。下午门

^① F. L. 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第91—92页。

诊开放前,所有候诊病人及陪同来的家属,也都必须集中听外国牧师的宗教灌输,不管病人愿意与否,一概先听道后看病。那些重病人起不了床的,外国牧师就到病房里去讲道。

最初到仁济医院看病,都是免费的。对无饭吃的病人,还发伙食费。据雒魏林写的《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一书说,他在一八五二年年初,因医院周围有许多饥民,他曾向租界内的外国商人募捐买米煮饭,发放给饥民吃,如此持续了九个星期。到十一月间,雒魏林再次发放米饭给饥民吃,直发到春节之后才停止。^①

青浦教案

一八四八年,在上海附近青浦县发生的青浦教案,是近代中国最早发生的教案之一。青浦离上海县城有九十华里,按照上海开埠时的规定:“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过夜。”可是雒魏林和其他英、美传教士,在这次教案发生之前,就已多次非法进入青浦和其他县城,进行侦察和散发传单。他们事先雇了民船,一般都在夜间上船,进到内地活动一天后,又乘船在夜间回到上海。

一八四八年三月八日,雒魏林偕同麦都思、慕维廉带了几捆传单,再次进入青浦县城,在城隍庙一带逐户散发。当时有大批准备运粮北上的漕粮船停泊青浦,约有一万五千名来自北方的水手在县城里,其中有些水手正在城隍庙附近闲逛,看到有外国人来,也上前去观看,和索取传单。雒魏林这时见有不少人前

^①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第250页。

来,就叫麦都思、慕维廉走在前头挨户散发。他在后面用手中的拐杖驱赶群众。有一个水手对此大为不满,要求雒魏林让开一条路。但是,雒魏林不但不肯让路,反而用拐杖猛击该水手的头部,别的水手和他讲理,他仍用拐杖驱赶群众,这就激起了众怒,于是,传教士与水手在东门外展开了一场搏斗,结果这三名传教士“受有轻伤”。^①漕粮船上的水手们给主要的肇事者雒魏林一点教训,为的是告诉他:中国人是不可侮的。但是这三个英国传教士,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打伤了中国水手也不讲一句道歉的话。当水手们进行还击时,他们还竭力反扑,到后来才不得不求饶。最后,水手们把他们带回青浦县城,交给官府处理。

县府经过调解,就派兵护送他们回上海。一到上海,他们立即向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汇报,要求英国政府进行报复。阿礼国随即约见苏松太道咸龄,他不但不承认英国传教士违法越境和打人的罪行,反而小题大作,有意歪曲事实和扩大事态,乘机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和勒索。咸龄当即答复阿礼国说:“斗殴细故,不足深诘。”拒绝了阿礼国的要挟。阿礼国没有达到目的,回去和传教士们商议,决定了几条毒计:一,在未得满意的解决之前,所有英国船只进口的货物,一概拒绝付税;二,所有装载贡米准备出海运往北京的一千四百艘粮船,一律不准驶离港口,由英国兵船警戒;三,立即派英国驻沪副领事罗伯逊乘兵船驶赴南京,向两江总督李星沅直接要挟和武装恫吓。

清政府在不明底细的情况下,屈服于英国侵略者的压力,特

^① 《筹办夷务始末》第79卷,第6—7页; Chinese Repository, 1848年8月,第151—157页。

派老牌投降派耆英负责处理此案。结果，咸龄被革职。由买办吴健彰署理苏松太道；在青浦逮捕了十名水手，押到上海枷号示众；赔款三百银两，一千四百余艘漕粮船被扣十六天所受的损失，还未计算在内。地方官亲赴英舰和传教士寓所“拜访道歉”。就这样，青浦教案算是结案。

这次事件既反映了外国侵略者的奸诈和虚伪，也暴露了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缺乏知识。当时在香港的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写给阿礼国的指示中说：“恭喜你的成功，但只此一遭，不能再干。”^①因为，当时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兵舰一共只有两艘，阿礼国令一艘驶赴南京进行恫吓，一艘封锁上海港口。这艘担负封锁任务的兵舰，仅是装了十门小炮的双桅船，就把一千四百艘漕粮船扣住不能出港。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淫威，当时任苏松太道的咸龄，在英国侵略者的压力下，义正辞严地声明：“执民以媚夷，吾不为也。”^②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当时的运粮水手，也是永远不会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欺侮的。雒魏林自知理亏，因此在他自己写的《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一书中，只字未提青浦教案的经过，而他向英国领事所作的显然是夸大和歪曲的“证词”，却告诉了人们：青浦教案的发生，雒魏林应负主要责任。

劝降上海小刀会起义首领

雒魏林对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是抱敌视态度的。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44页。

② 夏燮：《中西纪事》，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卷，第334页。

特别当小刀会首领刘丽川在一八五三年九月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后，雒魏林和在租界内的其他外国人一样异常恐慌，在他的仁济医院里，收留了不少清军的伤病员。他一直希望迅速把小刀会起义军消灭掉，可是小刀会起义军在清军和外国侵略军的连续攻击下，仍坚守县城一年多。后来，法国政府第一个撕下所谓“中立”的伪装，企图一举消灭小刀会起义军。一八五四年十二月间，法军司令辣厄尔决定发动总攻之前，先利用传教士进城劝降，法国传教士不敢进城，只有利用仍表示“中立”的英、美传教士。雒魏林得悉后自告奋勇，要求法军司令派他进城劝降。据雒魏林后来在书中写道：

“在法军和据守县城的小刀会冲突的过程中，有一天晚上，我听到法军将于次日再度进攻小刀会。我就去见法军司令，请他准许我通过法军岗哨，让我进城以私人名义劝诱小刀会接受法军司令招降的命令。……我答应他在第二天清晨五点钟，向他报告谈判的结果。这已是晚上十一点钟了，我回到家里作好了安排之后，就和伦敦传教会的伟烈亚力先生两人，通过法国守军的岗哨。伟烈先生是在听到我的企图之后，自动参加的。……我们走到了东门，要求会见他们的头目，并要他们派人陪我们回去，以免在路上遭到袭击。到达小刀会司令部时，他们正在开会，虽然这时已经深夜二点钟了。经过通报，说我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和司令会谈，就有二、三个头目出来接见我们。于是，我便将来意告诉了他们，并说这次行动完全由我个人负责，没有带来任何官方文书，也没有被官方授权。我斗胆地向他们陈述了法军司令与小刀会之间的形势，来说明他们无法抵御即将向他们进攻的法军，又指出他们的给养无法支持多久，

很快就会饿死。因此，我恳切地忠告他们，接受法军司令招降的命令。他们听了我的陈述之后，就一起回到里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商议。最后，他们出来答复我说：他们决定战斗到底。他们说：他们人数很多，力量很强，虽然法军可能给他们造成许多损失，杀死他们的人，但是放弃县城将使他们全部覆灭，因此他们宁死不屈。如果法军向他们进攻，也未必能将他们逐出县城。我力图说服他们，他们迟早会被征服的，到那个时候，他们将什么条件都不能谈了，不如趁现在还可以作出安排，以保存他们和他们部下的性命。‘不’，他们说，‘或者是顶住，或者是失败，我们都将生死与共。’我如此对他们进行忠告持续了二、三小时之久，但是毫无结果。我只得向他们告别，回到租界向法军司令报告此次会谈的结果。”^①

雒魏林的劝降失败了，法军司令辣厄尔发布了向小刀会进攻的命令。他转告英、美驻沪领事，宣布自十二月十四日起，与小刀会进入战争状态。但是，小刀会的“决定战斗到底”的意志坚不可摧。例如，在一八五五年一月六日的一次战斗中，攻城的法国侵略军六十多名和清军二千余名遭到伤亡，可见战斗的激烈。直到二月十七日阴历除夕，小刀会在外国侵略者和清军的连续进攻下，弹尽粮绝，才不得不放弃上海县城，突围面出。

雒魏林关于劝降的记述，揭示了当时外国传教士的侵略嘴脸，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我国人民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

^①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第316—318页。

北京行医

雒魏林在一八五七年年底辞去上海仁济医院传教医生的职务，回到英国休假，由另一英国传教医生合信，到上海接替他的位置。在雒魏林到东方来的二十年间，据他自己估算，曾在爪哇、澳门、香港、舟山和上海等地，共诊治了二十万人次，其间在上海共活动了十四年。雒魏林回到英国后，英、美、法、俄四国正在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提出所谓“修约”问题，英、法出兵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分别与各国签订《天津条约》。消息传到英国，雒魏林竭力要求英国扩大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得到英国政府的赏识。一八六〇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立即任命他为英国驻华使馆的高级医生，要他赶紧前往北京上任。^①

一八六一年，雒魏林在北京一方面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和负责英国公使的健康，一方面又同伦敦传教会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帮助在北京开设一所伦敦会的医院，给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一番筹备之后，由雒魏林兼管的伦敦会医院开始门诊。雒魏林在北京活动了三年，由于身体不佳，不得不再度离开中国，留下的工作移交给另一位英国传教医生德贞负责。

雒魏林的晚年是在英国度过的，于一八九六年去世，终年八十五岁。他的妻子凯瑟琳，在一九一八年去世，终年九十五岁。雒魏林的主要英文著作是《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一八六一年出版；《北京及其近郊纪事》，一八六六年出版。

^① W. W. Cadbury: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100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6*. 第93页。

罗 孝 全

(Issachar Jacob Roberts, 1802—1871)

罗孝全是美国传教士，他因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而著名。

罗孝全一八〇二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从小接受美国比较保守的浸礼会的信仰，后来到南卡罗来纳州福曼神学院攻读神学，一八二五年开始在美国南方传道。一八三三年，罗孝全被封立为牧师，当时他三十一岁。一八三五年，他把全部家产捐出组成了一个“罗孝全基金与中国传教会”，在南浸礼会差会部的领导下，鼓动教徒给这个基金会捐钱，并准备亲赴中国当传教士。一八三七年，罗孝全三十五岁时，登上驶赴中国的货船，于一八三八年到达澳门。^①

早期的传教活动

美国南浸礼会最初与公理会差会部合作，在一八三四年派丁威廉牧师到中国传教，但他未能前来我国。一八三六年九月，另一名美国南浸礼会传教士叔未士到达澳门，并建立了传教据

① William Dean: *The China Mission, Embracing a History of the Various Missions of all Denominations among the Chinese*. 第95页; A.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r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第94页。

点。罗孝全是第二个到达澳门的南浸礼会传教士，先是住在叔未士的家里学习中文，不久后开始独立传教。他经常向当地患有麻疯病的居民传教和施药。

第一个前往香港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不是英国人，而是美国人罗孝全。英国侵略者割据香港后，罗孝全在那里建造教堂，但不久他决定到广州去开辟新的传教基地。一八四四年，他趁美国使团顾盛来华时，前往广州传教，一八四六年在广州南关东石角租地建造一座小礼拜堂，雇用了两个中国籍助手，吸引人们到他的教堂来查经听道。^①

与洪秀全的初次接触

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最初与基督教的接触，是在一八三六年。当时他正在广州参加乡试，在考完走出考棚后，从传教士那里接受了一部教会出版的《劝世良言》。到一八四三年，他才认真阅读该书，决定信拜上帝，并向人宣传。一八四七年三月，洪秀全同洪仁玕一起，从家乡前往广州，到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学道。据《太平天日》载称：“年三十三岁，在丁未二月初，主与干王仁玕到广东省城礼拜堂，后干王仁玕回归，主独留礼拜堂，与花旗番罗孝全共处数月。”又据《洪秀全来历》载称：“丁未年将向日所得《劝世良言》，同洪益谦（仁玕原名）到省城礼拜堂对验，更学道理数月。”又据罗孝全回忆：“约在一八四六年或次年，有两位中国人来到我广州寓所，宣称意欲学习基督教道。其中一人未几即回家，但另一人则继续留在我处，约有两月余。在

^①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1689页。

此期间，他研究《圣经》，听受讲道，而其品行甚端，此人似是洪秀全，即现今之革命领袖。……当洪秀全初来我处时，曾写就一文详述他获得《劝世良言》一书的经过，和他患病期间所见的异象，说他梦中所见与书中所言两相符合。在叙述异梦时，他所讲的内容实在令我莫明其妙，迄今我仍未明其究从何处得来这些意见。这是因为他对于《圣经》的知识所得不多的缘故。他曾请求我给他施行洗礼，但是在他还没有获得令我满意他的合格程度之前，就到广西去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以后的行动。”^① 据与罗孝全同时代在中国活动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的描述，罗孝全与洪秀全的接触情况与上述相同，并证实洪秀全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②

赴天京的尝试

洪秀全于一八五三年在南京定都后，曾派人到广州邀请罗孝全访问天京。当时罗孝全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观点，据英文《北华捷报》所载罗孝全在一八五二年十月六日发表的自述中称：

从前我对于此次革命的性质并无何种适宜的观念，人们总以为这不过是推翻现在的朝廷而已。依我所见，这或许是革命军中一部分人的计划，……然而革命军中拜上帝的一部分人，于此目的之外必另有一目的，而且是更为重要的目的。他们不是要反抗政府，而似是为宗教自由而斗争，

① The Chinese and General Missionary Gleaner. 1852年10月，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第1册，第38页。

②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第2卷，第587—588页。

且实谋推翻偶像的崇拜。现在我对他们的这个斗争具有同情，而且期望着能有重要的结果，上帝的旨意真是奇妙！前次与外国开战的结果，是出人意外的使中国得以开放。如今，倘这次革命能推翻偶像崇拜而开放，将使基督教的福音传遍中国，其结果岂非同样的奇妙！我认为洪秀全的部下不但以他为军事最高统帅，而且奉他为宗教的先知或大师。……如果现在有外国势力扶助清廷以攻击他们，我将认为非常遗憾。^①

可见，当初罗孝全对太平天国运动，是持同情态度的，在他接到洪秀全的邀请后，即计划从广州北上。

罗孝全在一八五三年夏天到达上海，在向当时驻节上海的美国公使马沙利汇报他打算去天京访问的事时，马沙利不同意他在此时前往。但事实上，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另一个美国传教士戴作士，已在同年五月和六月两次前往太平军辖区活动，六月间，他还在镇江受到太平军守将罗大纲的接见。罗孝全就约戴作士再作一次前往天京的尝试。未经马沙利同意，他俩于七月间秘密前往。到达镇江后，因为在江面被清军发现，而被强迫折返上海，使罗孝全这次去天京的目的，没有达到。^②

在上海与小刀会领袖刘丽川的会见

罗孝全于一八五三年在上海逗留期间，适值小刀会起义成功，占领了上海县城。在上海的传教士晏玛太、雒魏林、伟烈亚

^① North China Herald. 第160期，1853年8月20日。

^② R. Covell: W. A. P. 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 第82页。

力、戴德生等曾先后进入县城去搜集情报和进行劝降等活动。罗孝全曾进城两次想拜望刘丽川未成，九月二十五日他再次入城，终于会见了刘丽川。据罗孝全在《北华捷报》发表的访问经过称：

我于今日往访刘丽川于文庙，此处即其大本营也。……彼此寒暄已毕，侍役进茶。……我问其年龄籍贯则答：三十四岁，生于广东香山，一八四九年始到上海居住。刘丽川对我说：“已送两封公文往南京，与太平王通款曲，其一由陆路，其一由水路递送。正等待复音，并盼望南京派大员前来共同布置上海各事。如获成功，将能令上海中西居民皆大欢喜，比自本月七日占领县城后所做的任何事更为满意的了。”我对刘丽川讲了十诫和它的来历。我还对他说我过去曾经是太平王的宗教师，表示愿照样施教于他部下的广东人。但他推诿说须等候南京派人到上海后，再行商量。……对于我曾二次递片于拜会他未获接见事，他一再向我表示歉意。^①

这项记载表明，罗孝全企图打入小刀会内部充当“宗教师”的计划，遭到刘丽川的拒绝，不得已他又重返广州。

一八六〇年抵达天京

罗孝全回到广州后，又继续他的传教活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罗孝全用中文写的一本《家用良药》的西药书，于一八五〇年在广州出版，虽说一共只有四十页，却是外国新教传教士在

^① North China Herald. 第166期，1853年10月1日。

中国介绍西医西药的最早出版物之一。^①

由于一八五二年罗孝全应洪秀全的邀请，未能到达天京，一八五四年六月洪秀全通过杨秀清，答复英国三十一条中曾问起罗孝全曾否到来。内称：“后天王闻觉番国兄弟在粤东省设有礼拜堂宣传上帝真道时，天王御驾是得到罗姓礼拜堂，访察其所传上帝真道符合，今该罗姓先生曾否来乎？”^②

后来一八五八年洪秀全发布的《赐西洋番弟诏》中，又曾问及罗孝全说：“朕前游行粤东省，礼拜堂诏罗孝全，那时朕诏上过天，天父天兄托大权，于今孝全曾到否？到则上朝共朕言。”^③

一八六〇年，罗孝全再次从广州出发试图前往天京，是年夏天到达苏州后，在给《北华捷报》的报告中写道：“我在九月二十二日到达苏州，有忠王秘书刘氏来见我，陪同去谒见忠王。……忠王问我是否为罗先生。我说正是。忠王即命我坐下。刘氏坐在我右侧担任翻译。忠王自由地和我交谈约二小时之久。开始都是些恭维的话，对我在十三年前曾任他的真圣主天王的教师，推崇备至。继则答应将批准我前往天京，且将亲自护送我去。……”^④

在晤谈过程中，李秀成还向罗孝全问及上海租界外国殖民主义者的情况，并请罗孝全帮助翻译一份忠王致英使的公函，请他寄到上海，并在上海外文报纸上公开发表。“最后，又略谈了商务情况。忠王邀我和他共同礼拜上帝，又与他一同进餐。他

① W. W. Cadbury: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100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第280页。Appendix. 罗孝全所译之书的原名为 *Domestic Medicine*. 是从 Jayne 的原作 *Family Medical Works* 摘译的。

② 引自1962年《文史》第1辑，第69—75页。

③ 罗尔纲编著：《太平天国文选》，第58、60—61页。

④ *North China Herald*. 第535期，1860年10月27日。

托我的两件事，我都乐意代办。会晤完毕后，乃握手告别。”^①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三日，罗孝全终于到达天京。他在天京一共逗留了十五个月，于一八六二年一月离开。对来自西方的宗教性质，和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的目的，太平天国领袖们是缺乏认识的。罗孝全到京后，天王洪秀全表示欢迎，厚赐礼物，册封为义爵，并简为外务大臣，襄佐于王洪仁玕处理外事，请他住在干王府中，亲如兄弟。

罗孝全到南京一个多月后，在十二月四日写信给美国南浸礼会差会部说：“现在，兄弟们，请到这里来帮助我们罢！请来，这是迫切紧要的事。来罢，传教士们！来罢！卖圣书的人，来罢！教师们，谁愿意的，都请来罢！”在同一封信中，罗孝全还描述他到天京后所受到的热情接待时，说：“天王宣言，得再见老友罗孝全，最为快乐。我初到时即封以高官，赐我显爵，复许以匹配三个妻子——太好了！当然我皆推辞不受。”^②

罗孝全在天京本不想当太平天国的官员，“但是为了可以自由出入和行动便利起见，他也就一如其他诸王和大臣们，穿起了朝服”。^③从此他任意出入宫廷，以天王的宗教老师自居，宣传他的教条和多次写信要美国方面赶紧派遣传教士来天京活动。

罗孝全在天京这种红得发紫的情况，使得在上海的某些外国人有所猜忌，甚至上海《北华使报》一位英国编辑，在一八六一年九月七日的“社论”中，呵责罗孝全被天王利用为工具，但后来由其他传教士代为申辩，复于下一期发表“社论”声明更正。^④

罗孝全在天京期内，先后有杨格非、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

① North China Herald. 第 535 期, 1860 年 10 月 27 日。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道考》下册,第 969—973 页。

③ G. L. Wolseley: 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第 14 章。

④ North China Herald. 第 580, 581 期, 1861 年 9 月 7, 14 日。

士，以及容闳等到天京访问，受到罗孝全的接待。他虽然试图在天京建立美国传教据点，宣传西方的上帝，但是天王以及他的下属，却要罗孝全接受天王的信仰。他在那里活动了一年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给美国南浸礼会差会部的信中说：

他(洪秀全)要我到这里来，但是不要我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劝化人民信奉上帝。他是要我做他的官，宣传他的主义，劝导外国人信奉他。我宁愿劝导他们去信奉摩门主义，或别种不基于《圣经》而出于魔鬼的什么主义。我相信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是实在反对耶稣福音的，但是为了政策的缘故，他们给予了宽容。可是我相信，至少在南京城内，他们是企图阻止其实现的。……我也看出，我的传教事业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也不再期望能容许有别的传教士和我一起在这里进行主的工作。因此，我决计要离开他们了。^①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罗孝全这位“洋兄弟”与天王洪秀全的想法完全两样，同时哀叹他的活动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决计要离开他们了”。果然，过了二十天，也就是在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日，他突然不告而别，从干王府匆匆逃到停靠在长江边上的英国军舰，溜到上海去了。

最后的十年

罗孝全一逃到上海，就连续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污蔑太平天国的领袖，攻击太平天国只宣传“政治的宗教”，不准外国

^① 英国《蓝皮书·中国内乱续记，1863年》，第3—4页。

传教士任意活动。这恰恰证明了太平天国领袖立场的坚定，与罗孝全的失败。^①

与此同时，《北华捷报》还借此辱骂太平天国，认为“这是终局的开始，此后太平天国将永远失去外国人的同情”。并且公然要求英国政府和议会授权英国侵略军，削平这场亵渎上帝的叛乱，等等。^②

罗孝全在上海，还于二月七日向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写了一份长篇书面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公使先生：遵照阁下的请求，本人仅就我之所知，对以南京为中枢在中国推进的革命运动，扼要地敬向阁下陈述于后。这次叛乱的领袖洪秀全，傲慢地自封为天王。他在一八四七年曾花了二、三个月时间，到我在广州建立的礼拜堂作为一个宗教的慕道者。自听说他占领南京，摧毁偶像，并广传基督教教义后，我以纯正的基督教得以在人民当中，甚至有在中国全境如此传播的前景面感到高兴。我因此甚愿及早参加他的这项工作，……但直到一八六〇年前，不是由于这一原因，便是因为另一原因，我的希望未能达到。到一八六〇年，由忠王率领的一支洪秀全的军队占领苏州后，洪秀全从那里向我发出了特别的邀请，要我前往天京和他同住。我在十月十三日抵达南京，从那时起直到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日，我在南京逗留了十五个月七天。

我既然在一八四七年担任过洪秀全的宗教师，自他高升以后，我更希望这个国家能由此在宗教、商务和政治方面得到良好的效果，为此我对这场革命运动一直表示友

① North China Herald. 第602,606期,1862年2月8日,3月8日。

② 同上书,第602期,1862年2月8日。

好。……但是当我在他们中间居住十五个月之后，对他们的宗教、商务和政治各种措施作了仔细的观察，我已经另翻一页。现在，我反对太平天国，同我当初赞助相比，其热心的程度前者大大超过了后者。并且，我认为这种反对是有很充足的理由为根据的。……我认为洪秀全只是一个狂人，完全不适于当一个统治者，他没有成立一个有组织的政府。……

我到南京以后不久，天王曾下令容许宗教自由，这使我和基督教界都非常高兴。……但他的目的是要我为他宣传他的政治宗教，至于他是否把我看作一个传教士，我现在已很怀疑。正因为如此，洪秀全乃派出他的官员来指导我，请我研读他的著作，要我向其他外国人传播他的宗教。……

我因此认为，在他们中间传教，已无成功的希望。而且不论在宗教、商务或政治方面，都不能从太平天国运动获得什么好处，因而我决定离开他们。

这事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失望。……^①

罗孝全在这篇给蒲安臣的报告里，还对干王洪仁玕进行造谣和攻击。同年三月，罗孝全回到了广州。四月三日，他在广州又发表文章，再次攻击太平天国运动。

罗孝全在广州继续他的传教活动，直到一八六六年六十四岁时告老回到美国，一八七一年因患麻疯病去世。终年六十九岁。^②

曾经同情和支持过太平天国运动的英国人呤喇，对罗孝全的评价是这样的：罗孝全“是美国浸礼会的一个传教士，……他

① North China Herald. 第606期，1862年3月8日；China Mail. 1862年2月27日。

② 《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 1836—1936》，第11页。

是一个不学无术，缺乏坚定性格与和蔼态度的人，偏狭和拘泥于浸礼会的教条。他易怒，暴躁，反复无常，心志不定。他到南京实在是害多于益的。……罗孝全在太平天国接受了世俗的品位，因他愚昧武断，固执己见，经常引起不愉快的争辩。……罗孝全由于盲目的冲动或其他原因，竟在盛怒之下从南京城内逃走，躲藏到停泊在江上的英国军舰‘狐狸’号上去。……罗孝全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竟把自己多年来一直颂扬太平天国是一批道德高尚的话，忘得干干净净。他在一天之内就态度大变，声称他自己一直受到欺骗，而且为了对一个人的行为不满，竟使千千万万为太平天国宗旨奋斗的人们，全都投入炮火之中”。^①

^①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74—476页，原注⑤。

理 雅 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理雅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也是早期著名的汉学家，曾将中国经典性的儒家书籍译成英文，向西方介绍。他的英译本至今仍被认为是标准译本，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作出过贡献；他对太平天国革命却持反对态度，讽刺农民起义的“铁棒将变为竹竿”，这与他始终站在外国侵略者的立场上分不开的。

家庭出身与求学时代

理雅各在一八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生于苏格兰阿伯丁郡的杭特利城，他是老四，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他父亲是资本家。他小时候就读于老家的教区学校，曾在—位盲妇处学习英国古典诗篇，这使他从小就喜爱文学。他十四岁时转入阿伯丁文法学校，勤奋学习拉丁文和英语语法。一八三一年考入阿伯丁英王学院。他在大学读书的第二年，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说：“我已开始学习几何与三角。我已学习了化学的大部分课程。”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又致力于学习哲学与宗教课。理雅各在大学求学的四年中，功课一直名列前茅。十九岁，即在一八三六年，他大学毕业，成绩为全班第一名。毕业后，他接受了布莱克本学校的聘请，担任该校校长。

理雅各在大学求学期间，为当时英国的海外传教事业所吸引，志愿当传教士。因此，他担任校长只有一年时间，就去投考希伯利神学院。他接受了两年的神学训练，向伦敦传教会提出申请，要求派往中国传教。伦敦会批准了他的申请。一八三九年七月，他带了新婚夫人玛丽，从英国乘船出发，一八四〇年一月十日抵达南洋马六甲。

在英华书院教书和担任校长

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是由英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的。马礼逊在一八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给伦敦传教会的信中说：“我希望在马六甲有个机构，可以用作培养欧洲的、本地的和越恒河国家的传教士。”伦敦会批准了他的计划，并拨给筹办经费。一八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华书院举行奠基礼，一八二〇年校舍建成，秋天正式开学。第一任校长为英国传教士米怜，后来又陆续更换了五个校长，一八四〇年理雅各到达马六甲后，担任校长。当时他才二十五岁。

英华书院自一八二〇年招生，到一八三四年的十五年间，完成学业的学生只有四十人，多数为当地华人，愿回中国从事传教的人，几乎没有。该校有一个学生袁德辉，原籍四川，一八二五年入英华书院，一八二七年毕业后回到中国，先在理藩院工作，一八三九年随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担任外事工作。欧、美人在英华书院学习的人数很少，其中较有名气的是威廉·亨德和马儒翰。前者是美国人，在广州经商，写过一本《广州番鬼录》；后者是马礼逊的儿子，主要在校学习中文，后来到广州当翻译。

理雅各在马六甲的头两年，正值英国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最

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理雅各获悉这个重要消息后,认为:“中国门户开放同欧洲通商和交往,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这个条约揭开了一幕伟大的戏剧。”^①

理雅各在《南京条约》刚签订后,就写信给马儒翰,征求他关于英华书院迁往中国的意见。马儒翰是随英国侵略军头目璞鼎查一直打到南京的助理和通译。马儒翰在南京回信给理雅各,提出了迁校的看法。他在信中写道:“我亲爱的朋友,你要把英华书院迁往南京、甚至迁往北京开办的计划,是过于不切实际了。不,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的学校建立在英国的领土上,而香港,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就是这块地方。因此,下定决心迁到香港吧!你要赶紧。我亲爱的理雅各,赶紧安排好把学校定放在香港。”^②英国伦敦会方面根据理雅各等人的意见,同意把英华书院迁往香港继续开办,令理雅各全盘负责迁校事宜。一八四三年,英华书院搬到香港,仍由理雅各担任校长。

英华书院在香港的办学宗旨,已与以前不同。它已成为专门招收当地中国青少年入学的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理雅各除负责校务外,还直接从事传教活动,一八四九年被任命为香港联合教堂的牧师。理雅各在一八四五年回英国休假时,曾经带了三名中国学生赴英留学。一八五二年十月,他的妻子在香港去世,后来又娶了一位英国女子为妻。

从事于儒家典籍的英译工作

理雅各的一位孙女,曾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四日在英国的“中

^①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国苏格兰学会”宣读一篇论文，内容是论述理雅各的生平。她提到：“理雅各是天生的学者，后人之所以纪念他，乃是因为他是学者。他并不象那些使人讨厌且生反感的传教士。……理氏明白，如果想引起一个民族的注意，而不试图去了解那个民族，那将是一个悲剧。因此，他开始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①

了解中华民族是理雅各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中国能传播西方的上帝。理雅各发现：“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注者和解释者。过去，他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的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的理想。”^②既然孔子有那么巨大的影响，西方世界、特别是从事于向东方推行殖民主义的国家，都应该了解他、学习他。理雅各告诫在华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③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有必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理雅各不同意早期来华传教士提出的，要以西方的基督取代孔子，即所谓“孔子或耶稣”的说法。他认为，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有许多共同点，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出妥协。这些就是理雅各从事于英译中国儒家典籍的历史背景。

理雅各把英华书院迁到香港后，就根据上述信念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古典文学的工作。从一八六一年第一卷《中国经典》英译本出版时起，在此后二十五年间，陆续翻译出版了中国的

① 《景风》第11期，第99页，1966年8月香港出版。

②③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第1卷，第96页。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名著。

理雅各在香港开始着手翻译中国典籍时曾经发愁，并且自问道：“出版的经费从何而来？”香港怡和洋行的老板查顿的侄子约瑟·贾丁获悉后，把理雅各找来，对他说：“如果你已译好准备出版的话，钱由我来付。我们的钱是在中国赚的，只要从中得到好处，我们就应该乐子帮助。”一八六一年理雅各英译的第一卷得以出版，内容包括《论语》、《大学》和《中庸》。由于出版之日捐钱者约瑟·贾丁已去世，为此理雅各在卷首印了几句感谢和纪念这位英国商人的话。后来，这位商人的弟弟罗伯特，继续资助理雅各出版以下各卷。

理雅各在《中国经典》第一卷的“序言”中，叙述了他翻译和出版的经过：

“本书译者于一八三九年年底作为一个传教士来到了东方，在马六甲居住了三、四年。他在离开英国前，有幸在伦敦大学吉德教授（现已过世）处学习了几个月的汉文，使他得以在一八四〇年初开始阅读本卷中所译的第一部作品（《论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认为在汉语上确已获得了进步，他想可以大胆地自己着手翻译了。他按照自己所订的计划研究和翻译，并且进行注释。他认为此项工作并未使他对日常的积极从事的传教和教学业务转变方向，但是他决不容许自己浪费任何光阴。一八五六年，他第一次向他的一些朋友们谈到自己的打算，朋友之一有循道会的郭修理牧师。编译的稿件不久就可送到印刷所，但却发生了出版费用的问题。他希望那时能获得在华英商或别国商人的捐助，以便使他能按照计划，继续编译下去。不

久，郭修理牧师不动声色地把我全部编译计划告诉了他的朋友约瑟·贾丁先生。他向我叙述了贾丁先生的意见，我得以和那位绅士进行商谈。他非常慷慨地答应愿意承担印刷费用。……贾丁先生对我的编译计划表示完全赞成。他对我说：‘我知道在华外商是慷慨的，他们有许多人将随时愿意帮助这样一种计划。你不用费力去向他们募捐。如果你已译好准备出版的话，钱由我来付。我们的钱是在中国赚的，只要从中得到好处，我们就应该乐于帮助。……我希望这些译本的出版将会给传教士和其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学者以真正的服务’”。^①

另一个英商颠地答应理雅各，在书稿译成出版后，给在华的每一个传教士，不论是属于天主教的还是基督教（新教）的，每人只需出一半价钱就可购买一部，其余一半的钱全部由颠地来支付。^②其他在华外商也都为这些书的出版捐过钱。在这些捐钱的外商中，大多数都是鸦片贩子，他们把毒品高价走私给中国人后，从捞到的巨额不义之财中，拿出一点零头来资助向西方介绍中国经书的出版活动。

理雅各向英国和西欧介绍中国的儒家典籍受到了欢迎，并使他获得很高的声誉。一八七〇年，阿伯丁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在爱丁堡大学举行三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理雅各是受到尊重的人物之一。理雅各在多次访问巴黎的过程中，曾同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朱利昂，进行对汉学的高水平的讨论，曾获得朱利昂奖金的首奖。

中国儒家经典向西方的传播，对西方的哲学思想、伦理思

①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1861年3月26日写于香港。

②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第40页。

想、文学思想,都产生一定的影响,理雅各是有贡献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位中国学者王韬的功绩也不应该埋没。王韬原来在上海伦敦传教会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一八六三年王韬乘船来到香港,担任理雅各的助手。当时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头两卷英译本已经出版,他正在翻译《书经》。由于王韬的具体帮助,给他解释难懂之处,帮他写注释,使他得以顺利地完成英译《书经》和《竹书纪年》等,并作为第三卷出版。随后王韬又帮助理雅各英译《诗经》,作为第四卷,于一八七一年出版。第五卷《春秋》、《左传》,于一八七二年出版。以上均在香港出版。《礼记》于一八八五年在伦敦出版,这是王韬帮助理雅各英译的最后一部书。

王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据《理雅各传》一书提到,当时在英译《诗经》的过程中,每月的开支约为一百零五元港币,而付给王韬的酬劳每月仅二十元港币。^①

一八六七年,理雅各因病回英国,当恢复健康开始译书遇到困难时,他想起了他的得力助手王韬,就赶紧写信给香港伦敦会办事处,要他们安排王韬到英国去帮助他译书。王韬接到邀请后,先把家眷送回上海,然后再乘船前往苏格兰。

在理雅各回国前,王韬曾写了一篇《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的文章,对理雅各翻译中国儒家经典向西方作介绍的评价称:“嘉庆年间,……理君雅各先生……橐笔东游,……注全力于十三经,贯穿考覈,讨流溯源,别具见解,不随凡俗。其言经也,不主一家,不专一说,博采旁涉,务亟其通,大抵取材于孔郑,而折衷于程朱,于汉宋之学,两无偏袒,译有四子书、尚书两种。书出,西儒见之,咸叹其详明该洽,奉为南铎。……而先生独以西国

^①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第43页。

儒宗，玩心媚古，俯首以就铅槧之役，其志欲于群经悉有译述，以广其嘉惠后学之心，可不谓难欤？然岂足以尽先生哉！”^①

王韬到英国后，又协助理雅各继续进行翻译。理雅各曾多次赞扬王韬为中国“第一流学者”，得到他的帮助匪浅。理雅各还抽空陪同王韬在英国参观访问，包括到大英博物馆、蜡人馆（参观了蜡人林则徐）、圣保罗大教堂和牛津大学等。牛津大学还特地请王韬发表演说，由理雅各替他翻译，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后来理雅各又陪同王韬到他的老家访问，又到爱丁堡、格拉斯哥、阿伯丁等地参观游览。资本主义的英国使王韬大开眼界。特别是当王韬到达爱丁堡时，受到了原在上海伦敦会的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和韦廉臣的接待，他们还陪他一起参观了医院、浴室、法庭、印刷厂、纺织厂、造纸厂、监狱等，使王韬了解到这些当时中国还很少见到的工厂企业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情况。后来，王韬又在理雅各的资助下前往法国、俄国等国游历。在法国巴黎，他会见了著名汉学家儒莲。一八七〇年三月，理雅各偕同王韬乘船回到香港。王韬在国外共游历了二十八个月，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启发。

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黄胜，对理雅各译书的印刷出版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黄胜是一八四七年与容闳一同到美国的留学生，抵美后因健康关系不久又回香港，在一家英商报馆工作。从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八六年的二十五年间，理雅各在王韬等人的协助下，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共有二十八卷之巨。由于采用英、汉对照和详加注释，在排版和印刷方面，黄胜曾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理雅各编译中国儒家经典，从客观

^① 《皇朝蓄艾文编》第77卷，杂纂1，第19—20页；参看王韬：《弢园尺牍》第12卷。

上对中外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理雅各认为一般外国在华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是：

“当一八五三年占领南京后，此革命运动初露锋芒于世上之际，传教士中的许多人因该运动的领袖们所颁发的书籍和文告中所表现的基督教感情而欢呼称庆，渴欲探知他们将发展至何种程度，同时对他们充满了希望。当他们获悉已有《圣经》的几个部分印行，并传播于众，并不在经文中附加评语或注释时，他们欣喜至极。如有对此事不高兴的，那真是奇怪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这个运动的种种许诺的花朵日渐枯萎而死时，他们产生的懊悔一如初期所抱的希望。……”^①

而理雅各则早在一八五四年一月和七月两次写给伦敦传教会的信中，就对太平天国持反对态度。在一月间写的信中，理雅各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有许多“错误与混乱”，“既然如此”，理雅各写道，“我们深惧民众的宗教将成为狂信主义，并不是对福音有理智的信仰，这是我们所不乐意承认的。”在七月间写的信中，理雅各反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更加明朗化了，他认为：“现有两点似可确定者：一是起义者的宗教，是走向狂野、粗鄙和亵渎上帝的狂信主义。二是他们对于外国人已经采取坚决的敌视态度。对第一点来说，我宣布对于其首领洪秀全自称的启示不能置信，对他自称与救主是兄弟深为震惊。一切客观的真理，凡由《圣

^① 理雅各致伦敦会函，1862年7月11日。引自司各尔：《传教会与近代历史》第1卷，第66—70页。

经》以外所得者，皆可追溯其源系出于疯狂、欺骗或假冒。这些错误的发展，把一切本欲引人归向并产生希望的真理，投入阴暗之中。真理既然在起义者的心中消失，其权力也将随之消失。铁棒将变为竹竿！”^①可见，理雅各这位“洋兄弟”，并不因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有密切关连而表同情，恨不得它迅速消亡。

太平天国领袖之一洪仁玕，从一八五四年冬到一八五八年曾在香港居住四年，在伦敦会担任助理，与理雅各共事约有三年。理雅各很赏识洪仁玕的才华，可是每月却只给他十元港币的工资，比王韬还少一半。他也知道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亲戚，当时有很多人来见洪仁玕，要他率领他们到内地去参加太平军，理雅各却竭力阻止。“理雅各劝告他不要与起义者有任何瓜葛，并说他应当为已经逃脱牵连而感恩，因为理雅各博士一开始就对太平军首领们持有的某些可憎恶的教义，表示可疑和反对。但是对洪仁(玕)的品行，是深为敬重的。当理雅各不得不赴英国十八个月的前夕，他向洪仁(玕)下了严格的禁令，不准洪仁玕去参加起义军，必须留在香港。”^②可是，理雅各的这项“禁令”并未起作用，当理雅各前往英国后不久，洪仁玕就离开香港，于一八五九年四月抵达天京。洪仁玕离港之前，曾把他的家眷接到香港暂住，同来者还有他的堂兄洪水保，后被安排在理雅各家中当仆役。

理雅各对洪仁玕赴南京后的态度，谈了他的看法：“直至约

① R. E. Speer: *Missions and Modern History*. 第1卷, 第66—70页。原载 *Missionary Magazine*, 1862年10月。Dr. James Legge's Letter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62年7月11日写给伦敦会的信。

②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第91—92页。

两年前我得知我的老朋友洪仁玕已被封为干王，成为洪秀全的宠臣和顾问。当时我希望他将能改正太平天国的许多错误，引导他们对基督教的真理能有正确的观点，在政治方面能有较智慧和慎重的行动。他当初发布的一些文告，和他呈献给天王的长篇奏章(《资政新篇》)，并不令我失望。可是不久他实行多妻主义的消息，打消了我重生的希望。我还曾多次写信给他，但我已不再期望他能使中国得救了。我在上面所引述的信中，曾提及起义者对外国人已抱坚决的敌视态度，洪仁玕则准备理智地劝解他们培植与外国人的友好关系，后来他也确曾做了。倘若我们在一八六〇年或一八六一年愿意同他谈判，我们当可发现他们以‘洋兄弟’相称呼，是具有真正的、善良的和实在的意识在内。不过干王在他所处的地位，仍不能克服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人们对他有多种责难，但实在是冤枉他的。然而，我们有理由深为忧虑，即他已经毁掉了信仰和良心。”^①

洪仁玕是一位爱国者，他当然不肯接受传教士对他的摆布。不论是理雅各还是艾约瑟或罗孝全，都没有能改变他效忠太平天国革命的信念和行动。

但是，洪仁玕并没有忘记香港的一些中外朋友过去曾经给予他的帮助。包括从理雅各那里学习到的许多西方知识。为此，洪仁玕为了表达他的谢意，曾托人带了一千元银币到香港，命他的堂兄洪水保分赠给四名传教士和六名中国人每人一百元银币，其中有赠给理雅各的一百元银币。

理雅各问洪水保：“干王是从哪里得来这些钱的？”

^① R. E. Speer: *Missions and Modern History*, 第1卷, 第66—70页。原载 *Missionary Magazine*, 1862年10月。Dr. James Legge's Letter to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62年7月11日写给伦敦会的信。

洪水保答道：“他是王，他只要开口说一句，就可以得到钱。”

理雅各：“你称他是王，我呼他为寇。如果太平军成功地推翻中国政府，我就将承认他是王，但我现在只能呼他为寇。我怀疑这一千块钱是否是用正当的方式得来的。他过去在这里（香港）每月只拿十块钱而常乐。你写信告诉他，我不能接受这一袋一百块钱。”

洪水保：“这，他会发怒的。”

理雅各：“我没有法子，告诉他我心领他的好意，但必须要等待这次起义的结局如何。”^①

洪水保一气之下，也离开香港投奔太平天国去了。理雅各说得很硬，他不收这种所谓是用不正当方式得来的钱，试问当初他为什么要接受大鸦片商查顿的侄子和颠地等英国人的钱，来印他的书呢？难道大鸦片商的钱是用正当的方式得来的吗？理雅各不但拿了他们的钱，而且还在书的首页大登这些“大善士”的名字加以歌功颂德，难道理雅各健忘了吗？不是的，理雅各的这种不友好的态度，反映了他根本反对太平天国革命。

出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理雅各在一八七三年离开香港，在回英国之前，他曾到山东、北京等地一游，参观了曲阜的孔庙，游览了泰山，然后到天津、北京游览，最后南下到江苏参观游览，再从上海乘船回英国，理雅各这时已五十八岁，已经成为在欧洲享有盛誉的汉学家。这次回英国后，就没有再到中国来。

理雅各回英国后，竭力主张应加强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

^①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第 95 页。

中国社会思想的支柱儒家思想和典籍的研究。当时在英国的一些原来在中国当外交官或经商的英国人，提出应在牛津大学设立汉学讲座，推荐理雅各为该讲座的第一任教授。英国舆论对此也积极支持，有一家报纸发表的社论说：“我们在东方、特别在中国的利益，超过了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利益，但在研究东方语言和文献方面，却做得很少。……这方面少做或者不做，甚至从商业观点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①

当时推进此项计划最努力的，有英国前驻华公使阿礼国，和前香港总督德庇时等。他们募集了捐款，专供牛津大学开设汉文讲座之用，但英国的正统派仍嫌理雅各不是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生，不是贵族，又不是英国国教的教徒等加以阻挠。经过各方疏通加上理雅各的大量译著和它们对欧洲的影响的客观存在，使得那些正统派也只好让步。因为当时在英国的一些汉学家，无出其右者。因此，牛津大学才打破常规，让一名传教士出任第一任汉学教授。阿礼国等多方奔走，一共募得三千英镑之巨，专给牛津开设汉学讲座。

一八七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这个讲座在伦敦谢尔登大剧院举行开学典礼，理雅各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指出设置这个讲座的理由，是“出自我们同中国的政治、宗教和商务的关系”。^②

理雅各仍旧保持他在中国工作时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在书桌上连续工作五个小时才用早餐，然后教书和从事翻译或研究，每天工作总在十二小时以上。他在牛津的教席，

①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第204—205页。

② 同上书，第206页。

一直延至一八九七年。一八八四年，爱丁堡大学又授予理雅各法学博士学位。

一八八一年，理雅各的第二个妻子又去世，留下四个子女，加上前妻所留下的两个孩子，共有六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理雅各在牛津大学任教期间的译著，主要有：

1. 《法显行传》(一八八六年加注付印)。2. 《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3. 《孔子——中国的圣贤》。4. 《孟子——中国的哲学家》。5. 《中国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与小说》。6. 《致缪勒函有关中国人称帝与上帝》。7. 《中国编年史》。8. 《离骚及其作者》。9. 《帝国儒学讲稿四篇》。10. 《封建的中国》。11. 《道德经》。12. 《道教论》。13. 《中国的诗》。14. 《扶桑为何及在何处? 是在美国吗?》。15. 《中国古代文明》。16. 《基督教与儒教之比较》。17. 《孔子生平及其学说》。18. 《孟子生平及其学说》。19. 《诗经》(英文押韵诗体译本)。

以上是单独出版的一些主要译著，另外由英国语言学家缪勒收进他主编的《东方圣书》丛刊中的理雅各译著，有：

1. 《书经》。2. 《诗经中的宗教》。3. 《孝经》。4. 《易经》。5. 《礼记》。6. 《道德经》。7. 《庄子》。8. 《因果论》等。^①

理雅各所作的学术报告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人物传评、中国天文和中国社会宗教等。他在牛津大学前后共二十二年，培养了不少汉学家。

理雅各回到英国后，开始反对英国把鸦片输往中国。一八七八年在伦敦举行的一次禁止鸦片贸易的大会上，理雅各慷慨陈词，反对英国的鸦片贸易。他认为，这是一种罪恶的交易，不

^①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第208—216页。

但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受害,而且最主要的是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为了加强他演说的说服力,理雅各引述了一段他与当时的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八年任驻英、法公使)的一次颇有意义的谈话,其内容为:

郭嵩焘:“啊!亲爱的博士,你虽然出生在英国,却几乎是同我一样象个中国人。为此,请你老实告诉我,中、英两国相比较,你看那个国家更优越?”

理雅各(略为踌躇,以免得罪对方):“但请阁下不要生我的气,不论怎么说,我把英国放在首位。”

郭:“是,是,我明白,如果你把两国的工业力量、铁路、海军进行比较的话。但我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的。我喜欢你用这个观点,来把两国人民作一比较。”

理:“阁下,从这个观点来说,也只能使我把优势让给英国。”

郭嵩焘顿时从座位上跳起来,在他豪华的中国式书房内踱来踱去,猛力地伸展双臂,然后又一屁股用力坐到书房那一头的椅子上,几乎要砸坏那张椅子。理雅各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发那么大的脾气。过了一会,他又站起来,走到理雅各的面前,对他说:

“那末,博士先生,为什么,为什么贵国要强迫我们中国接受贵国送来的鸦片呢?”

理雅各顿时目瞪口呆,无以回答。

理雅各在引述完毕他同郭嵩焘的上述对话后,对参加大会的听众说:“当我听了郭嵩焘这番问我的话后,我只好保持沉默,因我被可耻地驳倒了。现在,面对这个问题,你们会问,那末你的意见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我的兄弟们,关于这个

问题，我只有用先知的话作为回答，那就是：停止作恶，学习行善。”^①

一八九七年，理雅各已是八十二岁高龄的人了，他还在牛津按照日常的生活规律工作，十一月二十九日他突然中风倒地，经抢救无效，终于离开了人间。他的学生们把他最后在黑板上写的汉字拍摄下来，作为纪念。他的遗体葬在牛津，墓碑是用他的母校阿伯丁地方的花岗石凿成的。英国学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到牛津访问时，总要到他墓地献花。一九二八年东方语言大会在牛津举行会议时，除英国外，还有来自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美国和拉脱维亚的许多汉学家，一同前往理雅各的墓地献花，花圈上的缎带是这样写的：“谨献给不朽的、天才横溢的大教师理雅各。第十七届牛津东方学者大会全体汉学家敬献。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一日。”^②

①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第224—225页。

② 《景风》第11期，第101页。

10

晏 玛 太

(Matthew Tyson Yates, 1819—1888)

晏玛太是美国传教士，在上海传教期间曾经干涉过小刀会起义，又因参加投机活动而致富，成为披着道袍的冒险家，混迹上海达四十余年。

青少年时代

晏玛太于一八一九年一月八日出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克郡，父亲是个农场主，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共生十个子女，晏玛太是老二。晏玛太从小在他父亲的农场里参加劳动，在乡村小学毕业后考入汤普生中学。他父亲是南浸礼会的信徒兼执事，对晏玛太的宗教生活很重视，因此他在中学时代就立志长大了要当牧师。一八三六年晏玛太接受基督教洗礼，加入南浸礼会，当时他十七岁。他一面念中学，一面在家乡的一所小学兼任教职，把所赚的钱充作在中学读书的补贴。一八四〇年，晏玛太考取了福雷斯特大学。由于他在中学时代就喜爱声乐并有一定的造诣，他在大学里和校外都兼课教声乐。南浸礼会的总部，也给他一些助学金，希望他将来能当一名传教士。

一八四六年，晏玛太即将大学毕业，校长写信给南浸礼会，正式推荐他作为该会的传教士候选人，信中写道：“晏玛太身高

六呎，胸挺肩阔，乌眼黑发，相貌堂堂，仪态非凡。他在我校就读六年，并具有极优美悦耳的歌喉，确实善于演说，我认为他有非常清醒的头脑。”^①

但晏玛太却犹豫起来，在同年五月十日写给南浸礼会差会部的信中，推说身体不好，他写道：“我父亲的私人医生说，我到东方去活不到三年，就会死去。如果真是这样，把我派出去不是浪费差会的钱吗？”但是隔了没有几天，他又写信给差会部，说：“我经过祈祷和默想，放眼观看地球，除了中国，再没有别的地方更加吸引我的了。”^②

六月间，晏玛太大学毕业，校长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真的决定到中国去吗？他回答说：“我先要在国内找一个工作做，以便还清我所欠的二百五十元学费，还清了这笔债，再申请差会派我到异邦去传教。”校长一听，他又找了一个借口，就说：这笔钱我可以替你设法筹划还清，你就不用发愁了。我手里有好几份聘书，看你喜欢接受哪一份。你看有一处国内的教会，要请你去当牧师，年薪二千元。还有……。晏玛太被校长这么一说，感到非去中国不可了。校长对他说，到中国去年薪只有七百五十元，而且要远涉重洋，异常艰苦。晏玛太低头不响了。当天下午，校长亲自跑到晏玛太的宿舍里，对他说：“晏玛太，这就是你需要的解放你的钱，你拿去吧。现在你就准备到中国去吧！”^③

一八四六年八月三日，美国南浸礼会差会部正式批准晏玛太的申请，决定派他到中国去当传教士。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他

① Charles E. Taylor: The Story of Yates the Missionary, as told in His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33—34页。

③ 同上书，第34—36页。

经人介绍，同以莱扎·莫林举行了婚礼。同年十月十八日，被当地教会封立为牧师。然后他作了充分的准备，于次年，即一八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带了夫人乘船离美来华，九月十二日抵达上海，开始了他的传教士生涯。当时晏玛太二十八岁。

在上海最初的六年里

晏玛太到上海后，南浸礼会差会部考虑他已成家，决定给他的年薪增加到一千元。夫妻俩先在县城的中心租了一所旧当铺居住，由于这座房子死过人，当地人迷信不敢住，房租很便宜，他们就搬了进去。这是一座积尘满屋、老鼠乱窜的破旧房子，晏玛太用从美国带来的一套木工工具，自己动手隔了几间房间，又雇用了一名男仆，帮助管理家务。安顿好之后，晏玛太开始学习上海方言。他回忆当时的情景道：“我学的第一句上海话是‘迭个叫啥？’就这样有了一座房屋，一个厨子，买了一条火腿和一些蔬菜，学了一句上海话，开始了我们在上海的生活。”^①

晏玛太在上海县城里居住了不久，他的眼睛就患病，使他无法学习汉字。于是，他就天天跑茶肆，一面喝茶，一面听上海人讲话，并且也学着试讲试问，和上海人厮混在一起，不但学会了上海话，也了解到不少上海人的情况，结识了一些中国朋友。

这样过了一年之后，晏玛太就在他的住处，开了一间小礼拜堂。他站在门口邀请过路人进堂听道。但是敢于进堂的人数不多，进堂的人与其说是听他宣讲基督教义，还不如说是听洋人讲洋泾浜上海话。由于晏玛太身材高大，出门时群众见了都退避

^① Charles E. Taylor: *The Story of Yates the Missionary, as told in His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第48页。

三舍，尤其是妇女，还警告小孩不准外出。晏玛太走到哪里，那里一些胆大的孩子就喊叫：“鬼子！鬼子！”

据晏玛太当初写给美国南浸礼会差会部的报告中称：“我们进入中国的时候，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四、五年。中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被英国人击败，并被迫签订了一个条约，开放五口与外国通商，赔偿了沉重的战费。这说明，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强烈地反对一切外国人，他们也分不清楚外国人的国别。他们说，‘外国人把鸦片带入我们的国家，毒死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并把所有阶层的人都弄穷了。这鸦片引起了战争，使我们许多人被杀害。现在他们竟然要来教给我们一个新的宗教。让他们先去教导他们自己的百姓吧。’所以，当我们在上海开始传教的时候，我们必须同一个已被征服但却不可掉以轻心的敌对情绪作战。”^①

晏玛太除在上海县城内传教外，还违反当时的规定，擅自深入邻县乡间活动。他在乡间布道时，不但总是有群犬围着他乱吠，还有不少小孩在他讲道时到他背后看他穿的衣服，甚至拉起他的裤管观察是否象马腿一样，长着长毛。乡民们警告这些顽皮的孩子，当心被洋人踢一脚。乡民们都以为洋人的腿是僵直的，没有膝盖骨的。可见当时洋人到乡间非法传教也是困难重重，经过两年多的传教活动，只有三个穷人接受洗礼加入他的教会，其中一个是无家可归的青年。一八五二年，他在写给在美国的一个妹妹的信中，不得不承认在上海传教多么困难，确是一项令人心劳日拙的工作。而这时晏玛太已在上海活动了五年，并已经学会一口上海土白，逐渐习惯于上海的生活，对上海社会状况也有了相当了解。

^① Charles E. Taylor: *The Story of Yates the Missionary, as told in His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第 59 页。

在上海小刀会起义时的表现

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五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是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光荣的一页，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八五三年九月七日，小刀会起义军在上海发动起义，攻占了上海县城，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俘获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并立即组织政权，推举刘丽川为领袖，称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坚决反对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使得上海的官僚地主豪绅“无不惊避，举市若狂”。^①盘踞在租界的外国侵略者，也惊恐万状，而上海人民却热烈欢迎。

从上海小刀会起义成功之日起，外国侵略者就横加干涉，而晏玛太则更为活跃。由于他已迁到县城北门外居住，小刀会从北门攻进县城的战况，他看得一清二楚。他写道：“先是起义者六百人，早已潜匿在北门外。是日黎明开城，他们即蜂涌入城。街上栅栏守备人等早已逃跑，皆大开放。起义者毫未受到阻碍，长驱直入县署，要求知县交出印信。……上海县城被占领，只杀死县令一人。……我们所遇见的由县署涌出的大队党人，复前往道台衙门，那里稍有抵抗。大炮响了数发，枪声也响了一阵，但无伤亡。道台将上海兵备道印信献给了刘丽川。……我回来立即将这些情况向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作了报告。他希望亲自去观察一下，我于是陪伴他一同去，并担任他的翻译。”^②

从晏玛太亲笔写的这个最初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晏玛太是有意识地搜集中国内部情报的，而他又随时与美国驻华使馆

① 《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版，第282页。

② 晏玛太：《太平军纪事》，转引自《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06页。

保持联系，并将搜集到的情报向使馆作详细的汇报。当马沙利要亲自入城去现场考察时，他又充当向导和翻译。

从此，晏玛太不但把起义的情报向上级差会和使馆报告，还连篇累牍地投登在上海的英文《北华捷报》上，并经常与使馆人员商讨对策。当小刀会起义军占领县城数天后，“在此时刻，美国公使担心居住在城内的美国传教士可能受到侵犯，希望能派人去同刘丽川为此事进行谈判，我（晏玛太）就自告奋勇地接受了这项使命，因为高第丕一家是住在城里。我从北门被允准进了城，被带领到刘的司令部。……我向刘说明了来意，取得了保证，住在城里的外国人一定会受到认真的保护。”^①

接着，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又策划营救被小刀会起义军俘获的上海道台吴健彰，企图把他引渡到租界里来，这是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的举动。先是马沙利发了一封公函给小刀会首领刘丽川，信中表示美国公使“愿意保护道台，如果把道台交给他负责的话”。与此同时，马沙利还策划由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军舰，派出二百名水兵冲入城内营救吴健彰，但又害怕这种明目张胆的劫持手段，可能激起上海民众的公愤，于是又放弃这项计划。最后的方案是，派遣两名外国人秘密入城，设法把吴健彰带出城。^②

租界里的霍尔医生和贾尔考德被美国驻华公使选中，一同进入县城，看到了被关在屋子里的道台吴健彰，和他商量使他出城的最有效和危险性最小的办法。然后把他打扮成店伙，叫他拿一把破伞，和乔装成军官的亲信，一同跑出去。他们好不容易

① Charles E. Taylor: The Story of Yates the Missionary, as told in His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第91页。

② 高龙骧：《江南传教史》，参阅《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706页。

逃到了城墙边。两个医生对道台说，要用一条绳子拦腰把他系住，然后把他从城墙上面缒下去。道台一听要捆他，吓得倒退三步。这时一个医生先用此法缒下去出城了，道台看见没有什么危险，就听凭摆布。他和他的那个亲信，就用这个方法逃出了县城。^①

这时，晏玛太这位美国传教士早已按照事先布置好的计划，在城外接应。吴健彰那抖索的身子从城墙一翻出城外，晏玛太就上前把他抱住，并立即把他窝藏在自己的寓所里。稍事休息，吴健彰惊魂稍定后，晏玛太又用他自己坐的轿子，把他抬到租界里，住进美国公使马沙利驻节的旗昌洋行，给以庇护。

吴健彰在美国侵略者的庇护下，不久就重建反动政权。晏玛太写道：“过了数星期，道台就搜罗了一支兵力，企图收复上海县城。第一次进攻，就是从我的住处发动的。在我住处的周围，我自始至终目击了六十八次战斗，我的房屋成了掩蔽部，使清军可以逼近离城墙只有三百英尺以内的地方。”^②清军本打算占领晏玛太的房屋，但被他鸣枪吓跑了。这证明传教士不但有枪，还会开枪。小刀会领袖刘丽川命晏玛太撤走，并答应给他赔偿，却遭到晏玛太拒绝，因为他不肯放弃这个据点。以上事实说明，晏玛太已在明目张胆地干涉小刀会起义。

晏玛太把十六个月中目睹小刀会起义的情况，写了一本书，名为《太平军纪事》。书中对小刀会起义前后的上海情况，起义后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双方作战情况，以及中外反动武装联合向

① 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第3章，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608—609页。

② Charles E. Taylor: *The Story of Yates the Missionary, as told in His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第93页。

小刀会进攻等，都有较详尽的叙述。晏玛太对小刀会起义的结论是：“这是一度无用的和破坏性的地方叛乱。”可见晏玛太的立场是站在哪一边了。

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中外反动武装联合进攻下放弃了上海县城，起义终于失败了。“熟悉事件真相的晏玛太讲，进入县城的官兵烧杀掳掠了三天，县城的东半部几乎全部付之一炬。”^①晏玛太还乘机向清政府勒索到所谓损失赔偿费五千元，而实际上他本人损失据他自己报称只有一百元。晏玛太花了一部分钱修复城里的教堂和北门外的住宅，他写道：“自从县城收复之后，我们又重新向着这个崇拜偶像的堡垒发动了进攻。……我一星期开堂七天，来听讲的人数平均有二千五百人次。”^②

事奉玛门的晏玛太^③

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晏玛太又在县城传教两年，到一八五七年全家回美国，休假了一年半。他回到美国后，发现南部的基督教差会对海外传教事业的兴趣大见衰退，当初他们夫妇俩被派遣来华时，南浸礼会差会部曾向他们保证：“你和你妻子下到井里，我们会拉住绳子的。”而现今据晏玛太估计，竟有三分之二的教堂放掉绳子不管了。这就是说，这许多教堂的教徒们已对捐款给海外传教事业冷淡了。晏玛太质问道：“亲爱的兄弟姊

① 兰宁、柯灵：《上海史》第35章，转引自《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605页。

② Charles E. Taylor: The Story of Yates the Missionary, as told in His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第111页。

③ 《圣经》“新约”载，玛门是指财神的意思，事奉玛门即从事于商业活动。

妹们，你们怎么啦？你们对我们感到厌倦了吗？或是你们认为任务已经完成了吗？现在我们打算明年某个时候回到工作地点去，我们靠什么生活呢？”^①

当时美国又经历着一次经济危机，南方的农业经济与北方工业资本的政治矛盾，已愈见明显。南方的种植园主正在为维持其封建农奴制（使用大批黑奴）而挣扎着，为此，没有多少余力向海外扩张，对这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多年而又进展缓慢感到不满，不大肯拿出钱来维持海外的传教事业。

晏玛太这时已年届四十，在美国也无法立足，只得再次打点行装，前来中国。一八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他们一家又来到了上海。可是不久，美国南北矛盾激化，终于爆发了南北战争，南浸礼会差会部接济晏玛太活动的经费被削减了三分之二。一八六一年下半年，由于战况日趋激烈，南浸礼会差会部与在中国的传教士之间的联系全部切断了。晏玛太虽然在上海传教已十余年，但所收信徒甚少，无法自养，于是他决定在上海设法赚钱，以维持一家的生活。

晏玛太写道：“上海租界工部局委派我向中国人收税时任翻译和管事的职务。……每年的薪水约可有二千元。”^②不久，晏玛太又在租界的会审公廨当翻译，并一度出任美国驻沪助理领事。晏玛太在会审公廨任职时还兼充包打听（上海人称租界里的侦探为包打听，这是一宗最赚钱的差使）。晏玛太从一个传教士逐渐靠着这些不义之财，而变得阔绰起来。

一八六三年四月三日晏玛太给他父亲的信中透露：近两年

① Charles E. Taylor: The Story of Yates the Missionary, as told in His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147页。

来除了在租界工部局的收入有三千多银元外，还捞到许多外快。为此，他开始在上海购买土地，经营起地产业来。他已成为十里洋场的一个阔佬，钱多了就要挥霍享受一番。他先把妻子和女儿送到瑞士日内瓦去租屋居住，一八六四年四月他向工部局请假，也乘船前往日内瓦，同妻小一起过着舒适豪华的享乐生活，玩遍了瑞士的风景点，又一同到法、英等国游览。

晏玛太在欧洲畅游了一年多之后，又回到上海。这时上海的地价因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开始跌落，他写信告诉他的父母说，虽然地价已不如前，但在上海的生活还是极为优裕的，他的体重已增加到二百四十磅！

可是，晏玛太在五十岁那年，突然喉管患病，成了哑巴。医生劝他到中国东北去疗养一段时间，但是声带仍发不出声音，他不得已在一八七〇年五月回到美国去治疗。他遍访名医，花去很多钱也不见好转，一八七二年又回到上海。医生劝他到欧洲去治疗，于是他又匆匆买船票跑到欧洲，四处求医，病情有所好转。一八七三年九月，他回到上海继续经营地产，并兼任美国驻沪副领事和会审公廨陪审员。

一八七七年，这位腰缠万贯的传教士，经美国教会劝说，决定辞去工部局职务而重理旧业——传教，但他不放弃地产业经营业务。差会派他把《圣经》的“新约”部分翻译成上海话，但他只是用去一小部分时间，其余大部分时间仍是吃喝玩乐，游山玩水。他每年要到烟台避暑一个月，有时则全家去他国旅游。

为了沽名钓誉，晏玛太给教育和慈善团体捐款，估计共有两万多元。从一八七三年起，他每年向母校福莱斯特大学捐以巨款，最后一次捐了四千三百五十元。一八七五年南浸礼会在上海建筑教堂，共用去三千三百余元，晏玛太独捐二千五百元，以

显示他的“慷慨”和对神的“忠诚”。^①

晏玛太在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过着寄生生活，而对当时大批被胁迫、哄骗到美国去充当苦力的华工，极端蔑视，他认为，美国的铁路已经建成，金矿也开采得差不多了，可以禁止华工赴美了。他说“华工不配在一个文明政府的统治下当公民”。^②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劳动人民被掠卖到美国西海岸帮助修建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干线，最多时人数达到十余万人。他们在那里从事艰苦的奴隶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是到七十年代时，美国资本家和一些反动政客竟煽动反对和驱逐华工，美国还订出苛刻的法律限制和排斥华工，制造排华风潮。在上海的晏玛太，也站在美国侵略者的立场上，与美国反动派一鼻孔出气，叫嚣反华。

一八八七年春，美国南浸礼会要晏玛太回美国报告他在上海的传教工作，他因拿不出什么“成绩”去汇报，于是找了个借口没有回国，却在七月间再次到烟台避暑。他因游泳着凉而病倒，在烟台未能治愈。朋友们把他送回上海治疗，拖到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七日终于与世长辞！这位美国传教士活了六十九年，在上海混迹四十二年，成了外国传教士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中腰缠万贯的大富翁的一个典型。

① Charles E. Taylor: *The Story of Yates the Missionary, as told in His Letters and Reminiscences*. 第275、181页。

② 同上书，第249页。

戴 德 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戴德生是英国传教士，基督教中华内地会的创始人。他在二十二岁被派到中国，干的头一件事就是干涉上海小刀会起义，第二件事是在一八六八年制造了扬州教案，第三件事是创办跨宗派的内地会。戴德生有两句颇能迷惑一部分人的话，那就是：“假如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我国有一句古话：“听其言而观其行”，且把他的行为从头到底表一表罢。

“奉献给神的头生儿子”

戴德生在一八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生在英国约克郡的巴因斯力。他父亲是药房老板，后又兼任建筑会的经理，母亲是牧师的女儿。戴德生在娘胎里时父母就决定，如果头生是个儿子，就把他奉献给上帝，结果是生了个儿子。所以，戴德生从小就受宗教的熏陶，背诵经文，五岁时奉父母之命在家里讲道给弟妹听。除了接受宗教熏陶外，戴德生从小还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一切都从钱着眼。他从十三岁起在父亲的药房里当学徒，十五岁进银行当学徒，据他自己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很爱钱财、骏马和华屋，一心向往世上的快乐。……后因得眼病

不得不离开这家银行。”^① 十七岁时在母亲督促下接受基督教洗礼，成为一个教徒，同时遵照父母亲向上帝作的许愿，决心到海外去当一名传教士。

当时戴德生仍在父亲的药房工作，他从本地一位牧师处借到一本早期来华活动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写的名叫《中国》的书，初步了解了一些中国的情况。书中提到，为了在中国打开传教的局面，开设医院行医是个好办法。于是，戴德生开始自学医药方面的知识。

当时曾在中国充当外国间谍的德国传教士郭实腊，正在欧洲大肆宣传他是怎样把福音传遍中国十八个省的，同时欧洲一些城市建立了中国协会，其中也包括伦敦。戴德生获悉后，就写信到伦敦与该协会的秘书皮尔士联系，并寄去一些捐款。但是，不久郭实腊的骗局被揭穿，他的所谓已把福音传遍中国内地的宣传，纯属子虚。但是，戴德生仍想通过中国协会到中国去。伦敦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寄给他一张申请表格，要他填写。他填写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我知道我确已重生。……

二，我今年十九岁，未婚。

三，关于健康。我没有害过大病，但也不算强壮。……

四，关于职业。除一八五四年有九个月在银行里当学徒外，我都在父亲开的药房里当助手。父亲是一位化学及药学专家。

五，关于教育程度。我在家里读书到十一岁，然后进学堂读到十三岁……又进入父亲的药房。除了固定的功课外，我自修拉丁文、几何、代数，……也学了点希腊文、解剖

^① 戴存义暨夫人(胡宣明译):《戴德生传》上卷,第18页。

学和生理学。……^①

从戴德生所填的表格上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只受了两年学校教育，他的知识大部分是靠自学得来的。十九岁那年，他经姨母介绍，到赫尔市哈迪医师诊所去当助手。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戴德生辞去哈迪医师诊所的工作，来到伦敦，在中国协会秘书皮尔士的帮助下，到一家医院学医。一八五三年六月四日，中国协会（改称中国布道会）通知戴德生，批准了他去中国当传教士的申请，年俸八十英镑。

初到上海

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戴德生从英国利物浦乘船来到上海，当时他二十二岁。他受到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和维魏林的接待，又受到当时住在英国领事馆的英国老牌传教士麦都思的指导。麦都思要他先学习中文，并答应帮他找一名家庭教师。

戴德生到达上海，正值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时期。他写信给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布道会秘书皮尔士说，到上海后没有找到中国布道会的代表，幸亏伦敦会的传教士帮助，暂时借住在维魏林医生家里。这里每天炮声隆隆，房屋震动，物价腾贵，天气严寒，屋中无火。他写信给他的母亲，说：“天气这样冷，又受各种刺激，起头我几乎不知我究竟作什么事、说什么话。离家这么远，住在战区，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不懂我的话。到这时，我才完全明白这种经验之苦。”^②

当初英国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到广州，是受东印度公司之

① 戴存义暨夫人（胡宜明译）：《戴德生传》上卷，第31—32页。

② 同上书，第66—67页。

聘，年俸五百英镑。而戴德生只有八十英镑，汇率又高，因此生活很窘迫，房子也租不起，别的外国人都瞧不起他。后来，他总算在北门外租到几间破屋住下，略加修理后，于八月底从伦敦会搬出，独立工作。他从旧货摊上买了几张旧桌椅，招收了十几名穷学生，请一位中国老先生来教中文，自己也跟着学习。另外，他也开始看病，但没有挂牌。

这年(一八五四年)十月二日，戴德生写信给伦敦的中国布道会，报告说：“至于我的处境，可以说是危险得很。最近两晚，炮弹正击中我头上的一部分屋顶，我差一点被打死。……当炮弹呼啸飞过我的头时，我的确害怕。”^①由于北门接近战区，教员、学生都不敢来，他自己也非常害怕，不得已迁回麦家圈伦敦会会址租屋暂住。

劝降小刀会的活动

戴德生到上海还不满一年，中国话也说不象，却开始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他闯进上海县城，到小刀会起义军司令部去劝降，遭到起义军领袖的严词拒绝。据记载：

戴德生有一个机会可以一试，以便避免那最不幸的结局。他进了城，为他的老师薛某去申请一份许可，借以营救出薛某岳家的几个人。当戴德生正和叛军将领陈阿林接洽时，有一份由英、美领事签署的信件被送进来，并当着这位年轻传教士的面，向那将领大声宣读和翻译。那封来信敦促他要负责保护那些无助和无辜的老百姓的性命，同时告

^① 戴存义暨夫人(胡宣明译)：《戴德生传》上卷，第70—71页。

知他,事情可以和平了结,只需他在清政府最宽大的条件下立刻开城投降。

当时戴德生是唯一在场的外国人。他看到这种情况,就尽力说服那位发怒的将军,从善意方面去考虑送来的信件。

戴德生在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写的日记中透露:“我和他(陈阿林)谈了许多话,尽力劝说他接受信中提出的调停。……可是他似乎很生气,不愿听到开城投降的话,公然宣告说,他要作战到底,死也在所不辞,可是决非他一人独死。黄昏催我出了城,似乎没有希望可以更好地感化他了。”^①传教士的劝降丑态与起义者的英勇不屈形象,成了鲜明的对照。

非法潜往四乡活动

从一八五四年年底开始,戴德生曾潜往上海周围的城镇和农村,进行多达十次的所谓旅行布道。第一次,他是跟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自上海乘小船出发,前往松江、嘉善一带活动。他们分送福音书、施医给药,沿途刺探内地情报。到达嘉善时,县令命他们返回上海,他们却花言巧语地说要到嘉兴府去拜会府尹。县令派兵护送他们到嘉兴,使他们得以跑到嘉兴活动。

一八五五年初,戴德生购置一条船,于一月二十五日开始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到达浦东川沙县和南汇县。南汇县令得知外国人来立即下令将主要城门紧闭,直到他们离境,才可开门。可是,戴德生在第二天凌晨,趁人不备从西门窜入城内,到处散发

^① Dr. and Mrs. Howard Taylor: Hudson Taylor in Early Years. 第263页。

福音书和治病给药。

第三次布道旅行的目的地是青浦县。那天晚上他到达青浦，回头看见上海天空一片通红，估计是小刀会起义失败，便立即返沪。第四次，戴德生乘自备小船到嘉定，施医给药和散发福音书。第五次，戴德生跑到崇明、海门和南通。第六次，戴德生跑到吴淞、浏河、常熟、杨舍、江阴、靖江、横泾、华墅一线。第七次，戴德生向宁波进发，沿途经过柘林、乍浦等地。这时已是一八五五年夏天了。

戴德生经过前后七次深入内地活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为了避免老百姓认出他是外国人，必须穿中国服装，作中国人打扮。每到一地，先施医给药，联络感情，即使被认出是外国人，也有了一些群众基础。于是，这年八月二十三日，他请剃头匠，按照当时清代的习惯，把头剃了，留下一簇圆顶的头发，并把所留的头发染黑。在头发长长之前，他用了一根假辫子，拖在身后。

经过这番化装之后，戴德生又开始他的第八次旅行布道。这一次目的地是浙江海盐。到达海盐之后，戴德生写了封信给在英国的妹妹，信中说：

我在八月二十三日礼拜四夜里十一点钟，把我一部分头发叫剃头匠剃掉，把余下的头发染黑。第二天清早，编了条假辫子，然后穿上中国服装，送派克医生前往宁波，路程有三百多里之远，在路上沿途布道。现在，我独自一人回上海，希望以后传道更加方便，但是我还没有讲到我的苦处。

第一，一生第一次把头发剃掉，是个忍痛的经验，尤其是皮肤容易长痱子的人。我可以向你保证，剃头之后，再敷上头发染料，至六小时之久，是不会减轻剃头刀之刺激的。到梳头的时候，苦头达于极点。……第二，……中国袜于是

粗布做的，自然没有一点弹性。……关于洗头，我以为这个也当试验一下，以免后来因为对此外行而发生困难。所以，我尽量忍受剃头匠的搔头。一会儿捶背又开始了，没有捶完之前，我真觉得有点痛。第二次便较能忍受，希望将来对于剃头匠这一部分艺术，可以处之泰然！^①

第九次旅行布道中，戴德生再次来到崇明，目的想在崇明设立传教据点。他在那里租到一间屋子开设门诊，进行传教。这是非法的，崇明县将此情况如实上报后，曾照会英国驻沪领事。英国副领事把戴德生找来，令他暂时迁出崇明。戴德生第十次从上海非法外出活动，是到浙江南浔。在那里呆了十八天，后来又转到浙江乌镇。戴德生在两年时间内从上海出发，向西、北、南的内地进行非法活动，利用医病和散发福音书，刺探到内地不少第一手资料。这些活动，连英国驻沪副领事赫维福，也不得不承认是非法的，而不得不对戴德生的活动加以约束。戴德生第九次旅行布道时，曾被英国副领事召回，“领事告诉他，按照中、英条约，英国人只可住在五口通商之地，如有违背，得处以美金五百元（约值一百英镑）罚款。……为此必须迁出崇明，否则依法罚处。戴德生只得照办。”^②戴德生敢于不听中国政府的命令，却不敢违抗英国政府的规定。当然，英国副领事只是从英国的侵略利益考虑问题。

有必要指出的是，戴德生第六次旅行布道时，原曾计划前往太平天国首都刺探情报，当他雇的小船驶近离镇江约六十英里处时，由于船工不同意载他去南京，同时也因离开上海已近一

^① 戴存义暨夫人（胡宣明译）：《戴德生传》上卷，第89—90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月,才不得已作罢。^①

到汕头、宁波活动四年

一八五六年三月十二日,戴德生和另一名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威廉,一同乘船到广东汕头,开辟传教据点。在当时戴德生写给英国家人的信中,透露了外国侵略者输入鸦片和贩卖华工的情况:“每月输入汕头的鸦片约有三万二千斤,值二十五万英镑。……还有一种惨无人道的贩卖奴隶的生意,叫做苦力贸易。这些苦力,表面上被雇用若干年,但是生还的没有几个。奸商先付他们一些钱,骗他们说可以大发其财,有时且用更恶劣的手段牢笼他们。苦力一上船,经手人便向奸商按名收钱,这时候可怜的苦力才知道上当。”

因为外国侵略者干这种伤天害理的坏事,所以汕头人民都痛恨外国侵略者。戴德生在信中写道:“此地的老百姓痛恨洋人,我们上街,没有一次不受侮辱、讥笑、谩骂。”尽管如此,戴德生还是通过施医给药,企图笼络老百姓的感情,想建立一个据点,但是困难重重。

戴德生与宾威廉由于在汕头无法立足,在那里逗留了不到四个月,就分手了。戴德生又从上海转到宁波,在另一个英国传教士派克的医院里,开展传教活动。

在宁波,戴德生结识了在一所教会女塾教书的马利亚·戴尔小姐,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日,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内举行了婚礼,由赫德主婚,赫德当时任英国驻宁波

^① Dr. and Mrs. Howard Taylor: Hudson Taylor in Early Years. 第300—303页。

领事馆翻译。戴德生当时是二十五岁，新娘二十一岁。

戴德生结婚后，仍在宁波医院治病传道，直到一八六〇年，因患肺结核病，夫妻二人决定回英国度假治病。当时因《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已先后签订，戴德生决意回英国去招兵买马，然后深入中国的腹地。他在写给英国亲属的信中说：“哦！利人的工作范围是无限大，但是作工的人既少且弱，精力都已用尽了。但愿英国的教会对于她的责任与权利恍然醒悟。如果能觉悟的话，我不知道多少人会到中国来传福音。……亲爱的弟妹们，来吧！过来帮助我们。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① 这末一句话，又否定了前一句话。

回到英国与筹建中华内地会

戴德生于一八六〇年回到英国后，先是治病和休养，然后在伦敦一家教会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屋子，以便到医院进修。两年之后，他得到毕业证书，与此同时，还抽空修改宁波语《圣经》等传教用书，动员一些英国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

戴德生在逗留英国期间，愈来愈感到必须派遣大批传教士到中国内地去活动。他把这个想法，同在伦敦的一些教会人士和商人说了，得到他的好友皮尔士的完全支持。

于是，戴德生在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向伦敦一家银行存入十个英镑，开了一个“中华内地会”的空户头。他象投机商人那样创办了他的内地会。他在伦敦租了间屋子，开始对外写信、演讲，并会客。他借上帝的指示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

^① 戴存义暨夫人(胡宣明译)：《戴德生传》上卷，第134页。

你充满。”经他这样大肆鼓吹、张口，居然这十个英镑的资本，不到三个月工夫，就获得二千英镑的捐款。伦敦的一个大商人柏驾见此有利可图，自告奋勇地向戴德生表示，愿意担任内地会在伦敦的代理人。

戴德生获知苏格兰将在九月举行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基督教徒灵修大会的消息，立即托人介绍，到大会上去进行鼓动。为了进行宣传，戴德生还连夜赶写了本小册子，名叫《中国属灵的需要及要求》，柏驾愿意垫付印刷费，出版后由戴德生带到十月间在密尔德美举行的灵修大会去发售。大会还邀请他上台演讲，他又趁此得到一大笔捐款。

戴德生在英国待了五年多时间，用十个英镑创办起中华内地会，前后共募得数千英镑的捐款，还动员了二十余名传教士前往中国。一位英国军官彪第上校还拿出五百英镑为戴德生包了一部分船舱。一八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带了这批传教士和家属乘上“兰茂必尔”号船，自伦敦出发前来中国。

中华内地会在中国开始活动

中华内地会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它是为适应外国侵略者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而成立的，是由英国传教士率先组成的、深入中国腹地的先遣队。后来，美国传教士和其他一些欧洲传教士也相继加入，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特有的一个跨国跨宗派的新教传教会。它一直是在中国最大的基督教差会。

中华内地会标榜：

一，这个差会是跨宗派的，任何宗派都可参加。二，这个差会是国际性的，任何国家都可出人出钱。三，这个差会

要求其传教士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生活、起居、衣着尽量地中国化。四，这个差会的主要目标，不在招收教徒，而是面向全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福音。五，这个差会的传教士无固定工资，要求刻苦献身。^①

这五条的核心内容，用戴德生的话说，就是“以前进和深入为目的”，“去树立十字架的旗帜”。为此目的，中华内地会的传教士每进入一个省，就先在省会建立一个传教站，然后迅速向四周的府、县扩展，接着深入到四乡活动，把所谓“巩固”工作留给其他教派接替。

中华内地会在中国的活动，是以一八六六年十月戴德生带领二十余名传教士到达杭州时，正式开始的。戴德生以杭州为基地，向台州、温州、金华一带发展势力。然后又伸向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等地，试图建立传教据点。

扬州教案

扬州教案是由戴德生一手制造的，它发生在一八六八年八月。戴德生本拟在镇江建立传教据点，他乘谈判空隙期间，擅自跑到扬州强行租屋，遭到当地群众反对，并被包围。戴德生一家所租住的旅馆，也遭捣毁。戴德生当即跑到官府，要求派兵保护，并且派人连夜送信到上海英国领事馆求援。第二天下午，戴德生一家撤离扬州，到达镇江。

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闻讯，立即乘军舰直驶南京，向当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进行要挟，擅自扣留中国“恬吉”号汽轮，作

^①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第385—386页。

为担保。曾国藩屈服于外国势力，把扬州知府撤职，赔偿损失，并出告示保护外国传教士自由传教。

扬州教案的消息传到英国时，伦敦《泰晤士报》在十二月一日发表社论攻击内地会，说戴德生几乎引起中、英战争。九日，上议院开会讨论此事，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要求英国政府将所有在华的英国传教士召回。一时伦敦各报攻击甚烈，结果捐款大减。^① 据称，捐款数字骤然下降，一八六九年五至九月的捐款数，要比前一年同期减少一千英镑。说明内地会的信誉，在英国也大受影响，但是戴德生依仗英国的炮舰作为后盾，又派人到扬州去，建立了传教据点。

再次回英国

一八七〇年七月，戴德生夫人又分娩了，这是她为戴德生生的第五个孩子，但不幸她传染到霍乱病，无法抚养孩子，孩子出世一个星期，因无奶吃而夭折，戴德生夫人也随即病逝。

戴德生写道：“爱给我这个打击，使我觉得尘世的生活更空虚。”他决意要回英国去一趟。一八七二年三月，戴德生又到了伦敦。由于柏驾年迈要求告老退休，戴德生便负起中华内地会英国差会代表之责。这时，内地会在中国已有三十名传教士，雇用了五十个中国籍传教助手，分布在十三个据点，每月开支约三百英镑。这里也反映出戴德生给传教士的待遇是菲薄的，撇开中国雇员不算，三百英镑给三十个传教士平分，每人也只有十个英镑。而英国女子到中国传教，待遇更低。据戴德生自己说：“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渴望妇女早日进入中国内地工作，这是我一

^① 戴存义暨夫人(胡宣明译):《戴德生传》下卷,第51—82页。

生的最大愿望。”他给数十名英国妇女不固定的、极低的待遇，令她们深入内地，在中国妇女中进行活动，她们往往就此死在异乡。^①戴德生利用一般在英国没有生活出路的穷苦男女的宗教感情，鼓动他们到中国去，要他们牺牲一切，不准计较待遇。一八六六年一次就鼓动了二十几名英国男女，到中国传教。到了上海，吃住都没有着落；到了杭州，也是如此。还下令要他们立即到内地去，过中国一般平民的生活，致使他们贫病交迫，往往就在当地昏倒或死去。

在一八六六年前来中国的一批传教士中，有一个英国女子被称作福姑娘，最得戴德生的欢心。据说，福姑娘最能适应中国的环境，并深明中国妇女的心理。她曾对一位杭州妇人说：“我到此地来做一个杭州女人，我吃你们所吃的饭，穿你们所穿的衣服，说你们所说的话。我愿意你们快乐，我们都是姊妹。”^②自从戴德生的妻子去世后，戴德生就属意于她，这次回英国又是同船，“二人心心相印，道合志同，益相敬爱。他们到英之后不久，就决定结婚。”^③

此外，戴德生在这次回英国期间，还在一八七三年八月六日在伦敦成立中华内地会咨议委员会，由希尔任名誉秘书，同时和“羔羊与旗学校”合办了一个训练班，培训传教士候选人，派他们到伦敦贫民区去传教，考验他们能否吃苦耐劳，甘心为内地会牺牲一切。在布置就绪后，戴德生于同年返回上海，这年他正好是四十岁。

可是，戴德生到中国还不到一年，因一八七四年六月乘船到

① 戴存义暨夫人(胡宣明译):《戴德生传》下卷,第65—67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③ 同上书,第47页。

武昌,打算深入华中腹地开辟传教据点,不慎从船梯跌下来,造成下肢突然瘫痪,不得已朋友们再把他送上船回英国治疗。他在英国养病期间,又动员了一批传教士到中国去,还决定派遣两名传教士跟随英国政府的探险队,沿缅甸伊洛瓦底江深入中国西南边陲省份云南,开辟传教据点。

“前进运动”

一八七六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条约规定英国可以派员到云南、甘肃、青海边远地区活动,并增辟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新的通商口岸,全免各项内地税等特权。这时,在英国治好下肢疾病的戴德生,决定再次前来中国,准备发动一个“前进运动”,向中国西北和西南进军。

仅从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八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戴德生先后派遣中华内地会传教士,进入山西、陕西、甘肃、云南、四川、贵州、广西九个省,开辟传教据点。据统计,内地会传教士在中国腹地所历路程,累计达十万里路,而戴德生为了便于指挥,长期坐镇在武昌。

一八七七年,上海举行一次全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大会,戴德生也亲自去出席。会上商讨了各宗派如何联合行动等问题。戴德生在会上发表演说,强调中华内地会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功能,提出的口号是,前进与深入中国内地,由内地会开辟的每一个新的传教据点,任何一个宗派的传教士都可以去接替,以便使他们再深入开辟更多的新的据点。他希望各宗派能把他所开辟的新据点加以巩固壮大,以发展整个基督教的在华势力而共同努力。

一八七七年冬天，戴德生为了动员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和募集更多的捐款，再次回到英国。一八七九年又来到中国。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世界资本主义正在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国对华经济侵略日益加深。为了适应侵略的需要，进一步打开中国内地的大门，戴德生总是感到传教士来得实在太少了。一八八二年一月，他在宁波巡游时，起草了一份倡议书，要求在三年之内加派七十名传教士到中国内地去。他写道：“必须即时大量增加工作人员。……加派四十二名男子、二十八名女子，出来帮助我们推进已托付给我们的属灵工作。”^①

戴德生以此为借口，一八八三年二月第五次回英国去动员。中华内地会成立已有十八年了，经济上也有了一定基础，他可以用内地会的公款来去自如。他的夫人还专程从伦敦到巴黎去迎接他。^②

“他们于三月底回到英国，但见内地会声价十倍，为众基督徒所敬重，大异往昔。……各方人士对于戴氏的人格及成就，推崇备至，请他讲道及演说的非常之多。……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对于他征求七十个传教士表示热烈响应，其中最著名的叫作剑桥七杰，而炮队军官何斯德，大运动家施达德、司米德尤为杰出人才。他们的美好见证，感动了英国大学生到中国来传教。……那时工作十分紧张，戴氏日夜工作，通信、会客、开会、演讲，十个月内所写的信有二千六百封之多，而这时所收到的捐款，也特别多。一年之内献身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有四十六人，连同前二年已经出发

① Dr. and Mrs. Howard Taylor: Hudson Taylor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第360页。

② 戴存义暨夫人(胡宣明译):《戴德生传》下卷,第72页。

的传教士,合计已超过七十人。”^①

戴德生在英国不到两年,于一八八五年一月离开伦敦,再次来到中国。为了加强他的“前进运动”,他把内地会的组织加以调整,增设中国谘议委员会,开办华语学校,并增设一个副主任和指定各省的主任,在安庆设了一个中央训练所。范约翰充当中国总部的副主任,并在上海虹口购得土地七亩,建造中国总部的办公楼及住宅。^②

戴德生此次在中国把一切改组工作完成后,即赴山西太原和汉中一带“视察”教会,在一八八六年冬天召开一次内地会各省主任会议,制订了《内地会工作大纲及施行细则》,并决定以中文出版,分发给内地会中国职工一体遵守。同年,经范约翰建议,加派一百名传教士来华,需要一万英镑捐款。“果然,年内收到十一次奉献,共一万一千英镑;而奉献自己来中国传教的,共有六百名,但是只能批准一百零二名。”^③

美国的介入

一八八八年,戴德生前往苏格兰开会时,有位专程从美国纽约来的青年资本家福亨利,在伦敦等候他。戴德生一到伦敦,福亨利就去拜会他,“说明来英国的目的,是要和他商量可否按照内地会一贯的宗旨,在美洲组织一个谘议委员会,协助供给戴氏教士及经费。”^④

① 戴存义暨夫人(胡宣明译):《戴德生传》下卷,第72—73页。

② 同上书,第74—75页。按上海虹口原址于一九三〇年全部出售,另在上海新闻路购地二十二亩,建造了两座大楼作为中国总部,现已改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规模是相当大的。

③ 戴存义暨夫人(胡宣明译):《戴德生传》下卷,第78—79页。

④ 同上书,第80页。

美国正值剑拔弩张地向太平洋进军的时候，美国各基督教差会除直接派遣大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外，对于由英国控制的、已经具有相当势力的且已深入中国内地的中华内地会甚感兴趣，希望能在美国设立一个分支机构，利用内地会的原有组织和工作方法，美国出钱出人，企图介入。戴德生对这位美国青年突然提出的提议，回答了个“不”字。

但是福亨利并不罢休，他通过美国的著名布道家慕迪，正式邀请戴德生在回中国途中先到美国一游，到美国去演讲和作客。戴德生对新大陆向往已久，可是从未去过，此次竟有人邀请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诱惑。结果，六月间他和福亨利一同登上豪华的美国邮船，前往北美。不消说，戴德生在加拿大和美国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并作了演讲。他的内心斗争很激烈，每次演讲都不提中华内地会在中国的活动状况。

福亨利的父亲是美国的一个大资本家，戴德生在美国的一应起居都由他殷勤款待，不收分文。在芝加哥演讲完毕，还邀请他到纽约州乡间的一处极为豪华的别墅休养。戴德生在美国虽然只字不提中华内地会，但美国还是有不少青年愿意奉献自己参加内地会的工作，许多信徒捐了钱，福亨利把初步得到的捐款加起来，据称可以足供八个传教士在中国一年之用。当福亨利把这些“好消息”带给在别墅里休养的戴德生时，他“似乎只说了一句赞美主，或是感谢主，此外毫无表示。我对于戴德生先生有点失望。他不但不快乐，似乎反觉得多一个重担在身”。^①

戴德生当然无法懂得，这原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

^① 戴存义暨夫人(胡宣明译):《戴德生传》下卷,第80—81页。后来戴德生被说服后,到1900年美国捐给内地会的钱已达4万余美元,到1916年美国捐款达146,000美元,以后每年不低于10万美元,1929年达502,000余美元的顶峰。

趋势，美国势力必然地会介入。这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在十九世纪末已经超过英国，美国将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魁首，并已积极向太平洋区域扩张了。以后的进程证实了这一点，内地会的权力同样地逐渐从英国转到美国手中。就在这首次戴德生访美期间，正式成立了北美谘议委员会，在此后十七年中，北美谘议委员会仅仅捐款收入就超过五十万元美金，再加上在美国还有价值四万元美金的不动产，于是美国传教士源源不断地被派到中华内地会去。后来，西欧一些国家也成立了谘议委员会，到十九世纪末，中华内地会在中国约有六百五十名传教士，二百七十个传教据点，教徒人数约五千人，早已成为在中国的基督教(新教)的最大差会之一。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传教士在内地会的人数逐年增多。一九〇〇年，英国传教士占百分之五十四，美国传教士已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一〇年，英国传教士占百分之四十四，美国传教士又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三。自此以后，英国传教士逐年减少，美国传教士势力渐占上风，到一九三六年美国传教士已占到百分之四十七，而英国传教士减少到百分之三十五。从美国介入以后，中华内地会不但是一个跨宗派的传教团体，而且已是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国际性差会了。

一八九〇年，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大会，戴德生被推举为大会主席。这次大会除了讨论如何在中国协作外，还要求各基督教差会派遣总数为一千名的传教士到中国。但是，中国各地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斗争正风起云涌，戴德生策划通过传教士的大批深入内地，企图占领更多的阵地，只能促使更多中国人民起来与帝国主义开展更加声势浩大的斗争。

最后十年

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五年的十年间，戴德生由于年事已高，先把在上海的内地会总部进行改组，由年轻的传教士代理他的工作。然后，又回到英国去处理英国议会的改组工作，然后到欧洲去旅游和休养。这时，他早已不愁自己的生活，在瑞士休养期间，一位叫莫士的资本家一次捐给内地会一万英镑行改费，后来他又在遗嘱中捐给内地会十万英镑。

一九〇〇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反帝运动，使中华内地会受到沉重打击，戴德生的脉搏跳动也从每分钟八十次骤然下降到四十次，虽然他在瑞士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一九〇一年夏天，他在瑞士松林中散步，忽然跌了一交，不能行动，无法再到中国指挥内地会重振旗鼓了。

一九〇二年，戴德生正式辞去内地会主任之职，由何斯德继任。一九〇三年，他的第二位夫人孀姑娘患病，在瑞士去世。一九〇五年四月，戴德生健康状况稍佳后又来到中国，先到上海参加内地会的春季大会，以后又前往镇江、扬州旧地重游，然后再回镇江乘船前往汉口，再从汉口前往河南郾城等地“视察”教会。回到汉口后又乘船前往长沙。六月一日到达长沙，六月三日晚上正当戴德生的媳妇在椅上侍候他吃晚饭的时候，“忽然看见戴氏的头一转，喘一口气，以为他要打喷嚏。又连喘两口气，而不呼叫，不说话，不窒息，也不对我（戴的媳妇）看。我回到房门口喊存义（戴的儿子），但未到床边之前，他就已安然归主了。”^①戴德生终年七十三岁，葬在镇江。

^① 戴存义暨夫人（胡宣明译）：《戴德生传》下卷，第102—103页。

戴德生去世后，中华内地会在中国继续活动，到一九三六年，教堂达一千二百三十三所，支堂达二千二百六十一处，传教士共计一千三百二十六名，占当时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它还经营中学十所，小学三百三十所，医院十六所，诊所十七处，仍为在华基督教最大的一个差会。这时内地会的传教士，每人身边都已有一本内地会自编的密电码本，可以用密码向上海拍发中国穷乡僻壤以及战略地点的各种情报的电报。

倪 维 思*

(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

来 华 之 前

倪维思是美国传教士，一八二九年三月四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率尼加。父亲是一个大农场主，但在倪维思生下后十八个月，就去世了。倪维思的童年是在祖父家度过的，九岁时进中学念书，受到祖父的宗教灌输。一八四五年，倪维思十六岁时考进联合大学，一八四八年毕业后前往乔治亚州，在一所学校教书为生，同时逐渐对宗教发生兴趣。一八五〇年，他决心要当一名传教士，同年十二月考进普灵斯顿神学院。在神学院读书期间，他为自己订立了二十四条守则，有宗教、道德、体育等方面的修养，并硬性规定每天睡眠不能超过六小时。

一八五三年四月十一日，倪维思向美国长老会差会部递交申请书，要求派到中国去当传教士。一个星期之后，差会部予以批准，决定派他到宁波去传教，并在教堂内为他封立了牧师的神职。倪维思于同年六月十五日结婚，婚后二个月带了新夫人，启程前来中国。经过四个月的航程，于一八五四年二月抵达上海，稍事逗留后，即坐船转往宁波。他们先在宁波传教，后又负责办理男女寄宿学校。天津和北京条约一经签订，山东的登州被迫

* 本篇合作者为山东省政协王神荫同志。

开为通商口岸，他立即写信回国，向长老会差会报告说“长江和
华北现在若干地区正在向我们开放。我们应该看到，事实上是
全中国都已经向我们开门了。从条约方面说来，它是开了，其
余开放工作就要由我们传教士自己来干。”^①于是，倪维思自告
奋勇，于一八六一年五月经上海、烟台到登州，住在观音堂内。

办学——“最经济的投资”

倪维思夫妇到登州不久，便开始招收教徒。据倪妻自述：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三月初二日教会在登州初立，有三人受
洗，一是宁波人，是我厨房作活的；一是林寿宝先生，他是个拔
贡，是帮助倪维思抄书的；一是张千臣，先为我们抄书的。”^②一
八六二年冬天，倪妻在登州找了“几个管饭的闺女安在家里”，称
说是“开一个女学堂”，是“山东省第一个教中学房”，倪维思曾说
明他们为什么要开办“教中学房”：

“以我在宁波办了多年男女寄宿学校的经验，证明在中
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法。它们只花费差会的
力量和传教士的劳力与时间约四分之一，却为该地教会提
供了很大一部分的教徒——我想超过半数。最近三、四年
外堂数目大增，多半要归功于本地的工作人员。这些中国
人，多半曾在我们所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总之，宁波教会
之所以继续成长，引人归主，建立分堂，在很大的程度上，都
可以归功于我们所办的学校。”^③

① Hele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 Nevius, for 40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第 207 页。以下引的信件均摘自此书。

② 倪维思夫人编：《传道模范——倪维思事略》，即注①的汉译节略本。

③ 奚尔恩：《在山东前线》，第 227 页。

倪维思虽然重视办学，并且免费供给食宿和衣服等物，但入学人数始终不多，到一八六七年和另一个长老会传教士梅理士在东大寺开办的女塾合并，总共只有六名学生。

赈灾——“最有效的传教方法”

一八七一年，倪维思夫妇带着几个女生迁居烟台。除在烟台组织教会和教课外，还数次深入山东内地游行布道。他足迹走遍青州府（今益都）、潍县、沂州府（今临沂）。一八七七年二月，他又一次前往山东的最南面。当他西行到青州府属临朐县时，看到沿途都是难民，灾情十分严重。他就决意放下别的事，专门从事赈灾活动。他先到青州府与正在当地放赈救灾的李提摩太商议，划分地界，分头放赈，二人并且分别向外地劝募捐款。

倪维思以临朐县的高崖为中心，走遍饥荒之处，了解灾情，统计灾民，将灾区的村庄、人数都记在清册上，定出放赈办法，由各村灾民选出代表一人，每隔五日来领取每人每日十文钱（一分）的赈款。

为了向外地募捐，他将灾情和放赈工作情况，经常写信给在烟台的妻子，由其妻转发到国内外。仅从以下信件的片断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灾情的严重：

一八七七年三月：“此处灾情极为严重，几乎人口的一半，被迫分散到邻近几个省份逃荒要饭。过去六个月平均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已经饿死了；有的地方死亡率比这个还要高。好地只卖十分之一的价钱，实际上是无论多少钱都没人要。老百姓的粮食已经吃尽了，连小米糠、地瓜秧、豆秸也都吃尽了。现在是靠树皮、草根等充饥。我们所遇见

的人，十个中就有九个都是脸黄肌瘦，眼睛凹下去，有的骨瘦如柴，仅仅有个骨架。他们不敢求吃饱，但求能活下去。许多人以售妻鬻女作为最后的一着。六、七岁的女孩卖一、二元钱，十至十二岁的卖三至五元钱。”

一八七七年六月：“过去几个星期死亡率更高了，……五百人的村庄就有三百人饿死。三百人的死了一百多。临朐有个村庄，去年夏天有一百八十人，现在只有九十三人。他们衣服卖光了，没有衣服，就在地底下挖个大坑，拥挤着取暖，死了一个就补上一个，青州东关就有四个这样的大坑，挤着二百四十人。每个星期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我亲眼看到有人将房子拆了，把木材装了四个车，跑了三天路到这里（高崖）卖了五百文钱（合五角）。”

这次大灾荒给传教士一个机会，即在放赈之后，出现了一个加入教会的洪流。倪维思声称：“我的救灾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宗教因素。”与他有联系的人们每日早晚两次参加礼拜。礼拜天我们举行盛大的布道会，讲了很多道，发了很多书。”“我所发放的金钱和我救灾的努力，都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延伸和发展。”^①以致使他在一年之内新增教友不下一千数百人。^②倪维思还将十几个男女“难童”带回烟台，把“将要饿死的孩童，收为学生，养至成人”。

一八七七年七月，倪维思写信给美国报告说：“灾区的人民都十分欣喜并且感激。相信这种工作对于消除偏见，为接受基督教准备道路，我经手分发的赈款约一万元，分发给高崖周围三

① Hele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 Nevius, for 40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第329页。

② 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第417页。

百八十八个村庄,共三万二千五百九十人。”^①

介绍西洋果树品种

倪维思曾经介绍过若干西洋果树品种到烟台,据倪妻说:倪维思素有种植果树的业余爱好,幼年时从纽约园艺园里学到种植果树技术。他来到山东后,看到山东的气候、土壤等和美国相仿,而所产水果的质量却不如美国,便想从事改良果树。他在住处的南边,买了十几亩地,称为“南园”。一八八七年,在这里种植了美国特拉美、迪亚纳、斯威特沃特(甜水)、布莱克(黑)、汉堡、马斯喀特等地的葡萄,巴特莱德的梨树和其它品种的梨树、苹果树和李树等。他还在一次例假回华的途中,路过日本,从日本带回来二三十种草莓和大量的西红柿(番茄)种子。他在南园里盖了三排平房,招集若干工人,要他们一面从事开垦种植,一面学习栽培果树的技术。他还栽培了许多果树幼苗,免费供给来索取的人们,但他也从不忘记推广美国商品。^②另外,需要附带一提的是另一个美国传教士梅理士,曾在山东推广种植从美国带来的花生品种,使山东花生无论在产量和质量上都有所提高。^③

对中国的政治态度

倪维思在一八五四年二月初抵达上海时,正值上海小刀会起义,清军在外国武装力量支援下,不断地发起向上海县城的进

① Hele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 Nevius, for 40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第328—329页。

② 同上书,第428—432页。

③ *China Economic Journal and Bulletin*. 第19卷,第67页。

攻,吓得他们夫妇俩在甲板上两脚一直在发抖,后来上岸后住进了租界,才惊魂稍定。^①

倪维思曾对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发表过意见:“不管这场战争正当不正当,它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被用来开辟我们同这个巨大的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②这表明,倪维思和他前辈来华的多数传教士一样,完全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说话的。

他早年在宁波传教时,经常违反规定潜入四乡活动。一八五五年十二月间,倪维思又深入内地,跑到一家书院与老师们进行挑衅性的论战,竭力否定和贬低中国固有的文化,并为英军侵华事件辩护。^③

倪维思在宁波一带到处目睹英国强行输入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可是他对英国侵略者和英、美贩毒商一句谴责的话都没有,反而责怪中国人。^④他对退入浙江的太平军称之为“匪”,并竭力盼望英、法联军能迅速攻入北京,迫使清政府屈服。^⑤

一八五八年,倪维思跟随美国驻宁波领事前往杭州窥探,以便在那里择址建立传教据点。一八五九年,他来经中国政府许可就在杭州居住。杭州府的道台得悉后,立即向宁波美国领事馆提出抗议,要求倪维思离开。而美国领事却为倪维思在杭州非法居留进行辩护,要求让他在杭州住过夏天再说^⑥,倪维思依仗美国政府的势力在中国为所欲为,与其他在华传教士是同

① Hele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 Nevius, for 40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第121—123页。

② J. W. 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第73页。

③ Hele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 Nevius, for 40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第139页。

④ 同上书,第141页。

⑤ 同上书,第159页。

⑥ 同上书,第189—190页。

样的。

一八六一年,倪维思从宁波转到山东登州府后,就在山东省到处“游历”,搜集捻军情报及其他社会状况向美国差会报告。

一八七〇年,爆发了天津教案。倪维思感到无法再在登州府立脚,于是急忙要求美国驻烟台领事派炮舰到登州府救援他们。可是,美国兵船已驶离烟台,经过美国领事和英国驻烟台侵略军头目商量,立即派出了两艘英国炮舰急驶登州,把倪维思等外国传教士接到烟台避难。^①一八七一年,时局略见平静,倪维思决定迁居烟台,以便在外国兵舰直接保护下活动。

倪维思每次回美国休假,都要进行鼓动,要求增派更多的传教士来华深入内地活动,向差会汇报在中国搜集到的各种情报。他最后一次回美国,是在一八九〇年,除了上述活动外,专门写了一部论鬼的书,名为《被鬼附着及有关论述》,大讲其在华的经历,侮辱中国人民。^②

一八九二年九月,倪维思又从美国回到山东,由于他原来就有心脏病,加上回来后活动频繁,终于在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九日病故在烟台,终年六十四岁。

倪维思在一八六九年获得他母校联合大学授予的神学博士学位。他的中文著作有《天路指南》、《祀天辨谬》、《马可(福音)注释》、《神学总论》、《宣指归天臚二光》等书。英文著作有:《中国与中国人》(一八六九年出版)、《被鬼附着及有关论述》、《差会工作方法》等。

① Helen Nevius: The Life of John L. Nevius, for 40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 第286—287页。

② 同上书,第463—465页。

倪维思的妻子为丈夫写了一部英文传记，书名为《倪维思——一个在华四十年的传教士》，丁韪良为该书写了序言，一八九五年在纽约出版。

嘉 约 翰

(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

嘉约翰是美国传教医生，一八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邓肯维尔。他父亲早亡，童年时期是在弗吉尼亚州叔父家度过的。嘉约翰从小好学，非常勤奋，十六岁时就念完中学课程，考取了俄亥俄大学。他在大学读了两年基础课后，即转到肯塔基州读医科，不久又转入费城的杰斐逊医学院，到一八四七年医科毕业。毕业时他年仅二十三岁，回到俄亥俄州行医共有七年时间。

被派赴中国当传教医生

嘉约翰从小接受基督教的灌输，受洗加入长老会为教徒。他在俄亥俄州行医期间，正值长老会拟在中国发展，需要物色一位医生打开局面。一八五三年，经长老会牧师鼓动，嘉约翰表示愿赴中国，于是他向差会部提出了申请，经批准后派往广州传教行医。同年，嘉约翰与爱蓓·金斯伯里小姐结婚，两人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从纽约登轮出发，次年即一八五四年五月十二日抵达香港。由于在船上颠簸了五个多月，加上南方气候一时难以适应，他的妻子到中国只有一年多时间，就因病在澳门去世。

嘉约翰在广州被派在伯驾的眼科医局当医生，同时积极为

长老会筹设惠济医局。伯驾因出任美国驻华外交官，从一八五五年五月起，医局业务全部移交给嘉约翰负责。一八五六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广州的眼科医局和新建的惠济医局都被焚毁，嘉约翰不能在广州行医，只得暂时回到美国去。一八五七年七月到达费城，重入杰斐逊医学院进修。一八五八年，他与以撒贝拉·莫斯利小姐结婚。嘉约翰在美国期间一面进修，一面为广州重建医局进行游说和募捐，陆续购买了一批医疗器材，在得悉广州局势已经平静后，决定再次前来中国，在一八五八年年底带了新夫人，重新乘船向东方进发。

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

嘉约翰到达广州后，即在南郊增沙街租得一处店面房子，经过装修和筹备，在一八五九年一月中旬开业，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医院之一。嘉约翰担任该院院长长达四十四年之久，到一八九九年卸任。

中国第一个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的医学博士黄宽，一八五八年回到广州后，先在金利埠仁济医局当医生，这原来是伦敦传教会开设的医局，后来移交给广州中华医药传教会经营，由嘉约翰兼管。一八五九年博济医院开张后，黄宽经常到该院协助嘉约翰为病人施行手术和会诊。从一八六二年起，黄宽参与该院培养中国学生学习西医的教学工作。

由于博济医院业务发展，嘉约翰在广州毅埠觅得一处新址，经过一番筹划，利用在国内外募捐的资金，从一八六三年起建筑新的医院，一八六六年建成后于十月间开诊和接纳住院病人。与此同时，该院附设的南华医科学校，也正式招收男生入学。这

时，嘉约翰由于积劳成疾，不得不暂时离开中国，院务由黄宽暂时负责。过了几个月，嘉约翰返回广州，又独揽起医院大权。

开办教会医院的主要目的，是赢得人心。嘉约翰认为，他首先是一个传教士，利用行医的方式传播基督教，声称：“为了基督，要爱病人如同爱弟兄”。博济医院自开张之日起就进行传教活动，嘉约翰要求“所有能够走动的病人，连同他们的朋友和仆人，都必须去参加晨祷会……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传播基督教教义，赢得那些来医院要求解除肉身痛苦之人的好感。传道人说好话和医生行好事，是互相配合的。上帝之话的真理给人的头脑以新的思想，注意力也从肉身的痛苦可能转到福音所能给予的无穷尽的快乐中去。凡是识字的病人，都发给福音书，这些书可以帮助病人消磨许多令人生厌的时辰”。^①

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到博济医院就诊的病人骤减，传教活动更难开展，信教者更是寥寥无几。

一八七五年，嘉约翰全家回美休假，院务由凯罗医生负责，前后有三年时间。一八七八年之前，黄宽一直在该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兼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他还在海关兼任医官。由于积劳成疾，在一八七八年去世。这也反映了博济医院的医疗业务和其他教学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仅举一八七五年七月一日这一天该院手术室的工作量为例：一，白内障切除手术二例；二，膀胱积石切除手术一例；三，眼球肿瘤切除手术一例；四，肛门瘘手术一例；五，切除包皮一例；六，眼科手术一例；七，骨

^① W. W. Cadbury and Mary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100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第142页。

科手术一例。共七类八例手术。^① 嘉约翰在做这些手术时，多数由黄宽协助或主刀，加上其他教学任务，致使黄宽在壮年时代过世，使他的许多友人和学生为之惋惜不止。嘉约翰认为，黄宽称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也是中、英人民之间友谊的榜样。

嘉约翰在美国度假三年后，重返广州。当时美国国内不断发生敌视华工的排华风潮，以致引起广州人民的愤慨。为了缓和中国人民对美国反动派的反感，嘉约翰决定扩大医院业务，增加附属医校招生名额，开设西药房和销售西医书刊，同时加强传教活动。

一八八五年，博济医院举行来华传教行医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新教的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伯驾，当时已八十一岁高龄，他特地写了一封祝贺信，从华盛顿寓所发出。纪念大会上宣读了伯驾的信：“……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四日是我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的日子。千千万万人将称颂和感谢值得崇拜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医药传教士为工具，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可使他们都认识无法形容的神的性格。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② 嘉约翰医生在纪念大会作了医院工作报告，着重介绍该院在外科手术和医学教育方面对中国的贡献。皮尔士牧师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我的观察和经验得出一个结论，这是我希望在此特别强调的，那就是：西方慈善事业为中国人的福利所设计的一切，再也没有比医药传教会所采用的手段和目的更为聪明

① W. W. Cadbury and Mary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100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

的了。……外国人开设医院，可以帮助扫除中国人的偏见和恶意等障碍，同时又可为西方的科学和发明打开通路。我在此可以声明，广州医药传教会在消除中外人士间的误会并增强关系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所医院表明，从西方来中国的人士，对四海之内的人都相待如弟兄，对那些困窘的人们，给以兄弟般的同情和帮助。”^①

可是这位牧师的观察和经验，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他回避了自从一八四〇年以来四十多年间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外国侵略者屠杀的中国人，要远远超过他们开设医院所救活的人。这个皮尔士牧师，对外国侵华只字不提，却一味强调要“扫除中国人的偏见和恶意”，岂不是有意识地在转移人们的目标吗？

介绍西医知识，培养西医人才

嘉约翰从一八五九年开始编写教材和书籍，向中国传播西医知识和自然科学。早期主要是为医科学生编写讲义。撰写过程中，最困难的是医药词汇的翻译问题，有许多译名是同黄宽长时期地反复研究后才确定的。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种痘书》，虽然只有六页，却对推广新式种牛痘以预防天花的流行，起到普及知识的作用。一八七一年，嘉约翰编写的五部医药书陆续出版，计有：《西药略释》二卷，《眼科撮要》，《割症全书》（此书附插图多幅，今译名为《外科手术手册》），《炎症》和《化学初阶》四卷。一

① W. W. Cadbury and Mary H.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100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第181—183页。

八七二年,嘉约翰又出版了《裹扎新编》,《花柳指迷》(指治疗梅毒病的方法),《卫生新编》(这是为在中国推广卫生知识而编写的)。一八七三年,嘉约翰又出版了《内科阐微》(这是一本着重讲症状学的书),《皮肤新编》(即皮肤病治疗手册)。其中因回美国间断了数年,到一八八三年,嘉约翰出版了《内科全书》六卷。一八八四年出版了《体用十章》四卷(这是一部讲生理学的书),《体质穷源》(这是大本子的彩色人体解剖图说)。一八八六年,嘉约翰增订《西药略释》一书至四卷,附有木刻多幅。一八九八年,专为医科学生编写出版了《实用化学》。一八九九年,与尹道之医生(南华医校早期毕业生)合作出版了《病症名目》等。这许多医学教材和书籍的出版,对在中国介绍西医西药和培养西医人才,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另外,早在一八六八年,嘉约翰医生就在广州编辑和发行中文《广州新报》。这是一张用汉字排印的一英尺见方的周报,只印一面,每份一文钱,在广州街头公开发售,主要介绍西医西药知识,间或刊载一些国内外新闻。从一八八四年起更名为《西医新报》月刊。这可能是最早在广州发行的科学性中文周报。

一八八七年,在上海的老牌美国传教士之一的文惠廉,倡议成立中华博医会,推举嘉约翰医生为第一任会长。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教会医学学术团体。嘉约翰在两年的任期内,创办了《博医会报》,分中、英文两种版本。这份期刊是十九世纪末在中国出版的唯一西医学的学术刊物,对于了解中国当时疾病分布与教会传教医生的活动,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嘉约翰还从一八八八年起兼任广州医药传教会的会长,直到一八九九年辞去。

为培养中国第一代西医西药人才,从一八六二年起博济医院就招收少量男生。一八六六年新院落成,南华医学校正式招

收正规化训练的医科男生。一八七六年,建立了标本室,扩大了原有实验室的设备。一八七九年,首次招收三名女生入校学医,连同原有男生十六名,共有十九名医学生,修业期为三年,然后进行临床实习。一八八七年,香港开办了更为正规化的医学院,南华医学校的部分学生转到该院深造,其中包括孙中山。一八九八年,南华医学校在校学生共有三十七名。在嘉约翰任校长期间一共毕业了大约一百名西医,肄业生离校的约五十名。这一百五十多名西医,大部分都在广东各县行医,有的还到其他省工作,对中国南方传播西医及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起到一定的作用。

嘉约翰的晚年

一八八五年,嘉约翰六十一岁时,他的第二位夫人又因病去世。第二年,他又娶了玛莎·诺伊斯为妻。这时他已不担任院长职务。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地处南方的广州也不例外。

一八九八年八月,博济医院为嘉约翰行医五十年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年,他在广州花地建造第一所精神病院,年已七十四岁的嘉约翰和夫人一起搬到精神病院的二楼居住,采用西医疗法为精神病患者治病,他经常遭到病人的突然袭击。嘉约翰在精神病院居住和诊治病人有一年半。这是美国传教医生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座用西医方法治疗精神病的医院。

据统计,嘉约翰一生共诊治病人七十四万人次,施行手术四万九千人次,培训西医一百五十人,编译西医、西药书籍三十

四种。

一九〇一年八月十日，嘉约翰在广州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对于外国传教医生在中国举办医疗事业，不能孤立地来看。它既是慈善事业的一种，医治了一部分病人，引进了西医、西药；但是这种慈善事业，又和外国人的侵华活动相联系，通过医疗事业以笼络人心，使中国人对外国侵略者产生好感，以解除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情绪。嘉约翰在华举办的医疗事业同时起着这两方面的作用。

杨 格 非

(Griffith John, 1831—1912)

杨格非, 又名杨笃信,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 一八五五年来华, 先在上海活动, 曾到太平天国辖区“访问”, 一八六一年后主要在华中一带活动, 为最早深入中国腹地的新教传教士之一, 在中国居住达五十七年之久。

身世和教育

据杨格非自述: “我在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生在英国威尔士的斯温西城。那时我的父亲受雇于维威安公司, 担任监工。……我排行最小, 也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母亲在一八三二年死于霍乱, 当时我只有八个月。……父亲的胞妹, 即我的姑母, 负责抚养我。” “我是从摇篮里就在宗教的气氛中长大的, ……到我大约八岁时, 已成为对宗教有深刻印象的孩子。”^①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杨格非经亲戚介绍, 在十二岁时就到离家二十英里外的一家杂货铺当童工。这家商店是一个名叫约翰·威廉士的铁矿老板开设的。杨格非在店里当了大约有五年之久的学徒, 吃尽苦头和受尽剥削。但因他从小接受基督教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3—4页。

的熏陶，一切痛苦都通过虔诚的宗教生活加以忍受，并且从十四岁起，就利用空余时间在教堂里开始讲道，还到处借书自学，希望有朝一日能考进大学念书。杨格非在这家杂货铺工作到十七岁。他决定向老板提出了辞职的要求。老板看他从小听话，工作又勤奋，坚决要挽留他，并许诺如果他肯继续留下，可让他完全负责这家杂货铺，将来还可帮助他成家立业。但是，杨格非决心已定，还是要回家去准备考大学。

但是，杨格非到家后，父亲又不幸被霍乱夺去了生命，感到悲伤万分。在亲友们的鼓励、资助下，杨格非还是认真复习功课，终于在一八五〇年九月考取了布雷肯大学。

杨格非读到大学三年级时，因受老师的影响，想到自己的身世，决心在毕业后到海外去闯一闯。于是，在一八五三年三月十八日向伦敦传教会写了一份请求派到海外去当传教士的申请书，校长也特地给他写了一份推荐书。杨格非当时希望能派到非洲东部的马达加斯加岛去传教。一八五四年一月，杨格非转到贝德福德神学院接受神学训练。这所神学院是伦敦会在1847年开设的，是一所专门训练派到海外传教的传教士学校。

杨格非在神学院学习期间，伦敦会对他进行考察，认为他个子虽然矮小，志气倒是不小，决定批准他的申请，但是要他前往中国传教。杨格非在同年九月间写信给伦敦会表示同意，他在自述中写道：当时“我不能说我感到难过，也不能说我感到快乐。我只是简单地认为，伦敦会的董事们最懂得该怎么办，而我只有遵命而已。”^①

由于行期将近，神学院给他提前毕业，让他回家准备行装。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32页。

第二年，即一八五五年三月，杨格非在家乡被封立为牧师。四月十三日，他与玛格丽特·格里菲思小姐结婚。五月二十一日，杨格非带了新婚夫人到伦敦，亲友们和伦敦会的代表为他们举行欢送宴会。杨格非当时只有二十四岁，因个子矮小，看起来象个小孩子，而另一名和他同行的英国传教士韦廉臣个子很高。当他们一同走进一家大酒店参加欢送宴会时，门警放进了韦廉臣，却不让杨格非进去。他与门警说明，自己马上要上船去中国传教，进去是参加欢送宴会的。门警听了哈哈大笑：“原来如此，派小孩子去拯救中国人皈依基督！”^①宴会结束后，他们上了船。

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侵略者迫使中国开放五口通商，伦敦会已先后派出麦都思、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雒魏林、合信等传教士，来华传教、开设医院、建立墨海书馆等。杨格非、韦廉臣的到来，将更加强该会在华的传教事业，并密切配合英国的侵华活动。

在上海的日子里

经过海上一百二十七天的航程，杨格非等于一八五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抵达上海。伦敦传教会给他的任务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向老一辈传教士学习如何在中国进行活动。他在上海共住了五年。

到上海的第二年，杨格非开始单独传教，不但到上海县城，还跑到禁止外国人去的松江县、青浦县活动。一八五六年六月三十日，杨格非给伦敦的报告中，谈到他在中国传教的困难：“中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33页。

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和了解到的最漠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他们全神贯注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将吃什么？我们将喝什么？或是我们拿什么来蔽体？他们留心听道，听了以后说，很好。但只到此为止。”^①

同年十月五日，杨格非给伦敦的报告中，对中国人所以不接受外国传教士说教的原因，称：“这里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人抱有好感，把这些人当作神明崇拜。……他们可以承认上帝是一位外国的哲人，但比起孔子和其他中国哲人，则远远不如。他们承认基督教的宗旨是好的，但不论从深度和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的圣人和智者的宗旨相比。……中国人还沉浸于可以感触到的唯物主义，世界和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②

对太平天国的干预

杨格非在上海期间，正值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和继续与清军作战，外国侵略者表面上宣称保持中立，实际上不断地在干涉中国内政。他们派遣传教士进入太平军辖区刺探情报，和企图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57页。

② 同上书，第64页。

说服太平军领袖改变革命方向。

一八五七年，杨格非初次进入太平军辖区。他是同另一名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一起去的，主要是在苏州及其附近搜集太平军活动和驻军的情报。^①洪仁玕从香港到南京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后，在上海伦敦会的传教士，决定以老朋友的资格去拜会他。由艾约瑟带队，杨格非等一共五名传教士，于一八六〇年六月二日联袂前往苏州，先拜会李秀成，以便了解与洪仁玕会面的可能性。杨格非报告此行的经过称：

在中国中心区发生的大斗争，已历时十年了，这是严格的有宗旨的大运动，至今势雄力厚。……对于这些宗旨和所采用的手段，我们绝对需要有正确的了解，借以帮助我们对整个运动可以有正确的估计和我们对付的行为。……有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天王洪秀全仍然活着，而且健康比前更佳。……洪仁玕到达南京，也是令人感兴趣的事。……他对基督教、对外国人和对世界大事的知识，要比他的族兄（洪秀全）深刻和正确得多。他被封为干王，这表示天王对他的钦佩和宠信。他的职位，将使他可以纠正天王的谬误。^②

洪仁玕获悉艾约瑟、杨格非等传教士想要与他会晤，即向他们发出邀请。同年八月二日，杨格非等到达苏州，传教士们声称：“我们早就希望同干王会晤，目的是考察各种有趣事件的实际情况，为了鼓励干王努力纠正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错误，为了探知如何在太平军辖区内传播基督教，同时也是为了提供一些帮助他们改革和进步的计划。”^③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 67 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第 520 号，1860 年 7 月 4 日杨格非写的报告。

^③ 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第 121—136 页。

干王在苏州真诚热情地接待了这批传教士的来访，向他们首先明确表示，他是“很效忠于天国，并决心与之共存亡的”。同时回答了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他们共会晤了两次，据杨格非给伦敦的报告记载：“我们在八月二日早晨到达苏州，当天就和干王会面。……我们欣然接受同他共进午餐的邀请。……席间，我们所谈论的题目，几乎全部是宗教方面的。……第二天，我们又去拜会了干王。……”^①

当太平军进军上海时，杨格非把搜集到的情报先后两次寄给伦敦传教会，第一份报告的日期为一八六〇年九月三日，第二份报告的日期是同年十月二十日。^②在第二份报告中，杨格非提到当太平军已经击败防守上海县城的清军，正准备进军入城时，却遭到租界内法军和英军的大炮连续轰击，结果未能达到进城的目的。后来太平军向跑马厅行军时，又遭到外国军队射击。这表明，外国所宣布的中立，全然是虚伪的。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上旬，杨格非偕同一名英国传教士和两名广东人，其中之一即为容闳，一同前往南京访问。据容闳回忆：“一八六〇年秋，有两名传教士计划到南京访问太平军，有一名叫曾蓝生的中国人陪同，他们邀请我也参加，我欣然答应了。我去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太平军的性质，他们这批人是否能胜任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满清皇朝。”^③他们一行先是乘民船到苏州，在向太平军取得通行证后，又乘船到丹阳。然后于隔日弃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140—143页。

② 原文均载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143—146页。

③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第十章，“到太平天国访察”。

船徒步往南京进发,在十一月十八日抵达南京。

杨格非去南京的目的,据他自己声称:“我去南京的主要目的……是要从太平天国首领处获取一份宗教自由的诏旨。我已领到诏旨,完全准许传教士到起义者的地区居住和传教。”^①

容闳去的目的已如前述,这次他非常高兴,能见到在香港结识的老友洪仁玕,他们一共长谈了两次。第一次长谈时,容闳就向洪仁玕建议七件施政纲领,即“按照科学原则,组织一支军队”;“建立一所陆军学校,训练有能力的军官”;“为海军建立一所海军学校”;“组织一个文官政府,聘用有才能和有经验的人担任各行政部门的顾问”;“建立一个银行系统,厘订度量衡标准”;“为人民建立一个各级学校的教育系统,把《圣经》列为教科书中的一种”;“建立一个实业学校系统”^②。第二次长谈时,他们详细讨论了容闳的建议,洪仁玕对之表示全部赞赏,但他说明当前因战事频繁,只能稍后相机行事。洪仁玕想留容闳在南京共同振兴太平天国大业,但被容闳拒绝了。他随杨格非等一同回到了上海。

杨格非带回上海的、太平天国颁发的“宗教自由诏旨”,这是幼天王以天王名义颁发的,根据英文回译如下:

天爷天爹暨爹命,朕诏各王文武众臣及众弟兄知之:天爷天爹之真教乃天教,耶稣教天主教均是也。天下与爹朕为一家,谨守天规之人皆可来访。今干叔赞叔秀叔等奏称,

① R. W. Thompsom: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147页,“1860年12月6日杨格非从南京写给伦敦传教会的报告”。

②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第十章,“到太平天国访察”。

西洋教士杨笃信(格非)君暨其友人,敬服天国,信奉天爷天爹,来京欲鉴荣耀,瞻仰上帝耶稣,并请求传播真道。谢天爷天爹赏天国权力与奇能,使远近各国均得敬闻。唯目前干戈扰攘,刀兵遍地,深恐教士为乱兵所伤,引起严重后果,朕鉴彼等皆忠诚信实之人,愿为耶稣忍受患难而不顾,朕深敬之。仰各王传谕军民人等,对彼等当和爱相待,不得加以危害。须知天爷天爹暨朕同是一家,故当令彼等受优遇也。钦此。^①

一八六一年四月,杨格非再次到南京,表面上是为了打算按照诏旨到南京建立传教据点,实际上是去实地考察一下,等太平军垮台后,如何沿长江而上,扩大传教活动的可能性,因为一八六〇年他去南京时,外国侵略者与清政府已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华传教士们早已不把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了,而是打算一旦消灭太平天国,就深入中国内地“自由”活动。

杨格非事实上在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就急忙向伦敦作如下报告:

这封信带给你的消息,一定会使整个基督教国家所有的差会朋友们深感兴趣。这个辽阔古老的帝国,不管它的闭关政策,自负的傲慢,对一切外国的极度轻蔑,已经首次被迫打开了它迄今不能渗入的地区,可以进行友好交往和光荣的贸易了。……就这样,中国几乎出人意外地对传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

^① 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365页。

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①

传教士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频繁地到太平军辖区去活动的目的,杨格非作了一个比较坦率的自白,他写道:“传教士对这般叛乱者的骚动,并没有给他们丝毫援助或一个字的鼓励。如果传教士到他们那里去,那只是为了搜集情报,把真理之路更完整地教导他们,或者训戒他们放弃他们的错误主张和非基督教的礼仪,对他们效法他们的敌人的残暴行为,予以谴责。”^②

到华中去建立传教基地

伦敦传教会在获悉《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消息后,除在英国国内开始动员更多的传教士前来中国外,还迅速指示在上海的伦敦会传教士,赶紧前往内地开辟新的传教据点,并要杨格非能赶上乘坐英国炮舰向长江上游进发。杨格非写道:

我迅速地作出了决定,我已打听到和阅读了许多有关汉口的情况,多次渴望能到该地去访问。现在汉口已真的开放了,我感到没有必要再选择了,只有去,而且要立即去。我记得很清楚,在一八六一年六月九日那天,当我同威尔生牧师一起登上“赫勒斯邦”号汽船驶往汉口时的快乐情景。我记忆犹新,当我们在伟大的扬子江溯江而上的感情,似乎象一个新世界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们两人是多么地感谢上帝,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经成为十字架使者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79—82页。

② 同上书,第259—260页。

们的大道。^①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杨格非等到达汉口，他们上岸后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调查，租好房屋后又回到上海，准备把家眷一起带到汉口去定居。他们在上海经过一番筹备之后，又在八月六日乘船西上，十九日到达汉口，在那里开始建立传教基地。威尔生牧师到汉口后一年多就去世，遗下的妻儿由汉口外国商人捐款五千两银子，送回英国。

汉口作为通商口岸一开放，半年之内就有二十二家外国商人设的洋行开张营业。传教士在汉口的活动，得到了外国资本家的巨大支援。虽然他们都是基督教徒，但对经济侵略的兴趣，远远超过到教堂去做礼拜的兴趣。杨格非虽然非常感激他们的慷慨捐助，却对他们可能丧失进天堂的机会感到不安。杨格非是第一批到达汉口的传教士，他们到汉口一年之后，才有别的基督教差会派传教士到汉口。一八六二年三月十六日，杨格非在汉口为他劝说信教的第一个教徒，施行了洗礼。

杨格非是早期来华的“街头传教士”的典型。他主张自下而上地通过散发福音书和在街头讲道，以吸引中国人一个一个地入教。这种布道方法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被在华传教士普遍采用，即使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华传教士主张采用这个办法。杨格非在汉口的头四年，外国商人共捐赠他八千两银子作为活动经费，当然还有伦敦传教会的拨款。

杨格非在汉口建立据点后，就打算到武昌去开辟据点。他认为，开辟了武昌，就等于开辟了湖北全省。但武昌是省会，并不对外开放，外国人不能在武昌建立教堂。杨格非对英国驻汉口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 159 页。

的领事提出这个计划，请求英国领事向武昌清朝官员施加压力。经交涉，杨格非终于在武昌租到土地，汉口外国商人捐助了五百英镑（约合一千六百两银子）给杨格非，就这样：外交官、传教士和洋商三位一体联合行动，互相支持，取得了条约范围以外的特权。杨格非开始在武昌建立起传教据点。此外，汉口洋商还集资捐赠一条船给杨格非，好让他在长江和汉水两岸扩大活动范围。

当时外国传教士到中国，都是以白种人的优越感来“拯救”中国人灵魂的，杨格非在这方面说得非常直率。他在给伦敦的报告中，写道：“难道我们不是比他们（中国人）优越得多吗？我们不是更雄伟、更聪明、更灵巧、更人道、更文明吗？不仅如此，我们不论在哪一方面，不是比他们更有价值吗？”“我们的目标并不是使他们更灵巧、更富足、更有力量，而只是使他们更加圣洁、更加快乐。”^①他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传教士到中国来活动的目的，是为他们本国的对外扩张效劳的，是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充当先遣队的。他们并不希望中国独立富强，更有力量。

一八七〇年七月，杨格非在中国活动了十五年之后，带家眷回英国休假。他在英国逗留了两年多，除了向有关方面汇报他在华中开辟传教基地的经过外，还到各地教堂巡回演讲，鼓动教徒多多捐钱，以便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腹地扩展教会势力。他认为，这对于英国资本家和英国的对外殖民利益，是大有帮助的。特别是为英国在建立长江流域势力范围，有不能言传的作用。一八七三年二月，他带家眷自英国启程来华，当船驶经新加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254、268页。

坡时，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突然去世。他在悲伤之中回到汉口。

从一八七六年起，杨格非开始重视教会出版物的编写和散发工作。为此，他在汉口成立了一个书报部，企图通过利用华人在华中各省散发福音书，来扩大教会的影响。这个书报部成立后第一年，共散发一万册福音书。六年之后，共散发三十五万册。到一九〇三年，教会书刊的发行量，在华中各省达到二百二十万册，在湖北和湖南两省雇用的专职书报推销员有七十人，仅这两个省在一年之内就售出三十三万册福音书。他在这段时期内，用了不少时间亲自撰写传教小册子，据一八八四年这个书报部的报告，在出版的五十种新书中，有三十一种是由杨格非亲自撰写的。^①

一八七四年，杨格非再度结婚，娶了一位美国派往上海传教的寡妇。他们一起在华中传教六年之后，在一八八〇年先到美国探亲，然后到英国度假和汇报在华活动情况，到一八八二年再次回到汉口。

杨格非在中国活动了二十年之后，总结道：“我似乎是拖着沉重的脚步在中国爬行，夺取的欲念很多，而达到的目标却甚少。”^②杨格非的第二位妻子在一八八五年又与世长辞，使他格外心灰意懒。伦敦方面来信，请他回英国准备参加世界宗教大会。他感到没有什么“成绩”可以向大会汇报，决定留在中国，并计划向西至四川，南至湖南等省扩大活动范围。但是，他也遇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无法随心所欲。

七十年代初爆发天津教案后，全国各地普遍燃起了反对外

①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330—337页。

② 同上书，第391页。

国殖民主义者利用宗教侵华的斗争，杨格非对之始终是抱敌视态度。一八七一年，清政府为了防范教案发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一份《传教章程》，杨格非认为清政府的“这些要求是打击在华基督教差会的根基，如果答应和实行的话，就要关闭在华的每一座教堂和学校。”^①为此，他竭力加以反对，而各国驻华使馆在请示本国政府和在华传教士意见后，全都拒绝接受这个《传教章程》的规定，“各国皆置之不理，此件到欧洲各国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②

杨格非对一八六八年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制造的扬州教案，对一八七六年在汉口近郊爆发的群众捣毁他所立的教堂，以及对一八九一年五月在镇江、南京、宜昌等地发生的反对外国利用宗教侵华的斗争等，都曾向英国政府出谋画策，或提供情报，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手段，以达到镇压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目的。

杨格非还为在华的外国冒险家们攫取避暑胜地庐山出过力。杨格非在华中一带活动时，早已看中庐山这块地方。一八九四年，他通过与地方官的数次谈判，只花了六十两银子就租到包括高冲、长冲、女儿城、教厂、讲经台等一大片辽阔的公有山地，给外国人盖屋避暑。到十九世纪末，每年到庐山避暑的在华外国人，已达一千二百人。^③

一九〇五年，汉口基督教会为杨格非在华五十周年举行庆祝会，当时他已七十四岁。他在华中一带发展教会势力的“功

① Chinese Recorder. 1871年4月，第149页。

② 《教务纪略》第3卷下，第14—15页。

③ R. W. Thompson: Griffith Jones, 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 第518—519页；王鹏九：《交涉约案摘要》第2卷，第19—21页。

绩”，受到英国政界和宗教界的称颂。英国爱丁堡大学曾于一八八九年授予杨格非神学博士学位。一九一二年初，杨格非返回英国后不久去世，终年八十一岁。

丁 韪 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丁韪良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六十余年，曾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他是“在华最前列的美国人”。^①事实究竟如何，且看他的生平言行。

从印第安纳来的传教士

丁韪良，一八二七年四月十日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里沃尼亚。父亲威廉·马丁是长老会传教士，生有五女三子，给三个儿子都起了传教士的名字。丁韪良的原名前二字是威廉·亚力山大，是派赴三明治岛传教的他叔父的名字，后面一个字是帕森斯，是派赴巴勒斯坦的传教士的名字。

丁韪良的大姐在一八三四年就跟随丈夫到非洲传教，当时丁韪良只有七岁。大姐从非洲的来信中，谈到在非洲传教和冒险的经历，以及后来大姐返美时向家人讲述在海外传教的故事，对幼小的丁韪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丁韪良在家乡中学毕业后，于一八四三年，即他十七岁那

^① John W. Foster: "An Appreciation of Dr. W. A. P. Martin", Indiana University Alumni Quarterly (1917). 第134—135页。

年,考进了印第安纳大学。一八四六年,转入新阿尔巴尼神学院攻读神学。不久因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到路易斯维尔一所长老会教区学校教书。就在这期间,丁慧良作出要当传教士的决定,于是又回到神学院复学,一八四九年毕业。他在神学院毕业时,发表的演说题目是《传教士应利用自然科学》。

丁慧良在神学院读书的最后一年,向长老会差会部提出申请,要求到中国或日本去当传教士。他的申请很快被批准,并被指定到中国去传教。一八四九年毕业后,丁慧良回到家乡,十月十五日被封立为牧师。丁慧良的哥哥撒母耳,也同时被指派到中国传教。同年十一月十三日,丁慧良在纽约遇到简·范桑特女士,经过闪电式的恋爱后,即在教堂举行了婚礼。十天之后,他和他的哥哥带了他们的妻子,一起乘坐“蓝涛”号货船,出发前来中国。

在宁波传教

一八五〇年四月十日,丁慧良等一行抵达香港,然后换船前往宁波,开始他们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丁慧良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在宁波城内实习传教。不多久,他就从宁波出发到山北、奉化、杭州等地活动。一八五一年二月,他在宁波南门外设了一所走读男塾,同年五月又在南门内设立另一所走读男塾,每所男塾约收二十名小学生,后者在九月间即停办。丁慧良在宁波期间,曾参与一部分将《圣经》译成宁波土话的工作,也曾试用汉字罗马拼音法,教学生学习拼写,还用拼音文字编印了一些福音书,但未能获得成功。^①

^①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第56页。

一八五四年，丁韪良出版用中文编写的《天道溯源》一书，此书曾再版多次，广泛流传，还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最后一版是一九一二年。^①

丁韪良在宁波传教期间，曾积极为美国政府效劳，无偿地为美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翻译。当他获悉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将前往华北与清政府谈判修约时，就主动要求参加美国使团，担任翻译。经批准后，于一八五八年随列卫廉前往大沽口。

一八五八年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九日，丁韪良两次写信向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报告此行经过情况。他说，他参加美国使团的目的，“是在修约过程中推动传教事业的发展”。他认为英、法联军发动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按照上帝的旨意看来是必需的，首先应该使用武力，令这些高傲的亚洲人谦恭下来，然后才能用福音把他们抬高”。^②

在这次修约谈判中，丁韪良还同另一个参加使团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胁迫清政府将批准到内地传教的条款，写入中、美《天津条约》。丁韪良在为美国《纽约时报》写的报告中，公然声称：“人们已经意识到传教士已成为世界上的一股势力。政治家们已确信，传教士是一种媒介。通过他们，西方的意志必定要对中国起作用。”^③

一八五九年，丁韪良又接受新任美国驻华公使华约翰的聘用，再次到华北参加侵华活动。后来，由于差会部没有批准他到华北传教，因此，一八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带了妻小（在宁波生

①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第67—68页。

② W. A. P. Martin, "Two American Embassies", 第1卷, 第111页。
引自 Ralph Covell: W. A. P. Martin: 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 第90页。

③ New York Times, 1858年10月12日, 第1版。

了四个儿子),从宁波取道上海,乘船回美国休假。

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当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时,丁韪良认为这个运动对基督教是有利的,这个新政权将会对传教士开放,从而引起美国教会对中国关注,派遣更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为此,他计划到太平军辖区去进行一番考察,一八五三年秋,从宁波来到了上海。

在他之前,已有一位传教士戴作士医生,不顾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的反对,跑到了镇江。为了避免被马沙利察觉,丁韪良也偷偷地雇船从上海出发,在到达镇江之前,他被清军所阻,不得已又返回上海。^①当时他的信念是:“难道一个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兄弟’的统治者,不比自封为‘天子’的皇帝更有可能皈依圣父吗?”^②此后,他一直注视太平军的动向。

上海英文《北华捷报》先后在一八五六年五月三日、六月七日和一八五七年六月十三日、六月二十日刊载丁韪良写信给美国司法部长顾盛的三封信,要求美国政府承认太平天国政权,并首次提出了所谓“两个中国”的荒谬主张。

在给顾盛的这些信里,丁韪良要求美国政府不要帮助清政府。他认为,帮助满人就是怂恿他们对汉人进行种族战争,延长了满族的统治;与此同时,他对太平天国备加赞扬,认为起义者拿起武器反抗清帝国的统治,可以“同克伦威尔的义举比美”。对洪秀全升天受命,“可以比作古时君士坦丁的得见十字架旗助其战胜”。他为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辩护说:“或谓他们的基督教是假

^①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第129—131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的，因之形势不同，然而基督教在开始时期，其形象何尝不是假的呢？……今所指为假的基督教，又有谁敢说它将来不会极有助于真正的基督教的发展呢？”他认为洪秀全，“无论他个人人格品德有何缺点，他现正操持着重生中国的唯一机构。”丁韪良援引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说：“这奇特的革命，也许需要很长时期方能圆满完成，然而对于中国最终必然皈依基督教的希望，是不必沮丧而放弃的。”他在一八五六年对太平天国的基本看法是：“这个革命运动的成功，对于基督教是大有用处的；反之，它的消灭却是十分有害的。”

丁韪良在一八五七年夏天写给顾盛的信中，进一步认为既然南京已经建立了一个能够生存的政府，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政权，这将有利于促进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因为太平军所占有的地区，正是长江下游最富庶的地方。况且外国传教士认为最不正统的东王杨秀清已经伏法，天王“仍能保其领导地位”。丁韪良感到同时承认两个中国，会创造一个更良好的环境，必将有利于美国的在华利益，“使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是攻破东方闭关主义堡垒的好办法。两个相敌对的王朝，会互相争斗”。这样，美国就可从“两个中国”同时获得贸易上的利益和其他特权。^①

顾盛对丁韪良的这些信，没有作出反应。在这之后，丁韪良就去参加美国使团与清政府谈判修改条约的活动，迫使清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扩大美国侵略者的在华利益，无暇顾及太平天国的存在与否了。他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表示遗憾，写道：“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及今回顾，由以后的历史所呈现的后果以观之，我们仍要疑问当时外国如采取另一政策，则造益于中国更

^① North China Herald. 第301、359—360号，1856年5月3日、6月7日，1857年6月13日、6月20日。

大否?……当革命运动正临成功的边缘时,一般短视的外交家的成见即决心反对之,遂使千年不可再得的好机会一旦丧失了。”^①

在上海和北京从事传教和其它活动

丁韪良一家人从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二年在美国度假期间,正值美国内战时期,他虽到处演说,要求教徒支援中国的传教事业,但捐款甚少,报名到中国去当传教士的青年也很少。他特地到菲城学习电报业务,以便回中国时能加以运用。^②一八六一年十月十六至十七日,他在纽约参加美国东方学会的首届学术会议,作了题为《中国人的伦理哲学》的学术报告。^③同年七月,美国拉斐特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

丁韪良总结他在中国头十年的活动经验,认为要发展美国基督教在华势力,必须从教育入手。他向长老会差会部提交一份建议书,要求在中国创办一所高等学校,以训练牧师为主,旁及医学等其他学科,以此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部分。

一八六二年夏天,丁韪良和夫人带了两个最小的男孩,从纽约乘船再次前来中国。经过八十五天航程到达上海,本拟直接回宁波,却因上海美国长老会负责人克陞存牧师突然去世,被要求留在上海工作。

丁韪良在上海订出了发展外国教会势力的计划,要求把上海的长老会会堂“兴奋”起来,扩大长老会办的学校,并扩大两年

① 司弼尔:《传教会与近代历史》第1卷,第53页。

②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第299页。

③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第7卷,1861年10月16—17日。

前刚从宁波搬来的印刷厂花华书房的业务范围（后改称美华书馆）等。

但是，丁韪良却打算到北京去开辟传教基地。从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已有伦敦传教会的雒魏林、艾约瑟，英国圣公会的包尔腾，美国圣公会的施若瑟等新教传教士，进入北京活动。丁韪良决定一个人先去北京。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帮助下，他先在北京西郊一个庙宇落脚，不久在城内离总理衙门不远处，找到一处可供他一家居住和开设学堂之用的地方。于是他向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卫三畏借钱，把它租了下来。然后到上海把家眷接到北京居住，开始为美国长老会在北京开辟传教区而活动。

丁韪良在北京传教期间，由于以前曾参加与清政府的修约谈判，认识一些高级官吏，得到了不少方便，但所收的教徒，则全是贫苦人民。有一次，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大臣文祥召见了丁韪良，要他转告所有在京的传教士小心谨慎，不要大张旗鼓地传教，以避免遭到反对。他照实向其他传教士传达了，但他自己却加快实行大发展的计划，然而真正信教的人仍是不多。一八六四年五月，他开设了一所走读学校，收了六名男生。当时学生的学费、伙食费，甚至服装费等，都是由学校负担的。丁韪良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信教之后，将来派出去当传道人。但当时，美国正在打内战，经费接济有困难，因此他在宁波时期的老朋友、现在在北京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答应每年从海关拨给他一千五百两银子，作为学校经费。^①

一八六一年，在华传教士成立了一个把《圣经》翻译成北京话的委员会，丁韪良也是成员之一。他根据麦都思的译本，翻译

^①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第 235 页。

了“新约”中的一部分。

一八六五年年底,丁韪良打算从陆路到上海去,以便沿途搜集中国内地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一八六六年二月,他到达河南开封,成了第一个到开封访问的新教传教士,在那里主要调查开封犹太人的状况。

丁韪良在开封查访了犹太人的礼拜寺,可是已成为废墟,只剩下一块六英尺高的孤碑,矗立在污水池旁。当时还有犹太遗民三、四百人,生活穷困。丁韪良访问了六家犹太遗民。他们已不识希伯来文,也不再做礼拜,大部分成了回教徒。最后一个拉比^①的儿子告诉了韪良,说:他父亲在三十多年前死在甘肃,从此就无人能识希伯来文了。丁韪良谎称识希伯来文,因而从他们那里骗取了两部希伯来文经卷,后来他将其中一卷送交卫三畏,现存美国圣经公会。

丁韪良在访问后,曾写信向美国的《犹太人时报》报道,建议组成一个援助中国犹太人的差会团体。他写道:“重建犹太会堂,对于那些行将消失的犹太遗民是极为必要的,这将提供一个联系他们的中心。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他们了。”他还写信给美国高夫曼牧师,建议派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前往开封重建会堂,以吸收这批犹太遗民信奉基督教。^②

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

丁韪良在上海传教期间,就已开始翻译惠顿《万国公法》一书的部分内容。他到北京之后,就向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提出,

^① 拉比,希伯来文 Tabbi 音译,犹太教的教师。

^②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第4章。

打算把此书译完,以供中国政府应用,得到蒲安臣的鼓励,并答应向总理衙门提出此事。一八六三年夏天,丁韪良在天津拜会通商大臣崇厚。他们在修约谈判时已是老相识,向他出示一部分译稿,崇厚答应写信给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请其支持刊刻。这年十一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亲自带了丁韪良到总理衙门去向他们推荐此书。文祥问丁韪良,此书中包括赫德翻译的二十四段内容吗?这是指赫德过去曾把惠顿一书中某些章节片断翻译给总理衙门作过参考。^①回答是肯定的。文祥认为,此书对清政府可能有用。丁韪良告诉他说,此书尚未译完,要求总理衙门指派官员帮助他润色,并由清政府出钱刊刻出版。恭亲王同意派章京(官名)陈钦、李常华、方澹师、毛鸿图四人,“与之悉心商酌删润”,并拨银五百两交付京都崇实印书馆刊刻问世。^②

最早介绍近代国际法到中国的,是美国传教医生伯驾。他是受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委托,翻译滑达尔的《国际法》一书中的几段,供林则徐参考的。滑达尔是瑞士国际法学者,他写的书原名是 *Le Droit des Gens*, 一七五八年出版。丁韪良认为此书已过时,因此选用了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原书名是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一八三六年出版,在当时算是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蓝本。惠顿从一八一五年起到一八二七年,是美国著名的律师,后来被派赴欧洲任外交官有二十年之久,一八四七年回美国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被认为是国际法权威。

① F. W. Williams: *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第286页。

②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第222—223页。

丁韪良在上海时，曾把翻译此书的情况告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得到他的赞成。到北京后，又得到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和总税务司赫德等的支持；总理衙门批准后，丁韪良在中国助手们帮助下，很快就定稿出版。初版三百本，由赫德建议分送给清政府中央和各省以及五口与外事有关的各级官员。此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就传入日本。

继《万国公法》问世之后，丁韪良又在他担任同文馆工作期间，与他人合作陆续译著出版了以下国际法的书籍：

一、《星轺指掌》四卷，一八七六年出版，是根据德国人马顿斯的《外交指南》翻译的。

二、《公法便览》六卷，一八七七年出版，是根据美国人吴尔奎的《国际法导论》翻译的。

三、《公法会通》十卷，一八八〇年出版，是根据瑞士人布伦执礼的《国际法法典》翻译的。

四、《陆地战役新选》，一八九九年出版，是根据国际法学会一八八〇年编辑的《陆战法规手册》选译的。

五、《中国古代万国公法》，一八八四年出版，是由丁韪良搜集中国古代公法的材料编写的。

一八六五年三月，由于在同文馆任英文教习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离职前往上海，赫德推荐丁韪良到同文馆兼授英文课。这是一个肥缺，年俸一千三百五十两银子，比他在教会拿的工资高出一倍，一天只需工作两个小时。同时，他还兼任美国《纽约时报》的特约通讯员，每发一份报道，可以有二十至三十美元的收入。当蒲安臣于一八六八年代表清政府出使外国时，丁韪良竭力在《纽约时报》上写文章为他吹捧，蒲安臣的出使活动后来遭到英国等国的非议时，丁韪良又化名写文章，在《纽约时报》为

他辩护。^①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同文馆决定聘请丁韪良开设有关国际法的课程。他答应了这个安排，但要求先回美国去进修一段时期。因此，在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丁韪良带了家眷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从上海乘船回美国。美国长老会差会部决定停止他的工资，因为他事实上已不担负教会工作。丁韪良在美国进耶鲁大学进修国际法等课程。

出任北京同文馆的总教习

一八六九年夏天，丁韪良独自一人自美返华，妻子和四个孩子留在美国。他到北京后，立即去拜访赫德。赫德问他是否愿意出任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回答说：“擦擦灯盏，我是愿意的，但条件必须是你要供给灯油。”赫德允诺经费不成问题，可以由海关方面拨付。丁韪良后来声称，对同文馆来说，“赫德是父亲，而我只是一个保姆”。在正式任命之前，他还通过了清政府对他的一次数学考试，合格后才被正式聘请为总教习。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丁韪良到同文馆走马上任，学校为他举行就职礼。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和美国驻华公使馆临时代办卫三畏，都前往参加。赫德因事未能参加，送了一份祝贺信。全体学生也一起参加。从这一天起，他担任这个总教习的职务长达二十五年之久。这个消息在美国曾得到广泛的宣传，一八七〇年纽约大学授予丁韪良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以为他

^① 丁韪良在《纽约时报》上用的笔名有 Q. Perry Plus，见于该报 1864 年至 1868 年。

担任了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①

丁韪良就任同文馆总教习后，于同年十二月一日正式向美国长老会差会提出辞呈。总教习的年俸要比教会高出十倍，约六千两银于一年的，但他向教会保证，他还是一名传教士，而且是一名终身传教士。他承认，同文馆是一所世俗学校，但是他保证在他的手里可以至少使这所学校减少对基督教的反对，甚至不反对基督教。^②

丁韪良写道：“以同文馆的性质而言，正式讲授宗教本是不许可的，但我却常常和学生们的谈到宗教问题，并且要求别位教习，如课本中遇到有关宗教的课文时，尽可不必删去。”他还下令把课堂里原来贴的禁止讲授宗教的规定撕去。

丁韪良工作一段时期后，忽然向总理衙门提出辞职，总理衙门连忙派两位大臣前来挽留，对他说：“那你便想错了，学生并不一定永远只有十个。而且就是这十个学生，他们的前程也是未可限量啊！我们一天天地老了，他们十个人之中，说不定还有可以继承我们位置的。将来皇上也许要学外语，难道你的学生便不会被召去教他吗？”丁韪良听了很受“启发”，他写道：“这倒是一句大可注意的预言”，于是他想通了，决定留下教这十个学生读英文，兼管全校教务，他说：“我之所以留任，是认为同文馆的影响，远比北京街头上的教堂的力量大得多。”^③

丁韪良上任之后，对同文馆的学制进行了一些改革，分成五年制与八年制两种，后者是在一八七六年获得总理衙门批准的。五年制课程不包括外语，主要学习数学、格致和国际法等课程。

^①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第6章。

^② 丁韪良1869年12月1日致美国长老会信。引自 R. Covell: *W. A. P. Martin*. 第175页。

^③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第293—305页。

八年制在头三年几乎全部学习外语,后五年才学习格致、数学和国际法等课程。学生数从四、五十名逐渐增加到一百名,一八八八年学生达到一百二十五名的高峰。学生来源在一八七〇年以前均为八旗子弟,在这之后招收了部分汉族子弟入学,到一八九三年汉族与八旗子弟的比例为五十二比四十八,汉族子弟超过了八旗子弟。^①

同文馆在丁韪良的主持下,培养出一批翻译和外交官。洋务派中的要员如户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廷襄等,都是同文馆的毕业生。同文馆还翻译出版了一批西学书籍。总理衙门基本上控制了同文馆的教育主权,对丁韪良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授给他三品顶戴官衔。

丁韪良在同文馆任总教习期间,仍经常为美国《纽约时报》撰稿,到一八七二年以后才中断。他还在北京组织了英国皇家学会亚洲分会的华北支会,称作北京东方学会,并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在这期间,他还多次在国外的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政治等情况。

一八八〇年,总理衙门给丁韪良以官费出国考察教育的机会。他遍游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了各国的教育制度和现状。一八八二年回到中国,用中文写《西学考略》一书,向总理衙门作了汇报。但是,丁韪良试图把同文馆完全按照西方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造,并没有获得成功。他设想通过这所国立高等学府发展外国教会的势力,也同样没有结果。同文馆的学生没有一个受洗入教的。

对清政府来说,开设同文馆毕竟是一件新鲜事物,即使象曾

^① K. Biggerstaff: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 in China*. 第141页。

经协助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的四位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也未必把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当作一回事。一次，丁韪良专门邀请他们来参观他拍发电报的操作表演，其中一位翰林竟对丁韪良说：“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没有电报，也已经立国四千年了。”于是，丁韪良故意拿出几样玩具来给他们观赏，他们却显得非常有兴趣，花不少时间去捕捉磁性鱼或磁性鹅，抚弄这些小玩意儿，几乎不忍释手。丁韪良对他们带有报复性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上他们是大人，在科学上他们是儿童”。^①

一八九四年，丁韪良因健康不佳辞去同文馆总教习的职务，回美国治病。他走后，有些人公开批评同文馆办理不善。如陈其璋在一八九六年写的《请整顿同文馆疏》中指出：

计自开馆以来，已历三十余年，问有造诣精纯洞悉时务卓为有用之材乎？所请之洋教师果确知其教法精通，名望出众，为西国上等人乎？接受之法固不甚精，而近年情弊之多，尤非初设馆时可比。向章有月考季考，今则洋教师视之为具文。……学生等在馆亦多任意酣嬉，年少气浮，从不潜心学习。间有聪颖异人者，亦只剽窃皮毛，资为谈剧。及至三年大考，则又于洋教习处先行馈赠，故作殷勤，交通名条，希图优等。^②

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一八九七年一月，丁韪良已是七十高龄，因不甘心在美国的寂寞生活，又回到了北京。当时正值甲午战败，维新派普遍要求

^①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第 299—300 页。

^② 《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变法类》，“学校”。

清政府实行变革。一八九六年六月十二日，刑部侍郎李端棻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凡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一八九八年六月至九月“百日维新”期内，光绪帝发出七十三条改革谕旨，其中有三十六条涉及到教育改革，而直接提到要筹办京师大学堂的达八条之多。于是，孙家鼐授命任京师大学堂校长，丁韪良任总教习，工资改为每月五百两银子（折合当时美元三百七十五元），与他在同文馆时期的工资一样。美国《纽约时报》于同年九月二十三日发布清政府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校长的消息，题目是：《中国挑选一个美国人——丁韪良博士任新京师大学堂校长》，清政府把丁韪良的官衔从三品晋升为二品顶戴。为此，美国普灵斯顿大学于一八九九年又授予丁韪良以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但京师大学堂没有被取消，丁韪良依然当他的总教习。他曾为此询问过荣禄，荣禄回答他说：“如果取消这所大学堂，会在外国人的眼中失去体面。”^①经过一番筹备，京师大学堂于同年年底招生开学，一八九九年一月正式上课。

丁韪良当时所聘用的中、外教习，几乎都是基督教中人士，差不多等于是一所教会大学，只是不做礼拜而已。孙家鼐为丁照顾外国教习，同意他们不必参加祀孔典礼，但是丁韪良却带了外国教习参加了祀孔活动，为的是“对这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象征，表示他们的敬意”。^②前者为各国在华传教士所欢迎，而后者则有相当一部分传教士表示反对。

这时，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熊熊烈火正从山东逐步朝着

^① W. A. P. Martin: *Siege in Peking*. 第54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1899年2月6日, "Peking University".

京、津一带蔓延，到一九〇〇年六月，北京城内已是义和团的天下，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于是，丁韪良在一九〇〇年十月又回美国去。

丁韪良在美国逗留一年之后，于一九〇一年九月再次来到北京。慈禧任命管学大臣张百熙兼京师大学堂校长，仍聘丁韪良为总教习。但张百熙对外国传教士控制国立大学早已不满，认为这些传教士并不是什么学有专长的专家，京师大学堂理应完全由中国人自办。于是他以学校经费困难为由，在一九〇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解聘了所有外国教习，包括总教习丁韪良在内，只发给他们十八个月的工资。^①

丁韪良被辞退后，于三月间又回到美国。四月间，他在温哥华收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一封电报，聘请他到武昌筹办一所大学，并当校长。他决定接受这个聘请，于同年九月再次来华，前往武昌就任这个新职。

张之洞在武昌接见丁韪良，告诉他大学还在筹办之中，请他先为年轻的官员开设一门国际法课程。正在此时，张之洞接到调令，要他到南京任两江总督。这样，大学的筹办工作搁浅，但丁韪良仍在武昌为年轻官员开设一些课程，工资由张之洞支付。他一直做到一九〇五年才回美国。^②

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

一九〇〇年夏天，义和团开始包围北京使馆区时，丁韪良连忙搬进了英国公使馆的大院，并且领了一杆毛瑟枪，参与巡逻，

^① Chinese Recorder. 1902年3月，第143页。

^② W. A. P. Martin: The Awakening of China. 第231—232页。

和枪杀义和团。他在被围期间，于六月十八日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在使馆区内的部分外交官，提出了一个“以华制华”的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九月十三日出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上公开发表，其主要内容为：

一，为了根除慈禧太后制造的灾难，在各大国共同议定下，将慈禧太后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力。二，取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颁布的一切政令，包括她给党羽的委任状，新政权许可者除外。三，恢复光绪帝的改革方案，在各国批准后执行。四，让各国划分利益范围，指派代表控制其势力范围内各省督抚的行动。……

对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上述计划可使现有的机器保持运转，避免无政府状态，有利于进步，并可获得中国人中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另一个选择是推翻清朝，由帝国进行正式瓜分，这是一个长时期和包含痛苦磨擦的过程。按照我上述的方案，各国可有时间酝酿他们的政策，推动逐步的改革，这比公开的或暴力的吞并所希望获得的利益，要更为广泛。利用中国人治理中国人要容易得多，而用相反的办法，则不可能达到目的。^①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丁韪良也参与了抢劫活动。据丁韪良自己说，慈禧太后带了宫廷人员从西边城门逃走后，“有一半居民放弃了他们的住所，向城外逃走。由于他们仓皇逃跑，他们的衣橱里塞满了值钱的皮货，地板上撒满了最华丽的绸缎，有些地方满地都是银锭。多么诱人去抢劫啊！”他还说。

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

^① W. A. P. Martin: *Siege in Peking*. 第145—147页。

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批粮食搬装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喊叫店主，告诉他在把帐单送到时，我会付给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是我自己的回声。……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拿出来公开拍卖。……我很荣幸在他们蒙受的责难中我也有份，我承认自己与他们一样有罪，虽然我侵吞为我个人使用的唯一物品是一条羊毛毯。^①

使馆被围解除后，丁慧良在转道上海乘船回美国时，于九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新天安堂发表了一次演说，仍然主张必须放逐慈禧，扶植光绪，并且还补充了如下意见：

若能有一个由外国官员组成的强有力的委员会来指导这位年青的皇帝治理中国，和平和秩序就可恢复。象目前这样的暴乱，必须采取预防的措施。为此目的，就必须解散中国军队，接收所有的兵工厂或加以摧毁。当你抓到了这只老虎以后，就必须拔掉它的牙齿，斩断它的爪子。^②

丁慧良从上海上船，于十月二十三日回到美国。他上岸时有意穿上他在北京使馆被围期间的那套衣服，并且背上丁他在北京射杀义和团的毛瑟枪。丁慧良写道：

我穿了在北京被围时的那套衣服到达纽约。我儿子到码头来接我，但跑错了路，于是我雇了一名脚伕帮我拿行李，因我背了一杆步枪，那人就问我：“你一定到什么地方打

① W. A. P. Martin: *Siege in Peking*. 第131, 135—137页。

② *North China Herald*. 1900年10月3日, 第729—730页。

猎去了。”我说：“是的，到亚洲，在大海那头。”“是哪一种游猎？”他问道。“打老虎，”我答道。——我本应说是打猎狗。^①

丁魁良这次回到美国后，利用演讲、发表文章大肆攻击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并且公然提出美国应该占领中国领土海南岛，并胡说这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而是美国领土“自然的延伸”，请看他亲笔写的自供状：

假如让我在中国境内挑选一个任何地方以代替战费的赔偿，由中国割让给我们一个“立足点”，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与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它只有西西里岛的一半大，但在出产方面可能是同样富饶。那样，我们就有一个踏实的基地，使我们在有关中国前途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拥有发言权。六十年前英国要求香港岛，并不是为了掠夺土地。它所要的是一个根据地，一个转动世界的支点。对我们来说，为了取得海南岛面进行谈判，也不是越理非分的侵略。（原文粗体字）……

对于帝国主义这个谩骂式的称呼，我是很少同情的。但是，自然的扩张和发展，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美国应当象英国一样，不因惧怕发展而放弃她光荣的卓越地位。……

我们将领土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并将我们的势力扩展到日本和中国，这是由于自然的延伸。……在中国，直到目前，我们的政治影响一直不够显著，但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出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任其消逝，而不加利用。在我看来，我们并不需要大块土地作为我们的立足点。如果一个海岛不够称心的话，再有一个大陆上的海口就可满足我们

^① W. A. P. Martin: *Siege in Peking*, 第1页，并附照片为证。

的需要了。也就是说，有了一个作为我们海军舰队的避风港，一个驻防阵地，使我国军队为了反对某个贪欲的国家企图吞并中国时，或是为了镇压另一次象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反对文明世界的暴动时，有一个集结的所在。^①

以上是丁韪良一九〇〇年在美国出版的《使馆被围目击记》一书中发表的狂言。他后来在一九〇七年写的《中国的觉醒》一书中，竟然还说满族是一个异族，能够统治中国好几百年，那么，欧洲列强肯定能够照样做到这一点。^②丁韪良甚至说，与其英国从一八四二年就管制中国，不如让中国仍然保持独立更好些。^③此外，丁韪良还在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九日的美国《纽约时报》上，刊载了他写的一封公开信，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赔款和惩办恣愿义和团的各级官员，坚持外国军队长期占领北京等。丁韪良在对待义和团运动的态度上，充分暴露了他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侵略者的嘴脸。

重操旧业当传教士

一九〇六年，先后自北京和武昌的国立大学退出返回美国的丁韪良，已经七十九高龄了，但他仍要求长老会差会部派遣他到中国去当传教士，长老会批准了他的请求。但是只能作为一个“名誉传教士”去中国，不发工资，可根据他自己的力量自行安排传教活动。

丁韪良这次来到北京，有他历年从清政府领到的优厚俸给，

① W. A. P. Martin: *Siege in Peking*. 第152—157页。

② W. A. P. Martin: *The Awakening of China*. 第22页。

③ Ralph Covell: *W. A. P. Martin*. 第243页，注39。

使他不用为安度晚年而发愁。他又重操旧业，开始了传教士生涯。

他在北京除了传教外，还应邀到处去演讲，并完成了英文《中国的觉醒》一书，于一九〇七年出版。接着，他又撰写《中国革命的历史》一书，但没有出版。据说这部书的稿子已经散失，但当时丁韪良的观点是把袁世凯称作“中国的君士坦丁”。袁世凯倒台后，他的儿子袁克定每周三次到丁韪良家中听课，由丁韪良教授国际法、《圣经》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①

一九〇七年，丁韪良到上海出席基督教来华传教百年大会。一八七七年和一八九〇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曾在上海举行过两次全国会议，丁韪良都送去了论文，但未能出席。一九〇七年这次会议，使他有会机会会见许多在华活动的传教士，交流侵华经验，回顾他在中国五十七年的经历。会上，他提出在中国如何发展基督教势力的主张，并且妄论对中国政局的看法。他鼓动说：“我赞成基督教国家应有重兵驻在中国，……如果没有这样的驻军，我们作为基督教徒就不可能在此开会。”^②他又吹嘘说，传教士在中国是一股“道德的势力，中国政府是不能够等闲视之的”。他诬蔑中国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只有接受西方用大炮送来的基督教文明，才能进入世界文明国的行列。^③

会议结束后，丁韪良回到北京，因年事已高，除了在教会做些传道工作外，只参加少量的社会活动。在他八十岁生日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及一部分美国教育界人士约六十余人，送给他一面锦旗，表彰他在中国活动的功绩。那天，他还兴致勃勃

① Ralph Covell: W. A. P. Martin, 第262—263页。

② Records of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1907), 第753页。

③ Ralph Covell: W. A. P. Martin, 第264页。

地骑驴子到北京西山去旅游。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丁韪良因患肺炎在北京寓所去世，终年八十九岁。黎元洪总统派他的秘书去参加丧礼，美国驻华使馆人员也参加了丧礼，并且派了八名士兵护卫他的殡车，直到坟地。丁韪良被葬在北京西门外的外国公墓里，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国六十六年的活动。^①

丁韪良的英文著作主要有：《花甲忆记》、《北京被围目击记》、《中国的觉醒》和《震旦论丛》等书；中文著作以《天道溯源》一书销数最多，另外就是他得以踏入清政府、官至二品顶戴的敲门砖译作《万国公法》，和以后与他人合译的几部有关国际法的书。一八七二年八月，丁韪良与在京传教士艾约瑟等合作，曾经创办过一份科技杂志《中西闻见录》，这个刊物出到一八七五年八月，因人员离散和经费困难而停刊。

^① Ralph Covell. W. A. P. Martin. 第266页。

傅 兰 雅

(John Fryer, 1839—1928)

傅兰雅是英国传教士，他以向中国翻译介绍大量科学技术书刊而著名。傅兰雅于一八三九年八月六日出生在英国海德城一个牧师家庭，早年在海德中学念书，后入布里斯托尔港的圣雅各书院，不久获得政府一等奖学金，以后又考入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读书，一八六〇年大学毕业。

傅兰雅在少年时代因受家庭影响，渴慕到中国。他母亲还经常煮大米饭给他吃，让他以后能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傅兰雅在中学时代在父亲的宗教教育影响下，受洗加入圣公会为教徒。在大学时代，他决意毕业后到中国去传教或办教育。

早期在华的教育和出版工作

傅兰雅在大学毕业后接受香港圣保罗书院的邀请，在一八六一年初乘船离开英国，同年八月抵达香港，就任该书院的校长，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圣保罗书院属于英国圣公会，傅兰雅被聘用后即为该会的传教士。他除负责校务外，还兼教英语。圣保罗书院的学生来源多数为香港、澳门及广东省籍的穷苦儿童，中国近代外交家之一的伍廷芳，即为该校毕业生。

一八六三年，傅兰雅为了学习北京话，了解京城的政治社会

情况,接受了同文馆的邀请去当教习,辞去了圣保罗书院校长的职务。他在同文馆每天授课两小时,主要教英语,年俸为一千两银子。

一八六五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聘到同文馆接替傅兰雅,任英语教习。傅兰雅随即南下到上海,接受新开办的英华学堂的聘请,担任校长。他任此职三年多,到一八六八年五月辞职。

开设英华学堂的主要目的,是招收有钱人家的子弟,到校主攻英语,以适应外国侵略者日益加强的对华经济侵略,和中国洋务派兴办工业的需要,这可能是第一所在华正式教授英语的教会学校。

一八六五年,英华学堂校董会开会,作出办学方针的几条重要决议:“一,今后主要致力于招收商界子弟,学校要自养。二,将要认真教授英语。学生在校期间,如果英语熟练,条件许可,还可对其他课程进行用英语教学。三,在有能力的本地教员教导之下,学生仍继续学习汉语。四,所学习的宗教信条,必须同英国教会的教义相一致,但在教学当中不要把宗教过分突出。”^①

同年七月十二日,英华学堂在上海英文《北华捷报》上登载招生广告,内称:

“目前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往已很频繁,要尽可能促进和发展这种交往,这是极为重要的。考虑到英语教学将会是高度有利的,有许多人表示为此目的希望能学习英语,但迄今还缺乏机会。因此,在沪外侨决定在英租界内开设一所高标准的、有才能的和有效管理的学校。……学费和书簿费每年收银五十两,先付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865年7月12日。

后学。招收十至十三岁的男生，在校学习七年。”^①

傅兰雅接受英华学堂的聘请后，就按照校董会四条决议的精神，先招收十名富家子弟，分成日夜两个班级开始上课。校董会本由旅居在沪外侨代表组成，但却受到英国圣公会控制，硬要傅兰雅加强对学生的宗教灌输，而傅兰雅则根据校董会不突出宗教的规定行事，双方发生了矛盾。圣公会的传教士们先是对傅兰雅施加压力，傅兰雅不予理会，仍以英语教育为主；教会方面接着就对他采取排挤打击，并诬指傅兰雅“太世俗化”，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是否还要继续当这个有名无实的校长职务。

当时摆在傅兰雅面前有四种选择：一，当一个名副其实的传教士，听从圣公会的摆布，加强对学生的宗教灌输，改变校董会的初衷。二，可到上海广方言馆当教习。三，可到上海租界工部局当翻译。四，可接受江南制造局的聘请当翻译。傅兰雅正在考虑之际，圣公会扬言对傅兰雅是否能当一名传教士表示怀疑。到一八六八年，英华学堂的行政大权事实上已全部落入圣公会当局的手里，迫使傅兰雅于五月二十日正式向校董会提出辞呈，经批准后，他愤然离开了英华学堂。

傅兰雅担任英华学堂校长任内，还兼任中文《上海新报》编辑。《上海新报》是一八六一年由英商字林洋行创办的中文报纸，与英文《北华捷报》为姊妹报，首任编辑为美国传教士华美德，从一八六六年十一月起改由傅兰雅兼任编辑。《上海新报》为隔日刊，新闻大部分从英文《北华捷报》(周报)以及从一八六四年创刊的英文《字林西报》(日报)译出，同时还转录《京报》的部分内容。《上海新报》载有不少有关太平天国史料，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傅兰雅曾在该报发表过一些时论。例如一八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865年7月12日。

六七年三月就曾向清政府建议,选派二十岁以下的优秀少年,学习三年外语,然后派遣出国接受大学教育等。

这时,傅兰雅已在中国住了七年,对中国的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他在一八六七年写给在英国的一位朋友的信中,曾流露出对中国进步的关切: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用全速发动竞赛,要看究竟何国将称雄于世。日本最近已可听到斗争的声响,开始紧跟在别国之后参加竞赛。中国在今年刚从一个很长很长的睡梦中苏醒过来,看到了远远在她前头的优胜者,使她经历了激烈的斗争,终于行动起来参加这个竞赛。中国必须全力以赴,否则就会远远抛在后头。”^①

傅兰雅本着帮助中国全力以赴参加同世界各国竞赛的信念,在辞去英华学堂校长职务后,接受了到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的聘请。

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二十八年

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经营的新式军工企业,由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一八六五年成立。一八六七年,曾国藩派徐寿、华衡芳等到江南制造局任职,命他们选译西方的科技工程书刊。徐寿与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传教士,包括傅兰雅,本有往来,曾请他们翻译一些书籍。徐寿还多次到字林洋行拜会傅兰雅,请他

^① A. A.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19th Century China. 第16页,1867年3月4日和9日给苏西·约翰逊的信。

设法购买一些英国出版的科技图书和资料。不久，徐寿向曾国藩提请在局内附设翻译馆，曾国藩上奏表示赞同。

傅兰雅除帮助徐寿向英国订购图书外，还曾和他的儿子徐建寅合作翻译《运规约指》一书，甚受徐寿的器重。因此翻译馆成立后，徐寿即推荐傅兰雅到馆任专职翻译，得到曾国藩的同意。

一八六八年五月底，傅兰雅正式受聘于江南制造局，在翻译馆任译员，年俸八百银两。傅兰雅是英国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并不是科学家。他只是懂得当时英国大学程度的一般数理化知识。在中国七年期间，他基本上掌握了汉语。他参加江南制造局的动机，是要摆脱圣公会上海教区某些同行对他的压制，不再领取教会的俸给，但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于外国在华传教活动仍然是关注的。

傅兰雅进翻译馆工作后两个月，在给叔父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已获得了一个新的翻译职务，为中国政府翻译科学书籍。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开心过。”信中还写道：“我立即开始学习和翻译三个专题，上午学习和翻译关于煤和煤采掘的具体知识。下午钻研化学。而在晚上则研习声学。”^①这表明，傅兰雅对担负这项新的工作，是心情愉快的。他一边学习，一边进行翻译，把业余时间都用上了。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的方法是：“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

^① A. A.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19th Century China. 第23页。

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斲,其讹甚少,而文法甚精。既脱稿,则付梓刻板。”^① 华衡芳也证实此点,他在《代数术》的序言中,写道:“傅君口述之,余笔记之,一日数千言,不厌其艰苦,凡两月而脱稿,缮写付梓,经手告成。”

不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又增聘金楷理、伟烈亚力等传教士,参加一部分或全部译书工作。一八六九年,上海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后,又聘林乐知半日教习,半日译书。金楷理在江南制造局工作了九年,伟烈亚力八年,林乐知十年,傅兰雅时间最长,达二十八年。他几乎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是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度过的。

傅兰雅入馆工作一年之后,对翻译科技书的业务逐渐熟练。他感到这项工作对帮助中国社会进步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要素。他在写给一位英国友人的信中,说:“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可大有希望成为帮助这个可尊敬的古老国家向前进的一个有力的手段。能够使这个国家跨上向‘文明进军’的轨道,是外国人都一般地乐于夸耀的。”^② 为此,原来傅兰雅与江南制造局签订的合同一年期满后,又签订了继续工作三年的合同。

广方言馆自一八六九年并入江南制造局后,傅兰雅还增加了为该校编译教材的任务。他工作和学习都非常勤奋,在写给在英国的叔父母的信中,说:“因我只是一个受过普通教育的人,所以我必须非常用功学习,才能胜任我的工作。”^③ 到一八七一

①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2章。

② A. A. Be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19th Century China. 第24页。

③ 同上书,第25页。

年合同期满，江南制造局对他的工作甚为满意，希望他能连任。为此，他又同局里签订了继续工作三年的合同；到一八七四年六月期满后，又连续签订了几次合同。傅兰雅热爱此项工作，并且在中国和外国已经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一八八〇年，他在编写出版的中、英文两种版本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书序中，说：“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业十余年，远近诸君几若共闻。然其中本末裨益，尚有未详知者，屡承顾问；且常有西人书缄频寄，讯此馆之源流，问译书之理法，究察所用各物之名，访求所译西书之目。……因自备资斧，印成此书，分送于西国朋友并乐传格致西人。然书为西文，华友不便披览，……故不惮劳悴，灯下译成，附于汇编，供诸同好。余居华夏已二十年，心所悦者，惟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耳。”^①

傅兰雅在这本书中介绍了翻译馆成立的经过，译书的方法，译书的益处，已译及出版的书目等。同时说出了他所以要辛勤从事这项向中国介绍西方科技的动机，即：“惟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耳”，这是难能可贵的。他已在过去十余年实践了他的许诺，又在以后的岁月里坚持不懈地向中国介绍外国日新月异的知识。

傅兰雅在这本书中论述译书的益处时，写道：“可见中国多年旧习，必赖译书等法始渐生新。”他希望中国人能了解此举必有益于中国，因“学术一道，不在一国一邦，故虽视西人为夷狄之邦，亦乐学其有益于中国之事”。他要求中国能变通考取人才的办法，因中国一向“以经史词章为要，而格致等学置若罔闻。若今西人能详慎译书而传格致于中国，亦必能亲睹华人得其大益。虽不敢期中国专以西学考取人才，然犹愿亲睹场中起首考取格

^①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序。

致等学，吾其拭目望之矣。”傅兰雅在这本书中，还表达了他之所以辛勤译书的一点心愿，即：“西人常居局内，专理译书，故人远处，无暇往来；而且水土为灾，不胜异乡之感，终朝一事，难禁闷懣之怀。然而多年敏慎，风雨无虚者何也？盖以为吾人于此分所当耳。况上帝之意，必以此法裨益中国，安可任意因循，违乎天耶！是故朝斯夕斯，忍耐自甘，所以顺天心耳”。^①傅兰雅与当时在华的某些传教士成天忙于妄图变中国为某某等国的殖民地而空喊什么变革是有区别的。

傅兰雅还有一个想法是与某些传教士不同的，他认为“欲教华人，必仍用华语，所用之书亦须华文”。他已改变当初主持上海英华学堂时的一般传教士的看法，“以为欲俾华人得益，必先教以西文”。他发觉不少送往外国的留学生，回国后并没有发挥作用，这批留学生“至回国时，则不想传授同邦，惟以所学者为资本，赖以致富。……借令回国生徒能热心传授华人，亦难比译书更有益于华人”。他亟欲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自主之大国”，也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大国，他说：“况中国书文流传，自古数千年来未有或替，不特国人视之甚重，即国家亦赖以治国焉。有自立之大国，弃其书文而尽用他邦语言文字者耶？若中国为他邦所属，或能勉强行以西文；惟此事乃断不能有者，故不必虑及焉。”^②

在选译何种书籍上，傅兰雅与清政府的意见不同。清政府“令特译紧要之书，如李中堂数次谕特译某书等”。他们所谓紧要之书，是指专译直接与军工生产有关的书，而傅兰雅的意见是“本欲作大类编书”，“以西国门类分列”，即应比较有系统地翻译“更大更新”的基本科技知识，特别是想把《大英百科全书》全部

①②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3章。

翻译成汉文。但是，傅兰雅既受雇于清政府，只得“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进行翻译，有些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必须先为译出。因此，免不了“所译者多零件新书”。

在翻译科技书的过程中，最难解决的是科技词汇的翻译问题，傅兰雅为此与中国同事们多次商议，确定了两条原则：一，中文已有之名，不论是民间约定俗成或先前所译者，只要合用就沿用；二，中文尚无译名者则采用音译法或加偏旁造新字，如镁、矽、铈等元素，都是新造的字。中国近代科技词汇，有大量的傅兰雅与中国合作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陆续确定的，并为此编纂好几部汉、英或英、汉对照的科技词汇的工具书。

在译书的过程中，傅兰雅与中国合作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工作中经常彼此商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翻译水平和科学知识。同傅兰雅先后合作翻译的中国科学家，有徐寿、徐建寅（徐寿之子）、华衡芳、王德均、贾步纬、赵元益、丁树棠、江衡、周郁、应锡祖、汪振声、钟天纬、徐华封、俞世爵、范本礼、钱国祥、潘松、徐家宝、王树善、王季烈、程瞻洛、栾学谦等人。傅兰雅与徐寿一家人感情最为密切，他曾称赞徐建寅是“我所遇见的最聪明的中国人，我同他相比，在许多方面我只不过是一个幼童而已”。^①他对前期曾在翻译馆工作过的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也夸奖备至：“想中国有李君之才者极稀；或有能略与颀颀者，必中西广行交涉后，则似李君者庶乎其有”。^②

① A. A.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19th Century China. 第28页。

②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3章。

从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九六年的二十八年里，傅兰雅和他的合作者向中国翻译介绍了不少种类和相当数量的西学书籍，还通过他所编译出版的期刊，做了大量科学普及工作。他们翻译的代表作有：

数学方面，《代数术》、《代数难题解法》、《代数须知》、《微积溯源》、《微积须知》、《运规约指》（即实用几何学）、《三角数理》、《格致书院西学课程数学课题》等。

物理学方面，《声学》、《光学须知》、《电学》、《重学须知》（即机械原理）、《力学须知》等。

化学方面，《化学鉴原》、《化学考质》（即定性分析）、《化学求数》（即定量分析）、《化学须知》等。

军工方面，《水师操练》、《防海新论》、《轮船布阵》、《行军测绘》、《西国陆军制考略》等。

矿物学方面，《矿石图说》、《矿学须知》、《开煤要法》等。

冶金学方面，《宝藏兴焉》（即实用冶金学）、《铸金略论》等。

医学方面，《治心免病法》、《儒门医学》（即医学手册）、《西药大成》、《法律医学》、《通物天光》（即爱克斯光诊断）等。

科技工具书方西，《金石中西名目表》、《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汽机中西名目表》等。

此外，傅兰雅还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编《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共出一百零八期。梁启超介绍说：“《西国近事汇编》最可读，为其翻译西报实事颇多也，自同治癸酉起译至今，然自壬午以后，无刊布之本，实可怅恨。译出以活字排版排印送总署南洋海关道各一份而已。”^①

有必要指出的是，傅兰雅与他的合作者辛勤劳动的翻译成

^①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

果，江南制造局并不重视，使用率很低，外单位购买者也甚少。如《防海新论》一书出版后，十年内仅售出一千余册；《开煤要法》十年内售出还不到一千册；其他各书印数既不多，销售面也极为狭窄。只有用作广方言馆的教科书，因教会学校也采购应用作为教材，才有一些销路。傅兰雅对此常感到难过和失望，他写道：“然则中国人数尤多，若以书数与人数相较，奚啻天壤。惟中国邮递之法，尚无定章，而国家尚未安设信局，又未布置铁路，则远处不便购买。且未出示声明，又未分传寄售，则内地无由闻知，故所售之处尚为甚少。”

当然，除傅兰雅所述原因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选题狭窄及偏专，是其原因之一。军工方面占相当比重，但江南制造局在军工生产中解决技术问题，却主要依靠外国工程师彭他、柯尼施、梅因兰、史蒂文森等人。而附设的技工学校只是培养一般的熟练工，对傅兰雅所译之书使用率自然就低下。虽然所译被认为是“紧要之书”，但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傅兰雅所译之书，特别在后期，属于一般科技知识的书，也出版了一批，但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太少，过去从未接触过科学书籍，如果无人指点或进行一些实验，也难以弄懂，再加上当时士大夫一般都自命不凡，对西方的科技知识不屑一顾，这是经常萦怀在傅兰雅心头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但这并不是说，傅兰雅与他的合作者翻译的书没有价值，试以他们所介绍的物理学为例：电学方面，一八七九年出版的由傅兰雅和徐建寅合译的《电学》一书共有十卷，向中国介绍了电学的研究对象、概念及有关规律，提出了电学发展各个阶段的线索，列举了著名物理学家吉尔伯特、富兰克林、伽伐尼、伏打、奥斯特、法拉第等人对电学的贡献。热学方面，一八九〇年出版的

《热学图说》一书共两卷，第一卷论热性，第二卷论热力，对物体吸收热量的现象，用分子运动的理论加以阐述，并对热功当量作了介绍。在光学方面，一八九〇年出版的《光学图说》一书共两卷，对于探讨光的本性的两种学说，都作了介绍：“格致家论光之性有二：一为直发，一为浪动。第一性之理，凡发光体，光亮自质点出发，恒行直线，而遇人目，或进入目，令人能觉能视。第二性之理，群拟天空之中，与各体微点之内，均有一种极稀极轻流质，西名以脱(以太)发光体，能使此以脱震动，周围冲成微浪，谓之光浪。光浪遇人目，即感动脑气筋而使见，此即浪动之理。”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大批译著，对当时中国社会是产生影响的。首先，在创办军工企业和引进西方科技的过程中，产生了象徐寿、徐建寅、华衡芳、应祖锡等一批近代科学家，他们中多数曾与傅兰雅合作译书，在翻译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声、光、化、电和军工、矿冶等西方科技知识，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的造诣。

例如，徐寿是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化学理论和实践的前驱。他与傅兰雅合作翻译的《化学鉴原》，及其续编、补编等书，是当时最完整地把化学这一门学科向中国作介绍的，此外还翻译过其他重要的科技著作，和华衡芳等制造过中国第一部蒸汽机和轮船。他的一生，“无谈星命风水，无谈巫覡评纬。其见诸行事也，婚嫁丧葬概不用阴阳择日之法，四时祭祖专奉先祖而不祭外神，治丧不用僧道旌醮以及乐工鼓吹，营葬不用堪舆家言。居恒与人谈议，所有五行生克之说，理气肤浅之言，绝口不道，总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①

这批新式的科学家，显然具有完全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知识素养。他们不仅有丰富的近代科技知识，而且在政治观点和

^① 程芳：《徐玉村先生像序》。

哲学思想方面，都有新的突破、新的见解，对当时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进行了冲击。

其次，江南制造局的译著，对中国思想界也是有影响的。中国近代思想家因受传统儒家理论的极深的影响，只注重于抽象的综合，因袭于梁启超所说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旧观念，从来不探究自然科学。由于江南制造局的译著引进了许多西方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一些爱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就急于想一探西方的究竟。但使他们转变的，却不是学习西方的技艺，而是极取政治的营养，以图自强。

中国近代著名改革家、思想家谭嗣同，就曾读过江南制造局出版的翻译书籍。他边读边作笔记，还写了一些有关的文章。一八九三年，谭嗣同到上海参观访问时，曾应傅兰雅邀请，到格致书院访问，傅兰雅带他参观了陈列的化石标本、照相器材和其他实物，同时回答了他提出的许多科技方面的问题。他又到江南制造局及其他洋务企事业去参观学习，临回湖南前，购买了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大部分翻译作品。

谭嗣同写的一篇论文《以太说》，和他写的哲学著作《仁学》内所引用的“以太”概念，就是从傅兰雅译的《治心免病法》一书中来的。“以太”本是十九世纪西方一度流行的科学名词，当时西方科学家认为“以太”是一种存在于原子之间的、不可称量的精微粒子，以此来解释物理现象。这个假定，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以太”是根本不存在的。谭嗣同曾把这个虚无的“以太”，放入他的哲学体系中去。^①

谭嗣同在接受江南制造局西书影响之后，很有感慨地说过：“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已腐臭，

^① 《王寅新民丛报汇编》，第879页。

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①他在湖南特别宣传应当学习西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免于危亡。一八九八年二月，他在长沙南学会讲学时称：“深愿诸君都讲究学问，则我国亦必赖以不亡。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电、图、算，皆是也。”^②

中国近代另一位著名改革家、思想家康有为，早在一八七九年游历香港时，就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一八八二年，他路过上海，欲究西方国家进步原因，精心研读各种西书译本及报纸，同时购买了江南制造局所有的译书，带回广东认真学习。

某些外国学者认为，一八八五年傅兰雅与应祖锡合译的《佐治刍言》，对康有为影响较大。梁启超介绍该书道：“《佐治刍言》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穷源，论政治最通之书。”^③

《佐治刍言》原名为 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nance，中译本译名是确切的，由英国爱丁堡一家出版社出版，为英国人钱伯斯兄弟所主编的教育丛书中的一本普通的书，原作者不明。全书共分三十一章四百七十七节。开头有一个总论，前六章叙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处世之道，从第七章以下论述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和外贸等法则。综观全书，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掩盖阶级压迫与剥削，要求被统治者“无论所遭境遇，或为安乐，或为忧患，皆当使一己之身体与一己之性情，随所遇而淡然安之”。

① 《谭嗣同全集》，第181页。

② 同上书，第403页。

③ 梁启超：《谈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

《佐治刍言》的原作者，所以要把资本主义社会加以美化，其目的显然是要使资本主义“万岁”下去。但是康有为写的《大同书》，则在控诉了“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的多灾多难的人世间之后，幻想用“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形界”、“去家界”、“去产界”、“去乱界”、“去类界”、“去苦界”，以建立一个虚幻的“大同世界”。康有为阅读了《佐治刍言》一书，并不等于采纳了该书的观点和主张，某些国外学者作了一些类比，是牵强附会的。^①

创办格致书院、格致书室与《格致汇编》

格致书院 傅兰雅于一八七四年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磋商，拟在上海创办一个科普机构，并请英领事出面倡议和发动募集捐款，得到麦华陀的赞许。同年三月十二日，上海英文《北华捷报》登载了由英领事麦华陀署名的倡议书。^② 同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傅兰雅主持召开了筹备会议，出席者有英美传教士、中外商人、报馆记者和英领事馆人员。^③ 会上提出了创办格致书院的计划和设想，打算先设立一个阅览室，陈列科普书刊，供华人任意入内阅览。但是，某些传教士提出要在阅览室内陈列宗教书刊，傅兰雅对此竭力反对。他认为，这种做法不好，可能

① 参看薛君度用英文写的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 *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 Kang Yu-wei, Reformer and Utopian, 1867-1927*, 第507—513页。薛公度把《佐治刍言》原书名末一字写错，他主要摘引了莫斯科1959年出版的齐赫文斯基写的论康有为一书中的有关论述。

② *North China Herald*. 1874年3月12日，麦华陀致《北华捷报》的一封信。

③ 同上书，1874年3月26日。

造成中国人同西方人疏远,只有通过共享科学领域的成果,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① 辩论结果,多数赞成傅兰雅的意见,格致书院将专门提倡科学,不宣传宗教。会上随即组织了筹备委员会,公推麦华陀(英国驻沪领事)、福勃士(美国旗昌洋行商人兼植物学家)、伟烈亚力(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唐景星(即唐廷枢)(轮船招商局总办)和傅兰雅五人为筹备委员,后来又增补徐寿和徐建寅参加筹备。于是,他们开始向上海中外人士募捐,和加紧筹备工作。

傅兰雅在徐寿帮助下,在当时的英租界福州路元芳花园北首买到一块地皮,开始建屋,除原来打算开辟的阅览室外,又增辟了博物展览室,陈列工艺机械、实验仪器、动植物和化石等标本。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正式开幕,取名格致书院,以推广格致之学为其宗旨。

傅兰雅出任格致书院监督,徐寿为主管,董事会中,除徐寿父子外,还有华衡芳、徐华封、张焕伦、赵元益、王韬、李钟玉等先后被列为董事。傅兰雅于一八九六年辞去监督,徐寿主管院务到一八八四年去世时止,一八八五年起由王韬继任。

格致书院不同于一般洋学堂,初期有些类似科普团体,欢迎任何人入内参观和阅览。在章程里明确规定:“凡各种传教之书,断不可入馆”,“院内存储诸件,惟是推算制造等项书籍及各种机器式样,与设立教堂情形迥别。”

但是,傅兰雅的这般用心,却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来格致书院参观阅览的人不多。三年之后,傅兰雅决定在格致书院内开设一些课程,招收学生来听课学习,于是,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① Richard G. Irvin, John Fryer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第8页。

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招生启事。声称格致书院“可容数百人”，拟开设“西国语言文学”、“格致实学”等课程，学制为三年。并宣布，“本书院于算学、化学、矿学、机器之学，皆有专家。”可是报名入学者人数竟寥寥无几，效果甚微。

据江南制造局的栾学谦在一八九七年所写《格致书院讲习西学记》一文中回顾：“上海之创有格致书院，迄今凡二十余载，原为倡行格致、振兴西学起见。惜阅多年，未获实效。一由于风气未开，鲜知格致之益；一由于经费不充，推广良难；一由于乏名师教授有志诸生。院中西董傅兰雅君每念及此，辄思设法振兴，以求成效。”^①傅兰雅在格致书院附设的讲习班，不久即停办。

后来，傅兰雅根据中国科举制度的特点，于一八八三年“首创考课之举”，聘请“南北洋大臣暨诸海关道宪，按季命题，课以格致论说”。凡是考课成绩优良者，发给奖金或介绍工作。这个办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远近应科士子，动辄百数十人”，按季前来参加格致书院的考课。王韬接任主管格致书院后，对此格外注重，曾延聘沿海各关道四季命题考课。参与命题者有薛福成、盛宣怀、李鸿章、刘坤一、郑观应等人。

经过命题考课，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开始重视西学。他们在参加考课时，“其中虽不乏嘉言说论，然犹属纸上空谈，未必尽有实际。……傅君颇以为憾。”^②傅兰雅后来发现，参加四季征文获奖者，原来至少有一半人是教会学校毕业生，或在校学生。他们的考卷成绩，要比旧式知识分子好一些，空谈也少一些。但他们应试的动机，无非是想获得一笔奖金或谋个一官半职，为此写了一些适合于洋人口味的文章。^③

^{①②} 《皇朝蓄艾文编》第70卷，学术2，第25—26页。

^③ Chinese Recorder, 1896年，第27卷，第142—143页。

王韬主管书院后，四季命题情况有了一些改变，参加考课的知识分子不但多起来，而且外地也有人赶来应试。命题的范围也有所扩大，“书院既以格致名，则所命之题自当课以西学为主，而旁及时事、洋务，然史论亦在所不废。”^① 根据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四年历年课题统计，时事、洋务占百分之六十四，西学占百分之三十一，史论占百分之五，可见重洋务者最多。但这与出题者多为洋务派官僚也有关。傅兰雅曾把历年参加考课的较优作品，汇编成《课艺》刊刻出版。例加在一八八六年出版的《课艺》中，已有对西方议会制的介绍，提出议院“可使上下无壅隔之弊”，“将来欲仿西国议院，直一转移事耳”。^②

到一八九五年，傅兰雅决定亲自到格致书院每周讲学一次。“凡聪颖子弟，有志讲求者，皆许来院肄业”。他编制了六种《格致书院西学课程》：“一矿务，二电学，三测绘，四工程，五汽机，六制造。……从学者凡三十四人，类多好学深思之士，经傅君熏陶琢磨，数月以来，茅塞顿开。计历半载，术业骤进。……迄今考取凭课者，凡二十六人。”^③ 傅兰雅在讲课时还利用幻灯片，亲自做实验示范，使学生易于接受。这次收效较以前有进步。他在《北华捷报》发表文章时说，经过多年摸索，最近一年为科普所作的努力收到了实效，符合当初开办格致书院的宗旨，希望格致书院能“成为在中华帝国传播西学的中心之一”。^④ 格致书院是在一九一一年停办的。

① 《格致书院课艺》戊子年春季，王韬眉批。

② 同上书，丙戌秋课。

③ 《皇朝蓄艾文编》第70卷，学术2，第25—26页。

④ North China Herald. 1896年2月21日。关于格致书院详情，可参阅刘世龙：《清末上海格致书院与早期改良思想》，刊载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第45—52页。

格致书室 用现代汉语表达,格致书室即为格致书店,一八八五年,由傅兰雅在上海开设,专门出售具有“实用知识”的图书和期刊。在一八八六年印行的书单上,共列出三百七十一一种书籍、地图、图解和地球仪等,其中外国作者写的有一百七十五种,中国作者写的有一百九十六种。属于科技范围的书有一百五十三种,傅兰雅和他的合作者编译的,占到四十四种。

到一八八八年,格致书室出售的图书,增加到八百七十八种,其中外国作者写的有六百五十种,中国作者写的有二百二十八种。格致书室后来还在天津、汉口、汕头、北京、福州、香港等地设立分销处。售出的书已达十五万册,书价达一万七千余银元。^①此后,在沈阳、烟台和厦门又设立了分销处。

到甲午战争期间,格致书室在全国的十个分销处销售量激增,但具体数字不详。傅兰雅在离开中国后,格致书室仍是由他当家,直到一九一一年退出。同年六月十一日,上海英文《泰晤士报》评价傅兰雅的格致书室,“是多年来中国学习的麦加”。这就是说,格致书室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渴求知识的“朝圣者”的圣地。^②情况确实是如此。与此同时,由于销售量的与年俱增,傅兰雅也确实逐渐变得富有起来。但是,傅兰雅却并不是一个守财奴。

《格致汇编》 这是由傅兰雅自己出钱、自己主编的一份极为重要的科普期刊,而且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翻译和编辑的。傅兰雅从进入江南制造局工作后,每天都是工作十余小时,从不间断。一八七五年八月,傅兰雅得知原由丁慧良、艾约瑟等在北京办的科普杂志《中西闻见录》停刊的消息后,在同年十一月印

^① Chinese Recorder. 1888年,第19卷,第95—96页。

^② Shanghai Times. 1911年6月21日。

发了一则启事，宣布要在上海创办一个科学刊物《格致汇编》，以满足中国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傅兰雅计划使这本科学期刊图文并茂，介绍西方科技成就，登载科技新闻，评介或摘译西方新出版的科技书籍，普及科学基本知识，同时还收登西方工业产品的广告。原来订阅《中西闻见录》的读者，可以改订《格致汇编》。

《格致汇编》的创刊号，于一八七六年二月在上海出版。除傅兰雅自译、自撰、自编外，还请了一些传教士如艾约瑟、慕维廉、韦廉臣、了畦良等撰写，或编译科普稿件。但傅兰雅从不在《格致汇编》内刊登宗教文章。

《格致汇编》出版至一八七七年第二卷后，曾停刊两年。这是因为他回英国度假，一八七八年在英国时还曾一度担任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的秘书，一八七九年回中国后复刊。本为月刊，一八九〇年起改为季刊，其间时有中断。到一八九二年正式停刊。

梁启超对《格致汇编》的评价是，“格致汇编，前后七年，中经作辍，皆言西人格致新理，洪纤并载，多有出于所翻各书之外者，读之可增益智慧。惜当时风气未开，嗜之者终复无几。闻傅兰雅因译此书，赔垫数千金云。故光绪十六年以后，即不复译。今中国欲为推广民智起见，必宜重兴此举矣。”^①

傅兰雅创办格致书院、格致书室和出版《格致汇编》，都是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自筹资金办的科普事业，在徐寿等中国科学家的大力支持下，为在中国推广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栾学谦说：“然傅君常以传授格致为己任，自信责由天委，苟不遵道而行，是违天也。旅华三十余载，此心未尝

^①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

稍变，以故屡思良法以振兴之，其于格致书院讲西学，特一端耳。”^①

格致书院、格致书室和《格致汇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可能是多层次和多方面的，因为通过这些形式的科普工作，大大冲击了中国传统的“重义理、轻艺事”的偏见，扩大了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视野，使他们原来的价值观动摇了，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环境中求变图强，向西方学习倡行新政的时代潮流逐步汇成。傅兰雅在十九世纪末高兴地看到了中国“经历了激烈的斗争而终于行动起来”，参加了走向进步的“竞争”。他的这些科普工作，是起了一定推动作用的。

在益智书会和中华教育会的兼职工作

一八七七年五月，上海举行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会上通过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后对外称益智书会。傅兰雅虽然早已脱离教会工作，但仍被邀请参加大会，并被推举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兼负责干事。同时被推举为委员的，还有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林乐知、丁韪良，德国传教士黎力基，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等。经过几次开会讨论，确定了教科书的编辑方针：

一，最好是编，不是译，文字用最浅显的文理，结合中国的风俗习惯，使中国人易于接受。

二，不仅给学生用作课本，而且教员也可用来进行教学。

三，不仅供教会学校使用，也要着眼于让教外学生使用。

四，最重要的是，不但课本要非常科学，而且要利用每一个

^① 《皇朝蓄艾文编》第70卷，学术2，第25—26页。

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恶、拯救的伟大事实。^① 作出上述规定,是因为这是一个由传教士控制的学校教科书编辑委员会,不是傅兰雅所能作主的。会上还确定,编写出版初级和高级两套教材,初级教材由傅兰雅负责,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当时推举傅兰雅任干事,是因为他与中国官方比较熟悉,不论募捐或印刷出版,都必须借重他。

傅兰雅在编辑会议上,提出了宗教应与科学分离的主张,但为其他传教士不同意。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明确提出:“科学和上帝分离,将是中国的灾难。”如果实行分离,学生“既不信仰上帝,又不相信魔鬼、圣贤和祖宗”,将使中国陷于“崩溃”,只有把“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拯救中国”。^② 韦廉臣的这些话,是很有代表性的。

为此,傅兰雅在一八七九年益智书会举行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辞呈,不再当负责干事和委员。经他们一再挽留,他答应只负责编写非宗教性的教科书,同时建议应把教科书分为两大类:非宗教的与宗教的,两者不要混同,以便使中国读者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他的这个建议又被否决。当讨论到还缺少三千两银子经费时,与会的传教士们又请傅兰雅帮忙,他答应了。^③

到一八八六年为止,益智书会共出版一百零四种教科书,傅兰雅编写了其中的四分之一,有十二种是科学方面的,五种附有手册的科学知识挂图,八种为科学须知。这些图书,全部为基础科学,供初学者学习。傅兰雅编的这些课本和挂图,被教会学校

①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附录 E, 第 712—719 页。

② 同上书,第 519—531 页。

③ Chinese Recorder, 1879 年 10 月,第 468—471 页。

普遍采用，对于普及科学知识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一八九〇年，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决定把原来的益智书会扩大改组为中华教育会，把教科书工作作为教育会的活动之一。傅兰雅再次被邀请参加大会，并且被选入中华教育委员会为委员。

从一八九三年起，傅兰雅还兼任上海英文《教务杂志》教育栏编辑，另一美国传教士福开森为助理编辑。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中华教育会一致推举傅兰雅为执委会主席，主持教育会工作。他主持编辑和出版了英文《中国教育指南》一书，这本书已成为研究十九世纪末中国教育状况特别是教会学校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甲午战争之后，傅兰雅对中国的看法，在他一八九六年一月发表于英文《教务杂志》上题为《一八九六年教育展望》一文中，有所表露。他写道：

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以及宗教和政府的形式，早已在天平秤上显出了非常的不足。怎样把中国从目前日本的魔爪和可以预见的西方列强的支配中拯救出来，已经开始成为人们急切要解决的问题。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简而言之，中国已从长期沉睡中苏醒过来，可是她发觉自己正被迅速地冲向一个大瀑布，除非用最大的努力、毫不迟疑地拯救她自己，否则就一定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灭顶之祸。……不难看出，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

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危急。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传教士的教育和训练工作，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因素。中国没有基督教是不行的，她也不能把基督教拒之于门外。基督教必须胜利。中国如要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要求摆脱压迫者的压迫而获得自由，那就必须把智力培养和基督教结合起来。^①

这是傅兰雅在即将离开中国前的一篇反映他当时对中国看法的重要文章，他受到时代的局限，不可能提出一个真正能拯救中国的方案，他几乎用了他大半生的时间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学，但最终还是提出科学必须与宗教结合，才能从日本和西方列强的支配中拯救出来的主张。

晚年在美国

一八九六年，傅兰雅辞去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职务，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东方语言文学教授。^②早在一八七二年，清政府已授予傅兰雅三品官衔，一八九九年，清政府还颁给他三等第一双龙勋章，以表彰他长期在华介绍西学的功绩。傅兰雅的高华，自然使他的许多中国同事和朋友们感到惋惜，他们都希望他继续留在中国。但他说他已近花甲之年，美国方面很希望他去主持中国学的教授工作，以便培养一批了解中国文化的高级人才。在高华之前，傅兰雅把格致书院的教学任务，交给栾学谦、陆仁堂。他到美国的第二年，王韬不幸去

① Chinese Recorder. 1896年1月，第36—37页。

② 1941年《学林》第8辑载称，傅兰雅到芝加哥大学教书是错误的。许多文章都引用了这段资料，实际上他是到加州大学教书，并没有去芝加哥大学。

世，格致书院的主管改由赵元益负责。一九一一年，格致书院停办后交由租界工部局接办，改称致格公学，即今格致中学的前身。格致书室仍继续经营下去。《格致汇编》已在一八九二年停刊。傅兰雅曾在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兼任过水师学堂的主考官，他还是上海亚洲文会的会员。

傅兰雅到美国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史，日本史，中日语言、文学、政治、法律和社会状况，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中国和日本宗教和哲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言文和官话等。傅兰雅在加州大学虽然教学任务很繁重，但还是常常思念长期工作过的中国，仍然同中国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们保持通信联系。他在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九年的十四年间，还继续为中国江南制造局翻译了十四部书。为了鼓励和帮助中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一九〇〇年傅兰雅还编写了《美国加邦大书院图说》(中文版)一书进行介绍。次年，北洋大学派了九名学生赴美入加州大学留学，特请傅兰雅担任这批留学生的监督，负责安排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这九名学生有八名可查，他们是：王宠惠、王宠祐、谭天池、濮登清、陈锦涛、张煜全、吴桂灵、严锦容。他们到加州大学三个月后，其中一名学生(名字不详)写信回国告状诉苦，把傅兰雅骂了一通。事实上，这位学生可能初次出国，遇到了一些困难而大发牢骚，不能光凭这一封信就贬低傅兰雅的用心。^①一九〇九年，傅兰雅受美国政府教育部门委托，用英文写了一本《接纳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章程》。书中介绍了美国的大学制度、大学招生情况、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情况、建议与忠告、美国各大学一览表等，全书共二百二十一页，对于赴美留

^① 《壬寅新民丛报汇编》，第668—669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第187页。

学生,有参考价值。傅兰雅在加州大学任教至一九一三年退休,改任名誉教授。

傅兰雅在晚年曾以私人名义捐助一些钱,在中国开办盲童学校,并为盲童教育编译了《教育瞽人理论法》一书,由上海时中书局出版。一九一一年三月,傅兰雅捐助六万两银子在上海创办盲童学校,后又捐钱在汉口建立一所盲童学校。一九二八年,又命他的儿子傅步兰在上海再建立一所盲女学校。

据黄炎培回忆,他于一九一五年到美国访问期间,“在旧金山街道电车上,我于人丛中偶然开一声口,一位老翁挤上来向我握手,用中国话表示欢迎,说:‘有事奉商,欢迎先生到我家谈谈’。我随老人去,他自称名傅兰雅,在中国担任翻译物理、化学书几十年了。我回忆他就是上海制造局老辈翻译格致书籍的。那时不称理化,称格致,我初学还读他所译书的。老人说:‘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办法报答中国人民。我看,中国学校一种一种都办起来了。有一种残废的人最苦,中国还没有这种学校,就是盲童学校,因此预命我儿子学习盲童教育,现在他已毕业了,先生能否帮助我带他到中国去,办一盲童学校?’一席谈使我大感动。后来我帮助他在上海曹家渡办成一盲童学校。傅兰雅的儿子傅步兰为校长,教盲童习字、手工,如制藤椅、织毛巾,等等。后来日寇一度陷上海,傅步兰回国。”^①此校后来迁至上海虹桥路,一九四九年后归公立。

在所有能看到的文献中,这是唯一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说出了“我几十年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办法报答中国人民”。多数来华的传教士,都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声称来“拯

^① F. H.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第194页。黄炎培:《八十年来》,第74页。

救”中国人民。他们以白种人的优越感，抱着所谓“白种人的负担”，到中国来指手划脚。似乎只有按照他们的主张，中国才能得救，而结果又是怎样呢？

傅兰雅自一八六一年只身来到中国后，于一八六四年与安娜·罗尔斯女士在北京结婚。安娜·罗尔斯不幸于一八七九年去世。一八八二年，他又娶安娜·纳尔逊女士为妻。傅兰雅退休时已有七十四岁，但仍继续努力工作，并关心中国的进步事业。他后来归化为美国公民，一直在美国生活，一九二八年去世，终年九十岁。

傅兰雅生前最后写的一篇未曾公开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是《我们与改良运动的关系》，写作时间是一九〇九年。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他对清政府搞洋务的最终目的是排外的看法。他说，中国办理洋务的“唯一目的，并不是为了启蒙中国，而是帮助中国了解外国人的一切情况，以便能成功地与他们斗争，最后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①

傅兰雅译书篇目介绍

傅兰雅在三十余年里，单独翻译或与他人合作翻译的西学书籍，共有一百二十九部。其中七十七部在江南制造局出版，占该局出版总数一百六十三部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二，几乎达到一半，其余由益智书会出版。在这一百二十九部书籍中，属于基础科学的有五十七部，应用科学的有四十八部，军事科学十四部，

^① A. A. Be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19th Century China: 第71页。全文未见到，在《加州大学傅兰雅存档》内。

社会科学十部。

在译介社会科学的十部书籍中，有四部是有关国际法的，有关政治经济学、历史、贸易和货币的各一部，介绍美国大学情况的一部，盲人教学法一部。

傅兰雅的译书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一八六八年到一八八〇年。他与合作者已刊成或出售的书共有九十八部，已译成而未刊的书有四十五部，正在翻译的有十三部。^①从品种上看，这个时期翻译以算学测量等书占第一位，共有二十二部，水陆兵法等书占第二位，共十五部，工艺等书占第三位，共十三部，在九部以下的为天文、行船、地理、汽机、化学、医学等书。

第二时期从一八八〇年到一八八五年。傅兰雅与其合作者共翻译了十九部书，其中有十二部属基础科学，五部属应用科学，其它二部。

第三时期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八九年。傅兰雅与其合作者共翻译了十八部书，其中基础科学占十五部。

第四时期从一八九〇年到一八九六年。傅兰雅与其合作者共翻译了四十一部书，其中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相等。

傅兰雅到美国去教书后，又翻译了十四部书，写了二部书。

现将傅兰雅与其合作者的译书篇目，包括英文原著书名、出版地点和年份，按学科开列于下：

军事：

《防海新论》 合译者华衡芳 1874 年出版

A Treatise on Coast Defence by Victor E. K. R.

①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4章。

von Scheliha London, 1868

《营城揭要》 合译者徐寿 1876 年出版

“Fortification”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y
J. E. Portlock 8th edition

《营工要览》 合译者汪振声 1894 年出版

Instruction in Military Engineering London, 1870

《轮船布阵》 合译者徐建寅 1873 年出版

Fleet Manoeuvring by P. Pellow London, 1868

《行军测绘》 合译者赵元益 1873 年出版

A Practical Course of Military Surveying by A.
F. Lendy London, 1869

《开地道轰药法》 合译者汪振声 约 1893 年出版

Dynamiting Employed by Sappers n. d.

《西国陆军制考略》 合译者范本礼 1894 年出版

The Armies of the Great Powers n. d.

《行军铁路工程》 合译者汪振声 1894 年前出版

Military Railways London, 1870

《英国水师考》 出版日期不明

British Naval Examinations n. d.

《俄国水师考》 出版日期不明

Russian Naval Examinations n. d.

《美国水师考》 出版日期不明

U. S. Naval Examinations n. d.

《水师操练》 合译者徐建寅 1874 年出版

Instructions for the Exercise and Service of Great
Guns on H. M.'s Ships London, 1843

《格林炮操法》 合译者徐建寅 约 1874 年出版

Gatling Gun Drill by Franklin n. d.

《炮甲合论》 合译者徐建寅 1880 年前出版

A Treatise on Ordnance and Armor by A. L. Holley London, 1865

《兵船汽机》 合译者华备钰 1894 年前出版

The Marine Steam Engine by R. Sennett London, 1885

《制火药法》 合译者丁树棠 1871 年出版

Gunpowder by Richard and Henry Watts in Chemical Technology vol. 1, pt. 4 London, 1865

航海:

《测绘海图全法》 合译者赵元益 1899 年出版

Hydrographical Surveying by W. J. L. Warton London, 1882

《航海通书》 合译者贾步纬 1871 年出版

Nautical Almanac 1870

《大江图》 合译者王德均 1874 年出版

Charts for Navigation of the Yangtze n. d.

《海道图说》 合译者王德均 1874 年出版

Chinese Sea Directory by Reed 1867

《行船免撞章程》 合译者钟天纬 1895 年出版

Naval Regulations n. d.

《船坞论略》 合译者钟天纬 1894 年出版

Treatise on Decks n. d.

《海塘辑要》 合译者赵元益 1873 年出版

The Practice of Embarking Lands from the Sea
by J. Wiggins London, 1872

采矿:

《矿石图说》 1884 年出版

Mineralogy and Paleontology (Handbook Series)

《矿学须知》 1893 年出版

Mineralogy (Outline Series)

《开煤要法》 合译者王德均 1871 年出版

Coal and Coal Mining by W. W. Smyth London,
1869

《银矿指南》 合译者应祖锡 1891 年出版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Testing and Working
Silver Ores, by C. H. Aaron, 1876

《开矿器法图说》 合译者王树善 1899 年出版

A Descriptive Treatise on Mining Machinery,
Tools and Appliances by G. G. André London, 1877-8

《井矿工程》 赵元益编写 1879 年出版

Boring and Blasting by O. Byrne London, 1870

《求矿指南》 合译者潘松 1899 年出版

The Propsector's Handbook by J. W. Anderson,
1897

《地学须知》 1883 年出版

Geology (Outline Series)

机械与冶金:

《重学须知》 1889 年出版

Mechanics (Outline Series)

《器家显真》 合译者徐建寅 1872 年出版

The Engineer and Machinist's Drawing Book by
V. Leblond London, 1855

《画形图说》 1885 年出版

Aids to Model Drawing by F. C. Richardson Lon-
don, 1880

《画器须知》 1888 年出版

Drawing Instruments (Outline Series)

《汽机必以》 合译者徐建寅 1872 年出版

A Catechism of the Steam Engine by J. A.
Bourne London, 1865

《冶金录》 合译者赵元益 1873 年出版

The Moulder's and Founder's Pocket Guide by F.
Overman 1851

《傅兰雅历览[制铁企业]记略》 合译者徐寿 1874 年出版

Notes on Tour Through Iron Manufacturing Dis-
tricts by John Fryer

《铎板印图》 合译者江衡 1876 年出版

On Photo-zincography by A. de Courcy Scott
London, 1862

《西艺新知》 合译者徐寿 1877 年出版

Modern Arts and Manufactures of the West n. d.

《造铁金法》 合译者徐建寅 1880 年出版

Iron: Its History, Properties and Processes of
Manufacture by W. Fairbairn 1869

《宝藏兴焉》 合译者徐寿 1893 年出版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Metallurgy by W. Crooks
London, 1868-70

《电气镀金略》 合译者周郁 1880年出版

Electro-Metallurgy Practically Treated by A.
Watt London, 1875

《美国铁路汇考》 合译者潘松 1899年出版

The American Railway by T. C. Clarke N. Y.,
1889

《铸金略论》 合译者汪振声 1902年出版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Casting and Founding by
N. E. Spretson London, 1878

《汽机新制》 合译者徐建寅 1873年出版

Practical Rules for the Proportions of Modern
Engines and Boilers by N. P. Burgh, 1864

《造船理法》 合译者徐建寅 译好未出版

Modern System of Naval Architecture by J. S.
Russell London, 1865

《考试司机》 合译者徐华封 1894年前出版

Handbook to the Local Marine Board Examina-
tions by W. H. Thorn, 1871

《工程致富略论》 合译者钟天纬 1894年前出版

Aid Book to Engineering Enterprise Abroad by
E. Matheson, 1878-81

《艺器记殊》 合译者徐建寅 1879年出版

Pocket Book of Useful Formulae for Civi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s by G. L. Molesworth London,

1871

《制机理法》 合译者华备钰 1899 年出版

Mechanical Engineering-Workshop Companion n. d.

《铸钱工艺》 合译者钟天纬 1894 年前出版

Coinage (from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天文与地理:

《天文须知》 1887 年出版

Astronomy (Outline Series)

《地理须知》 1883 年出版

Physical Geography (Outline Series)

《地志须知》 1882 年出版

Political Geography (Outline Series)

《测候气说》 合译者江衡 1880 年出版

A Treatise on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by E.
A. L. Negretti, 1864

《测地绘图》 合译者徐寿 1876 年出版

Method of Conducting a Trigonometrical Survey
by E. C. Frome London, 1862

动植物及农业:

《动物须知》 1894 年出版

Zoology (Outline Series)

《植物须知》 1894 年出版

Botany (Outline Series)

《植物图说》 1895 年出版

Botany by J. H. Balfour

《务农要书简明目录》 合译者王树楹 1901 年出版

Bibliography of Agricultural Reference Works

《农务化学简法》 合译者王树德 1903 年出版

Agricultural Chemistry

《意大利蚕书》 合译者汪振声 1898 年出版

The Art of Rearing Silkworms by Count V.
Dandolo 1825

医学及科学一般:

《全体须知》 1894 年出版

Physiology and Anatomy (Outline Series)

《儒门医学》 合译者赵元益 1876 年出版

A Medical Handbook by F. W. Headland 1861

《西药大成》 合译者赵元益 1887 年出版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 by J. F. Royle
1876

《延年益寿论》 1892 年出版

How to Live Long by DeLacy Evans

《孩童卫生编》 1893 年出版

Health for Little Folks by Mrs. M. H. Hunt N.
Y., 1890

《幼童卫生篇》 1894 年出版

Lessons in Hygiene by J. Johnnot N. Y., 1889

《法律医学》 合译者徐寿 1899 年出版

Principles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 by W. A.
Guy London, 1881

《化学卫生论》 合译者栾学谦 1881 年出版

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 by F. W. Johnston

1859

《通物天光》 合译者王季烈 1899 年出版

X-Ray by W. J. Morton N. Y., 1896

《重学水学气学器说》 1894 年前出版

Scientific Handicraft by J. J. Griffin

《美国博物大会图说》 1892 年出版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Building and Catalogue ed. John Fryer

《治心免病法》 1896 年出版

Ideal Suggestions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 by H. Wood Boston, 1894

数理化及化工:

《运规约指》 合译者徐建寅 1871 年出版

Practical Geometry by W. Burchett 1855

《代数术》 合译者华衡芳 1873 年出版

Algebra by W. Wallace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微积溯源》 合译者华衡芳 1874 年出版

Fluxions by W. Wallace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算式集要》 合译者江衡 1877 年出版

Mensuration and Practical Geometry by C. H. Haswell N. Y., 1863

《三角数理》 合译者华衡芳 1878 年出版

A Treatise on Plane and Spherical Trigonometry by J. Hymers London, 1858

- 《数学理》 合译者赵元益 1879 年出版
Elements of Arithmetic by A. de Morgan London,
1869
- 《代数难题解法》 1879 年出版
A Companion to Wood's Algebra London, 1878
- 《代数须知》 1887 年出版
Algebra (Outline Series)
- 《画法须知》 1887 年出版
Mensuration (Outline Series)
- 《三角须知》 1888 年出版
Trigonometry (Outline Series)
- 《微积须知》 1888 年出版
Calculus (Outline Series)
- 《曲线须知》 1888 年出版
Conic Sections (Outline Series)
- 《决疑数学》 合译者华衡芳 1897 年出版
Probability by T. Galloway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 《算式解法》 合译者华衡芳 1899 年出版
Algebra Made Easy by E. J. Houston N. Y., 1898
- 《数学课题》 1895 年出版
Mathematical Problems
- 《声学》 合译者徐建寅 1874 年出版
Sound by J. Tyndall London, 1869
- 《声学须知》 1887 年出版
Acoustics (Outline Series)

- 《电学》 合译者徐建寅 1879 年出版
Student's Textbook of Electricity by H. M. Noad
London, 1867
- 《电学须知》 1887 年出版
Electricity (Outline Series)
- 《电学图说》 1887 年出版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 《格物图说》 1885 年出版
Properties of Matter
- 《重学图说》 1885 年出版
Mechanical Powers
- 《气学须知》 1886 年出版
Pneumatics (Outline Series)
- 《力学须知》 1889 年出版
Dynamics (Outline Series)
- 《光学须知》,《光学图说》 1890 年出版
Handbook to Diagrams in Light and Heat by W.
Lees London, 1881
- 《水学图说》 1890 年出版
Hydrostatics and Hydrodynamics
- 《水学须知》 1891 年出版
Hydrolics (Outline Series)
- 《光学须知》 1895 年出版
Optics (Outline Series)
- 《热学须知》,《热学图说》 1894, 1890 年出版
Heat (Outline Series)

- 《物体遇热改易记》 合译者徐寿 1899 年出版
Changes of Volume Produced by Heat by G. Foster 1875
- 《电学纲目》 合译者周郇 1894 年前出版
Notes of Course in Electricity by J. Tyndall 1875
- 《化学鉴原》 合译者徐寿 1871 年出版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by D. A. Wells N. Y., 1858
- 《化学分原》 合译者徐建寅 1871 年出版
An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 Chemistry, Including Analysis by J. E. Bowman 1866
- 《化学鉴原续编》 合译者徐寿 1875 年出版
Chemistry, Inorganic and Organic by C. L. Blodman London, 1867
- 《化学鉴原补编》 合译者徐寿 1880 年出版
 英文书名同上
- 《化学考质》 合译者徐寿 1883 年出版
Manual of Qual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 by K. R. Fresenius N. Y., 1875
- 《化学求数》 合译者徐寿 1883 年出版
Quant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 by K. R. Fresenius London, 1876
- 《化学须知》 1886 年出版
Chemistry (Outline Series)
- 《化学易知》 1880 年出版
Chemistry Textbook

《化学器》 1894 年出版

Chemical Handicraft by J. J. Griffin London, 1877

《电气镀镍》 合译者徐华封 1894 年前出版

Nickel-plating by A. Watt

《化学工艺》 合译者汪振声 1898 年出版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Manufacture of Sulphuric Acid and Alkali by G. Lunge London, 1879-1880

工具书:

《金石中西名目表》 1883 年出版

《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 1885 年出版

《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 1887 年出版

《翻译手册》第 1 卷(为上述三种名目表的总汇之一)
1888 年出版

《汽机中西名目表》 1889 年出版

社会科学:

《佐治刍言》 合译者应祖锡 1885 年出版

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nance (in Chamber's Educational Course) edited by Williams and Robert Chambers Edinburgh, 1836-1894

《西礼须知》 1885 年出版

Western Etiquette: What to do (Outline Series)

《戒礼须知》 1886 年出版

Western Etiquette: What to avoid (Outline Series)

- 《富国须知》 1892 年出版
Political Economy (Outline Series)
- 《保富述要》 合译者徐家宝 1894 年出版
Money by Bright
- 《国政贸易相关书》 合译者徐家宝 1894 年出版
The State in Its Relations to Trade by T. H. Farrer London, 1883
- 《俄国新志》 1894 年出版
History of Russia
- 《各国交涉之法论》 合译者俞世爵 1894 年出版
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 by R. J. Phillimore 1861
- 《各国交涉便法论》 合译者钱国祥 1894 年后出版
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 Vol. 4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mity London, 1861
- 《公法总论》 合译者汪振声 1894 年前出版
International Law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y E. Roberston
- 《美国加邦大书院图说》 1900 年出版
An Illustrated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y John Fryer
- 《邦交公法新论》 合译者程贻洛 1901 年出版
Ma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J. H. Ferguson Hague, London, 1884
- 《教育瞽人理论法》 1911 年出版
Method of Teaching the Blind by John Fryer

林 乐 知

(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

林乐知是美国传教士，他在中国以主编《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而著名，与中国近代报刊史、近代思想史和近代教育史，都有密切关系。他在中国活动达半个世纪之久，主要目标是鼓吹中国应变为外国的殖民地。

早 年 在 美 国

一八三六年一月三日，林乐知出生在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的伯克郡。他从小失去双亲，依靠赫琴斯夫妇抚养成人。赫琴斯是他的姨父，家在梅里韦瑟郡，林乐知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他小学毕业后，考入牛顿郡的斯塔维尔中学读书。林乐知从小接受姨父母的宗教灌输，进入中学后，又受到美国基督教的所谓第二次大奋兴运动的感召，决定接受洗礼，加入美国南方有势力的监理会为教徒。

林乐知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弗吉尼亚州的亨利学院，不到一学期又转学到佐治亚州的埃默里大学。一八五八年，林乐知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当时他二十二岁。

林乐知进大学后不久，在校内的牧师和教师的鼓励下，决定在毕业后当一名传教士，志愿到海外去发展美国基督教的势力。

为此，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已遍览有关英、美在海外传教事业状况的书刊，学习有关传教活动的知识。他特别对非洲感兴趣，希望有朝一日，美国监理会能派他到黑人中去传播基督教的文明。

林乐知从大学毕业后，就正式向监理会会督乔治·皮尔斯申请派往非洲传教。同时，他向刚从佐治亚州卫斯理女子学院毕业的玛丽·豪斯顿小姐求婚，请求她答应一起到海外去传教，得到了她的同意，不久就举行了婚礼。

这年的冬天，监理会举行年会，林乐知应邀列席。监理会差会的负责人问他是否肯前往中国传教，这使他感到意外。于是，他回去同他的新婚夫人商量，她表示无条件的支持，并答应和他一同到中国去。这次年会正式批准了林乐知的申请，要他再作一年准备，然后前往中国。

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岁的林乐知带了他的新婚夫人，和刚生下不到五个月的小女儿，从纽约乘上开赴中国的货船。经过大西洋，绕道好望角，跨越印度洋，到香港后北上，一直到了上海。他们在船上度过了整整二百零十天的航程，终于在一八六〇年六月抵达上海。

在上海传教不成而自谋生路

林乐知到上海后，首先学习中文，初时取名林约翰。当时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已在南京建立，在华大部分传教士对太平天国从所谓“同情”转向反对。林乐知到中国后不久，就受命同另一个传教士蓝伯，在一八六一年初访问天京，希望能在太平军辖区开辟传教工作。他们拜会了干王洪仁玕。由于洪仁玕急于要出

发西征,只是谈了一般性的传教自由问题。过了不久,美国发生南北战争,林乐知所属的南方教会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接济,这不但使他无法再到太平军辖区去,还迫使他必须设法自谋生路。

林乐知写道:“我们有四年之久,收不到差会一块钱,也接不到亲友的一封信。”林乐知起先不得不靠典卖教会财产维持生活,后来又从事中间商,向中国人采购煤炭、粮食、棉花等商品,转售给租界里的外国人。又当过保险行的经纪人和领事馆的通译等,生活颇为拮据。^①

一八六四年,经冯桂芬介绍,林乐知到上海广方言馆担任西学教习一年,后来又找点杂差以维持生活。

一八六七年,林乐知再次请求到上海广方言馆当教习。同年,徐寿等人筹设翻译馆于江南制造局,请林乐知协助译书。一八六八年,林乐知接受上海字林洋行的聘请,兼任中文《上海新报》编辑,从此林乐知的生活才比较稳定。一八六九年,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林乐知半天教书,半天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他在广方言馆任教习,直到一八八三年才正式解聘,清政府曾授给他五品顶戴官衔。

林乐知为江南制造局翻译的书有:

《印度国史》、《俄罗斯国史》、《德国史》、《欧罗巴史》、《万国史》、《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地理》、《格致启蒙天文》、《格致启蒙博物》、《地学启蒙》、《列国岁计政要》、《新闻纸》、《列国陆军制》、《东方交涉记》、《裔编年表》等书。与他合作翻译的,有严良勋、郑昌揆、瞿昂来等中国学者。^②

^① Warren Candler: Y. J. Allen, The Man Who Seeded China. 第82、106页。

^② 参看《教会新报》第4册,第1755—1909页。

创办《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

《教会新报》是林乐知在《上海新报》担任编辑期间自费创办的一份中文期刊，以“林华书院主人”的名义出版。林华书院并非学校，而是林乐知在生活稍定后自建的住宅。因此，《教会新报》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差会的刊物，完全由林乐知自筹经费、自己编辑，交给美华书馆印刷后自己发行，每星期出版一张。定价全年收银一元。

一八六八年九月五日，《教会新报》第一期在上海出版。据林乐知写的发刊宗旨称：

“新闻一事，外国通行有年，如士农工商四等之人皆有新报，即博学之辈亦于新报讲究无穷学问。教会亦有新报。……而在中国之传教外国牧师先生，久有十八省之外国字新闻纸，月月流通，年年不断，多得备益。何独中国牧师先生未得举行此事？兹特欲创其事，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给新闻一次。……况外欲人亦可看此新报，见其真据，必肯相信入教。……倘新报有余地，亦可录出外国教会中事，仍可讲论各种学问，即生意买卖，诸色正经事情，皆可上得。每年约五十本，价只取其一元。……林乐知启”^①

林乐知原以为《教会新报》会受到中国基督教徒的欢迎，却不知十八省内教徒订购者寥寥，仅上海一地也只销出百余本。^②过了一段时期，林乐知确实有些失望，他写道：“创始时满望中国

^① 《教会新报》，1868年9月5日，第8页。

^② 《教会新报》第1册，第28页启事。

各处教友出力相助，……岂料中国教友，有会大友多、心肠冷淡者；有路远需费、情意迥别者。”^①

据一八六八年年底统计，《教会新报》共销出四百九十四本，其中上海销出二百七十本，占百分之五十四，福州次之，销出六十五本，汉口、宁波各销出二十五本，北京销出二十一本，余均十余本不等，广州和香港无统计数字。^②由于销路不畅，林乐知不得不采取折价优待办法，先是每购十份多送一份，后来又跌至每购四份多送一份，定价也从全年一元降为五角。

《教会新报》以宣传宗教为主，同时刊登一些教会新闻、少数时事和科学之类短文，从第四十期开始刊载《京报》的一些内容，选录与传教或与教徒有关的上谕或奏折，以后又刊登有关国内外时事等文章或新闻，表明林乐知已逐渐注意中国政治问题。

林乐知在《教会新报》创刊两年之后，在第一百十三期刊登了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写的一篇报告，题目是《局外旁观论》，标志了《教会新报》对中国政治干预的开始。这篇报告是赫德在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呈送给总理衙门供参考的。他向清政府提出了三项改革方案：一是学习西洋人的长处，二是整顿财政，三是加强外交。

一八六六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写了一份题为《新议论略》的报告，给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转呈总理衙门，指出中国的贫困，是由于“好古而恶新”，必须“借西法兴利除弊”，和“设法更求外国和睦”，以求得“变通”。^③林乐知把威妥玛的这份报告，连续刊载在《教会新报》的第一百十六期至一百十七期，一百二

① 《教会新报》第1册，第422页。

② 同上书，第152页。

③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8页。

十一期至一百二十二期上。从第五卷起，林乐知把该报分成教事近闻、政事近闻、杂事近闻和格致近闻四大栏，其中政事近闻比例逐渐增至近乎一半的篇幅。

林乐知是把“孔子加耶稣”系统地从理论上加以鼓吹的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自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到一八七〇年一月八日，他在《教会新报》上连续五期发表题为《消变明教论》的长篇文章，把基督教的一部分教义同儒家的旧礼教、旧思想相结合。他写道：

吾教中人教曰：耶稣心合孔孟者也，请略言之，俾使众知以消后变。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吾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

言君臣者：《彼得前书》曰，尊皇上（二章十七节）；《宣道书》曰，不可诅皇上（十章二十节）；……《罗马书》曰，人宜服从在上之权，宜贡则贡，宜畏则畏，宜敬则敬（十章一至六节）。此重君臣之证也。

言父子者：《马太传》曰，神之诫曰，敬尔父母。又曰，冒父母者必死（十五章三节）；《以弗所书》曰，听从父母，敬尔父母，诫中之首，致尔获祥（六章一至三节）……此重父子之证也。

言夫妇者：《哥林多书》曰，夫宜一妻，女宜一夫，以免邪淫（七章二节）；《哥罗西书》曰，妇服于夫，夫宜爱妇，不以苦待之（三章十八、十九节）。……此重夫妇之证也。

言兄弟者：《彼得前书》曰，爱诸兄弟（二章十七节）；又曰，致爱兄弟无伪，由洁心而彼此相爱（一章二十二节）。……《马太书》曰，彼得曰，兄弟得罪我，我赦之七次可乎？耶稣曰：七十复以七相乘（十八章二十一、二十二

节)。……此重兄弟之证也。

以言朋友：《箴言》曰，膏与香，悦人之心，友以心劝，亦若是(二十七章九节)；……《诗篇》曰，谤我者，非仇敌也，是仇敌则忍之。自大问我，非恨我者，是恨我者则避。是匿为我同俦密友，相亲心悦，与之议论(五十五篇十二、十四节)。……此重朋友之证也。……

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复引《圣经》以证之。夫五常者，仁义礼智信是也，或疑吾教《圣经》中无仁字，不知仁即爱也。《圣经》言，爱即是仁也。……

再进言义，《诗篇》言义者最多。《诗篇》曰，耶和华以义为喜，必观正直之人(十一篇)。……

再进言礼，《圣经》明言礼者如《罗马书》曰，以礼相让(十二章)。……

再进言智，言智之可贵者，《约伯记》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淡黄玉不能比，精金不得衡(二十八章)。……

再进言信，《哥罗西书》曰，止于信(一章)。此与儒书大学合者也。……

余前二论言五伦五常，吾教与儒教同重矣。请进言儒教君子三戒，与吾教上帝十诫，旨有相同者，更历引《圣经》以证之。

第一戒，孔子曰：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上帝十诫第七诫曰：毋奸淫，正同也。……

君子三戒第二戒，孔子曰：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上帝十诫第六诫曰：毋杀人，旨又同也。……

君子三戒第三戒，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上帝十诫第八诫曰：毋偷盗。第十诫曰：毋贪邻屋邻妻与其仆婢

牛驴及凡邻所有者。此二诫皆言戒得也。……是上帝十诫与君子三戒又合，不但重五伦五常与儒教合也。^①

《教会新报》出到第三百期结束，从三百零一期开始改刊名为《万国公报》。那是林乐知在一八七四年九月改的，每星期出版一张，仍由他自办自编自销。他改报名的理由是，“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赏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岂徒新报云尔哉。”^② 这表明，林乐知已开始把读者对象从一般的教徒，扩大到政界和士农工商各式人等，并以此作为舆论工具，鼓吹他的变中国为外国殖民地的变法主张。

为此目的，林乐知把《万国公报》的内容，作了相应的调整。他把《京报》放在最前面，而且是全部转载，对清廷似乎很是尊敬。另外，他加强了政治和时事的报道及评论，直接对中国内政指手划脚。但他在更名之前，特别声明一点，即“中国官场以及审案、结案、定罪公允与否，非本报所与闻，即他处有寄文请录者，亦置之不问，特为预白”。^③ 对于一般诉讼，林乐知不感兴趣，他所要干涉的，乃是中国的大政，朝着有利于外国侵略者并吞中国而办报。

林乐知自办自编的《万国公报》，出版至第七百五十期，即在一八八三年七月停刊。这是因为林乐知又忙于办理中西书院和其他活动，无暇顾及而不得已停办的。该报销数最高时虽曾达三千五百份，但在一般情况下销路仍不好，这也是他决定停办的原因之一。

① 《教会新报》，1869年12月4日、11日、25日，1870年1月1日、8日。

②③ 《万国公报》，第6册，第8296页。

创办中西书院和中西女塾

中西书院是林乐知于一八八一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林乐知在他草拟的《中西书院规条》中,写道:“余拟在上海设立书院,意在中西并重,特为造就人材之举。……创立中西书院专为栽培中国子弟起见,非敢希图虚名,实求实济。”^①招生对象主要为买办子弟。

中西书院分一、二院及大书院,最初建立的是一院,在八仙桥,二院在吴淞路,大书院在崑山路。林乐知为此特地辞去广方言馆教习,把自办的《万国公报》停刊,专心致力于办教育事业。虽然他标榜中西书院“意在中西并重”,首先强调的还是宗教,每天上课前要学生“恭读”《圣经》和祈祷,每逢星期日要他们到教堂做礼拜。校务主要由沈毓桂负责。

学生入学后先在分院读二年或四年,然后升入大书院读四年。学生入学考试后根据其成绩分成四等:特等生、头等生、二等生及三等生。特等生及头等生选读的课程要比二、三等生多,内容也比较深。特等生及头等生上午读西学,下午读中学,二、三等生则相反。西学课程在分院期间主要学习英语,再适当增加一些数学和地理知识;中学部分主要学习尺牍、写作和五经。升入大书院后,西学部分除学习英语外,增学数理化课程,后两年要学习一点万国公法和测量等课目。

据《万国公报》开列的中西书院八年西学课程如下: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介辞句,讲解浅书^②,习学琴韵。

^① 《万国公报》第18册,第11806页。

^② 讲解浅书,意为讲解一些较浅的文言文。

第二年 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三年 数学启蒙,各国地理,翻译选编,查考文法,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四年 代数学,讲求格致,翻译书信,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五年 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六年 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七年 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功用,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八年 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①

中西书院的开办,得到美国驻华外交官和上海的外商支持和捐款,还得到中国官绅的不少资助,“李鸿章等显宦富商捐助”中西书院不少钱,崑山路的十三亩地产原为上海买办徐润所有,林乐知仅以不到四万元的低价购进。^②《万国公报》曾刊载一八八三年上海中西人士给林乐知开办的中西书院捐款清单一份,可以略见上海中外人士对该校培养买办的一番用心和支持。^③

继中西书院之后,林乐知又于一八九〇年在上海创立中西女塾,它是由美国监理会妇女国外布道部的经济援助,和派遣海淑德女士来华主持校政,而得以开办的。招生对象也以买办家

① 《万国公报》第14册,第8558页。

② 同上书,第15册,第10089页。

③ 同上书,第15册,第9629—9631页。

的女孩子为主,课程设置与中西书院大体相同,另增设音乐课和家政课。教会学校举办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叶对中国重男轻女的封建教育是一个冲击,它突破了中國女界的禁錮,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风气。

但是,中西书院和中西女塾都只是为新兴买办阶级服务的,也是符合外国对华的侵略利益的。当时,林乐知已经公开主张中国应该改革科举制度,认为“专尚举业,有害无利”^①。他建议中国应参用外国学制,分科教导,中国的教育改革应按照美国的学制进行。中西书院和中西女塾的西学课程和进度,是大体上按照当时美国教育体制安排的。但林乐知自己承认,他提出的所谓中西并重的目标,实现得并不理想,学生们“对中国古学所知甚少,而且缺乏兴趣;对于西学,亦只关心英文,因他们盼望借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②。学生毕业后,多数在洋行、海关、铁路、银行等处充当买办。到一八八七年上海广学会成立后,林乐知的主要精力转移到利用出版干预中国政治上去了。

参加广学会和主编《万国公报》

广学会是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在上海创办的一个基督教出版机构,成立于一八八七年,林乐知被推举为协理。林乐知在他写的题为《广学兴国说》一文中解释道:“会以广学名,广西国之学于中国也。中国自有学,且自有至善之学,断不敢劝其舍中以从西也。”说明传教士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心理,假传播西学之名

① 林乐知:“中国专尚举业论”,载《万国公报》第15册,第9261页。

② W. B. Nance: Soochow University. 第15页。

散布其殖民主义理论的。

广学会决定把已经停刊五年的《万国公报》恢复出版，变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每月出版一期，册次重起，仍请林乐知主编。一八八九年二月复刊号上登载沈毓桂撰写的《兴复万国公报序》中，叙述了该报宗旨：

林进士乐知先生，欧洲硕彦，航海东游，侨寓沪滨，多历岁月，迄今二十余寒暑矣。中间曾应江海关监督、前苏松太兵备使者后陈臬胥台方伯应公之聘，主教广方言馆，门下高才生如汪太史凤藻朱观察格仁严太守良勋席京职淦诸君各有成就，或膺使节，或绾郡符，或值枢曹，或登禁近，咸能建树以赴功名之途，林君于应公隆谊亦可稍酬而无负矣。而其有益中朝之举，尤在万国公报一编，盖其时沪上只有西字报，初无华字报也。……后知沪上子弟有志西学者颇多，苦乏师承，不无屈没，因与仆创议设立中西书院于吴淞江北，书院既立，日课事繁，势难兼顾，不得不暂行中止。五年以来，西国同人拟兴复者屡矣。兹林君稍加变通，于来岁正月为始，月具公报一册，计三十二页，合三万字。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敦政本也。略评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他至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各撮其精蕴，溯其源流，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皆在所不当遗也。分任其事者为西儒韦廉臣先生，慕君维廉先生，艾君约瑟先生，丁君魁良先生，花君子安先生，德君子固先生，而专司拟题乞文收卷编辑，则林君主之。想大方家赐以巨制，锡以鸿篇，霏滴仙之唾字，尽珠玑呕长吉之心，言皆锦绣，不独增简编之色，亦以联文字之缘，是固仆所乐观集其成也。爰叙数语以志之。

林乐知在《万国公报》复刊号后面写了《答序跋语》，内称：“近西国官绅士商于上海立有同文书会，摆印一切有益中国书籍，俾广流传。又拟复辑（万国）公报，以广见闻。同人集议于来年正月始，月具一编，以供众览。公报系仆前所创行汇辑编订，仍归仆专主，余则诸君分任之。……”

从复刊号的序和跋中，透露了《万国公报》是以干涉中国政治为主的。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万国公报》并不畅销，所载政论也未引起清朝统治阶层和士大夫多大的注意。从甲午战争爆发到戊戌变法的短短四年里，由于《万国公报》刊登了大量有关中日战争的消息和评论，才使销路逐年增加。林乐知撰写了三十多篇直接干涉中国政治的政论性文章，如：《中日朝兵祸穷本推源说》、《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以宽恕释仇怨说》、《防俄杂论》、《俄国新筑西伯里亚铁路说》、《中美关系略论》、《广学兴国说》、《险语对中》、《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等。

林乐知所写的政论文章，归纳起来就是要中国“降日本、亲英美、共拒俄”，最终目的是要使中国变为英国的殖民地，象英国占领和统治印度那样。其中最露骨的是《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一文。林乐知列举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有十二条“益处”：“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浚水源”、“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通声气”。其第一条就是对印度人民的反抗实施残酷镇压，其他几条都是围绕着有利于英国对印度的掠夺，以及巩固其殖民统治而提出的一些改良措施。林乐知接着竟公然向中国提出：“吾意惟有拔赵帜暂易汉帜之一法，先于东南方遴选二省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面治华。如是上下五十年间，彼意而习之者，将见心思辟矣，耳目开矣。……地则犹是

中国之地，而民则已为特出之民矣。”^①

林乐知至此完全暴露了他殖民主义者的嘴脸，他要求大清帝国卸下它在本国领土上的黄龙旗，把大不列颠的国旗暂时升上半个世纪，“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变中国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是任何一个爱国者所坚决不能答应的。

林乐知还竭力反对孙中山所从事的武装斗争。一八九六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诱捕后，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一篇《拘禁逸犯》评述，文中诬蔑孙中山在广东领导武装起义，为“在粤中鼓煽狂言，目光如豆”。对他被捕甚为高兴，认为从此可以“械送回华，以伸国法”了；不料孙中山被英国友人救出，林乐知大为恼火，攻击孙中山“种种悖谬，其罪亦重”。到第二年，林乐知还耿耿于怀地说，“孙文虽经拘获，莫正典刑”，恨不得把孙中山置之死地而后快。^②

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时，《万国公报》的销数激增，发行量从原来的数千份增加到三万八千余份。传教士们出于殖民主义利益和发展教会势力的动机，对中国的改良运动作了有条件的支持和鼓吹，在这方面，《万国公报》更是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活动。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曾直接受到《万国公报》及广学会其它宣传品的影响。康有为在一八八二年经过上海时，曾购买了不少广学会的书籍并订阅了《万国公报》。梁启超一八九五年在北京期间，除与李提摩太等结交外，也阅读了广学会大量出版物，包括《万国公报》在内。原来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政论，有不少是《万国公报》宣传过的言论。他也曾竭力推荐广学会的出版物。其他和谭嗣同、翁同龢以及光绪帝也不同意

^① 《万国公报》第93、94册，1896年10—11月。

^② 同上书，第96册，1896年12月，第26—27页；第98册，1897年3月。

度地受到《万国公报》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销路骤减。紧接着义和团运动又兴起，该报对义和团极尽攻击谩骂之能事，先是在一八九九年第一百三十二期发表山东庞庄公理会传教士写的《山东义和拳匪论》一文，后来又发表《京津拳匪乱事纪要》，连载十余期，公然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造舆论，并要求帝国主义各国出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甚至到一九〇四年，林乐知还在《万国公报》第一百八十一期上发表《总论中华时局》一文，鼓吹帝国主义各国重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为帝国主义侵略摇旗呐喊。

一九〇七年三月，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篇《社会党之流弊》的文章，英文原意是“社会主义不适用”，反对当时已开始在中国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文中写道：“晚近社会党最流行于欧、美，然其主义仍不免于偏，故反对者亦多。”林乐知认为：“社会党之在各国，主义略有不同，其间非无可取，倘能取其精粹，而去其糟粕，亦二十世纪之支配物也。苟偏激而走于极端，则流弊孔多。”^①这是林乐知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一八九一年，林乐知和李提摩太在广学会还编辑出版了《中西教会报》，所标榜的宗旨是专论教务，企图向士大夫宣传宗教，后因销路不畅而停刊。一九〇四年，广学会创刊《大同报》，由英国传教士高葆真负责编辑。

林乐知曾在《大同报》一九〇七年三月号上写了一篇《大同报改良发刊词》，要求《大同报》进行所谓改革，做到“辅新政”、“匡教育”和“培人格”三点，主要目的是维护已经摇摇欲坠的

^① 《万国公报》第218册，1907年3月，第72—74页。

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大同报》后因没有销路，于一九一一年停刊。

林乐知在广学会出版的译作，主要有《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治安新策》、《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西关系略论》、《列国岁纪政要》等书。林乐知的翻译助手为蔡尔康、范子美、任廷旭等人。

《中东战纪本末》一书，对当时的维新运动有一定影响，一八九六年出版初编八卷，一八九七年增出续编四卷，一九〇〇年又增出三编四卷，全书共有十六卷。这部书刊载了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大量原始资料，书后附有多篇传教士撰写的政论文章。

林乐知在《中东战纪本末》的“译序”中，首先提出了“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理论。他写道：“余美国人也，而寓华之月多于在美之年，爱之深，不觉其言之切。……各国之鹰瞵而虎视者，非尽欲侮中华也，弱肉而强食，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也。”林乐知接着提出了中国应向日本投降的谬论：“中日之战，人皆曰中败而日胜，是天之败中国也。迅速行成于日本，无论有无兵费，不妨悉索敝赋以应之，急则治标，别无良策也。”后来林乐知在书中干脆提出“欧洲各国，类皆弛情于域外，虽以非洲之酷热，北极之严寒，犹且图剖分而食之。造舟龟勉而赴之，矧以地处温和带下民殷物阜之中国，有不思染指于鼎，过屠门而大嚼乎？……呜呼！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尚有朝潮夕汐，进退盈缩之一候，若夫各国之入中国，则竟如水之就下，有进无退，有盈无缩也，其孰从而御之哉！”^①

林乐知在他编写的《治安新策》一书中，公然诬蔑中国人有

^① 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初编第六卷，第15—19页；第八卷，第9、34—37页。

八大积习：“骄傲、愚蠢、恒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他要求中国人消除疑虑，说传教士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使华人得沾教化而转弱为强”。对于英国侵占印度，并非英国要“贪其土地”，而“只为推广商途，……印人不知顺天行事，并偏逆而拒之；且又示之以弱，于是印权渐消，英权渐增，印遂为英外府”。他认为印度隶属英国后，不独无害，反倒有益，因英人“以治国之良规，爱人之至理，普之于身热头痛之域，绳行沙度之乡”。他教训中国人，说：“愚谓此宜敦聘西国贤臣，久处中国，假以岁月，隆以宾师，请援照通行于泰西已著明效大验之良法，参考行于中国。”

义和团运动被帝国主义镇压后，林乐知被召回美国参加基督教各教会联合会议，专门策划如何加强对中国的传教活动。他在美国为监理会的在华活动募得了五万美元经费，并号召增派五十名传教士参与对华传教活动。会议结束后，他又到中国参加广学会年会，在会上叫嚷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成为基督教国家的保护国，她已被置于我们的教导和开化的权力之下。”^①

一九〇六年五月，林乐知最后一次回到美国。他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特别接见。他向总统汇报了中国一九〇五年反美运动的情况，总统垂询有何良方可以增进中、美“友谊”，他建议应加强对华的传教与教育事业。^② 这年正值他七十“大庆”，有幸获得总统接见，自是非常高兴。一九〇六年，他再次来华，继续为英、美帝国主义侵华出谋画策。

①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Year Book 1901.

② 林乐知：《回国略述》，载《万国公报》第40册，第24814页。

一九〇七年，正当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云集上海庆祝马礼逊来华传教一百周年时，踌躇满志的林乐知突然在五月三十日清晨去世，终年七十一岁。

狄 考 文*

(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

狄考文,字东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基兹波格人,一八三六年一月九日出生。父名狄约翰,是个小农场主,母名玛利亚,均为美国长老会教徒。狄考文从小受基督教熏陶,在家乡小学毕业后,考入根脱斯中学,一年后转学于费脱邑中学,一八五四年毕业后,接受洗礼为基督教徒,同年考入杰佛逊大学。在大学期间,他的数、理、化及英国文学成绩,均为优等。一八五八年大学毕业后,教书一年。在此期间,他立志要成为一名牧师,于是放弃教职进美西神学院,专攻神学三年。一八六二年从神学院毕业后,狄考文即被封立为牧师,被派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教堂担任神职一年。一八六三年,他接受美国长老会差会的派遣,于七月三日带了新婚夫人邦就烈,从纽约乘船前来中国。一八六四年一月到达山东登州(今蓬莱县),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生涯。狄考文与中国近代教育史有关,清末在华北的著名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就是他创办的。^①

* 本篇合作者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李伟凯同志。

① 《山东登州文会馆志·狄先生传》。

带枪传教的狄考文

狄考文到达登州后，即一面“延齐人为傅，苦心学习”汉语，一面旅行传教，调查研究山东情况。他写信回美报告，说：“山东省比我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还要大三分之一，居民有三千万之众。气候与美国肯塔基州相似，出产没有多大的差别。我要大声疾呼：让长老会攻打这个省份。在以往的时代里，中国的宗教和政治都是由山东产生的，而今后则基督教要教给中国。”^①

狄考文从美国出发前，即购置了手枪。他到山东后，每次外出传教或散发福音书，都随身携带手枪。在《狄考文传》里曾经提到，狄考文有两次拔出手枪向群众示威，时间是一八六五年四月至六月间。他带了二十八箱福音书，从登州一路散发或销售。一天，在前往青州府的路上，群众看到狄考文，都喊他为“鬼子”。狄考文也早已听惯了这种称呼，不以为然，照样卖书讲道。但当他指责群众不该迷信占卜时，听众中一位算命先生要同他进行辩论。狄考文自恃有理，毫不谦让，结果发生了争执。狄考文仗着有美国政府的文持，口袋里又有手枪，说话就一点也不客气，当场激起了公愤。那个算命先生看见群众文持他，就拿一把长矛，要刺杀狄考文。说时迟，那时快，狄考文见长矛直向他刺来，就后退一步，一手按住长矛，一手拔出手枪，进行威吓。算命先生一看他拿出手枪，顿时面色转白，手也发软，扔掉长矛，回身就逃。

还有一次，狄考文在一处贸易集市上销售福音书，有一个人

^①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第20页。

拿了一本书没有付钱就走。狄考文追上去，把书拿了回来。本来这就没事了，而跟他在一起卖书的助手，却不肯放过，上去打了那人一把掌，结果两人扭打起来，引起了群众围观。狄考文也不上去拉开他们，却去驱赶群众。结果又激起了群众的公愤，群众要和他评理。狄考文这时再次拔出手枪进行恫吓，并且大声说他要告到烟台美国领事那里去，外国人是受到条约保护的等等。结果，群众四散避开，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枪击。^①

狄考文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却忘记了耶稣对他的门徒西门彼得的训斥：“把刀收起来！”^②也忘记了《圣经》中所提到的司提反的故事。^③

开办蒙养学堂

狄考文到登州后，除了上述活动外，还在教堂里招收六名“寒素不能读书”的穷小孩教以读书，“不维免其修金，并且丰其供给，一切衣履、鞋袜、饮食、纸张、医药、灯火以及归家路费，皆给自本堂”。他把这所小学校定名为蒙养学堂，一八六四年八月正式开学。据该校早期毕业生王元德说：

先生蒞登州时，其他传道于中国者，惟赖一己之口舌，……而先生窃思一人之能力几何，偌大之中国，不可以少数西人，而广收其效也。况以同种传同种易，异种传异种难，不若招集天性未漓之儿童，培之以真道，启之以实学，更

①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第121—122页。

② 《圣经·约翰福音》第18章，第11节。

③ 同上书，《使徒行传》第7章，第54—60节。

复洁以恩义，以其学成致用，布散国内，其收效之速，当不止倍蓰。^①

这六名穷学生中，只有一人读过一年私塾，他们全部住读。狄考文自任校长，兼授西学课程，他的妻子兼总务，另外请一位刚刚入教的穷书生张干臣教识字启蒙，读《三字经》等。伙食一日三餐由学校免费供给，每天伙食费平均为三十文钱，一年合十吊钱，折合当时美元约十元。狄考文专门请了一位司厨老嫗负责烧饭。

据统计，自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二年，蒙养学堂“计设学九载，教习五员，共收生徒八十五名，而学满六年者仅四名”。“诸生皈依基督教者，凡十四名，至一八七二年背道者已五人矣。”^②

蒙养学堂自一八七三年起设置中学课程，到一八七六年为止，学生流动性很大。据说，这些学生“不堪造就者十之九，其效用于教会者一人耳”。狄考文并不因此停止不前，他在出席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大会时，宣读了他写的一篇报告《基督教差会与教育的关系》。在论及教会学校开办的宗旨时，他说：“开办教会学校的目的，我认为给予土著在智力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教育中，不仅要使他们皈依基督教，而是要在他们皈依基督教之后，能成为上帝手中得力的代理人，以捍卫真理的事业。这些学校传授西方的科学和文明，必不可少地要在物

①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第3—4页。王元德为文会馆一九〇四年毕业生，先在校长狄考文处协助修改《圣经》译本，后任广文学堂和齐鲁大学教师，最后经商，任华北酒精商行经理。此书系1913年由潍县广文学堂印行。

② 同上书，第21页。

质上和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善果。”^①

狄考文在蒙养学堂内，传授西方的科学和文明，数量上是极为有限的，质量上也只是一般的基础知识，但是他特别强调学习这些西学一定要使之纳入宗教的轨道。他曾明确宣布过：“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为此，他主张不应让异教徒来传授西学，“异教徒或基督教的敌人来开动这个强大的机器，将阻碍真理和正义的发展”。^②这是在华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时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导原则”，因此，任何对传教士在华传播西学作过高的估计，都是违背历史真实性的。

蒙养学堂充其量只不过是具有小学程度的一所教会学校。

山东文会馆的情况及其影响

从一八七六年起，狄考文把蒙养学堂改称为文会馆，由一般小学升格为书院，分备斋、正斋两个学部，前者为三年制，后者为六年制，其课程规定如下：

备斋：

第一年 马太六章（即圣经新约若干章），官话问答（指教义问答）；孟子上，诗经选读一、二；分字心算，笔算数学上。

①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12, 1877. Essay of Mateer: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第128页。

②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纪录(1877年)》，第171—180页。

第二年 圣经指略下,以弗所哥罗西书(即圣经新约若干章);孟子下,诗经选读三、四,唐诗选读;笔算数学中;地理志略;乐法启蒙(即音乐课)。

第三年 圣经指略上,诗篇选读(即圣经旧约的一部分);书经一、二,学庸(即大学和中庸),作文作诗;笔算数学下;地理志略。

正斋:

第一年 天道溯原(即圣经神学课);书经三、四,诗经,论语;代数备旨。

第二年 天路历程(为一部宗教小说,作者为英国班扬,一六七八年出版第一部,一六八四年出版第二部);书经全,礼记一、二,孟子;形学备旨,圆锥曲线;万国通鉴(即世界通史)。

第三年 救世之妙(圣经神学);礼记三、四,诗经,学庸(即大学中庸);八线备旨,测绘学,格物,省身指掌。

第四年 天道溯原;礼记一、二、三,经书,左传一、二、三、四,赋文;量地法,航海法,格物(声光电),地石学。

第五年 罗马书(圣经新约);礼记四,左传五、六,赋文;代形合参,物理测算,化学,动植物学;二十一史约编。

第六年 心灵学(即心理学);是非学(即逻辑学);富国策(即政治经济学);易经全,系辞,读文;微积学,化学辨质,天文揭要。^①

从上述课程表反映出来,宗教教育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儒家典籍,再其次是西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外语课是没

^①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第3—4页。参看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35—236页。

有的。

关于宗教教育，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必修的《圣经》课程，二是带强迫性的参加礼拜，和到校外实习传道。《圣经》课不及格不能升级，礼拜不参加要受处罚，学生思想受到严格控制，不能有违反教义和传教士教导的言论和行为，其目的是要“摧毁异教的堡垒”，树立一个以基督教教义为核心的主观唯心论的世界观。学生毕业后，一般要当传道人三年，以表示对母校的养育之恩。为此，在校期间，还让学生参加课余组织如辩论会、传道会、勉励会、戒烟酒会、新闻会、青年会等活动，以培养学生演说的能力，和学习做社会工作。

儒家典籍的学习，也置于重要的地位，这是为了使毕业出去的学生，不致被旧式士大夫看不起，谈起诸子百家来，也可以头头是道。狄考文的主要目标，是要以教会学校培养的新式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以控制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用狄考文自己的话来说是：

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内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民众的先生和领袖。……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①

还有一个目的，是要使学生能将儒家典籍中的某些封建文

①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第457—459页。

化,与基督教中的某些奴化思想结合在一起,熟练地运用,以求能在中国发展基督教的势力,而不致受到旧式士大夫的阻力。与此同时,狄考文也考虑到山东是儒家思想的摇篮,教会学校要在山东立足并产生影响,不重视儒家典籍的学习是行不通的,“本校重视这些论说,因是政府科举考试所要求的,也是作为受尊敬的学者所必需的”。^①

此外,狄考文还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如一八七五年学生邹立文参加了登州乡试,结果名列前茅。后来,还有一个学生郭中印,考取了清朝最末一屆秀才,仲伟义考取了附生。狄考文这种手法有假孔子为耶稣开道的奥妙之处,使文会馆在山东不仅站住了脚,而且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较完整的西学课程和各种实验手段,是文会馆的另一突出之点。狄考文认为,要使教会学校能在中国培养一批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为外国侵略者日益加紧的对华经济侵略效劳,为在中国政府举办的洋务企事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为扩大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界的势力,都有必要在宗教的意识形态之中,加入必要的西学知识,既用来论证造物主的“伟大莫测”,又可使西方在华利益获得保证。

狄考文除了采用上海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的一些教科书外,还常常亲自编写或翻译教材,其中有《心算初学》、《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即几何学)、《官话类编》等,最后一本书主要是为来华的外国人学习华语之用。另外,还印了一些讲义仅供学生传习者,其中有《理化实验》、《电学》、《测绘》、《微积习题》、《华文字典》等,以上这些讲义,没有公开发行。还有一些神学方面的教材。

^① 郭查理:《山东基督教大学》(英文版),第31页。

除了自然科学之外，狄考文还要学生学习一些西学中的社会科学，包括世界历史和地理，以及最后一年要学的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这后三门课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课程。

狄考文非常重视给学生做实验的机会，建立了一些理化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设备除一部分由美国订购运来者外，大部分仪器设备都是由狄考文自己设计制造的，并且还教学生一起来制造仪器，并学会做实验。狄考文在一八八六年写信给他兄弟时，曾提到他自费建立起一个工场，内有木工、铁工、电工、车工等工艺，他说为此已用去一千元钱。一八八八年十月间，狄考文写信给一位教师时提到，中国最需要的电力工程，特别是电报；其次是土木工程，其中测量和建造铁路尤为需要。要掌握这些技术，必须要懂得实验手段，西要学会做实验，又必须学会制作必要的仪器设备。^①文会馆的学生从西学课程和实验室的实习中，获得了当时在中国一般不易学到的新鲜事物，对于他们的思想是很有影响的，尽管狄考文一再夹杂许多反科学的东西在内，客观上还是对学生起了启蒙作用的。

与沿海其它教会学校最大的不同是，文会馆的课程表中没有外语课。对内地教会学校教英语，狄考文是反对的。他的理由是：“假使我们必须教授英语，我们无疑地将得到中国官吏和富人的赞助和支援。这样，我们将被迫放弃学校的具有特色的宗教性质这个好的措施。我们招到的将是另一类学生。学校的宗教风气将迅速改变，西置我们于不顾。还有一个结果，也将几乎不可避免，那就是，中国的学术标准将下降，学习英语将使掌

^①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第236—240页。

握中国古典文学受到致命的影响。学生们会讲英语后，无疑地我们将有极大的困难把他们留住。他们将立即去找工作，他们的英语知识将给他们高的工资。更有进者，登州不是一个外国人居住的商埠，而是一个隔开的内地城市，这里不是设立一所学校教授英语使之成为显著特点的地方。”^①

狄考文并不是反对所有教会学校教授英语，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香港等沿海及沿长江的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教授英语有它的特殊作用；而在内地，狄考文直到一九〇七年仍反对在教会学校设置英语课。^②

狄考文的打算，是想把文会馆逐步地升格为大学性质的教会学校。在改称文会馆之初，狄考文就宣布在该校读完十年的三名学生邹立文、李秉义和李青山为大学毕业，并发给了文凭。当然，这是谁也不会承认的。“但这个学衔与其说是事实的描写，还不如说是一种雄心壮志和宏伟希望的表现。”^③

一八七九年五月至一八八一年一月，狄考文在美国休假。他在美国一方面积极为文会馆募捐，一面进修科学知识。他还亲自到美国的一些现代化工厂参观访问，了解新法，一家光学仪器厂赠送了一架十英寸的天文望远镜给他，还有一位电业大王赛勒斯·菲尔德，答应捐赠一套发电设备给文会馆，其它一些厂家也捐赠了一些图书仪器等。

一八八一年二月十四日，狄考文向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正式提出，把文会馆改为大学的计划书，具体谈了八点计划：

①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第217页。

② 同上书，第229页。

③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第477页。

一、登州文会馆宜扩建为大学，定名为山东书院。二、书院由山东教会组成六人托事部负责管理，差会部给予认可。三、书院学制为六年，包括学习中国典籍，普通科学和基督教伦理，设置“四书”、“五经”、中国历史、《圣经》历史、世界通史、数学、物理、心理学、伦理学、基督教教义论证等课程。四、书院的目标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给学生进行充分的中西学教育。五、整个课程都用中文教授，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教授英语。六、设立大学预科。七、书院最终要求学生完全自备学费入学，同时尽快地培养一批能胜任教学工作的中国籍师资。八、书院目前仍设在登州，是否迁往更为中心的地点，容以后再行考虑。^①

美国长老会差会批准了狄考文的计划书，但学校名称暂时不变，仍称文会馆，并答应在经费和师资方面给予有力的支持。狄考文经过数年的经营，扩建了校舍，添置了图书仪器等设备，建立了天文馆，安装了发电设备，扩充了印刷工场。学生人数也比早期有所增加，毕业生的出路，也从早期主要为教会服务转向社会，在华北一带产生了影响。当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时，就曾多次向狄考文提出，请他推荐文会馆的优秀毕业生到北京同文馆，教授数学、天文、物理和化学等课程。^②

据一九〇八年统计，文会馆从一八六四年至一九〇四年共毕业学生二十六届，一百七十名。一九〇四年该校迁至山东潍县。毕业生总数为二百零五名，分布情况如下：

在官立学堂任教习者	38名
-----------	-----

①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第207页。

② Chinese Recorder. 1908年12月，第694—695页。

在教会学堂任教习者	68
牧师	17
传道人	16
文字工作者	10
经营商业者	9
医生	7
邮局	4
铁路	2
基督教青年会	2
海关	1
办事员	2
秘书	1
家务	6
死亡	22

这二百零五名毕业生分布在十三个基督教教派，一百所学校，十六个省份工作。另外，还有大约二百名肄业生，分布在全国各地工作。^①

从上表看，办学四十四年仅毕业二百零五人，加上肄业生二百名，共有四百名学生，数量是很少的，但能量却不能低估。分布的岗位除教会外，大多数在国家的重要机关和学校。诸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北洋大学、云南法政学堂，保定和奉天的陆军学堂等，都有文会馆的毕业（肄业）生在执教，或担负一定的教育行政职务，特别是一九〇五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科举、办学堂后，文会馆毕业生有供不应求的情况。袁世凯

^①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第293页。

曾请文会馆第二任校长海斯，到济南筹建山东高等学堂。海斯带了六名文会馆毕业生，前往该校担任数、理、化等课程教习。

狄考文实际上一八九五年即已辞去文会馆校长职务，但一直牢牢控制这所学校。自从把蒙养学堂改建为文会馆后，他对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一直严加控制。考虑到当初蒙养学堂学生的流动性很大，因此文会馆成立之后，对每一个入学的学生在录取之前都要严格考核，在录取之后，每个家长都必须在与学校订立的契约上画押。其内容是：

“大美国长老会设学于登州府城内，招收生徒。今有××府××县××村，×××子，××岁，愿送入馆读书。应许自备儒书、笔墨、衣衾，遵馆内详章，依次学完，方准归家营业。倘无故早日领回，须将入学以来所耗经费，一概偿还。学生逃亡，须寻觅送回。未毕业之先，学生定亲娶亲，须经监督允许方可。学生愚顽，不堪造就，任监督遣归。此系两相情愿，并无后悔。 年 月 日”^①

这份契约表明，学生一旦进入狄考文的文会馆，一切都由学校摆布。学生在文会馆一天的生活，大体上是这样度过的：早晨起身盥洗之后，即须参加晨祷会，然后吃早饭。饭后首先上宗教课，然后再上其它课；午饭后继续上课和做实验，并分组参加集体课外活动；晚饭后举行夜祷，并上夜自修。星期天上午必须到教堂数礼拜，星期日下午分组到乡间去布道。这些活动也都是要点名的，无故缺席要受到包括体罚、记过，直至遣归的处分。

传教士主观上要训练学生成为教会的驯服工具，成为一切以传教士之命是从的走卒。有的学生因长期受宗教教育灌输，

^① 王元德、刘玉峰编：《文会馆志》，第36页。

在文会馆里就欢喜写《乐赴天城》、《快乐之日》之类憧憬于天国极乐世界，永远不死的作文，他们向传教士表示，毕业后愿意当牧师，为发展基督教事业献身；有的学生因受课堂上和书本里所介绍的欧、美各国情况的影响，十分羡慕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写的作文题目，有《逍遥曲》、《赏花》之类，以表达他们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但是比较多的学生，在课堂里学习《万国通鉴》、《富国策》、《地理志略》等课程之后，了解了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西方社会从十五世纪以来已经从封建社会逐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等情况，结合在课堂里和实验室里学习到的原为中国学堂所没有的课程，如声、光、化、电等格致之学和实验手段。他们初步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祖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的现状，并非不可改革；渐渐滋长了富国强民和摆脱外国侵略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学生写的作文里，就有所反映。在狄考文看来，这些学生的爱国思想，当然是越轨的。

狄考文的社会活动

狄考文来华后，共回美国三次度假和为文会馆募捐。汉诺威大学于一八八〇年授予狄考文以神学博士学位，伍士德大学于一八八八年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华盛顿大学和杰斐逊大学于一九〇二年也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在登州办蒙养学堂期间，他还每年抽出三个月时间，到胶东半岛巡回布道，并在各地为传教士举办的进修班和为中国籍传道人开办的培训班讲课。

但是，狄考文在校外担负的最主要任务，是编教科书。一八七七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大会时，通过了一项

决议,那就是各教派联合组织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对外称益智书会),推举狄考文为委员之一,并担任主席。决定编写初、高级两套教科书,初级教科书由傅兰雅负责,高级教科书由林乐知负责,并确定编辑方针和出版计划。狄考文除了主持该会工作外,也承担一些教课书的编写工作。到一八九〇年,这个委员会大约出版了三万册教科书,但狄考文承认质量不高。他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出版的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不是什么教科书,而只不过是宗教传单。”^①

一八九〇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将原来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大改组为中华教育会,狄考文当选为委员之一兼首任会长。每逢年会,他都参加,而且继续参与编写教科书,和提出如何在中国控制和垄断新式教育的阵地。在一八九六年举行的一次年会上,狄考文就教会学校为什么要开设西学课程,总结了三条:一是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二是可以使教会有声望,三是可以使毕业生更有能力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狄考文并非“超政治”的,占领中国教育阵地并按照美国差会的意图办学校的本身,就是干涉中国政治的一种行为。他对中国人民每次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都持敌视态度。一八六六年,美国军舰“舍门将军”号企图强行在朝鲜登陆被中国击沉后,一八六八年,美国军舰“升安多”号又驶往朝鲜窥视。从烟台出发之首,美国海军要求美国领事指派一名翻译随舰前往,狄考文在接到美国领事的指示后,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狄考文博士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虽然他的妻子患病,还有其它事务缠

^①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第560页。

身,使他极感不便”。^①

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爆发,狄考文曾联合山东的外国传教士,向美国驻烟台领事要求派军舰来华进行所谓保护美国侨民。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时,他不肯撤离登州府,而是“在房顶的守望处,观察全部事务的进行”,把他所搜集到的军事情报,全部向美国领事馆报告。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残酷镇压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时,狄考文与在华传教士联名上书差会,要求华盛顿反对八国联军撤出北京,主张惩办革命者,实行复仇主义。当时,美国方面的舆论,就有谴责在华传教士的这种要求的。

狄考文从一八九六年起,还曾参加修订《圣经》官话文本的工作。当时,文会馆校长的职务已移交给另一美国传教士海斯,但是狄考文仍为校董,继续控制着文会馆的行政。一九〇〇年,山东义和团掀起了反帝斗争,狄考文在登州多年经营的文会馆校舍也被毁(这是他的复仇主义的原因之一)。一九〇二年时局平静后,美国长老会与英国浸礼会于六月间在青州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合办山东基督教联合大学的决议。一九〇三年,召开第一次董事会,狄考文等代表长老会参加。本来他是舍不得放弃登州基地的,这时不得不同意将文会馆迁到潍县,与原在青州英国浸礼会办的广德书院合并,办一所文理科联合大学。以两所学校名称的头一个字,定名为广文学堂。一九〇四年,广文学堂正式在潍县开学,由原登州文会馆的第三任校长伯根,担任广文学堂的校长。事实上,到一九〇四年开学时,该学堂已是三个单位合办。这第三个单位就是英国圣公会。广文学校的行政与课程设置,基本上按狄考文在文会馆搞的一套,但增加了英语作

^①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 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第297页。

为选修课。虽然狄考文仍持反对态度，但因这时已不是他独家经营而无结果。学校开始酌收学费全年三十元，加上伙食费二十四元，选修英语者另付五元。广文学堂在一九一七年与青州神学院合并后，搬到济南开学，成为形成齐鲁大学的前奏。

一九〇八年，狄考文忽患腹疾，被送到青岛医治，终因医治无效，于同年九月四日去世，终年七十二岁，被葬在烟台山上。

花 之 安*

(Ernst Faber, 1839—1899)

花之安是德国传教士，是在华传教士中的一个汉学家，是“孔子加耶稣”的积极鼓吹者之一，中外文著述甚多。

生 平 简 述

花之安于一八三九年出生于德国科堡。十九岁考入巴门神学院攻读神学，二十三岁毕业，接着又先后入巴塞尔大学、杜宾根大学和歌塔大学进修，在歌塔大学的植物学教授指导下，曾从事一段时间植物学研究。二十五岁时参加德国基督教礼贤会。礼贤会是德国基督教(新教)创设的，是专门向中国传教的一个差会，总部设在德国巴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即派传教士到中国广东活动，但人数始终不多，规模很小。

花之安于一八六四年到达中国，先在广东内地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实习传教，不久参加了该会开办的学校和诊疗所工作。

由于花之安喉部有病，讲话发生困难，于是悉心研究汉学，希望通过文字著述，达到在华传播基督教和扩张修国侵华势力的目的。但是，礼贤会的负责人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办法，因此对花之安的设想不予支持。

* 本篇合作者为山东省政协王神荫同志。

一八八四年，德国和瑞士的一些神学家集会于德国威玛，成立同善会，其宗旨为派遣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传教士，向异教国家的人民传播基督教。花之安得悉后，决定正式向礼贤会提出辞呈，经批准后加入同善会（又称魏玛差会）。他随即从广东搬到上海，专门从事著述，并与中国士大夫和一些官僚结交。

一八九三年，中华教育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年会，大会主席美国传教士潘慎文在开幕词中宣称：必须在中国大力推广基督教教育，以“打破中国人的傲慢和除去中国人的惰性”。大会着重讨论如何把奴化思想与中国的封建思想相结合的问题。花之安为此在大会上发表了《中国基督教教育问题》的演说，强调在传教和教育事业中，传教士必须充分利用儒家思想，但最终的目的是要用所谓基督教文化来战胜中国的文化。花之安还鼓吹教会学校应当广开英语课程，使英语逐渐取代汉语，而成为东方的语言。

花之安在一八九三年还应邀参加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研究会，在大会上宣读了有关儒学的论文。

一八九八年，德国帝国主义强占青岛后，花之安随即前往青岛，协助德国占领军推行所谓“宣抚工作”。一八九九年九月因患痢疾，在青岛病故，终年六十岁。德国占领军为了纪念他，把建立在青岛的一所医院，以他的姓氏命名为“福柏医院”。他被安葬在青岛，他的生前友好在为他树的墓碑上刻着：“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的先锋，在外国的德国学者花之安。”

著述介绍

花之安的中外文著述甚多。主要中文著述有：

《自西徂东》，一八七九年香港出版，一八八八年上海广学会重版，五卷。

《西国学校》，一八七三年出版。

《教化议》，一八七五年出版。

《人心论》，一八七九年出版。

《性海渊源》，一八九三年出版。

《中国史编年手册》，一九〇二年出版，是在花之安去世后由他人代为整理其遗稿后出版的。

花之安的主要外文著述有：

《儒学汇纂》，德文版，一八七二年出版；英文版，一八七五年出版。

《中国宗教科学导论》，德文版，一八七三年出版；英文版，一八七九年出版。

《孟子思想》，德文版，一八七七年出版；英文版，一八八一年出版，一八九七年重版。

《中国著名男子名录》，英文版，一八八九年出版。

《中国著名女士名录》，英文版，一八九〇年出版。

花之安用中文撰写《自西徂东》一书。他是继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之后，在中国系统地鼓吹“孔子加耶稣”的第二个外国传教士。这部书是他在广东传教期间写的，由香港一位英商出资一千二百元印刷出版。上海广学会成立后，一八八八年又以广学会的名义重印。

花之安在该书“自序”中论及其编写目的时，称：“《自西徂东》之书何为而作也？欲有以惊醒中国之人也。”如何惊醒法呢？就是要求“中国君子同心合力，共往西国，真心求耶稣之理。”他说“夫儒教言理，则归于天命之性；耶稣道理，则归于上帝之命

令，仁义皆全，虽用万物，而非逐物，是以物养吾之心性，而物之精妙莫能违。此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者也。”他批评中国人学习西学，“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益耳。”他认为：“中国欲图富强，有以振兴”，就必须接受外国传教士把孔子与耶稣相结合的说教，听从德国侵略者摆布。

为此目的，花之安用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为卷名，分五卷阐述他的观点。

第一卷“仁集”，讲了十三个问题，重点放在“解息战争”、“怀柔远人”、“爱怜仇敌”、“论家主财东法则”等以敌为友和阶级调和论等方面。他引证《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后提出：

“伏愿华人早捐往日之嫌，推心置腹，相待以诚，复圣人怀柔之典。……耶稣教人，专以仁德化人，欲人无报仇之心，不记仇敌之犯我，为庶民言之也。……传曰：博爱之谓仁。仁则无所不爱，善我者固爱之，恶者我亦怜而爱之。……所以仇敌犯我，其心坦然，自不与之争也。”^①

第二卷“义集”，提出了十六个问题，要中国政府“绥靖地方”、“广行恕道”，和遵守“万国公法本旨”。他写道：“吾愿有国家者，体此意而行，切勿固执，罔知变通，则恕道之行，自觉中外无齟齬之事。”^②

第三卷“礼集”，着重提出了“宾礼主敬”、“齐家在修身”、“孝本爱敬”等问题。他写道：“吾愿中国人士，接宾款客之余，无谄无骄，行礼归于中正，无论燕饮赠送，皆得夫爱敬之真心，则雅令

① 《自西徂东》第1卷，第44—49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67—71页。

之间，斯诚彬彬之君子矣。”^①

第四卷“智集”，介绍了一些西方科普知识，包括“农政善法”、“机器利用”、“开矿国富”、“武备发明”、“精究医术”、“格物功用”等十七个问题。

第五卷“信集”，主要提到西方基督教情况，还介绍了西方基督教如何在工人中活动。他写道：“至于工人聚集之处，或村落，或会馆，常有教士以善言劝导，或派善书，以化其梗顽之习，使之人人生天地间，贵贱不齐，各有其职，君子劳心，小人劳力，难以强同，各安其分，故无有悖谬之事。”^②

一八九〇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时，当时在上海的花之安，曾应邀出席，并被大会委托用中文撰写一部关于评议中国经书的著作。他原来计划共写五卷，第一、二卷写对中国经书伦理评议，第三卷写中国文学评议，第四卷写中国历史与基督教国家历史对比，第五卷写中国今日之要务。但到他去世前，仍未完成。

花之安用德文和英文写的著述，曾将中国儒家学说和中国历史，向德语和英语国家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在西欧颇负盛名。

由于花之安在大学读书时曾对植物学有一定的研究，他曾协助俄国著名植物学家贝勒编写《中国植物》一书，并为该书写了《中国经书中的植物学》一章，附有注释、附录和索引，于一八九二年出版。^③ 贝勒是俄国里加人，一八三三年出生。一八六六

① 《自西徂东》第3卷，第16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42页。

③ E. V. Bretschneider: *Botanicon Sinicum*. 贝勒还著有 *Early European Researches into the Flora of China* 和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等书和发表过许多论文。

年至一八八三年在俄国驻华公使馆任医生。他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中国植物学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除出版《中国植物》一书外,还出版了一些其他著作和论文。

一八八七年,花之安陪同另一美国传教士赫斐秋,深入四川内地峨眉山一带研究植物,采集标本。花之安在这次旅行中,曾发现一些新的植物品种,即以他的姓氏定名。赫斐秋于次年写成和出版了英文《华西峨眉山旅行记》一书。^①

① Virgil C. Hart. *Western China. A Journey to the Great Buddhist Centre of mount Omei.* 1888 年出版。

谢 卫 楼

(Devello Zololos Sheffield, 1841—1931)

谢卫楼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四十余年,长期从事教会教育事业,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华北有一定的影响和代表性。

谢卫楼于一八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出生在纽约怀俄明的甘斯维尔镇。一八六一年当兵参加美国内战,一八六三年脱离军队到本乡教书三年。一八六六年二十五岁时考入纽约奥伯恩神学院,攻读神学三年。在神学院里,他立志要到海外去当传教士,向美国公理会差会部提出了申请。公理会接受了他的申请,决定等他毕业后派到中国传教。一八六九年谢卫楼在神学院毕业,随即被封立为牧师。两个月后,他与爱丽娜·谢里尔女士结婚。婚后三个月,就和新夫人一起从纽约上船,于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中国,被安排在离北京东面二十余公里的通州(今通县)传教。

公理会华北教区

公理会是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基督教差会,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该会随即开辟华北教区,派遣原在上海传教的白汉理,前往天津建立传教据点。一八六九年,谢卫楼夫妇到中

国时，公理会在华北又增加了三个据点：北京、张家口和通州。通州据点是在一八六七年由该会在天津的传教士江戴德所建立。第二年他在通州开办了一所潞河男塾，招收几名在街头乞讨的小乞丐进校读书，供给食宿和衣物等。这所男塾逐渐演变为华北协和大学，后与美以美会在北京开办的汇文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

二十八岁的谢卫楼和他的夫人到达通州后，一面开始学习中文，一面协助传教，在通州教堂和城外的几个分堂实习讲道，并在潞河男塾里教一些课。

谢卫楼到达华北的时候，正值天津教案爆发，人民群众对外国侵略者利用宗教侵华正同仇敌忾。通州的老百姓也不例外，因此入教者极少。谢卫楼在通州活动了七、八年之后，效果还是不佳，为此，他对这种直接传教法渐渐感到失望。

潞河男塾里，除了普通班之外，又添设了神道班，学生来源仍然多数是乞丐。当他们读了一段时期后，就派去充当传教士的助手。直到一八七七年，全校学生仍只有十七名。由于传教工作开展缓慢，谢卫楼于是试图通过办教育来打开局面。

上海会议与华北灾荒

一八七七年五月，上海举行首次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全国会议，谢卫楼也前往参加。会上，在山东开办教会学校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作了有关教会教育问题的专题报告。传教士对此展开了讨论，某些传教士认为，过份强调教育事业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应以直接传教为首要任务。谢卫楼对于教会办学校是赞同的，认为它可以充作传教的辅助，吸收一批学生入

教,并且培养一部分传教助手,但又担心如果给学生传教一些神学以外的西学课程,可能反而使学生背弃宗教信仰。因此,他对狄考文在山东开办文会馆、设置西学课程,是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的。当然,传教士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方法上有所不同。^①

谢卫楼回到通州不久,华北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公理会华北教区决定投入赈灾活动,派谢卫楼和其他两位公理会传教士,前往山东协助李提摩太等人,到重灾区施行赈济。他们一行于一八七八年夏天到达山东,一共带了六千两银子,身佩手枪,到大约一百个村庄向一万多灾民发放赈款。谢卫楼等利用赈灾机会,向灾民传教。有一处村民,在外国传教士宣讲菩萨无用的鼓动下,竟把一处庙宇内的大小菩萨全部搬走,把这所空庙让给外国传教士,充作礼拜堂。^②

谢卫楼在山东赈灾完毕后又回到通州,继续他的传教活动和教学工作,他逐渐增加教学量,并开始编写教科书。谢卫楼编写的第一部中文教科书是《万国通鉴》,是用浅文言写的。此书包括西方各国简史,对印度、日本等国的历史也略有叙述,而重点是放在基督教史。包括基督教的起源、教义、发展,和基督教文化与异教文化的对比等内容。当时公理会差会部不肯出钱印刷此书,后来,谢卫楼借了钱于一八八二年由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开设的美华书馆印刷发行,共分六册。此书不仅作为教会学校课本,也对外销售,对当时部分中国人包括部分官员,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①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第171—179页。

^② W. E. Strong: The Story of American Board: An Account of ABCFM. 第261页。

通州潞河男塾发展缓慢，到一八八三年小学班的学生仅有三十名，神道班的学生共十名，与其他在华教会学校情况相同。而在沿海一些通商口岸，当时已出现了教授英语和一些西学课程的教会学校。

纸上谈兵筹设大学

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五年，公理会华北教区曾为在天津筹建一所大学讨论了三年。先是由在天津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山嘉理，在一八八二年五月举行的公理会年会上倡议：根据李鸿章等在天津等地建立洋务企业需要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的情况，教会应利用这样的时机开办教会大学，这样，既可传教，又可将这些受过教会教育影响的知识分子，输送到各个洋务企业中去。学校定名为“英华书院”，以山嘉理为首，组成一个五人委员会，负责草拟筹建计划。

同年十一月，山嘉理等写出了一个计划草案和学校章程草案，并建议在天津组成一个学校董事会，由公理会领衔，在国内外进行募捐。山嘉理希望这所大学能具有与欧、美大学同等的水平，教徒子弟和非教徒子弟都可报考入学。大学设三个部：初级部三年，预科二年，大学本科四年。初级部主要课程有中文、英文、地理、历史和数学。预科除继续读初级部的课程外，再加拉丁文、希腊文、代数、朗诵、作文等课程。大学本科包括中外文翻译、作文、公文程式、拉丁文、希腊文、地理、历史、逻辑学、修辞学、演讲术、代数、几何、三角、测量学、生理学、动植物学、化学、矿物学、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法等课程。山嘉理等所计划开设的课程中，没有宗教课。但是，他们并非放弃传教。传教士们信守

的格言是：“科学是宗教的婢女。”他们向美国公理会差会部提出的筹建报告中，还是强调传教是第一位的，教育是第二位的；同时又指出，美国立国之初在新英格兰首先办起哈佛大学的历史经验。该大学在表面上并没有突出宗教，而是重视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成为美国的光荣与力量。但是，差会部答复：他们没有经济力量来办这样一所大学，传教仍然是最主要的任务。

谢卫楼对山嘉理的办学计划并不积极响应，虽然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利用教育这个工具以扩展外国教会势力的重要性。山嘉理的计划遭到差会部否决后，他和谢卫楼等又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募得一些钱，买了一块地，又向差会部申请一万美元开办费，并强调一定遵照差会部的意见，办一所纯粹的教会大学。

一八八五年春天，公理会华北教区举行年会时，传教士们对必须在中国建立一所大学的看法已渐趋一致，只是在建立什么样的大学上有分歧。一部分公理会传教士主张，所筹建的大学，不但应该教授英语课，其他西学课程也应采用英语授课，并且要招收非教徒子弟入学，毕业生主要出路是走向社会；而谢卫楼等人则反对用英语教学，强调宗教灌输的重要性，主张多吸收教徒子弟入学，学生毕业后，主要为发展教会势力效劳。谢卫楼在通州办的教会学校，就是这种类型。由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差会部又迟迟不肯出钱，这样计划在天津筹办公理会大学讨论了三年之久，仍然没有付之实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潞河男塾的发展

与此同时，谢卫楼等传教士所开办潞河男塾却在逐步发

展，一八八六年至一八八七年，学校正式改名为潞河中学，学生共三十名，其中二十六名为住读生，四名为走读生，全部是教徒。

谢卫楼对在天津办一所高标准的教会大学，一直持消极态度，但却积极致力于把潞河中学改为大学程度的教会学校。一八八八年，他向美国公理会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拨给经费，把潞河中学扩建为大学。

谢卫楼此时对于把在中国办教育视为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看法，这些看法在十九世纪末在华传教士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谢卫楼先是在一八九〇年二月七日的北京传教士协会上作了题为《教会教育与其他传教工作分支的关系》的长篇发言，后来在上海出席全国传教士会议上，又作了题为《教会教育与中国当前状况与需要的关系》的长篇报告。前者刊登在《教务杂志》上，^①后者载入大会记录。^②

谢卫楼向北京的各派基督教传教士声称：教育就是在传教，因为在华北迄今为止的直接传教活动令人失望。他认为：“传教工作做得太分散，播种神圣的种子因撒得太开所耗去的时间实在太多，以致无法回过头来在种子上浇水、除草和松土，使幼苗得以成长。”

与会的有些传教士反对办教育，因为《圣经》里面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没有指示要办教育开学堂。谢卫楼在这篇文章里说，这同某些中国人坚持孔夫子和

① Chinese Recorder. 1890年6月，第250—257页。

②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第467—476页。

祖先都没有说过要修筑铁路，因而把已经造好的铁路拆掉一样地保守。他说办教育与传教并不矛盾，而且可以巩固传教的成果，培养一大批忠实于教会的中坚分子，为发展外国教会势力奠定基础。

这表明，谢卫楼这时的思想，与一八七七年的思想相比，已有所发展。当时，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就是提倡办教育以扩展美国在华影响的。十多年来，他所开办的登州文会馆在山东已经初具规模。因此谢卫楼也企图把通州的潞河中学，扩展为和山东登州文会馆一样的规模。

谢卫楼在一八九〇年五月上海全国传教士大会上的报告中，除进一步阐述上述观点，还特别叙述了中国近两千年来各个朝代都强调以儒家的经典教育后代，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并指出，儒家思想不能达到西方认为的教育的最高目标——认识西方的上帝。为此，谢卫楼认为，只有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国家带来的文明才能使中国走向光明，只有开设由传教士控制的洋学堂，才能使中国现代化。谢卫楼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写道：“教育是未来中国的一种力量，基督教会必须为了基督使用这种力量，否则撒但就会用来反对基督。教会必须积极办教育……这样就可使基督教徒占据有势力和有影响的位置，在政府里做官，做传授西学的教师，当医生，当商人，或在中国早已开设的大企业中当督办。”^①

谢卫楼的这些观点，反映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华大部分基督教传教士的观点，预示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教会学校将向更高级发展的历史背景。这是与资本主义上升到帝国

^① Chinese Recorder. 1890年6月，第250—257页。

主义阶段是完全相适应的，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使美国帝国主义逐步能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其势力范围，企图控制中国。

潞河书院的建立

华北公理会在—八八九年举行年会时，通过了一项决议，把该会在通州办理的潞河中学升格为大学，并向美国公理会差会部提出正式申请，并要求拨出办学经费。

—八九二年，该校学生从原有的三十七名增加到六十二名，其中有十名据称已具备大学程度。这年期终，第一批有五名大学生毕业。这批毕业生被分配在华北公理会一些教会内担任传教工作，成为外国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在校的六十二名学生，除了八名是通州本地人外，其他来自天津、北京、张家口、保定府等地，都是公理会保送入学的教徒子弟。

—八九三年，该校正式命名为潞河书院，附设中学和戈登纪念神学院。校长仍由谢卫楼担任，他还兼任校董会主席，神学院则由富善牧师负责。富善也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八六五年来华，在通州传教。他除精通中文外，还精通蒙古文，用了近三十年功夫把《圣经》译成蒙文，并于一九一九年出版。

在学校开支方面，谢卫楼曾煞费苦心到处筹款。早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后来出任外交官的卫三畏，答应将他编辑出版的《汉英拼音字典》的销售所得，全部捐赠给谢卫楼，共收入八千美元充作学校经费，美国威斯康辛的富商卜雅各捐赠了三万五千元给谢卫楼，美国公理会差会部也拨了一部分经费。但是，他毕竟不如后来的司徒雷登神通广大，因此，限于经费和师资，学校无论在规模、设施和教学上，都称不上是一所大学。

潞河书院的办学宗旨是，“输送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去开辟基督教的各项工作”，要求该校的所有毕业生本着基督徒的热心，去当教会学校的教师，或进神学院深造后当牧师，和到教会医院当医生。“本校的基本目标是，培养青年成为教会工作人员，以满足教会日益增长的需要。”^①这是谢卫楼一直坚持的主张，因此他不赞成在潞河书院开设外语课程。但除了宗教课以外，也开设一些用中文教授的西学课程。

谢卫楼用中文为潞河书院编写的教科书，除了一八八二年出版的《万国通鉴》外，还有在一八八九年出版的《教会史记》，一八九六年出版的《理财学》（即政治经济学），一九〇七年出版的《心灵学》（即心理学）和《是非要义》（即伦理学要义）等，以上各书后来都曾重版过。

一八九六年，谢卫楼被推举为中华教育会会长，这是由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于一八九〇年在上海组织的一个跨宗派的联合教育团体。一八九七年，谢卫楼以教育会长的身份，在《教务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基督教教育在传教工作中的地位》一文。^②虽然他的侵略视野已比一八九〇年放宽了，认为教会学校除了宗教灌输之外，也应传授一些一般性的知识，但仍然主张宗教灌输是第一位的，其他都属第二位。他的教育思想和狄考文是一致的，竭力反对在教会学校教授英语课，这和当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北京的汇文大学等，有所不同。一八九九年谢卫楼辞去了中华教育会会长的职务。

谢卫楼为潞河书院定的校规，与当时在华一般教会学校同样严格，学生必须一切都听命于传教士摆布，不得有所违抗。每

① Chinese Recorder. 1895年5月，第226页。

② 同上书，1897年2月，第79—83页；1897年3月，第125—129页。

个学生必须参加全部宗教活动，包括星期天的礼拜在内。谢卫楼并不是不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在形式上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但是他认为在中国不但宗教需必与教育相结合，而且对于西学的传播，也必须由外国传教士垄断，以宗教统帅西学。

在义和团运动以后的日子里

由于外国侵略者自鸦片战争后六十年来对中国不断地侵略与掠夺，一九〇〇年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地处北京近郊的通州潞河书院，六月九日被愤怒的群众焚毁，学校被迫停办。这时在华北的一部分外国传教士，显出了他们侵略者的嘴脸，以复仇者的姿态，要求镇压义和团。当时在北京的传教士，曾打电报到美国要求报仇。这份电报登载在《纽约世界报》的头版头条新闻栏：要求“唤起基督教世界立刻来救援我们脱离险境。事不宜迟，替我们报仇！”^①

谢卫楼居然为这种复仇主义辩护。他说只有“私人性质的复仇是反基督教的”，意思是说，个人报复不是基督教徒所应该做的。但是，要求美国派军队对中国人民实行血腥的镇压，不论从神学的观点或实用的观点来说，谢卫楼认为都是“公正的，完全可行的”。是基督教文明国家向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国家实施的“正义”行动，“传教士不是嗜血者”。^②

传教士是不是嗜血者，要看他们的言论与行为。谢卫楼等

^① New York World. 1900年6月11、17日。

^② Sheffield to Smith. 1901年2月26日，3月26日。See J.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第274, 357页。

传教士当时公开指责美国政府对镇压义和团运动不象德国政府那样有力，并且鼓动美国军队对中国人民实行血腥屠杀，充分暴露了谢卫楼来华办学三十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义和团被帝国主义各国镇压下去以后，谢卫楼又回到通州重建潞河书院，并继续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但是，由于经费和师资缺乏，以及清政府自一九〇一年颁布《学堂章程》，改书院为大学堂，各省设立中学堂，各县设立小学堂，增设西学课程后，教会大学的行政当局深感有实行联合开办的需要，以便有能力与国立大学相抗衡。为此，潞河书院也相应地与其他教会学校合作，于一九〇四年改名为华北协和大学，谢卫楼仍当校长，直到一九〇九年卸任回美国休假。继任者为另一个美国公理会传教士高厚德，他担任华北协和大学校长，直到一九一八年。在该校与北京汇文大学等校合并后，一九一九年起由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学校名称后来改为燕京大学。

谢卫楼自美国度假归来，已是七十高龄的人了。他仍旧回到华北协和大学教书。当美国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穆德来华时，他曾以译员身份陪同到各地活动。谢卫楼在华长达四十四年之久，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他信守的格言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我们在中国所要的是献身于为基督服务的力量。”^①在谢卫楼的心目中，所谓基督服务，就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代词。一九一三年夏天，谢卫楼到北戴河休养时，于七月一日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他的遗体葬在通州。^②

① K. C. Liu 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第84页。

② *Chinese Recorder*. 1913年8月，第503—505页。

李 提 摩 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长期在中国从事赈灾和鼓吹变法活动，自一八七〇年来华，一九一六年回英国，在中国活动长达四十五年之久，其间有二十五年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在插手干预中国内政方面，李提摩太是最活跃的传教士之一。

在威尔士的早年生活

李提摩太于一八四五年十月十日出生在英国南威尔士卡马登郡的一个名叫弗迪布兰宁的村子里。他排行第九，父亲是一个铁匠兼农民，拥有一座小农场，在两处浸礼会教堂担任执事。李提摩太的童年是在父亲的农场度过的，在本乡小学念书直到十四岁。一八五九年四月十日，在本乡的小河里接受洗礼，成为英国浸礼会的教徒。据他自己回忆：在他受洗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做礼拜时，“感觉到好象有一个声音命令我到国外去当传教士”。^①

李提摩太十五岁时，到离家二十英里外的一个远亲开办的学校念书，从十六岁起开始不要父亲的资助，一面在一所小学教

^①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22页。

书，一面继续到一家文法学校念书。不久，他考入斯温西师范学院，十八岁时通过考试，被录用担任一家小学的校长。一八六五年，他二十岁时考入在盆布鲁克郡的哈弗福特韦脱神学院。这是英国浸礼会在威尔士设立的三所神学院中的一所。

李提摩太在神学院四年期间，决定到东方去传教，为此选修了有关埃及、印度和中国的历史课程。他认为，文学、艺术、科学、财富等一切文明的力量加起来，都不能拯救世界，只有基督教才有办法拯救世界。所以，后来他经常称基督教为救世教。^①他本想向中华内地会申请到中国去传教，但是英国浸礼会劝他还是向浸礼会差会部提出申请为佳。当时他有一个信念，即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文明的一个国家，只要中国皈依了基督教，就可帮助将福音传到不发达的国家中去”。他还提出，希望能派他到华北去，那里的气候可能对他较适合。^②

浸礼会对外传教会(差会部)是在一七九二年成立的，是英国最早对外传教团体之一，一八五九年派遣第一批传教士到中国活动。一八六〇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该会到山东省开辟了在华北的第一个传教基地。李提摩太于一八五九年春天自神学院毕业后，正式接受浸礼会的雇用，同年十一月被封为牧师，差会部的领导人叮嘱他到中国之后，切记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牢牢掌握在手中，这是重要的。只要知识分子皈依了基督教，中国就有可能转向上帝。据说，这是李提摩太在中国念念不忘的一条“基本原则”。^③

①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25—26页。

② 同上书，第29页。

③ B. Reeve: *Timothy Richard.* 第29页。

开始在山东传教

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七日，李提摩太在利物浦告别亲人，登上了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的“阿基里斯”号出航，于一八七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到达中国山东烟台。从此，二十五岁的李提摩太，开始了在中国的冒险家生涯。

李提摩太抵达烟台的时候，原来派到该地的八个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只剩一个人了，其余七个不是生病死了，就是已经回英国去。这唯一的浸礼会传教士劳顿牧师，在高兴地接待了李提摩太之后，不到四个月也突然因病去世，留下李提摩太一个人负责教务。他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在中国助手帮助之下传教。当时，在烟台还有苏格兰圣经会派去的传教士韦廉臣，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狄考文等人。韦廉臣后来是广学会的创办人，倪维思和狄考文后来先后成为山东教区的负责人，和文会馆的校长，与李提摩太都有密切的交往。

李提摩太象早先来华的传教士一样，在烟台挨家挨户散发或销售福音书和街头布道，进行传教活动。他很快就不耐烦于这种做法，不久就同苏格兰圣经会的另一英国传教士李利牧师一起出发，到山东半岛各个主要城镇转了一圈。第二年，即一八七一年，他又同李利牧师四次离开烟台，到各地侦察，其中一次曾远至东三省的鸭绿江边。他们是闯入沈阳的最早一批外国传教士。他们随身都带了左轮手枪，路上一面销售福音书，一面进行实地侦察，据说“富饶的东三省给李提摩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①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40—47页。

李提摩太在烟台的传教工作，收效甚微。人们被吸引到教堂里去，与其说是听道，毋宁说是看洋人的相貌，和听他们说不熟练的中国话。少数受洗礼入教的，也都是穷人。李提摩太说：“于是，我开始执行‘寻找上等人’的计划，因为我发现他们有良好的土壤可以撒种。”^①在李提摩太的心目中，“上等人”就是指那些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他开始认为，只要这些人信了基督教，整个中国就会接受福音了。他写信向英国浸礼会差会部报告，说：“我现在专门找上等人，只要得到了上等人，就可以得到其余的一切。”^②

李提摩太的这种“走上层路线”的传教方法，并不是他的发明，早在三个世纪以前，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就采用了直接打入宫廷的办法，以发展西方基督教的势力。从此，李提摩太开始学习中国儒家典籍，熟习儒者礼仪，了解中国儒家、道家和释教的思想体系，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地方官吏和士绅接触。

一八七三年秋天，李提摩太首次前往济南，当时正值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他和同去的几个传教士，到考棚向应试的文人销售了约二千本福音书。为了能吸引士绅听道，李提摩太先向他们表演一些简单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变一点“魔术”给这些人看，企图破除他们对阴阳五行的迷信，然后给他们讲解基督教的上帝。^③

一八七六年九月，李鸿章到烟台与英国政府代表威妥玛签

①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48页;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49页。

② T. Richard: *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s in China*. 第1卷, 第81页。

③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56—57页。

订《烟台条约》时，适有他的一个部下患痢疾，李提摩太乘机送了一些药品去。这是他与李鸿章的初次会面。^①

李提摩太在一八七四年把他的活动基地迁往青州府（今益都）。一八七五年一月他住在青州的一家旅馆里，为什么不租屋定居而要住在旅馆里呢？这是因为他怕定居下来遭到驱逐。他还改穿中国儒生的长袍，并在脑后系上了一根假辫子。他冒充医生，随身带了一些药，主要有樟脑油和奎宁丸。他采用这些手法，逐渐结交了一些人，然后租到了一座房屋，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教会。^②青州府原是一个宗教中心，有回教的清真寺，和相当数量的回教徒，还有佛教的庙宇。李提摩太迁到这里的目的是企图建立基督教的势力，并逐渐取而代之。据曾经为他写传的苏慧廉，写道：“氏在内地传道，已经过几年，想到布道方法，从官绅入手，是自上而下，威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较比使水上流，为势自顺，所以决定要先引领上等人入道。”^③

在山东赈灾

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九年期间，华北的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等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据估计，华北五省饿死的老百姓约有一千万人，土地大片龟裂，寸草不长，树皮全部剥光，家家户户门窗都拆光，锅底朝天，牲畜全部杀光、吃光。大批饥民向东北或南方各省逃荒，每亩土地的地价只值原来的

①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68页。

② B. Reeve: *Timothy Richard*. 第49页;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71页。

③ 苏慧廉(梅益盛、周云路译):《李提摩太传》(国外布道英雄集)第6册,第94页。

四分之一，还卖不出去，到处在卖儿鬻女以换取粮食，有的地方甚至发展到易子而食的地步。真是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一幅凄惨的人间地狱图。

李提摩太所在的青州府，灾情特别严重。据李提摩太一八七七年二月间写给英国浸礼会差会部的报告中，称：“去年夏天广大群众的呼声是雨、雨，而现在则是求生了。玉米都已吃光，他们现在吃的是玉米壳、蕃薯茎、榆树皮、荞麦秆、芜菁叶和草籽。这些草籽是从地里采集的，把尘土筛净。当这些东西都吃光后，他们把房屋拆掉，把木材卖掉。据报，到处有许多人在吃屋顶上已经腐烂的高粱秆。晒干的叶子一般是用作燃料的，无疑他们都在吃那种干叶。千万人在吃它，另有千万人因吃不着它而死去。他们在卖衣服和卖孩子。”^①李提摩太估计青州府农村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②受灾县饥民有二三百万人，饿死的人已达五十万。^③

清政府除了派恭亲王在北京向玉皇大帝求雨外，还责成山东巡抚丁宝楨负责赈灾工作，朝廷拨给青州府的赈款，有四万三千两银子。^④丁宝楨还在地方上筹集赈款，并采取一系列救荒措施。尽管如此，由于清朝各级政府的腐败和交通运输的困难，山东的灾情仍有增无减。这就给了传教士们可乘之机。他们深入灾区大肆搜集情报，同时通过募捐参与部分救济工作，作为扩展外国教会势力的手段。对于李提摩太来说，更是给了他可以同清政府的大小官吏进行接触的机会，为他今后干涉中国政治，打

① P. R. Bohr: *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T. Richard*, 第14页; Richard to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77年2月12日。

② 同上书, 1878年1月24日。

③ 《万国公报》第490期, 1877年3月17日, 第415页, 山东灾荒近况。

④ 同①, 无日期。

下了基础。

面对青州府的严重灾情，李提摩太首先在当地的十一个城镇张贴大幅黄纸告示，劝导百姓不要到庙里去向泥塑木雕的神求雨，而要向活的上帝求告，只要信从西方的上帝，就可以有生路。不少老百姓看了告示后，到李提摩太的教堂来请教该怎么办，李提摩太就乘机向他们传教，吸收了相当一部分人入教。^①

可是，入教的老百姓仍然是饥肠辘辘，西方的上帝并不见得比庙里的菩萨灵验。于是，李提摩太想到，必须设法开展一些救济活动，才能把到教堂求神的老百姓笼络住。李提摩太开始在青州府给一部分灾民发放小钱，每次发完之后，就命灾民下跪，他则口中念念有词，向天祈祷，求上帝降雨。老百姓看到，洋人求雨，老天照样无动于衷。李提摩太向山东地方政府建议，应派人到朝鲜或日本去购米，免税进口发给灾民。同年（一八七七年）七月，李提摩太专程到济南去拜会山东巡抚丁宝楨，向他报告目睹的灾情和所做的赈灾工作，并要求政府加速救灾的步伐，以免大批灾民死亡。^②

这时，在烟台的外国侨民捐助了一笔款子，汇给李提摩太。他把这笔捐款转赠给青州的地方官，请他们发放给灾民，这是为了讨好地方官，以便将来能自己发放赈款而故作姿态。不久，烟台又汇给李提摩太第二笔捐款。他向地方官请求可否让他直接发放给最困难的灾民时，很容易就获得了许可。

与此同时，李提摩太还通过在上海的英文《北华捷报》和《申

①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98页；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87页。

②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104页。

报》，刊载他所写的山东灾情报告，^① 向上海及南方沿海城市居住的外国侨民呼吁捐款赈灾，得到了他们的响应。他们希望由租界工部局出面，组织一个委员会尽快募集捐款，帮助灾区人民。同年三月，由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组成的山东赈灾委员会宣告成立，首次募集了三千两银子，汇给李提摩太。同年秋天，该委员会又陆续从上海和国外募得三万余两银子，汇给李提摩太。^② 在烟台，由外国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组成的赈灾委员会也进行募捐，李提摩太使用这些源源而来的捐款，逐步在山东扩大了赈灾的范围。

李提摩太认为，救济活动是扩展外国教会势力的得力手段，他写道：“因为我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传的宗教是好的。”^③ 他在山东手持“祈求真神”的大木牌，到处向灾民传教，一年之内就招收了二千名教徒。^④

李提摩太在山东的赈灾工作，持续到同年（一八七七年）十一月份。据他报告说，他在山东至少救助了七万灾民，^⑤ 吸收了一大批吃教的教徒，结交了一批地方官吏和士绅。

在山西赈灾

一八七七年十一月，李提摩太带了由李鸿章发给他的通行

-
- ①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119页；《申报》1877年4月3日。
② *North China Herald*. 1877年8月15日，8月14日，11月5日。
③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105页。
④ 同上书，第106页。
⑤ E. W. P. Evans: *Timothy Richard: A Narrative of Christian Enterprise and Statesmanship in China*. 第61页。

证，乘骡车前往山西太原府，到那里先去拜会山西巡抚曾国荃。曾国荃对传教士早具戒心，认为他们在灾区搞救济活动的目的，是在“盗窃中国人的心”。^①李提摩太对曾国荃说，他带来二千两银子准备发放给山西的灾民，曾国荃没有同意；他又要求曾国荃让他收容一批孤儿抚养，也遭到曾国荃的拒绝。而当时在太原或其他地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已获曾国荃的批准，在帮助赈灾。于是，李提摩太向天主教传教士发信，要求取得他们的合作，并请他们把已经搜集到的有关灾区的死亡率、粮食价格、移民比例、妇女与牲畜的流散等情报，向他通报。^②

李提摩太在太原把这些信件发出后，就于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带了一名仆人，各骑一匹骡子，出发到晋南一带实地调查灾情。经过两个星期、六百三十里行程的考察，他搜集到足够的情报，并绘制了地图，于二月十日回到太原。

李提摩太再次要求曾国荃让他在山西帮助赈灾，曾国荃派他的下属官吏同李提摩太进行谈判，要他必须在地方官吏监督下，到指定的地点阳曲县，向灾民每人发放五百文救济金，不得单独行动。李提摩太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山西开始赈灾的。

由于华北灾区面积不断增加，上海外侨集会并在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组成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设局于上海，负责向国内外劝捐赈济。^③这个委员会的常务工作，先是由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老板托马斯负责，不久大权落到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手中。

这个委员会向西欧和美国各界人士发出呼吁：“骇人的灾荒

①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136页。

③ 《万国公报》第466期，1877年12月1日。

席卷整个华北。据报有九百万人民陷于困境。市场上天天有人为了换取一点粮食卖儿鬻女。本赈灾委员会向英美各界呼吁援助。请求组织伦敦(或美国)援华委员会,将募集的捐款汇寄至香港汇丰银行收转。”^①

美国方面没有响应,在纽黑文的一部分美国学界知名人士曾联名写信给美国国会,要求把一八五七年以前清政府偿还给美国政府的一部分赔款二十四万美元,拨给上海赈灾基金委员会,遭到国会的否决。^②

英国和西欧各国一共募得二十万两银子的捐款,^③陆续汇寄到上海。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在山西一共发放了十二万两赈款。这项赈灾活动到一八七九年年底前基本结束。当时,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先后在华北灾区活动的,有三十余人,以李提摩太为主要负责人。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华北灾区活动的,有六、七十人。这是外国传教士第一次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救济活动,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搜集情报和发展教会势力。传教士也不得不承认,对如此众多的灾民,每人只发给二百文至八百文钱,确实也维持不了灾民几天生命,只求他们在饿死之后能升入天堂,“永远享福”而已。^④

李提摩太在山西从事繁忙的赈灾工作期间,于一八七八年十月抽空到烟台去结婚,他的新夫人是苏格兰长老会的女传教士玛利·马丁女士。当时李提摩太已三十三岁,新婚之后,他俩立即再到太原一起从事赈灾工作。

①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China Famine Relief Fund. 第14—15号。

② 同上书,第38—40号。

③ B. Reeve: Timothy Richard. 第53页。

④ W. T. A. Barker: David Hill. 第119页。

一八八四年以前提出的变法主张

早在一八七六年七月，李提摩太在济南初次会见山东巡抚丁宝楨时，曾说过发生旱灾的原因，基本上是经济的原因，必须进行某些经济改革以防止可能再次发生的自然灾害。他向丁宝楨建议，在山东建设铁路和开矿，以便加强运输能力、增加社会财富和扩大就业等。但不久丁宝楨调往四川，这事也就不了了之。^①

李提摩太还曾向山东地方官员提出，农业改良和建立新式学堂的建议。他说只要山东地方政府肯出地拨房并批给一半开学的经费，他愿自告奋勇负责管理这所学校，并在校内开设西学课程，给学生传授西方科学技术。^②这条建议也未被采纳。

一八七七年李提摩太到山西后，曾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灾宜设法早救》一文，^③提出应采取以工代赈办法。在与山西巡抚曾国荃的会见中，李提摩太建议应把灾民转移到东三省去垦荒，以减轻山西的压力，同时在山西筑铁路。这样，既可解决一部分灾民的生计，又可预防未来的灾荒。^④

从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到一八八二年一月，李提摩太又以“中西友”的笔名，在《万国公报》连载他写的《近事要务》长篇论说，提出了大约一百条建议，以求达到根治中国灾荒的问题。这些建议，要求清政府设法控制自然，改良农业，开矿设厂，发展交

①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104页。

② 同上书，第121—124页。

③ 《万国公报》第457页，1877年9月29日。

④ 同①，第137页。

通,开办银行,促进贸易,广设西式学堂,容许自由传播基督教,同西方各国保持友好,等等。^①这是李提摩太试图通过《万国公报》,向中国知识界鼓吹他的变法主张的开始。

此外,李提摩太还向英国订购了一批科技书籍和一些仪器设备,从一八八一年到一八八四年,在太原府每个月举行一次报告会,邀请一些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来听讲,并观看他的科学示范表演。在他表演完毕后,就把这些都归结为上帝的“奇妙作为”。^②而官员除了对这些表演感到新奇之外,不论对上帝或是对中国的改良,都无动于衷。

一八八〇年左宗棠路过太原府时,曾接见李提摩太。左宗棠向他介绍甘肃羊毛厂的概况,李提摩太给他讲解世界地理。^③左宗棠到武昌后,曾邀请李提摩太到他那里去当顾问,李提摩太没有去。同年,李提摩太到天津拜会李鸿章,李鸿章一方面对他在山东、山西灾荒中所作的救济工作表示感谢,同时也颇为坦率地向他指出,所招收的一批教徒无非都是吃教的人,一旦“停止付钱给这些地方上的代理人,基督教徒就一个也没有了”。李提摩太听了这些话之后,更加增强了他走上层路线的信念,以为只要使中国的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信基督教,就可以使全国老百姓都成为基督教徒。^④

一八八二年,张之洞接任山西巡抚后,李提摩太曾多次拜会张之洞,向他提出一系列变法的主张。张之洞看到李提摩太变法心切,就派人去请他放弃传教工作,出任政府顾问,实施他提

① 《万国公报》第664—675期,1881年11月12日至1882年1月28日。

②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160—163页。

③ 同上书,第166—167页。

④ 同上书,第151页。

出的改革计划。李提摩太回答他们说：“我虽然知道这些改革的价值，但我不是一个专家。如要顺利地实现各项改革，需要有一批各方面的专家参与其事。”张之洞的代表，一再坚持请他出山，李提摩太这时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推说不能随便离开传教士岗位，而谢绝了张之洞的邀请。^①一八八四年，他向山西地方官送交一份改革山西政治的《富晋新规》建议书。^②

一八八四年，李提摩太前往北京，同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和总税务司赫德，对“改革中国”的计划交换意见。李提摩太主要向赫德提出清政府应派一些代表团，到世界各国去考察，他写道：

我向赫德提议：“一、以一名中国亲王为首，由若干著名政治家如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为辅，组成一个代表团，应出国周游世界，实地考察别国的情况。二、由若干名帝国著名学者组成一个代表团，应出国考察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回国后提出考察报告。三、由若干最聪明和最虔诚的人士组成一个代表团，派他们出国研究世界各国的宗教状况。四、组成一个工业代表团，考察别国的工业状况，回国后提出考察报告。五、组成一个交通代表团，考察别国的各种交通工具状况。六、在北京设立一个联络局，将以上所获得的报告内容通报各省。”^③

李提摩太结束在北京的活动后到上海，在途经南京时，又去拜会在山西结识的、现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除了继续鼓吹他的变法主张外，还要求清政府给予他“宗教自由”。^④

①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132—133页。

② 《万国公报》第11册，1889年12月。

③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143—144页。

④ 同上书，第146页。

李提摩太在一八八四年年底，带了妻子和四个女儿，从上海乘船回英国度假。综观李提摩太早期所鼓吹的一些改革方案，以及请赫德组织清政府的高级官员出访外国，让他们去见识世界的建议，也并非坏事；他通过救灾活动，结识了一些清政府的要员，赢得了一些声誉，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初步形成了一套所谓改革中国政治的设想，使得他参与中国内政的欲望与日俱增。这表明，李提摩太后来干涉中国内政，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出任天津《时报》主笔

李提摩太在英国休假期满后，于一八八六年秋带了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两个大女儿留在英国念书），乘船回到中国。李提摩太没有料到，过去已在中国活动了十五年并获得一定名声的老资格传教士的他，一到山西竟被同行们赶出来，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长达四年之久。据李提摩太自己写道：“当我回到太原府后，我按照过去同样的方法继续我的工作，编印了一份论道教的小册子……在山西的同行们希望我改变自己的神学观点，服从他们的指导……我坚持我有我的行动自由，他们也有他们的自由。为了这个缘故，他们联名写了一封信给英国差会部，非难我的神学观点，和我的工作方法。……于是，我决定离开山西。在十天之内，我就把行李捆好。……十月十八日我带了家眷到天津，……十一月十四日到北京。”^①

李提摩太把家安置在北京后，先与在天津的李鸿章取得联系，提出由清政府每年拨出一百万两银子让他搞教育改革。李鸿章答复他说无此巨款。李提摩太再次向李鸿章进行游说，李鸿章

^①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155—158页。

问他需要多少年才能收到效益？他回答说：“需要二十年。”李鸿章说：“啊！我们不能等那么长时间。”李提摩太没有达到目的，不得已又回到北京。^①李提摩太在北京拜会兵部左侍郎曾纪泽，表示愿意让他的妻子收几个学生，教授英语，以收取一点束脩，维持他一家的生活。一八八八年，他到日本去跑了一趟，也没有什么转机。一八八九年五月，他又独自回到山东，去参加赈灾工作，但因与其他传教士意见不合而离开。他向英国浸礼会差会部写报告，要求拨款给他到济南办一所教会大学，差会部复函说，没有必要办学，命他仍回山东传教，否则听便。一八九〇年，李提摩太到上海出席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全国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基督教差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报告，主张将传教重点移到中国上层官吏和士大夫中间，还提出应加强基督教出版事业等建议。^②

一八九〇年七月，李提摩太时来运转，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特邀他到天津担任《时报》主笔。李提摩太大为高兴，他在《留华四十五年》一书中，写道：“我立刻接受了这一工作，这项任命可说是天赐良机。”^③这不但解决了他一家的生活问题，而且也给了他一个讲坛，可以向千百万中国读者鼓吹他的变法主张。

李提摩太在天津担任《时报》主笔的一年期间，共写了二百余篇社论，后来他把一部分社论汇编成集，题名《时事新论》，于一八九五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全书共分十二卷，并附地图和图片四十六幅。

①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158—159页。

② 同上书，第161—167页。

③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215页。

在《时事新论》卷一“国政篇”内的《书重庆通商停止轮船上驶疏后》一文中，李提摩太一方面说：“中、英所定四川重庆府通商新约不准轮船上驶，洋商之货，只用华船装载，在当轴诸公深谋远虑，固非管窥蠡测者所敢置喙”；一方面却又为英国轮船强行入川以夺取不平等的内河航行权进行辩护，还责怪重庆人民为维护主权所作的正义斗争，是“狃于成见，转生惶恐，仍请停止轮船上驶，虽有通商之名，而无通商之实”。开始显露出李提摩太的殖民主义者的嘴脸。^①

在《时事新论》卷二“外国篇”内的《非洲不能养民致失广地论》一文中，李提摩太说：非洲大片土地沦为外国的殖民地，是“欧洲各国欲拯民于水火之中，不得不率兵至境”。他侮蔑非洲人民“不知利害，自促覆灭而已”。^②

在《时事新论》卷八“新学篇”内的《推广圣贤博学说》一文中，他说：印度被英国侵略者并吞后实施的反动统治，“不数年而俗为之一变，国为之一新，现皆翕然知讲五洲之要务，为自立之始基矣”。言下之意，中国如要讲“五洲之要务，为自立之始基”，则非向印度看齐不可。这是李提摩太首次暴露他妄图使中国变为英国殖民地的狂妄野心。^③

在《时事新论》卷十一“教务篇”内的《教务本末》一文中，李提摩太竟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上、中、下三等，把“亚非利加之内地、中国之苗番”列为“下等人”，把“印度、土耳其等处”人列为“中等人”，而把“英、美、德等国人”列为“上等人”。至于中国大部分汉人究属何等人，他不敢说，但在他眼中，当然不会列为“上等

① 《时事新论》第1卷，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16—17页。

③ 同上书第8卷，第10—11页。

人”。他的“逻辑”就是，不论“下等人”或“中等人”，都需受“上等人”的统治和奴役。^①

李提摩太通过担任《时报》主笔，又增添了不少政治资本，从此他为扩张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开始对中国内政公开地指手划脚。

出任广学会的督办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一日在上海成立，创办人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一八八八年成立董事会，推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为会长，韦廉臣为督办。在最初的职员名单中，没有李提摩太，他也不是会员。

韦廉臣任督办不到三年，就因病于一八九〇年八月间去世，遗缺暂由上海汇丰银行大班艾迪斯代理。李提摩太在天津《时报》一年的活动，博得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青睐。他出面推荐李提摩太为同文书会的督办，得到董事会的同意。于是，李提摩太辞去《时报》主笔，于一八九一年十月正式到上海走马上任。他担任同文书会督办(总干事)的职务长达二十五年，到一九一六年才卸任。

李提摩太接任后，即将同文书会改称广学会(一八九二年二月)，扩充会务，增设售书局，并逐渐增加出版有关鼓吹变法的书籍，进一步调查中国上层社会可作为读者对象的具体人数，并加强与上层分子的联络。他声言：传教士“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

^① 《时事新论》第11卷，第6页。

的学生，我们将把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①

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的二十多年时间里，目的是要“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发皇帝和政治家的思想，这是李提摩太的格言和指导原则”。而主要目标是中国当时的维新运动，企图通过鼓吹传教士对中国的变法主张，把中国的维新运动纳入帝国主义侵华的轨道。李提摩太写道：“我们认为一个彻底的中国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新的道德和新的宗教基础上进行。除非有一个道德的基础，任何维新运动都不可能牢靠和持久。……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给中国所需要的这个新道德的动力。”^②

到一九〇二年为止，在李提摩太主持下，广学会主要出版了以下书籍：《中西四大政考》、《五大洲各国统属全图》、《华英谢案定章考》、《八星之一总论》、《五洲各大国志要》、《自西徂东》（以上一八九二年出版），《性海渊源》、《治国要务》、《开矿富国说》、《国贵通商说》（以上一八九三年出版），《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和（续编）、《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中国变新策》、《醒华博议》、《治国要务》、《新学汇编》、《文学兴国策》、《时事新论》（以上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七年出版），《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富民策》、《足民策》、《大同学》、《英国议事章程》（以上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〇年出版），《万国原始志》、《邦交格致之义》、

① No Speedier Way, A Volume Commemorating the Golden Jubilee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in China, 1887-1937. 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12—13, 99页。

《近时格致之义》、《印度史概要》、《广学类编》等。

以上出版物中，以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最为畅销。梁启超曾称：“《泰西新史揽要》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①

《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的原作者，是英国人麦垦西。书的原名是《十九世纪史》，一八八九年在伦敦出版，书中叙述了十九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李提摩太出任广学会督办后，即在中国助手蔡尔康的帮助之下，着手翻译此书，于一八九五年出版，取中文名称为《泰西新史揽要》。为了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原书中，他在翻译时作了一些篡改和删节。例如，他有意地把法国大革命改译为“法国大乱”，把“自由的进步”改为“绥靖百姓”等。

李提摩太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还用帝国主义的口吻教训中国读者。他写道：“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借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犹幸尚有明敏之才，深知中国近年不体天心、不和异国、不敬善人，实有取败之理。”李提摩太的所谓“体天心”，就是要中国人民接受传教士宣扬的奴化思想；所谓“和异国”，就是要中国向外国侵略者求“和”，屈膝投降，如若“不和，则大危也，大害也”；所谓“敬善人”，就是要中国人民接受这批伪善者提出的使中国变为外国殖民地的变法主张。

李提摩太在接办广学会的初期，书籍的销售量不多，一八九四年仅售出一千余元。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一八九五年广学会的售书量增加一倍，销售金额为二千余元。一八九六年，增加

^① 梁启超：《谈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

了四倍，销售金额约五千九百元。一八九七年，销售金额增至一万五千五百元，与一八九四年相比，增加十四倍以上。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前继续畅销，政变后骤降，销售总金额达一万三千九百元。到一八九九年，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全年销售金额惨跌至二千六百余元。到一九〇〇年，销售金额又回升至一万二千四百余元。一九〇一年销售金额为一万五千六百余元，达到一八九七年的水平。一九〇二年，全年销售金额达四万三千五百余元。^①

原来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自编自办的《万国公报》，一八八九年二月，决定改由广学会复刊出版，仍由林乐知担任主编。李提摩太到广学会后，决定将《万国公报》改为主要鼓吹变法维新的刊物。初期《万国公报》的销路不大，一八九四年以前只有一千多份。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因该刊从七月份起刊载《朝鲜纪乱》（后改称中东之战）的消息和评论，而销数大增。一八九四年为四千份，一八九七年增加到五千份，一八九八年维新运动高涨时，激增至三万八千四百份。戊戌变法失败后销数骤减，义和团运动后又复回升。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前期，只发表过有关赈灾和《近事要务》等少数几篇文章，广学会接办后，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发表的较重要的文章，有《新学（并序）》（一八八九年三月）、《救世教益》（一八九一年一月至一八九二年二月，一八九五年一月至一八九六年二月连载）、《广学会序》（一八九二年二月）、《泰西近百年大事记》（即后来出版的单行本《泰西新史概要》的连载，一八九四年三月至一八九五年五月）、《新政策（并序）》（一八九六年四月）、《帝王初学》（一八九八年三月至一八九八年九月）、

^① 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第105页。

《新学汇编序》(一八九八年七月)、《新政诀》(一八九八年十月)、《醒华博议》(一八九八年十一月至一八九九年一月)、《大同学》(一八九九年二月至一八九九年五月)、《保华上策(并序)》(一九〇一年三月)、《强压召变强伸召霸发微》(一九〇三年五月)、《政教相安平议》(一九〇四年六月)、《仇耶稣教即仇中国论》(一九〇六年十二月)、《美进士林乐知先生哀文》(一九〇七年七月),这是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由于林乐知的死,《万国公报》在同年十二月停刊。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竭力鼓吹传教士们设计的改革中国的方案。一八九六年,李提摩太发表的《新政策》一文,最具体、最集中地表达了他所谓变法的基本思想。他写道:

“窃考中西各国治国之法,中国有四纲领也,皆应亟宜行改革者,一曰教民之法,二曰养民之法,三曰安民之法,四曰新民之法。……论中国目下应办之事有九条目:一、宜延聘可信之西人二位,筹一良法,速与天下大国立约联交,保十年太平之局,始可及兹暇日,重订新章。二、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三、中国地大物博,铁路实富强之本源,……仍电请西国办理铁路第一有名之人。四、某力强年富,心计最工,在新政部应总管筹款借款各事,以中国管理财赋之大臣合办。五、中国应暂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随时入见皇上,以西国各事详细奏陈。六、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应请英人某某,美人某某,总管其事。七、学部为人才根本,应请德人某某,美人某某,……可与中国大臣合办。八、战阵之事,……九、以上各事,应请明发谕旨。……以上四纲领,认真办理,期以二十年,内外之机可以平,中西形迹可以化,天下万国至精至良已行已验之善法,

均可行为中国。……事机已迫，受害已深，果能迅速举行，中国尚有得半之望，倘再迁延贻误，恐燎原之火，立见焦糜，滔天之流，即时昏垫，无穷大祸，近在目前。”^①

无庸诠释，当时清政府果真照此办理，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凡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

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还一贯宣传所谓“渐进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出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张用渐进的方法、改良的方法革新政治，反对流血牺牲，实质上是针对孙中山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政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的所谓“渐进”，其实是“渐进”到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他的所谓反对流血，其实是妄图阻挠中国革命的进程。李提摩太在一九〇三年五月号的《万国公报》上写的题为《强压召变强伸召霸发微》一文，对此作了充分的发挥。他在描述欧洲暴力革命和法国革命流血之惨后，写道：“可见国计之安危，民生之苦乐，既不关君主、民主之制度，亦不涉求新、守旧之藩篱，全在明德新民，终之以止于至善，虽甚衰小，必臻盛大，虽甚贫弱，必底富强。所愿有志振兴者，尽扫自由、平等、革命、流血诸字样，彼此平心静气，浏览各国史乘，而恍然于泥此无识无学之谬语，治天下则不足，乱天下则有余也。”把这篇文章与林乐知先前发表的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文章相对照，就可以明白李提摩太的用心何在了。

但是，李提摩太确也通过《万国公报》介绍了西方的一些新思想、新制度、新方法，甚至他可能还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马克思的外国人！一八九九年二月至五月的《万国公报》，曾连载由李提摩太节译的《大同书》一文，在二月号和四月号上，该文两次提

^① 《万国公报》第 87 册，1896 年 4 月。

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一部分学说。当然，传教士决不会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只是在向中国翻译介绍西方一些社会学说的流派时，无意间带进来的片言只语。

在译介西方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等状况时，李提摩太也不期而然地引进了欧、美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说教，和立宪制度、民主制度、议会制度等；介绍了西方的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状况，以及所采用的一些制度；叙述了西方的出版图书和开设报馆的情况；以及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工矿企业飞速发展等情况。上述各方面的介绍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李提摩太还采用有奖征文办法，以扩大广学会的影响。例如，一八九四年，在上海经营地产投机发财的英国商人汉璧礼捐助广学会六百元大洋，专门作为征文发奖之用。这一年，李提摩太出了五个题目：一、开筑铁路，鼓铸银钱，整顿邮政，为中国振兴之大纲论。二、维持丝茶议。三、江海新关考。四、禁烟微。五、中西敦睦策。李提摩太聘请了王韬、沈毓桂、蔡尔康担任评判，要求作者阅读《万国公报》的“宏儒硕彦”，踴跃投稿。^①

此外，广学会还创办了《中西教会报》，一八九一年二月创刊，至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中断；一八九五年复刊，一九一二年一月起改称《教会公报》，到一九一七年二月停刊。先后担任该刊编辑的，有林乐知、卫理、高葆真、华立熙、莫安仁、季理斐等传教士。内容主要为宗教宣传和教会消息，间以新闻杂事等报道。这份期刊对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则不大。一九〇四年起，广学会还创刊《大同报》，内容以一般知识性文章为主，销数不大，主要由英国传教士莫安仁负责编辑。该报于一九〇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

^① 《万国公报》第27册，1891年4月。

百十九期,刊载李提摩太写的《预筹中国十二年新政策》一文,仍然鼓吹让外国人在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当顾问的主张。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第五百五十四期上,刊登了古德诺鼓吹恢复帝制的文章:《共和与君主》;袁世凯当皇帝不成突然暴卒后,莫安仁又以社论形式撰文声称:“吾人不胜为袁氏一人惜,且不止为袁氏一生惜矣。”暴露广学会对袁世凯之死的不胜惋惜。广学会又曾为儿童和妇女出过期刊,前者于一八八九年创刊,取名《成童画报》,次年更名为《日新画报》,不久又改名为《小孩月报》;后者为一九一二年创刊的《女铎报》。

李提摩太通过《万国公报》等广学会出版的刊物,定期地、大量地向中国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情况,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和一部分官吏,起过程度不等的启蒙作用。即使是关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败于日本的报道,和带有蔑视性的评论,对于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也可能具有警醒作用。

企图变中国为英国殖民地的一次闹剧

李提摩太自一八九〇年担任天津《时报》主笔后,以为自己羽毛已丰,竟直接对中国政治进行长期的粗暴干涉,并向清政府的高级官吏、维新派领袖等,进行旨在变中国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各种政治游说。

张之洞是广学会的赞助者之一,曾多次捐钱给广学会,一八九三年捐款一千两银子,一八九五年又捐一千两,一九〇〇年又捐三千两,这是有记录的捐款数字。^①李提摩太与张之洞过往甚

^①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178,180页。

密，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李提摩太抓住这极为重要的时机，曾前后三次奔赴南京，拜会当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向他提出以下五项建议：“一曰速和日本，二曰今岁必增西学课程，……三曰广筑铁路，……四曰京师阁部府院寺监及外省督抚提镇各衙门，各宜聘一声望素著之西士，奉为莲幕上宾，遇有重大事件必就商之。……五曰凡华人之久居外洋并熟谙西法者，亟宜分别录用，力矫昔年外视通才之弊。”其中第一项“速和日本”，即赶快投降日本，然后在洋人监督下进行以下四项所谓“改革”。张之洞原则上都赞同，但他感到“办理实多棘手”，没有答应下来，只是请李提摩太扩大游说面，“教中国大吏四十员，悉明外事，其属下寅僚，自然观感奋兴。待至官吏之心，无不明白晓畅，则四百兆民人之效法，自更捷于影响矣。”^①

李提摩太会见张之洞之后，又草拟了一份书面计划，准备向更高级、更有实权的李鸿章进行游说。这份计划的内容为：“一，中国应给予某一外国（即英国）在一定年限之内，处理中国对外事务的绝对权力。二，该外国应在中国进行各项改革。三，铁路、矿山、企业等每一部门，都应派外国代表管理。四，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给予外国代表各级官衔。五，在年限到期之后，该外国应将一切资产与债务交还中国。”^②据苏慧廉的《李提摩太传》一书中载称，李提摩太在会见张之洞时已经把这项建议向张之洞提出，张之洞原则上都同意，只提出应把年限规定在十年以内，但又说他不能向皇上奏报这项建议，因为他的地位还不够高。^③

① 李提摩太：《西铎》一、二。

②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236—237页。

③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187页。

李提摩太回到上海后，在一八九五年年初给李鸿章拍了一份电报，说有“妙法救中国”，并向李鸿章勒索一百万两银子。这是继一八八六年之后李提摩太第二次向李鸿章敲诈一百万两巨款。上一次是借口办学堂，这一次是搞政治投机。电文内容可以从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窥见：“上海英教士李提摩太来电：有妙法救目前，亦救将来，请酬银百万。但发一确电，允给款，即详细告知，不成不取云。查不成不取，亦无碍，应否姑允所请，请电复。”光绪帝发下圣旨：“正月十五日（一八九五年二月九日）奉旨电李鸿章：据电称：上海教士有妙法，可救目前。……既云不成不取酬银，不妨姑试，着李鸿章酌办。”^①

李鸿章奉旨后即电复李提摩太，请他把“妙法”详细说来。于是，李提摩太在同年二月二十日拍了一份长电报给李鸿章，据《中东战纪本末》卷三所记，电报全文如下：

为酌拟华、英相助之约，救目前兼救将来，无一损而有百益事：一曰订立华、英互助密约，英许护华不再失地。异日英或与他国失和，华亦允助英。二曰华整饬水师、陆军、学校、赋税，英许同心襄议，改归至善。又许遴荐妥实干员，助臻邦治。倘华欲集思广益，增延他国通材，英亦不阻。三曰华许英择要代筑铁路，开五金矿、煤矿，立工程厂，期以二十年。英许华按廉价购归自便。四曰华许有益通商者，如增口岸，核税厘之类，彼此从长熟计。英许决不损华岁入之帑。

以上四端，撮举大旨，如谓可采，请电总署，速会驻华英使妥议，密电伦敦，期其迅定。或疑此策已晚，然及今行之，

^①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第105卷。

不第杜将来外患，且略裨现在和议。况安内防外、富国足民之道，胥基于此，何东祸之足忧？否则敌人扼吭拊背，肆行要挟，割地索银外，甚或别有觊觎。苟且和矣，如后顾何？

可是李鸿章在收到李提摩太这份复电的前一个星期（二月十三日），已被清廷派为对日本议和全权大臣，并于二月二十一日由天津抵达北京请训，向日本投降已成定局。李鸿章到北京后，在二月二十三日拜会俄、法、英驻京公使，并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承诺。特别是英国公使欧格讷，对李提摩太的“中、英密约”，没有向李鸿章表态，只是要他速与日本议和。

此外，在李提摩太发这份电报三天之前，又到南京去了一趟，二月十七日会见了张之洞。张之洞在二月二十八日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各发一份电报，详述李提摩太与张之洞谈话的内容：“该教士……大意言，此时惟有设法恳英助中国，方能支持。问如何方肯助，李云：‘须多与英国商务利益，如准英商在中国开铁路、开矿、兴各项化学工作制造等事。……若与英国议定，准其在中国办二十年，每年所出之利，酌量分与中国，二十年限满后，仍交还中国自办。……’当诘以二十年太久，答云：‘或十数年’。……又诘以英以何法助中国，答云：‘极力劝和，不使倭人妄为。’诘以能助水师、陆军帮我攻倭乎？答云：‘不能助兵，只能胁和。’并云此系该教士为好之意，自出己见。至如何办法，如何立约，英廷所重者何事，究愿如何帮助，须总署与英公使，中国星使与外部自行商酌等语。”^①李提摩太这次政治投机，终因清政府迅速投降日本而没有得逞，但却充分暴露了这位英国传教士妄图变中国为英国殖民地的狼子野心。

^① 林乐知译：《中东战纪本末》第3卷，附录。

一八九五年在北京的政治活动

李提摩太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的政治投机失败之后，并不死心，他以考察佛教为名，到天台山旅游后，在这年秋天特意又到北京，企图再进行一次政治投机。当时，李鸿章表面上已经失势，但是李提摩太还是先去拜会他，从他那里搜集到清政府最上层的内部情报。李鸿章建议他去拜会当时最有势力的恭亲王和翁同龢。

恭亲王对李提摩太的来访很冷淡，还批评了传教士在中国作恶多端。李提摩太竭力抵赖，结果弄得不欢而散。李提摩太看到恭亲王已是老态龙钟，作用也不大，转而寄希望于翁同龢。

十月二十六日，李提摩太拜会翁同龢，先谈了一通尧、舜、周、孔之道，就转到传教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反洋教斗争，主要是由清政府的地方官吏挑起的，如从《海国图志》到《经世文续篇》一类书中，都宣传反洋教，所以，他要求清廷“一律按法实在剔除禁止”，^①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李提摩太只是把这些作为引子，主要是向翁同龢提出一套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的所谓“新政策”。这比他以前向张之洞、李鸿章提出的置中国于英国一国的“保护”之下，又有了发展。翁同龢听后要他写一份书面意见，以便奏报光绪皇帝。李提摩太回到寓所后，立即写出一份所谓“改革计划”，建议清政府：

一，皇帝应聘用两位外国顾问。二，成立内阁，由八名部长组成，半数为满、汉族人担任，另半数应聘请懂得世界进步事物的外国官员担任。三，立即改革币制，并在坚实的

^① 《张文襄公电稿》第19卷，“致总署天津李中堂电”。

基础上建立财政制度。四，立即修筑铁路、开矿和设立工厂。五，成立学部，在全国开办新式学堂和大学堂。六，设立报馆，聘用有经验的外国记者帮助中国办报，以启迪民智。七，建立为国防用的有效率的陆海军。^①

这份“改革计划”，后来在《万国公报》（一八九六年四月）上公开发表，据苏慧廉查证，李提摩太建议任用的四名外国官员，是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汇丰银行大班、英国人艾迪斯，天津税务司、美国人杜德维，李鸿章的顾问、美国人科士达。所建议聘用的两位皇帝顾问，一个是日本人伊藤博文，另一个就是李提摩太自己。

在这之前的十月十七日，李提摩太还与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在北京初次会晤。关于这次会晤的情景，李提摩太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书（指公车上书）中了。无怪乎他来访问我时，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虽然如此，他的上皇帝书还缺少一件东西，那就是宽宏。上皇帝书是民族的、地方的，而不是国际的、普世的。”^②李提摩太提出的所谓“国际的、普世的”含义是什么，这可从一八九〇年以来他对中国政治干涉中得到解释。但是，康有为却误把李提摩太当作“洋兄弟”，李提摩太写道：“康有为告诉我，他是相信上帝是天父，世界各国是兄弟的，就如同我们的出版物所教导的。他希望在革新中国的事业中同我们合作。”从此，李提摩太在北京开始了与维新派的所谓“合作”，他带了“李佳白、白礼仁等经常同维新人士一起吃饭，一起讨论进行改革的计划和办法”。“康有为最有才华

^①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220—221页。

^② 同上书，第219页。

的弟子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需要一位临时秘书，就来到李提摩太处，表示愿意为他效劳。他也就欣然地接受了。”^① 梁启超担任李提摩太的秘书，是从一八九五年十月起到一八九六年二月止。当维新派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时，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等英、美传教士都打入该会，从内部直接对维新派指手划脚，施加影响，同时要他们不但要与光绪帝密切联系，还要说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七日，维新派在北京出版《万国公报》双日刊，随同《京报》分赠给京师各级官吏阅读。李提摩太因该刊与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同名，曾向维新派提出要求更改刊名。这份刊物共出了四十五期，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改名《中外纪闻》，但出版一个多月后即遭封闭，强学会也在一八九六年一月二十二日被勒令解散。

李提摩太在北京活动了五个多月，在强学会被解散后，决定回上海，临行的前一天，即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翁同龢曾亲赴李提摩太寓所话别。李提摩太写道：“这是空前未有的举动，一个中国的宰相下一个传教士的寓所来访问。”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翁同龢希望李提摩太仍旧留在北京，向他透露清廷正在考虑恢复强学会，询问他是否愿意帮助这个团体。李提摩太却回答说：“我没有同纯粹的政治事务搅在一起的愿望。”^② 这真是弥天大谎，李提摩太这次到北京是来干什么的，大家心中都有数，只是因为这次在北京耗时五个多月搞政治投机没有结果，而不得不暂且告退。李提摩太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回英国度假。

①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 218—220 页;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 265 页。

②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 223—224 页。

百日维新期间再次上北京

李提摩太在英国度假一年多，于一八九七年秋天重来上海，继任广学会总干事。一八九八年六月，康有为上书翁同龢，敦促光绪帝赶紧变法。从六月十一日起到九月二十一日为止的一百零三天，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帝一连颁发了数十道变法谕旨，还批准了康有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顾问。

这时，踌躇满志的李提摩太，以为从此平步青云，可以直接对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发号施令了。正当此时，慈禧太后已在密谋发动政变。九月十八日，李提摩太在北京会见康有为，康有为告诉他局势危急，光绪已密诏他迅速离京。李提摩太劝康有为先搬到他的寓所躲藏，然后去找英国公使窦纳乐设法。康有为告诉李提摩太：“新政施行甚难。”李提摩太问康有为：“竟不能调和两宫乎？”康有为无以答。这时，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他在上海预先写好的一份计划书，提出英、美、日三国共同瓜分中国的狂妄要求，要清政府交出全部政权，以解救危机。

当天夜间，康有为同杨深秀、宋伯鲁、李岳瑞、王照等人集会讨论李提摩太的计划书。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说：“吾未与诸君谈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奏。”九月二十日，杨深秀写的《为时局艰难，拼瓦以救瓦裂》的奏折中，说：“昨又闻英国牧师李提摩太新从上海来京，为吾华遍筹胜算。亦云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别无图存之策。……臣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九月二十一日，宋伯鲁上的折子也说：“昨闻英国教士

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并出示分割图。渠之来也，拟联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事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这种所谓“合邦”，就是把中国合到英、美、日帝国主义手里，中国交出全部主权，沦为这三国共管的殖民地。李提摩太又去找孙家鼐，而这时康有为已匆匆出京经天津乘船到上海，在吴淞口换乘英国兵舰，逃往香港。

孙家鼐在接见李提摩太时，通知他光绪帝将于九月二十三日召见他。可是，慈禧在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即发动宫廷政变，把光绪帝软禁起来，亲自临朝听政，并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李提摩太在政变后的第三天，在他寓所举行秘密会议，梁启超、谭嗣同等出席。他们商讨如何援救光绪帝，决定分头吁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由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但是，各国公使在未获得本国政府训令之前，未敢有所表示。梁启超经天津搭乘日本轮船逃往日本，容闳看情势不妙也逃出北京，李提摩太到天津会见了刚从北戴河休养到津的英国公使窦纳乐。李提摩太要求窦纳乐出面保护光绪帝和维新派领袖。窦纳乐责备李提摩太多管闲事。李提摩太反唇相讥，批评窦纳乐身为公使，还不知康有为其人，结果不欢而散。李提摩太不得不乘船回到上海，当中国皇帝顾问的美梦，也随之破灭。^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三个月，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第十一届

^① H. B. Mor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第3卷, 第145页;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265页;《戊戌变法档案史料》, 第16、170页。

年会上作报告，在评述维新运动时说：“有所谓康党者，粤人康有为实倡之。康有为虽知新法之善，而恐外人之吞噬，又忧古教之凌夷，于是有保国保教之说。……今皇上令各大臣推举贤才，即有奏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诸人者。华历四月下旬以后，新诏迭颁。……惜也，大兴善政而不克永展鸿图也。……夫人之不谙外事，必不能讲新学，既不能讲新学，即无以知求新党人之心。于是由愚生疑，由疑生惧，积惧不释，酿成大狱。……呜呼！太后综理万机，固欲屠中国于泰山盘石之安也。……”^①李提摩太在此竟把他直接干预维新运动推卸得一千二净。在这篇报告的英文本内，李提摩太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只有遵循我们所倡导的总路线，才能获救。”李提摩太的“总路线”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变中国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殖民地。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政治活动

一九〇〇年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是年四月，李提摩太在美国纽约参加第一次基督教普世宣教大会。他在《留华四十五年》中，记载了当时在美国的活动：“我曾力请各差会总部采取联合行动，防止势将到来的危险。”五月初，李提摩太应邀到波士顿“二十世纪俱乐部”演讲，报告中国局势。李提摩太写道：“当他们感到局势严重，并看到受威胁的不只是传教工作，而是危及中国最高利益和世界平时，就立即决定要我去把问题向华盛顿政府提出来，他们为我写了许多介绍信，使我能够到议会和白宫的各部门去联系。”

^① 《中东战纪本末》第3编第4卷，第82—85页。

李提摩太到华盛顿继续活动，他在《留华四十五年》中，写道：“我首先把书面报告呈给国务卿海约翰，他对此深表同情。但是他对我说，政府如要采取行动，必须有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后来我又去拜会了参议院议长霍尔，他也极表关注。当我向他转告海约翰的意见后，他回答说，参议员若未获得主要城市的支持，是什么事也不能够做的，而纽约是影响最大的城市。于是，我便到纽约去拜会该市总商会会长耶索普，同他谈了一个晚上。他的答复是，他担心华盛顿不会单凭某些人的意见而采取行动，尽管这些意见是强有力的。……”^①

李提摩太游说美国政府出面干涉义和团运动，表面上似未成功，实际上在五月间英国侵略军头目西摩尔率领美、英、法、德、俄、日、意、奥等八国联军，已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攻了。后因被义和团包围在杨村、廊坊之间，不得不突围退返天津。美国政府获悉后，迅即增派援军，于八月间与联军一起攻陷北京，对中国人民实行大屠杀。

当时，列强瓜分中国之说正甚嚣尘上，李提摩太又在同年七月十四日抛出了一份所谓恢复中国秩序的“意见书”，重弹他过去对中国实施“国际共管”的老调，其具体内容为：

目前中国既然没有一个被各国信任并能执行条约义务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已秘密策划使全国陷入战争状态，两年来致力于驱逐外国人出境，现又在北京与直隶省进行，各国被迫必须组织一个新的、能够维持永久秩序、使中国人和外国人获得持久和平与繁荣的联合内阁。

^①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295—297页。

一，这个内阁将由一半外国人和一半中国人共同组成。

二，每一个能派遣一万名常备军驻扎在中国的大国，得派二人为阁员。

三，中国的总督和巡抚，得推派同等数目的人(譬如说十二人)为阁员。这些人必须是列强所绝对信任的。

四，这个内阁的主要任务是：(1)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3)毫无歧视地保护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一国或几国的利益。

五，新内阁将不受任何一国的直接管辖。

六，应组织一个最高国际法庭，处理这个联合内阁产生的一切问题。

七，在过渡时期，责成各省督抚负责各自辖区内的秩序，不可派遣军队援救北京。^①

当清政府被迫与各国政府谈判《辛丑条约》时，李鸿章曾拍电报到上海，把李提摩太请到北京。这次李提摩太入京，与过去不同，俨然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北京到处兜售他的变清政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主张。他向李鸿章上了一个条陈，提出了“皇太后皇上应母子相和”，“士大夫守旧与维新亦必相和”的“调和”办法，让清廷以慈禧为首的一套班子，仍回北京执政，作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然后再由帝国主义各国派官员，安插在中央各重要部门当顾问或部长，进行控制。

他在这个条陈上写道：“考满洲数万人，如何能统治中国数亿人达三百五十年之久而不生事变？皆由各州、县全用中国人，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18页。

深明本国情形，所以事皆办妥。再考近六十年中、外交涉，何以时时失和？缘京城自军机处、总理衙门以及六部各官，从未用一外国人，亦无一中国王大臣游历各国，能知各国情形者，所以欲立妥善章程而未能也。”^①原来如此，帝国主义所以多次发动侵华战争，都是由于清政府的军机处、总理衙门以及六部，“从未用一外国人”之故。接着，李提摩太又提出，应当请五种外国人分别掌管办理中国的外交、教育、铁路工矿、财政，并出席国际会议。他的结论是：“能如鄙说兴办，必有大益；不办必有大损。中国办事旧病，遇难办之事，往往推诿缓办，所以数十年未办成一要事。此时危急存亡，若欲再缓，恐上天不再与中国以复兴之好机会也。”直到一九〇八年清政府快要垮台之前，李提摩太还在鼓吹他的“请外国上等有学问道德的人为顾问官”的主张。^②

插手筹办山西大学堂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山西巡抚毓贤被处死，由岑春煊继任。岑春煊到任后即行残杀义和团在山西的领袖，并且拍电报给李提摩太，请他本人或推荐一个传教士到山西去，办理“教案善后事宜”。李提摩太于是草拟了一份《办理山西教案章程》，先呈送在北京的李鸿章，请他过目。李鸿章全部同意，并电令岑春煊一切照办。“章程”内容共有七条，除了提出惩凶、赔偿财产损失、道歉、为死难传教士及教徒立碑等要求外，还首次提出了利用赔款办学堂，要山西“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缴款五万两，十年

① 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第1卷，“英士李提摩太上合肥傅相书”。

② 《大同报》第219期，1908年6月21日，李提摩太：《预筹中国二十年新政策》。

为期。此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徒，专为开导山西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①

关于惩凶、道歉和立碑等事，由在北京的英、美传教士推出八人，于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前往山西，与当地官员商办，沿途各级地方政府奉令欢迎，“预备公馆、酒席以示优厚”，^②到太原之后，山西的大官们也不敢怠慢，根据他们提出的要求一一照办不误。

关于拿出山西的赔款办学一事，李提摩太多次催促岑春煊赶紧办理。岑春煊本想保留一些教育主权，在派员赴上海与李提摩太谈判时曾提出：一，山西省出银五十万两应不称为罚款。二，学堂内不得传教。三，学校与教会不发生关系。四，外国教师不干涉学校行政。这些意见李提摩太当然都听不进去，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议定了一个由李提摩太控制的中西学堂合同草案。据岑春煊的奏折提及谈判经过称：

复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八月，派……周之驥前赴上海与之面议。据周之驥电呈合同草底八条，大致令晋省筹银五十万两，分期交付该总教士开办中商学堂。十年以内，学堂课程，延聘教习，及考选学生，均归该总教士主政。……臣等以其捐已得之资为晋省育才，足见诚心爱晋。惟订课程，聘教习，选学生均由彼主政，未免侵我教育之权，一再电飭周极力磋商。据复称，该教士……持之甚坚。

于此同时，岑春煊决定遵旨着手在太原另办一所大学堂。

① 日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第19卷，“办理山西教案章程”。

② 《中外约章纂新》第5卷，“山西教案章程”第8条。

李提摩太得知这一消息后，居然大加反对。一九〇二年四月，李提摩太匆匆赶到太原，提出一个太原不能有两所学堂的荒谬主张，要么不办，要么两校合并，归并之后要由他全部控制学校的一切行政。岑春煊被迫作了让步，但是提出分成西学专斋和中学专斋两个部分，总名称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归李提摩太全权负责。于是，六月七日取消了原来的合同草案，重新订立了新的合同共二十三条。这个新合同规定西学专斋由李提摩太大权独揽，包括经费的支配、教师的延聘、课程的设施、学校的规章制度等，都在合同内有明文规定。只是西学专斋的学生膳宿事宜，由中学专斋负责办理。^①此外，还议定在上海设立一所山西大学堂译书局，经费也由赔款中支付。

合同签订后，即由岑春煊拨款给李提摩太筹办，李提摩太自任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理，聘请英国传教士敦崇礼为西学专斋总教习，他是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的学生；瑞典人新常富和英国人毕善功为分教习。设立文学、法律、格致、工程、医学五科。一九〇六年，敦崇礼在太原去世，由毕善功代理，一九〇七年改由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出任总教习。苏慧廉原为英国借我公会传教士，一八八二年来华，被派在浙江传教。一九〇七年西学专斋曾送出二十五名学生到英国留学。李提摩太对西学专斋的控制，到一九一一年才放弃，改由中国自办。清政府在一九〇二年赐李提摩太“加头品顶戴，赐二等双龙宝星，命参议教案”，算是给他的嘉奖。

① 《政艺丛书·政学通辑》第5卷，第5页；《中外约章纂新》第10卷，“山西大学堂合同”。

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

由于李提摩太一贯反对革命，提出要把英文革命一词 Revolution 的第一个字母去掉，改为 Evolution(渐进或改良)，因此对于包括法国大革命在内的各国革命，他都持反对态度。而他的所谓改良，决不是要使中国渐进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在上文已看得很清楚了。

李提摩太第一次与孙中山会面，是在一八九六年。这年的十月十一日，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在英国友人康德黎医师的援救下，于二十三日获释脱险。当时李提摩太干预维新运动之后，刚回伦敦度假，当听到孙中山获释后，即去拜访。李提摩太对孙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十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上李傅相》一文，是早已知道的，因此希望能说服他，还是走改良的道路，参与国内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他对孙中山说：“在我的意见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而孙中山却正是因为这篇写给李鸿章的信未获得答复，又未被召见，而“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①才走上革命的道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檀香山组织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因此，李提摩太的劝说没有达到目的。

李提摩太与孙中山的第二次会见，是在一九〇〇年。这年的春天，李提摩太从上海前往纽约出席基督教普世大会，六月间乘船回上海途经日本横滨时，拜会了当时正在日本的孙中山。李提摩太发现孙中山，“正集中全力计划推翻清政府，……下决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24页，“伦敦被难记”。

心要倡导革命”。李提摩太再次劝说孙中山不要革命，又遭到孙中山的严辞拒绝。李提摩太无可奈何地对孙中山说：“如此看来，我们只得分道扬镳了。因为我相信对政府，只能启迪，不能摧毁。”^①

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李提摩太给一位中国报人的信中，写道：“论及在中国的改革，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革命的观点，一种是改良的观点。我不属于前者，因为遍览各国历史，以武力进行改革，多是杀人流血，造成可怕的灾难。而我赞成改良，愿意贡献所能，对真正有利于中国的一切问题，给予开导。我们已译著各种书籍，希望能在年内出版，以利于中国的进步。……耶稣基督战胜世界不是使用武力，而是使用精神和知识的力量。我们努力采用后者的方法，另一种方法耶稣早已吩咐过他的门徒们——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②

一九〇八年，李提摩太又在《大同报》上撰文，公然主张消灭革命党，他写道：如果清政府同意聘请外国顾问参加政府工作，则“各国见中国如此整顿，则强大之国亦无不乐意借款于中国，而革命党亦自消化于无形。因国家所欲办之事，较伊党所欲为者，且过百倍也”。^③

辛亥革命取得成功以后，李提摩太并没有支持过孙中山，相反当孙中山宣布把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之后，李提摩太却说：“这是他（孙中山）一生中所采取的最明智的一个举动，因为孙中山对政治毫无经验，而袁世凯则几乎是中国最有经验的政

①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 350—351 页。

②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 303—304 页。

③ 《大同报》第 219 期，1908 年 6 月 21 日，李提摩太：《预筹中国十二年新政策》。

治家。”^①

当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对外进行大借款，准备练兵消灭国内革命力量时，孙中山发出了强硬抗议，指出袁世凯未经国会批准，擅自对外借款，是一种违宪越权的行为。这时，李提摩太又出现在孙中山的面前，他是奉袁世凯之命来劝阻孙中山，不要与袁世凯作对。孙中山在抗议书上略加修改后，递给李提摩太看。李提摩太劝孙中山不要把这份抗议书公诸于世，因为“袁世凯是民国的元首，全国应当表现出对他的信任，而不要去阻挠他认为图强所必需的计划”。李提摩太的劝说没有结果，孙中山还是把这份抗议书照发出去。后来，李提摩太竟诅咒孙中山，说“他不肯听从道理，因而也就断送了他在中国的事业”。^②

晚年生活

一九一三年，李提摩太已年近七十。他从二十六岁被英国派来中国当传教士，已长达四十二年。从这时起，他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鼓吹世界各国实行裁军和组织世界政府，还提倡世界各大宗教凑合成立所谓宗教联盟。

李提摩太一九一三年曾去青岛，访问崂山上的道教寺观，第二年到长沙活动。一九一四年八月，年近七十的李提摩太，因原配夫人已在一九〇三年去世，又与一位伦敦传教会的英国女医生特赖布女士在横滨旅行结婚。同年十二月，带了新夫人一起到爪哇游历。但是，他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即使是游山玩水也

① W. E. Soothill: *Timothy Richard of China*. 第305页。

② 同上书，第305—306页；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第353页。

需要有充沛的精力，因此他一回到上海就病倒了。这一病，竟卧床三个月之久，他自知已是力不从心，无法继续在中国干侵略勾当了，于是向广学会提出辞去总干事之职。

一九一六年，上海广学会董事会正式批准他的辞职，任他为名誉干事。同年五月二十日，他带了家眷从上海乘船回英国，码头上自然是少不了一番热闹。他在上海的中外友好，把这个充当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颇为惋惜地送上了轮船，并与之挥手告别。

李提摩太到英国后，同年七月十四日又接受威尔士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在这之前，他已获得过英国乔其亚大学和布朗大学授予的神学和文学博士学位。

一九一八年，梁启超到英国访问时，曾专程到伦敦李提摩太的寓所去看望，赠送给他十部梁启超自著的书，畅叙了在维新运动期间的往事。当然，他们无法总结出正确的历史教训。

一九一九年初，李提摩太决定重返中国，但在四月间旧病复发，住院开刀，在四月十七日不治身死，^①终年七十三岁，结束了他曾经在中国呼风唤雨长达四十五年之久的一生。

^① 一说为 1919 年 4 月 20 日在伦敦去世，参看《教务杂志》1919 年 5 月，第 981 页。

明 恩 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

明恩溥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一八四五年，他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维郎城，一八六七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州贝洛依特学院，后转入安多弗协和神学院，一八七〇年毕业。一八七二年受美国公理会差会部派遣，前来中国传教。明恩溥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曾出版过多部有关中国和美中关系的著作，他的言论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当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曾经产生过某些影响。

来 华 之 初

一八七二年，明恩溥来华后被公理会安排在天津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实习传教。天津教案被镇压后不久，二十七岁的明恩溥带了新婚夫人在天津传教。由于他的前辈传教士们的侵略活动，造成了人民群众对新来外国人的冷漠，传教活动很难开展。

明恩溥在天津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认为：必须深入中国的广大腹地去，开辟新的传教区，要住在中国人中间，说不同的土话，哪处都去，凡事都问，经常不断地与中国各界人士相混——上至衙门官员，下至街头乞丐、苦力都可以接触。为此，

* 本篇合作者为山东省政协王神荫同志。

他们夫妇俩经常深入农村，逐步打开了一些局面，但效果也不显著。一八七七年，山东发生严重灾荒，明恩溥受命前往山东赈灾。他进入山东省恩县的庞庄，向分散在附近的一百十五个村庄、四千余户人家、约二万二千人发放了近一万二千元（中国银元）赈款，使传教工作大有进展。在此后一年里，有一百五十余人入教。明恩溥在总结效果时说：“灾荒结束之后，事情变得很明显，我们进入了一个传教的崭新时代。许多反对外国的偏见消失了，或是被压下去了。”^①于是，他着手经营这一新的根据地，一八八二年在这里盖起了一座西式楼房，把家属从天津接来同住，成为美国公理会在中国农村的第一个有传教士驻扎的地方。一八九三年，他又把教会设到临清。恩县所属的若干村庄设支堂十三处，一九〇五年增至三十八处，教徒也由一八九〇年的三百六十六人，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九人，大大地开拓了美国公理会的在华势力。

明恩溥在山东用各种手法抢占房地产，以扩展他的地盘，下面是几个明显的例子：

其一：山东德州第七屯有一寡妇吴氏，因在一八七八年灾荒时领过传教士的一点救济，一八八一年在传教士的花言巧语下立下契约，愿将她的房地产捐款给教堂，契约上这样写着：

愿将宅院一处、平房七间、门楼一间、庄东地二分，献给教会，永不反悔。 吴氏押^②

其二：一八七八年，在明恩溥的哄骗下，强使德州石家塘的人民将当地的一座庙宇捐给了教堂，契约上这样写着：

具贴人史家堂会末人等同合庄人等共议，将庙宅情愿

^① 麻海如：《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第26—29页。

^② 《清季教案史料》第2卷，第196页。

归于耶稣教会修理会堂,宣传圣道,设立义学,成全合庄子弟为善,益于后世,俱属教中承管,永远为业,并将庙地归于看堂人朱连科家耕种为业,不许当卖。

光绪四年十月初三日 会末史公、王章、牟登霄具
庙宅计地八庙,庙地共二十三亩。^①

其三:平原县李炉村村长朱光魁,于一八八三年去庞庄探望亲戚,明恩溥获悉李是村长后,即百般劝说他入教。后因李炉村入教,一时竟有四、五十人也跟着入教,朱光魁还将四间房屋和地基一段捐给公理会,作为传教据点,逐渐形成地方上一股特殊势力。

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

明恩溥在传教布道之余,经常调查中国的风土民情,收集各种情报,并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驻山东通讯员的身份,发表新闻报导与文章。一八八五年,他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化》一书。^②明恩溥来华是带着白种人的优越感来的,自以为是拯救苦难来的,故时时处处都表现出一种歧视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他认为:“要改造中国,就要找到中国人性格的根源。”于是,一八九二年,他把为《字林西报》所写的对中国人的观感,汇集成一本厚达三百多页的《中国人的特性》,^③书中列举了中国人的二十六个特点。他把中国封建主义腐朽落后的旧意识和恶习,夸大为中国人共有的特性。仅从此书所罗列的目录:“没有时间观念”,

① Chinese Recorder. 1878年11—12月,第468页。

② 原文为 Chinese Civilization. 1885年出版。

③ 原文为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2年出版。

“没有准确的概念”，“误解的天性”，“拐弯抹角的天性”，“理智混乱”，“轻视外国”，“因循保守”，“没有同情心”，“互相怀疑”，“没有诚实”等，就可窥其一斑了。他说：“中国社会如同中国的景致一样，远看好看，近则臭气难闻。因为脏与臭不能摄入镜头。”在其它如“节约”、“勤劳”、“礼貌”等章里，也都以中国人民在封建压迫和剥削下所受的痛苦，作为讥笑的题材。他写道：“中国人生活水平极低，穷困无比；中国人什么都吃，什么地方都能睡，只要给他们一点点钱，如一天两分钱，就什么都可以替你干。”他甚至夸张说：中国妇女在临死之前，要自己走到坟地，以节省别人抬尸首的力气。在该书最后一章（第二十七章），“中国的真实情况及其需要”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文化是自私的，需要美国的发财文化；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需要美国的商品和现代科学；中国人的道德堕落，贪污腐化这到极点，以致不能看守自己的海关，不能让他们收税而自肥。”一句话：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及一切其它方面，都必须由美国来统治。他最后写道：“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需要——良心。”而“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永久地、完全地满足这种需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做到“中国幸福、快乐的新时代，将是城乡有铁路，内河有交通，有完整的邮政系统，电报电话畅通，有国家银行，人人使用银币……。”总之，中国最终必须变成美利坚合众国的殖民地。这就是他洋洋洒洒写了这么一大堆诬蔑性言论的最根本的宗旨。

此书一经出版，马上就被一些敌视中国人民的人，认为是对中国人性格“最深刻、最珍贵的研究”，并长期被列为来华传教士的必读之书。日本也急忙将其译为日文：题为《支那人之气质》。同时，明恩溥也由原来的报社通讯员，升格为专栏作家，开始被

一些侵略者捧为“中国问题专家”。

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瓜分狂潮，特别是传教士的为非作歹，激起了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它的烈火燃遍了北中国，使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尤其是宗教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明恩溥亲自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清楚地知道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许多文明人逐渐进到内地引起的”。他说：“在外国商业未进来扰乱旧秩序以前，在通常的年岁里，是够吃够穿的。”他自称是“在华日久，爱华日深”，但是面对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不能不叹息痛恨”，令他“不忍不言”。于是，他就利用专栏作家的身份，大写文章，大造舆论，诬蔑和漫骂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要求镇压农民群众。在各种报导和电文中，他更是捏造谣言，夸大其词。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日，明恩溥向驻京美国公使馆发出下列电报：

拳民叛乱在山东、直隶两省的二十个县迅速蔓延。枪杀、放火、暗杀之事有增无已，其明显目标在杀害基督教徒，驱逐所有外国人。除非四国公使联合起来，使用压力，则庞庄——临清——济南府的美国人，认为形势是毫无希望的。^①

同年十二月四日，明恩溥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北方火灾临头》。他大声疾呼说：“若不从速扑灭，则全帝国将无外人可居之地，甚至连将来的势力范围也就没有

^① 麻海如：《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第64页。

了。”他要求德、美、英三国立即联合起来，采取行动，设法扑灭“这个需要几十年才可以恢复的火灾。”^①在另一篇《北方的危机》的文章中，他写道：义和团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的排外运动。不难预见，长此以往，不但使每一处外国在内地的利益化归乌有，且要驱逐每一个洋人离开天津和北京”。“若这事继续下去，则铁路、矿务、商业、差会，将在一个共同的毁灭里，同归于尽。”他还把自己所编的这一套歪曲真相的报导，交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带往美国纽约出席“普世基督教宣教会议”时散发，要求美国政府从速干涉中国内政。

除了写文章造舆论外，明恩溥还亲自出面控告鲁西道台吉灿升、平原县令承泗、高唐州知州李恩祥、夏津县知县屠乃勋和恩县的秦应举等，“惩办拳民不力”。要求清政府把他们立即撤职，今后不得再在山东任用，或永不录用。接着，以明恩溥为首的庞庄传教士们，在向各国公使提出一份“备忘录”中，公然点名要山东巡抚毓贤下台。“备忘录”写道：

控告山东巡抚毓贤。他明知义和拳在本省存在，规模庞大，声势汹汹；也知道这种结社完全违反王法，本朝历来厉禁，却从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镇压。……他暗中倡导和怂恿叛乱，因他不许官兵剿办拳匪。……他曾专折密奏皇上，极力主张利用义和拳，将外国人逐出山东，这就等于正式批准了这个运动。对数月来席卷山东大部地区的这个极端破坏性风暴，毓贤是负有直接责任的。我们认为，凡关心本省应有一个良好官府的列强，应当坚持要求把毓贤革职，并把写明“永不叙用”的上谕在《京报》上公布，还应指出这是由

^①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899年12月4日。

于他的失职而受的处分。……^①

毓贤被撤职后，清政府改派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一到济南，就把明恩溥请来，商讨有关“大刀会”的事宜。山东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在袁世凯的疯狂镇压下，趋于低潮。此后明恩溥曾得意地说：袁（世凯）巡抚的“友好合作”，终于使此事获得成功。

山东的义和团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但反抗的火焰则转移到京、津地区，并且形成燎原之势。明恩溥看到拳民的反帝斗争愈来愈坚强，吓得心惊胆战。一九〇〇年初，他借华北公理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城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与丁韪良等一起荷枪实弹与义和团对抗。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最终失败。清政府最后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传教士们忙于为教徒争取赔款，搜刮民脂民膏。明恩溥于条约签订后，又回到山东庞庄，全部时间都用在向地方政府索取赔款。明恩溥感叹说：“从正义的观点来看，给予传教士和教徒赔款，是完全合理的，应该的。但从实际效益的观点来看，象内地会和其他差会那样，完全不要赔款的例子，是大大值得推荐的。”^②它暴露了明恩溥的伪善。

一九〇一年，明恩溥出版英文《中国在动乱中》一书，共两卷，上卷十九章，下卷十六章。这是他根据亲身经历义和团运动全过程后，写的一部诬蔑中国人民革命的书。^③他从外国经济渗透及其对中国人民生活影响，论述了义和团的起因。在书中，他

^① A. H. Smith: *China in Convulsion*. 第1卷, 第182页。

^② 麻海如:《华北公理会七十五年》, 第64—65页。

^③ 原文为 *China in Convulsion*, 二卷本, 1901年出版。

对义和团兴起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提供了不少材料,片面地指出,所谓传教士的活动,对于中国农村生活起了解体作用。他认为传教士在华活动,并没有什么过错,即使有一些,那也是天主教传教士而不是基督教传教士,以此来推卸罪责。由于书中完全抹煞帝国主义各国长期的对华侵略,因此,对中国人自发地起来强烈反对帝国主义,表示无法理解。该书后半部分叙述了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发展概况,以及八国联军血腥镇压义和团运动的经过,最后写了他对中国未来局势的预测。明恩溥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叫嚣说:“除非中国进行根本的改造,否则她将继续危害世界的未来。”他说,在中国“其他的势力已作某种程度的实验,但都显示出不适当和毫无希望”。他所说的“其他的势力”,是指帝国主义在华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明恩溥认为,唯一征服中国的办法是利用宗教侵华,在中国进行“彻底的试验,给基督教以机会,来发展它的潜势力,如此就可以在知识上、道德上、精神上,给中国一个新生活的特效药”。这就是明恩溥的“结论”。^①

建议利用庚款在华办教育

美国政府退还庚款办教育的政策,最初是由明恩溥向美国政府建议的。据明恩溥称,退还庚款办教育的目的是:“我们负有根大的责任,要看到当我们全部退还这笔钱时,应当用来使类似的暴乱在将来更难发生。”^②

一九〇六年三月六日,在美国报业托拉斯《展望》杂志老板

① A. H. Smith: *China in Convulsion*. 第2卷,第759页。

② A.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第220页。

艾博特陪同下，明恩溥到白宫进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他汇报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如果要防止义和团这样的反帝运动的再度爆发，最好的办法是传播基督教，和多设立由传教士进行教育的学校。建议总统将清政府的赔款退还一部分，专为开办和津贴此类学校之用。罗斯福总统听了之后，认为是一个极好的主意，于是破例留他们在白宫吃饭，饭后又继续详细研究至深夜，始行告辞。

清政府自一九〇一年颁布《学堂章程》后，政书院为大学堂，各省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增设西学科目等。但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此加以嘲笑，说“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章程，但它象其他许多可贵的理想一样，只不过是纸上谈兵。”^①当时，国内还出现一股“留学热”，大批学生到日本、欧洲各国去留学，甚至象比利时这样的小国也有三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到近邻日本去留学的达上万人，而唯独到美国去留学因受美国“移民律”的限制，却非常之少。美国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认识到，这将对美国不利，有必要加强在华的教会学校和吸引留学生到美国去，以便对中国进行精神支配和控制中国的发展。其中，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于一九〇六年初送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是有代表性的。这份“备忘录”主要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他认为：“这种道义上的影响的扩展，即使单纯从物质概念而言，意味着所付出的代价在回收时，将比用任何其他方式获利更大。商业追随在道义和精神的支配之后，要远比追随在旗帜之后更为合乎情理。”^②

罗斯福总统收到这份“备忘录”，和听取了明恩溥的建议后，

① J. W. Bashford: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第111页。

② A.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第213—218页。

经与各方商议，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内称：

“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①

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七月十一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的半数，共计一千一百六十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并在北京开设一所预备学校，即清华学堂（后改称清华大学），由美国派员监督庚款用途和培养学生的标准。以上是明恩溥建议退还庚款办学的过程。后来，一九二四年又以美国应分得的庚款作为基金，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开展补助在华文化团体等活动。

明恩溥在退款之计获得罗斯福总统赞同后，抓紧时间将退款的理论、方案，结合当时美国流行的舆论，写成《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于一九〇七年出版。^②他在该书的开头，号召美国要重视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远东的变化，接着在“新的美国”一章里，歌颂美国侵略的胜利，赞扬夺取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古巴和夏威夷群岛的业绩。但在第三、四章里，他认为，“古老的中国”是一个不可用武力征服的“伟大民族”。鉴于“美国已成为一等强国，需要向外扩张。因为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依靠外国市场。这不仅是为了美国商业的繁荣，也是为了使政治和社会得以健康发展”，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经济落后，正是“美国

^① 《新教育》第1卷第1期，1919年2月。

^② 原文即同 A.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一书，1907年出版。

的机会与责任”。

为了“大量地、满意地赢得中国人的善意”，为了“减少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怀疑”（据明恩溥估计，这种怀疑本来就较少），“用圆满的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明恩溥建议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他全文引用了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说明吸收中国留学生的迫切性、必要性以及实际效果。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帝国主义“退还庚款”，和帮助中国文教事业的全部目的，是要“控制中国的发展”，“支配中国的领袖”，使中国“效法美国”，“购买美国商品”，以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来代替追随旗舰”的征服，直到最后消灭中国人民反帝意志，使中国革命“难以再生”。

对于利用宗教侵华的重要性，明恩溥在该书中强调指出：传教“不仅是招收个别的信徒，而是介绍一种新的道德与精神气候。”他还明确指出：要使受尽封建压迫，尤其是受尽资本主义侵略者剥削和欺凌的中国人具有“忍耐、保守和受苦受难的精神”。明恩溥最后的结论与希望是：“假若美国人的挺进，能补上中国人的忍让，美国人的易变能补上中国人的专心，美国人的活力能补上中国人的耐力，这岂不是对我们更有利么？”^①

晚年时期

明恩溥的晚年，主要在通州府从事神学方面的写作。他在《教务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在英文《中国基督教差会年鉴》上，撰写了评述中国政局的所谓《总结与回顾》。第一次世界大

^① A.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第239页。

战后,他退休返回美国。一九三二年,明恩溥在美国去世,美国国务院曾致电吊唁,表彰他过去曾经提出过许多对美国有利的意见和建议。

梅 子 明

(William Scott Ament, 1851—1909)

梅子明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他因义和团运动时期在北京干尽坏事，被美国进步作家马克·吐温指名批判，而臭名远扬。是在华外国传教士中卸去伪装凶相毕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来 华 之 前

梅子明于一八五一年九月十四日出生在美国密执安州的奥尔索。他的父亲原籍荷兰，随祖先移民至美国定居，先是当铁匠，后在奥尔索开设旅馆和做驿马经纪生意，逐渐成为一名富商。但梅子明十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渐衰，主要由母亲抚养成人。

梅子明在家乡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后，一八七三年考入了奥伯林大学，并在奥伯林正式加入教会，成为基督教徒，立志当一名牧师。大学毕业后，他转到纽约协合神学院攻读神学，依靠做工挣钱付学费。他做神学生的最后一年，是在安多弗神学院度过的。

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四日，梅子明向美国公理会差会部正式递交一份申请书，要求在毕业后派往海外当一名传教士。一八七七年夏天，梅子明自神学院毕业，随即在八月二十三日与玛

丽·艾丽丝·潘菲德女士结婚，九月五日被封立为牧师，并正式任命他为传教士，派到中国去传教。^①

梅子明写给他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在十月十七日上了船。我们的轮船就是‘中国’号，……我迫不及待地要学习中文，以便让中国人通晓福音的救恩。”^②

早期在华北的活动

梅子明被安排到河北保定府，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参与一些传教和救济工作。

一八七七年，华北发生特大旱灾，不少传教士投入赈灾活动。梅子明当时也往返于保定和北京之间，发放赈款。在外国侵略者和腐败的清政府压迫下，一个当时只有十万人左右的保定府，即使在平时，无衣无食无家可归的乞丐就达二万人。^③梅子明在调查报告中，屡次提到由于中国人民生活的贫困，传教活动很难开展。现在面临特大灾荒，他们几乎全力以赴一面赈灾，一面传教，从表面上看，入教的人突然倍增，而实际上停止发放赈款后，教徒也就不见了。

梅子明在保定府学习和工作了两年多时间，起初对宗教是抱有热情的，同时也发现中国是一个文明之邦。他发奋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他说要真正了解中国，就必须成为一个中国人。一八七九年十月七日，梅子明从保定府写给他母亲的信中

① H. D. Porter: 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 第 52—53 页。

② 同上书，第 36 页。

③ 同上书，第 40 页。

说：“我要做一个受过美国的教育和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①他从美国带了年轻的妻子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华北农村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妻子因不能适应环境，经常患病卧床，而他还是四出奔走，救灾传教，为的是乘此机会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

一八八〇年五月，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在北京举行年会时，决定扩大活动范围，增辟张家口和山东庞庄为该会的新的活动基地。同时决定把梅子明调到北京，借以加强北京总部的力量。

公理会在华北的总部于一八六四年创立于北京，在不平等条约和外国武装力量的庇护下，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已初具规模。附属事业有学校、诊所和印刷所，在外国女传教士的努力下，还开设了女子学校和专门培养女讲经员的神道学习班。

梅子明被派到北京后，除了主持城内教堂的宗教活动外，更多的时间是用于到北京郊县游说布道。当时，外国传教士在华的布道情景，公理会传教士毕海蓝有一个典型的描述：“教堂多半是在城内租赁一处沿街的铺面房，欢迎任何人入内。……人们成群聚集，为要看看‘洋鬼子’，听听不用假嗓子的异于东方的唱歌。由于殷勤的招待，听完唱歌，人们便会坐下来。……聚会常会遇到干扰而中断。……如能供应茶水则更好，会后最好分组谈话。”“游行布道一般是乘集市之后去到一个县城，……配备宗教书籍和《圣经》，……夹杂在小贩叫卖声中，放开喉咙宣讲，……刚收工的农民会很快地围拢来，看外国人并听他讲道。”^②

梅子明在北京很短时期内，足迹已遍及房山、通州、长辛店、

^① H. D. Porter: *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 第 51 页。

^② 参看《近代史资料》1963 年第 3 期，第 161 页。

良乡、涿州等地。除了传教外，还进行社会调查，把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寄给美国公理会差会部，包括在北京城内所获得的有关清政府内部的情报，以及对中国政局的观点在内，开始了他对中国内政的干预。

一八八五年，梅子明带了家眷回美国休假。他们回到故乡奥尔索后成为新闻人物，到处有人请梅子明去报告中国的情况和传教士的经历。他接受梅地纳镇一家教堂的邀请，担任住堂牧师，为此得以在美国逗留三年多时间。

一八八八年，梅子明奉公理会差会之命，放弃在美国的住堂牧师工作，八月三日从旧金山乘船横渡太平洋，十月十八日到达北京，继续在北京及其四郊活动，致力于发展教会势力。一八九一年起，他又负责编辑出版华北公理会的中文刊物《华北新闻》，每期约印五百余份。当时在北京还有一个外侨读书会的组织，每月聚会一次，梅子明是这个组织的积极参加者。会上经常交流他们在华搜集到的情报，对中国各个方面的问题以及中外关系提出论文，发表各自的见解和观点。^①

对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梅子明有他明确的政治观点，即希望中国败，日本胜，清政府被推翻，让日本和其他外国侵略者来共管。他在同年三月二十四日自北京写给国内亲戚的信中，说：“清政府也许已经在上帝的眼中到了该被推翻的时候了。”^②

梅子明在北京还不遗余力地通过古董商，通搜中国的钱币，从汉代一直到清代，都竭力加以搜罗。其中除了一部分在义和

^① H. D. Porter: *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 第109, 124, 138—142页。

^② 同上书，第130—131页。

团运动期间被毁外，仅送往上海一次销售所得，就达一千五百元。还有许多古币被他卖到国外去。^①

一八九七年，梅子明带了家眷第二次回美休假。

一八九八年，中国发生戊戌政变，梅子明从美国返华途经日本时，得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十月八日，他到达北京后，就陆续向美国报告政变后的政局情报。他对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的评论是：“皇上是过于热心了。”^②

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三日，梅子明写信给美国公理会差会的负责人史密斯的信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他对中国政局的看法。他写道：

这里正在形成的历史，其速度是其他许多国家所没有的。人们埋怨中国人的惰性，而我的观察是，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在思考目前的时局。……他们正在思考，深深地思考，只是由于如此的政治情况，使我们还没有得到他们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已。……你提到（中国）的改良运动，和叹息它的突然失败。那个作为领袖的康有为，皇上给予他很大的信任，但他是个不适宜的人物，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是一个彻底的孔教徒，在他们的统治下，基督教将不会象现在这样受到宽容。象德国人在山东所做的那样，把西方的观念和惯例，用刺刀尖强加给中国人，只能导致恶感，把大家都关注的进步的车轮往后拉。当美国人开始看到（少数美国人已经看到），我国的利益是多么紧密地与中国的利益裹在一起时，当我们看到中国是我国剩余产品的一个多

① H. D. Porter: 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 第136页。

② 同上书，第149页。

么好的自然出口时，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就会真正开始，我们就会对中国的真正的改革，既给予同情，又关心物质的收益。当前的政治动向是美、英、日联盟，这将加强我国在东方的地位。……①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表演

一九〇〇年，在中国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威震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罪恶计划，显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力量。

当义和团开展“扶清灭洋”的反帝斗争后，外国传教士先是怂恿帝国主义政府，对中国进行干涉，压迫清政府撤换地方官吏，镇压义和团。后来发展到竟然脱去道袍，穿上军装，拿起毛瑟枪，参加到侵略军的队伍中去，充当翻译官、向导、情报官、参谋和连队长，直接与中国人民为敌。

创办尚贤堂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说：“抢劫是一种最高尚的伦理学。”表演得最淋漓尽致的要算是梅子明，他把传教士和八国联军在北京及其近郊的罪恶活动，都一一写信向他的妻子如实地汇报，且录几条如下：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六日写的信：“亲爱的玛丽：八月十四日我们被援救出来了。……我挑选占领就在我们以前住处东首的那座蒙古王府。”

八月二十日写的信：“亲爱的玛丽：我已带领二百余名教徒占领了那座蒙古王府。……由于我现在是王府的头头，

① H. D. Porter, 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 第157—158页。

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作一位王子对待。他们给我送来了蛋、鸡、鸭和葡萄酒，等等。”

八月二十八日写的信：“我必须把义和团的头目们搜查出来，并尽可能地给予惩办。我马上就要开始去干这个行当。……我们已经抢劫到足够的东西，可以过冬了。”

八月二十九日写的信：“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将尽快地把这批财宝全部运送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

九月十八日写的信：“我离开北京城出外讨伐已有五天了。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的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义和团象野鹿一样，从我们面前逃走。我们发现无法在青纱帐里追捕他们。”

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写的信：“我们都被邀请从十一点到一点钟到查飞将军处报到。目前在四乡还发生一些新的战斗，特别是那些外国军队扫荡过，但是没有适当镇压过的地方。……现在又要重新进行征讨了。”^①

不仅如此，梅子明还将大批赃物公开拍卖，捞取大量现金。到四乡去扫荡时，他还私设公堂，随意抓人进行非法审讯，强令农民跪在他跟前，进行逼供和敲诈，对每一个受害的教徒，还强迫地方当局赔款数百两银子，和附加罚款。^②

有关八国联军和传教士在北京暴行的消息传到美国时，正

① H. D. Porter: 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 第184—211页。

② 据福西士上尉向上级的报告中称：这个嗜血的美国传教士梅子明，曾要求美军在现场射杀每一个可疑的义和团员，放火烧掉可能藏有义和团的村庄。引自美国 New York Sun. 1900年11月18日。

是美国上下都在准备欢度传统的圣诞节的前夕。美国进步作家马克·吐温得悉后极为愤慨，尤其对美国传教士干的丑事更为震惊，许多有正义感的美国人，也无不感到这是西方文明的耻辱。马克·吐温为此放弃了圣诞节的狂欢，连夜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叫做《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美国有影响的杂志《北美评论》，在一九〇一年二月号上全文予以登载。

马克·吐温在这篇文章里，首先引了在圣诞节前夕纽约《太阳报》发布的一段发自北京的消息：

美国公理会差会部的梅子明牧师先生，已从外地旅行回来，他是去为被义和团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的。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梅子明先生声称：他索取到的赔偿，比天主教所获得的数字是低廉的。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他们为每一个被害的天主教徒索银五百两。在任丘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害，为此，这里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要求赔偿七十五万串现款（合三十四万两银子）和六百八十个人头。在和记者某次谈话的过程中，梅子明先生曾提起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态度。他说：“我断然否认传教士有复仇的念头，否认传教士曾普遍地参加抢劫，或自从被围以来做过不是环境所要求做的任何事情。我要批评美国人，美国人的软手并不比德国人的铁拳好。如果你用软手同中国人打交道，他们就会加以利用。”（重点是马克·吐温加的。）

接下去马克·吐温以他那特有的犀利讥讽的笔调，对美国

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暴行,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尖锐地指出:

传教士在华行为,“正是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把‘文明之福’推广到坐在黑暗中的我们的弟兄们,总的说来,向来都是很好的买卖。……用聪明谨慎的手段来经营,是一个聚宝盆。比较世俗的人所玩弄的任何把戏,这里面有更多的钱,更多的领土,更多的宗主权,以及更多的别种利益。”^①

这就从根本上揭穿了帝国主义对华传教事业的实质。

马克·吐温这篇有力的声讨帝国主义的檄文,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同时也指出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由于击中了要害,使得美国国内和在华的反动势力慌了手足,他们赶紧打电报到北京,要梅子明“核实材料”,在电文上做文章;在美国各大报刊登启事和公开信,矢口加以否认,企图消除影响;并直接向马克·吐温施加压力,强要他向公众发表公开道歉。^②那位被马克·吐温点了名的美国传教士梅于明,更是心惊肉跳,坐立不安,请看一下他的丑态:

当马克·吐温在《北美评论》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传来时,就象一声晴天霹雳。我记得当时我正到梅子明牧师的书房找他商谈一件要事,发现他坐在桌子旁边,好象发了心绞痛病。我惊叫起来:“你怎么啦?是病了吗?”他对我说:“如果我是象那个人所说的那种人,我是不配和你谈话了!”

① North American Review, 1901年2月,第161—176页。Mark Twain: To the Person Sitling in Darkness.

② H. D. Porter: 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 第210页。

我感到我似乎应该逃走，躲进山洞，永远不再见人。”我想他是发疯了。^①

这是和梅子明牧师同在北京活动的博恒理牧师，在为梅子明写的“传记”中的亲历其境的描述。这位干尽坏事的梅子明牧师先生，难道真的感到内疚了吗？不！前不久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记者批评美国人的手太软，主张采用“德国人的铁拳”，来对付中国人民呢！但他想不到竟然会受到公众舆论的批判，马克·吐温并把他的丑恶形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美国的基督教各个差会领袖，早在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一日就在纽约开会，并且作出了一系列决议。他们已经觉察到传教士在中国的罪恶活动，使美国的人民包括有正义感的教徒在内，感到深为不安，要求各个差会加强对美国人民的欺骗宣传；对于在华传教士，则继续要求他们留在中国，按照原定方针活动。“有几个差会的总部接到了从中国打来的电报，要求向华盛顿提出抗议，反对联军撤出北京和让慈禧太后复位的建议。认为如这样做，对传教事业将是一种灾难。有些传教士坚持提出这个抗议，因为联军如果撤退，慈禧复位，中国人将会理解成这是他们的胜利，而占领北京城的精神会受到破坏，甚至导致骚乱的再起。”会议为此进行了辩论，得不出一致的意见。^②

这些差会领袖满以为这样做，将会把国内的人民瞒住，但没想到，马克·吐温无情地揭露和抨击了在华传教士在八国联军支持下犯下的罪恶，不仅使各国人民得以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且也有助于人们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① Chinese Recorder, 1901年8月,第398—406页。

② North American Review, 1901年5月,第724—733页。Judson Smith: The Missionaries and Their Critics.

最后的日子

一九〇一年二月六日，纽约《论坛报》登载了一则来自伦敦的消息：“伦敦二月六日电：从北京发给《晨报》的一则电讯称：(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伯爵已下令解除梅子明的职务。”^①

原来，梅子明到处向农民敲诈勒索时，与天主教传教士发生了矛盾，结果在涿州被八国联军中的法国侵略军逮捕，押到了联军总部。经过审讯，被瓦德西下令解除了他在侵略军担任翻译的差使。

这个丧家之犬，在马克·吐温抨击和被瓦德西撤职后的第五天，哀叹道：“我的计划是飘忽不定的，打算尽可能快点回到美国去。”^②

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梅子明回到了美国。他到处鸣冤叫屈，而结果对他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却是欲盖弥彰，被美国人民嗤之以鼻；支持他的只有当时在美国的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和公理会差会头子史密斯等极少数反华分子，而他竟然声言，还要回到中国去“拯救中国人民”。

一九〇二年六月，梅子明又回到了北京，利用中国人民的赔款，重建公理会的传教基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梅子明不得不把他占领了两年多的蒙古王府退出来。^③梅子明这时已担任公理会华北教区的会督，在他的策划和指挥下，公理会的传教士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庇护下，利用清政府这时已极端衰弱的地位，竭力

① H. D. Porter: William Scott Ament,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to China. 第 250 页。

② 同上书，第 253 页。

③ 同上书，第 268 页。

发展教会势力。

一九〇七年，梅子明前往上海出席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他担任友谊与联合委员会的召集人，讨论由于中华民族的渐渐觉醒带来的新问题，主张基督教在华各派采取联合行动，以对付这种新出现的形势。会上就此问题曾作了一些决议，要求在华基督教各派开展合一运动。这在当时赴会的传教士当中，看法也并非一致，反对合一的传教士仍占多数。

这时的梅子明，已显得十分趾高气扬，生活也过得愈来愈豪华。一九〇八年七月，他到北戴河去度假，住在自己的海滨别墅里，第二天他尽情地打了一阵子网球，第三天又兴致勃勃地看垒球比赛，并在海上畅游，准备痛快地玩几天，然后到日本去接他的夫人。但是，乐极生悲，他开始发烧到华氏一百零四度五。经医生诊断为肋骨发炎，必须进行手术，切除部分肋骨。他妻子在横滨得到消息后，迅即乘船赶到北戴河，医生已在进行第四次开刀手术了。到十一月，病情愈加严重，于是决定立即乘船回美国治疗。他被护送到美国不久，即在一九〇九年一月六日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与梅子明长期共事的美国传教士博恒理医生，为这位在中国曾经脱去道袍、大干坏事的梅子明，写了一本传记，于一九一一年在美国出版，除了大部分是歌功颂德之外，还不得不记录了梅子明的若干丑态和罪行。

李 佳 白

(Gilbert Reid, 1857—1927)

李佳白是美国传教士，他主要是在近代中国开设尚贤堂，把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相结合，以建立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企图奴化中国人民。

先到山东传教

李佳白，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父亲是长老会的牧师。李佳白从小就接受基督教，在中学时代立志要到海外当传教士，这主要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后来，他考入纽约协和神学院，一八八二年毕业。他在神学院期间，已向长老会差会部提出申请，要求前往中国传教，长老会批准了他的申请。毕业那年的夏天，他从纽约乘船来华，同年十月抵达上海。

李佳白被指定先到山东烟台学习中文和实习传教。李佳白在神学院学习期间，就已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儒家的典籍。到了山东以后，他在旅行传教时来到曲阜，参观了孔庙，“登其堂而瞻仰圣容”，感到孔子“巍然在上”，表示非常景仰。^①他主张传教士在中国活动应当“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这样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可得到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所

^① 李佳白：《筹华自白》，第6页，“上中朝政府书”。

以，他在山东传教时，穿中国服装，戴假辫子，“一如华人仪式，行中国礼节”，并用孔丘经典附会基督教义，进行传教。^①

一八八五年，李佳白来到济南和兖州一带活动，这时，他已开始注意吸收中国上层社会人士入教。为此，他颇为努力地反复学习甚至背诵儒家典籍，以便能与士大夫们接触。他“甚觉孔教之精深博大，实汪汪无涯，而其理，又至中庸平实，浅浅易见”。^②他特别认为：“既能通达中国之学，中国之礼，则能与中国儒士官绅接见，情谊交孚。”^③

在济南强占民产

一八八七年，李佳白在济南城内看中一片民产，要求山东巡抚批准他以永租名义占用，但是，遭到业主拒绝。他竟用诬陷手段胁迫济南地方官扣押业主，并且未经官方同意，即亲率一批教徒，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冲入该址，把居民赶走，强占了那块民产。

此案反映到总理衙门，经过调查核实，认为李佳白确实是以非法手段强占的。总理衙门致美国驻华公使的一份照会中，指出：“十一月二十八日，李佳白挟着皮包，冲入该地住宅，命令住户空出房间，由他占领，致令住户内老幼妇孺惊愕莫名，手足无措。”美国公使田贝派员到济南去调查，也不得不承认李佳白强占民房是错误的。田贝得到报告后，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呈函美国国务卿贝雅特，指出“济南长老会在本年九至十一月间，企图获

① 《国际公报》，第45—46期合刊，1923年。

② 同上书，第47期，1924年。

③ 李佳白：《筹华刍言》，第34页，“民教相安议”上。

得一块永租的土地，为开设医院之用。他们声称，山东巡抚早在一八六四年已经批准他们在济南置产购地。不幸的是，这完全与事实不符。……李佳白代表长老会竟即前往占领该地，自称已征得出租者家属的同意，但该出租者当时正在监狱里。……”^①

事实既已调查清楚，美国公使田贝理应秉公处理此案，令李佳白退出所占民产，但田贝却反其道而行之，居然庇护李佳白所造成的现状，压迫清政府妥协让步。清政府不敢得罪洋人，先是拖延，后在美国公使田贝要调集兵舰前来威胁之下，在一八八九年不得已命济南地方官将城外一块空地作为交换，使李佳白获得比在城内那块民产大得多的地方，才算结案。

田贝在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向美国国务院汇报了此案结果：“极可告慰的是，当地政府已允许该传教士在距离济南三里处，拨给一块有价值的土地。……我不愿炫耀我自己的成就，但我感到有理由可以说，我为美国争取土地的努力，已经获得了明显的效果。”^②可是，事情并未了结，李佳白攫取到济南城外的土地后，仍坚持不肯让出在城内强占的民产，美国公使田贝也毫不讲理，支持李佳白的非法占据，到一八九一年，济南地方当局又被迫让步，城内这块民产也一并拨给了李佳白。

对维新运动的干预

一八九二年，李佳白回美国休假两年。他向长老会汇报了在华活动的情况，并且建议，在中国应首先向上层人士传教，并打算成立一个向中国上层人士传教的组织。李佳白除了向差会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87年，第238—239页。

^② 同上书，1890年，第148—149页。

部作这个建议外，还到各教堂进行鼓吹，并在一八九四年举行的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全国大会上发表演说，鼓吹只要使中国上层人士接受了基督教，通过他们，就可使下层老百姓都接受基督教。但是，李佳白的这个建议，却遭到长老会差会部的否决。

李佳白与长老会的意见相左后，决定脱离长老会，不再回山东传教。一八九四年，他以独立传教士的身份再度来华，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当时任同文馆总教习）的邀请下到北京，经赫德介绍，开始结交王公贵族和清政府的高级官僚李鸿章、翁同龢等人，“从此日出入王公大人及翰林御史之门”，开始了在上层社会的传教活动。

广学会在上海成立时，李佳白亦为该会会员，一八九三年被推为督办之一。当时他还在美国，没有就任，另一个督办（即总干事）是李提摩太。李佳白到北京后，常把搜集到的上层人物的情报寄到上海，也经常为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撰稿，鼓吹“改良”，强调与上层社会结交的重要性。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佳白还接受伦敦《泰晤士报》的聘请，任该报驻北京的特约记者，开始着重搜集维新运动的情报。一八九五年，李提摩太到北京活动。这时李佳白早已与维新派人士有往来，于是带了李提摩太与他们结交，大谈其政革与新政措施。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李佳白和李提摩太又都打入该组织，企图影响维新派人士，按照传教士的意图，改革中国的政治。

与此同时，李佳白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鼓吹传教士的所谓变法主张：要求清政府聘用外国人来推行“新政”，要求中国与帝国主义各国“讲信修好”，不要反对外来侵略；要求保持中国的旧

礼教、旧制度；“广新学”的目的在于“辅旧学”，要求“中西并立，新旧迭乘，专尚西学而竟弃中学者，非也。”^① 这些言论，实质上都是对中国维新运动的干预。

李佳白在《改政急便条议》一文中，说：“以今日而言改政，诚合随时之议。”接着，他提出了八个方面“改政”的具体意见：

“一曰重农以奠民食。”“二曰建学而储人才。”“三曰取才以获实用。”“四曰专任以定趋向。”“五曰制禄以劝官吏。”“六曰设法以励操守。”“七曰举善以公仕路。”“八曰经武以备不虞。”^②

这些改良主张曾经迷惑了一部分维新派人士，他们未能看清这些言论的实质，和传教士的真实意图。

创办尚贤堂

尚贤堂是李佳白于一八九七年二月在北京创办的，英文名称是中国国际学会，这是对中国上层人士进行工作的一个社团，不属于基督教任何差会。由李佳白自封院长，邀请了一批官僚和士大夫及绅士参加，作为“东西人士会合之地”，把他的“孔子加耶稣”的一套说教，付诸实施。

筹设这个机构，曾经得到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和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的有力支持。为了取得清政府的赞助，李佳白还报请总理衙门批示。

总理衙门在一八九七年二月发给李佳白的“批示”中写道：

“美国教士李佳白，在本衙门历次所上稟件条陈事宜及

① 李佳白：《中国宜广新学以辅旧学说》，1897年尚贤堂刻本。

② 《中东战纪本末》续编，第4卷，第1—2页。

拟办尚贤堂章程,均已阅悉,所见不为无见。该教士在华多年,洞悉情形,学有本源,心存利济,殊堪嘉尚。除将条陈各件留存本衙门备核,俟该教士创办尚贤堂,如果言行相符,见诸实事,有利无弊,届时由本衙门察看,再为酌奖外,著总办章京将原本发还,先行传谕嘉奖。”^①

李佳白在《拟设尚贤堂章程序》中谈到创办经过时,写道:

余籍隶美国之纽约省,夙仰中国盛名,神游久矣。……乃决意创立尚贤堂,实事求是,以期培养人才,裨益全局,准情酌势,妥定章程,务求有利而无弊。特念事属创举,关系重大,未经中朝允准而遽行开办,恐不能见信于友人者,或并有疑于中朝,殊非爱戴圣清之本意。乃将所拟章程,缮写一通,禀呈总署。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蒙王大臣照会美国钦使,内有查该教士所设堂名及所拟章程,均系为民教和睦起见,其意甚善等因。美国钦使复文,有该教士欲办此事之意,不过欲于中国京师及各省均有大益。该教士颇有才能,设立此堂,必能实力办理,故想其必能有成等因。……二月初十日,蒙总署延见商酌,十八日遂蒙批示,奖励愈恒。

尚贤堂开列的章程分三段二十一条,据李佳白声称:“本堂期于恢拓学士之志量,研炼儒者之才能,俾上行下效,使中人以上之人,智能日增,即资之以变化庸众。”“凡本堂往来交接之人,总以劝善为本,无论砥砺德行,讲求道艺,期乎扩充旧识,启迪新知。”“拟先在京都设立一堂,嗣后若能推广,则在外省分立支堂。”“本堂内拟设一公所,专使中西上等人土,往来会面,缔交既

^① 《万国公报》1897年第102期,第3页。

久，情谊亦亲，中外一气，获益良多。”^①

当时的尚贤堂，还不过是一个空架子，李佳白在取得了中国官方的批准文书，和各国驻华公使的赞助信或介绍信后，把尚贤堂的工作交由丁韪良负责，随即前往美国募捐。他在美国到处大吹大擂，说他与清政府的高级官僚和维新派领袖，是亲密的朋友。他专向大资本家游说，仅从摩根和卡内基财团就得到十五万美元的捐款。然后，他到欧洲去旅游，住的是最豪华的旅馆，专找各国政府高级官员和资本家，要求支持和给钱。他跑遍了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成为一个典型的借文化敛钱的国际术士。

李佳白在畅游欧、美等国之后，于一九〇〇年回到北京，却万万想不到遇到了义和团反帝怒潮，尚贤堂的筹备处也被焚毁。李佳白说，他当时突然从“极乐之山上，……落入绝望之泥坑中”。^②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外国传教士参与大规模的抢劫烧杀活动。事后，李佳白在一九〇一年美国出版的《论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为传教士参与抢劫进行辩护的文章，题目叫做《抢劫的伦理学》。李佳白为他本人未能进行更多的抢劫表示遗憾。他认为，抢劫的是战争的战利品，倘若中国人不愿被抢劫，他们就不应该发起这场战争。他除了为传教士的抢劫辩护外，还为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抢劫和烧杀等暴行辩护。李佳白对外国侵略军和外国传教士的暴行还嫌不过瘾，恨不得要求把整个北京城全部烧光，“也许这是为最大多数人所干的最大好事”。最后他写道：“抢劫是一种高级伦理学。”^③

① 《皇朝蓄艾文编》第 79 卷，杂纂 3，第 1—2 页。

② 《国际公报》1927 年，李佳白：“三十余年之纪述”。

③ Forum Magazine 1901 年，第 31 期，第 581—585 页，G. Reid: The Ethics of Loot.

李佳白在美国发表的这篇为强盗辩护的文章，激起了美国人民的愤慨。美国旧金山《呼声报》，对李佳白这篇奇文的发表大为吃惊，该报编辑撰文，说以前一直认为基督教伦理学除了讲公义之外，别无他物，而今居然由传播基督教义的传教士在伦理学里添加了“抢劫”的新内容，而且据说还是“一种高级的伦理学”。可是，这种“伦理学”在美国人民中是通不过的，是要遭到谴责的。^①李佳白看到《呼声报》的文章后，竟然又在《论坛》杂志上为传教士在华活动贴金，说传教士，“特别英、美传教士”，是“西方文明的保卫者”，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使人皈依基督教，并没有做错，即使它的后果会发生动乱或是战争”。他在这篇答辩文章里，对抢劫一事只字不提。^②以上是李佳白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后再度回美时，发出的叫嚣，暴露了这些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真实面目。

一九〇二年，李佳白回到中国后，决定在上海建立活动基地。一九〇三年，尚贤堂在上海正式开张，由于他在国外募得的钱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只得又向上海中外人士募捐。他的这个活动，又获得驻沪各国领事的支持。李佳白在上海通过旧关系，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大官僚取得联络，并竭力拉拢一些中外头面人物，参加尚贤堂的董事会，推举吕海寰任董事长。他还把尚贤堂以特别有限公司名义在香港注册，以取得英国殖民当局的保护。

在辛亥革命之前，李佳白以维护所谓“圣清”的封建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再次宣扬他的“孔子加耶稣”的说教，强调“美化庸

① San Francisco Call, 1901年4月16日。

② Forum Magazine 1901—1902年，第92期，第446—455页；G. Reid: The Ethics of the Last War.

众,转移人心,使中外教民趋于和洽”。同时竭力干预中国政治,公然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支持清政府的所谓“预备立宪”。他写了一篇题为《筹华台言》的文章,专为清政府的君主专制政体辩护,声言“中国之君主政体非专制”,“其精密完备不让于泰西,且更合于中国之情势”;如能预备立宪,使百姓“知其权力乃皇上所赐,有一定之限制”,就可使清政府更加稳固。^①

一九〇六年,李佳白又发表《论调和新旧学界之法》一文,声称:“今日中国朝廷,明昭叠下,力图自强,行将取法泰西各国,建立议院,予民以参与政治之权,是诚中兴之先声,端赖忠心爱国之臣民能谨慎以将。”^②

李佳白明目张胆地攻击孙中山宣传革命是“舍本求末”,认为应当对百姓“申以孝悌之义”,维持反动的清政府。^③“如将清政府完全推翻,则危害甚大,余信革命之精神,如流行病之不可遏。”^④为此,清政府于一九〇九年赏给他二千两银子和一块“通志同伦”匾额,以示嘉奖。

辛亥革命爆发期间,李佳白再次赴美国募捐,并且叫嚷“中国应不失其国之纲常名教”,“不得弃其经传”,而“现在中国所酝酿的民权,……有泛驾横流之患”。^⑤当他再次回到中国时,皇帝已被赶跑,他就转而寄希望于袁世凯。

李佳白曾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其中较露骨的是:“君主民主,不过名目之分,无关宏旨,不论可也。”^⑥“中国数千

① 李佳白:《筹华台言》,第20—21页。

② 《万国公报》1906年1月,第204期,第14—15页。

③ 李佳白:《筹华台言》,第20—21页。

④ 《国际公报》1927年,李佳白:《三十余年之纪述》。

⑤ 《尚贤堂纪事》第2期第6册;第7期第10册。

⑥ 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年来安于帝制，乐于尊皇。……今虽改皇帝为总统，易君主为民主，然人民安于习惯，其心理上仍望有天与人归，秉权出治之一人。”^①“治理中国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体。”等等。^②

一九一二年十月，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李佳白公然以洋儒自称，受聘为孔教会的高等顾问。为了扩大尚贤堂的影响，宣传他的关于帝国主义文化与中国封建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广泛收罗中、外上层人士入会。据称入会者“达到二十国人，十宗教”之众，又把尚贤堂的组织扩大，增设教务、商务、教育、妇女等部。每周举行大会，邀请三教九流人物到尚贤堂发表演说，以期达到“孔子加耶稣”的目标，即能“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③

一九一五年，李佳白接二连三地上书袁世凯，诬称：“中国人未识共和之精神”，“多缺乏自由之经验”，急于为准备登上几皇帝宝座的袁世凯鸣锣开道。袁世凯传旨嘉奖李佳白三万五千两银子，可是李佳白还没有领到这笔巨款，“洪宪皇帝”已经垮台，归了天。尚贤堂也由此而一蹶不振，会员作鸟兽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九一七年初，中国正式宣布与德国断交，德国公使将《北京晚报》转让给李佳白。他在北京期间竟公然反对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曾三次去谒见黎元洪总统，表示这个政治主张，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结果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北京晚报》同时被封。这年的十一月，他被美国驻华公使馆先遣送至菲律宾，然后让他回美国去。

① 《尚贤堂纪事》第5期第1册。

② 同上书第6期第10册。

③ 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

晚年的活动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响彻云霄。一九二一年七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开始出现崭新的面貌。正在这时，李佳白又来到中国。他惊呼：“余来华四十余年，中国之乱，无时蔑有，而尤以近十余年来为更甚。”^①他攻击当时中国革命青年“不知三畏之义”：“一不畏天”，是因“不知天命”；“二不畏大人”，是因“非毁孔圣”；“三不畏圣人之言”，是因“学校不读经书，且禁读经书”。^②

这时，李佳白跑到北京把尚贤堂的老店新开，又在一九二二年创刊《国际公报》（周刊），后来又组织所谓中外睦谊会、中外教务联合会等团体，拉拢一批清末在北京的遗老遗少，继续为在文化上结成反动同盟招兵买马。可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李佳白的号召没有多少人响应。他的尚贤堂经常是冷冷清清。不得已，李佳白决定把尚贤堂迁到上海，《国际公报》也改在上海出版。但到尚贤堂去的人仍然很少。他对当时在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以及后来的省港大罢工，都抱敌视态度。

李佳白在上海活动了一年多，至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郁闷而死，终年七十岁。他的儿子李约翰继承他的衣钵，但终因门可罗雀，乏人问津，于次年被迫关门大吉。

李约翰回到美国继续深造，于一九三四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他先是受聘于华盛顿大学，从一九三九年起到一九五八年止，一直在美国国务院任职，为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一九五八年以后又回到大学当教授。

^① 《国际公报》1927年，李佳白：《不平安的安慰法》。

^② 同上书，1924年，李佳白：《孔教大学圣诞节演说》。

卜 舫 济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1947)

卜舫济是美国传教士，一八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纽约，一八八三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旋入纽约总神学院攻读神学。他在神学院读书期间，由于在课余给一些中国人教英语，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他希望毕业后能前往中国当传教士。一八八六年，卜舫济接受美国圣公会差会部的派遣，从纽约乘船到上海，当时他年仅二十二岁。卜舫济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特别在文化关系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因为他曾经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为培养效劳于帝国主义的买办，操劳达半个世纪以上。但事与愿违，他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圣约翰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的却是帝国主义的掘墓人。^①

青年卜舫济在上海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青年卜舫济踏上了上海滩。自从一八四三年第一个英国领事到达上海后，经过四十多年经营的十里洋场，已经成为外国冒险家的乐园。卜舫济对上海的生活和环境很快就适应，一面被安排在圣公会学习汉语，一面到圣

^① Sherwood Eddy: *Pathfinders of the World Missionary Crusade*. 第189—193页, *The Founders of St. John's University*.

约翰书院兼职教授英语。

圣约翰书院即为圣约翰大学的前身。它的创始人是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若瑟。他把圣公会原在上海开办的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于一八七七年在上海曹家渡附近沿苏州河以南的一块三角洲上开始筹建校舍，一八七九年九月正式开学。施若瑟任第一任校长。

一八八一年十月，圣约翰书院正式设置英文部。这是因为当时在上海“英语知识可以有商业价值，可以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在外国商行里谋职，学校当局决定满足这项需求”。^①这表明，圣约翰书院从办学伊始，即以培养在外国商行的买办为宗旨。学生要入英文部学习，每月需付墨银八元，先付后学。

果然，要求入学的富家子弟纷至沓来。一八八四年，圣约翰书院把预科改为半日中文、半日英文，并扩大招生名额，收取高昂学费，以适应各方面急需的英语人才。

卜舛济到校后，执教英语仅一年，就总结出还需大大加强英语教学的几条经验。他向圣公会差会部写了份报告，提出把英语教学列为圣约翰书院的重点，列举的理由是：“一、教授英语可以训练中国人的智力，如同给外国青年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所能成就的是同样的性质。二、这样做可以铲除学生的排外偏见。三、训练青年与外国人交往和在商界担任重要职务，可以促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四、我们可以证明，对培养人才为社会作出有益的服务方面，可以指望基督教教会提供这样的服务。”^②

①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29*. 第5页。

② 同上书，第7—8页。

卜舫济的这个建议,受到圣公会差会部的重视,并且决定大胆提拔这位年轻有为、年方二十四岁的美国传教士,出任上海圣约翰书院校长。卜舫济决意不辜负美国差会部的托付,努力把圣约翰书院办成一所在中国领土上的美国文化租界,逐步把课程改革至除中文课外一律使用英语课本,用英语教学,学生全部使用英语,使学生置身校内不受中国政府和教育部门的管辖。

圣约翰书院最初的宗旨是传教。施若瑟在该校设立之初,即强调:“我们需要的是训练中国青年为基督服务。”^①卜舫济不能违背它,但比前辈更野心勃勃,要通过加强英语教学,铲除中国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培养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买办,和最听外国传教士话的学生。

经营圣约翰书院十七年

从一八八八年到一九〇五年的十七年间,卜舫济致力于把圣约翰书院逐步经营成为一所在华的教会大学,要使毕业生能控制中国的未来。他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问到美国军队的力量来自何处时,我们不只是指出我们有少量的常规军,而是提到西点军校。那里训练着我们未来的军官和军人,准备一旦需要就可担任领袖,对别人进行教育和训练。当被问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何处可以清楚看出其力量来源时,让我们不只是指出中国有那么一小队英勇的本地和国外的福音使者,而且还应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巨

^① 格雷·休门:《中国教会史》,第90页。

大和最有力的影响。”^①

圣约翰书院实际上仍是一所中等程度的教会学校，直到一八九二年才有两名大学生，一八九五年有六名大学生。到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五日，卜舫济写了份意见书给圣公会差会部，建议增设大学部，开设文理、医学和神学三个科，文理科学制为三年，医科收医预科毕业生，学制为四年，神学科收文理科毕业生，学制为三年。^②

圣公会差会部批准了卜舫济的意见书，并指示必须加强对学生、特别是神学科学生的宗教灌输和训练。一八九七年，医科学生有五名，神学科学生有四名；一八九九年大学生共有二十七名，均为男生。教徒学生与非教徒学生的比例为一比三。非教徒学生每学年需缴学费一百二十元墨银，教徒学生可享受减免费待遇。非教徒学生多为富家子弟，一八九八年入教者只有三名，但是他们在校也必须受到宗教的灌输。

一九〇〇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没有直接打击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但是卜舫济却非常害怕，决定暂时把学校的暑假延长，从七月一日直放到九月十日，让所有学生都回家去。对华北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参与八国联军和在北京大肆抢劫的罪行，卜舫济认为：“在回答这项指控时，我们至少担心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们是要服罪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参与这种政治干涉，也不是没有罪过的。传教士们受到攻击，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基督教的传播者，毋宁说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③但是，卜舫济

①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第497页。

②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51. 第40—41页。

③ F. L. Hawks Pott, The Outbreak in China. 第100、101、111页。

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的，在讨论是否瓜分中国的问题时，卜舛济的意见同美国政府是一致的。

圣约翰书院在义和团反帝风暴过去之后即行开学，卜舛济首先把学费从全年一百二十元提高到一百四十四元墨银。此外，他还设置了一些奖学金和减免费名额，鼓励那些被他认为可以培养的穷学生，读神学科或别的科目。

据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度报告称，圣约翰书院共有学生一百八十七名，大部分来自富有的商人家庭，学生来自全国八个省，还有夏威夷来的学生。学生中教徒共有五十七名。大学部已有学生四十六名，已经毕业者十三名，其中八名是教徒。他们毕业后的去向是：四名留校当教师，二名传教，二名在官立学校教书，四名经商。医科在一九〇二年又毕业四名，在校五名。

自从卜舛济担任圣约翰书院校长后，除上述重视宗教与英语的训练外，还强调师生之间关系要亲密无间。他自己在这方面首先树立了榜样。每逢周末，他总是在家里举行晚会，请学生轮班到家里作客。他在这些周末晚会上只是请同学们来喝茶，吃蛋糕，玩些游戏，唱点歌曲，随便聊聊天。实际上，这种做法可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同学们对学校、对校长、对其他教师产生感情。同样，卜舛济也要求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在教室内外运用上课、谈话、讲故事等同学生们接触，特别是当每个学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刻，教师要给予他个人的同情和忠告。”^①

卜舛济也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卜舛济说过：“在游玩的时候，教师愿意与同学们混合在一起，……无疑地会使学生的脑子

^①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第466页。

开窍，教给他们有价值的课程。”^①卜舫济组织的第一个学生体育组织是射箭俱乐部，后来规定每周要上哑铃操和军事操，随之学生足球队也组织起来，并且开始有了田径运动和游泳等体育活动，这些体育运动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还是件新鲜事。许多旧式文人认为，这样太不成体统。

圣约翰书院在十九世纪末已有了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每月举行一次活动。此外，同学会还组织辩论和文学会，是用英语练习辩论和举行文学方面的活动。同学们还组织唱诗班和戏剧小组等。由学生编辑出版的英文校刊《约翰声》，是在卜舫济的直接指导下，从一八九〇年起创办的，这个校刊一直延续了四十年之久。卜舫济除了回到美国去度假之外，几乎每期都要写一篇文章。

一九〇四年是圣约翰书院二十五周年校庆，八月二十九日，该校首任校长施若瑟从日本（他在一八八一年因病返美，后被派往日本传教）发来了贺信。信中写道：“当我在一八五九年到中国去，在前辈文惠廉主教领导下工作了几年之后，我心中非常强烈地涌出，需要建立一所教会大学。我决定在我回美度假时，为这一目标进行募捐。我深信，接近中国人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办教育。理由有二：一是因为中国人是有智慧的人民，二是因为他们看重教育，也许要超过其他国家。……愿上帝继续使圣约翰书院兴旺发达，使它对中国的传教事业有愈来愈大的影响，这该是我经常盼望的和为之祷告的。”^②

①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29* 第58页。

② 同上书，1879—1951，第56—57页。

任圣约翰大学校长三十五年

为了把圣约翰书院改为正式大学，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九日该校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注册，定名为上海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的十六名主教、十四名牧师和十五名教徒组成托事部，任命卜舛济为圣约翰大学校长。当时卜舛济四十一岁。

一所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大学，不向中国政府登记注册，而向外国政府注册，这是无视中国主权的举动。

卜舛济毫不掩饰地说：“圣约翰大学就是在治外法权庇护下，设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所美国学校。”(An institution on Chinese soil but under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①这就是说，教会学校就是设立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文化租界”，在这大大小小的“文化租界”里，中国的政令是无法插入的。这是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九〇七年二月，圣约翰大学举行毕业典礼时，有六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其中四名被授予文学士学位。这是在华教会大学授予的第一批学士学位，他们是：顾子仁、朱友渔、江虎臣、蒋克鼎，其中三人为教徒。他们后来都成了教会的头面人物。

由于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了册，该校的毕业生不经过考试可以直接到美国的大学深造，这也是一种吸引留学生到美国去的措施。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有三十余名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到美国留学，十余名前往英国留学。这批学生回国后不仅在教会担负重要工作，且已进入中国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或洋

^①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51. 第78页。

行等出任高级官吏或买办。

一九〇七年，上海举行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卜舫济为大会的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大会上宣读他写的有关教育问题的长篇文章。他看到当时中国政府正急于发展教育事业，于是批评中国政府操之过急，太表面化；而且，指责中国有反对教会办学的倾向。这是传教士害怕丧失他们对中国教育的垄断。卜舫济接着要求注意教会学校与迅速发展中的官立学校相竞争的问题，建议教会学校办得规模小一点，但要更好一点。他声言：“我们必须不让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发展过大，以致牺牲对学生的个人影响这个重要因素。我们的目标是较小的学校，保证质量，而不求数量。这将会象发酵的力量，可对整个社会施加更大的影响，这样要比学生人数拥挤的学校，因很少与学生接触而无法施加影响好得多。”卜舫济的所谓对学生施加影响，无疑是指培养学生亲美、崇美的思想。他在大会上还建议设立跨宗派的联合教会大学，要招收研究生，培养更高级的人才，有与官立大学相颉颃的能力，以便保持帝国主义在中国教育界的垄断地位。^①

卜舫济还不断地设法扩展在上海曹家渡三角洲的校址，到一九三六年他回美度假前，圣约翰大学已占有苏州河两岸近三百亩土地，建造了十三座教学用楼和三十二座住宅。布置了一块相当美丽的校园，校产总值约八十万两银子，其中地产约值十八万两，其余均为房产值。这批房地产的百分之六十是在中国募捐而得的，也就是说大部分是由中国人捐赠的。其中的约二十万两银子，是由圣约翰大学校友募集和捐赠的。卜舫济每周末举行的晚会上的几块蛋糕，可能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① Report of the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1907.

圣约翰大学设有文、理、工、医和神学院，并附设研究院和附属高中，常年经费约七十万美元。其中十万美元来自学生缴的学费，其余六十万美元，则由美国圣公会负责筹措。

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是“光与真理”。据《约翰声》的诠释：“我们要使约翰书院成为中国的光和真理的火炬，没有再比这个目标更为崇高了。我们将努力给予我们的学生一个广阔的、丰富的和基督化的教育。我们将充分地教授英语和文学，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扩大学生的智能水平。我们将传授科学，不仅因为科学有实用的价值，还由于科学真理和其他一切真理，都是来源于上帝。”后来又在“校训”中添加了孔子在《为政》篇里讲过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还把孔子的这段讲话刻在学生们胸前挂的校徽上，要他们对传教士解释的“光和真理”及孔子教诲，拳拳服膺，身体力行。^①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已有一部分人在中国政府担任要职，其中如颜惠卿出任驻德公使（严格说来，颜惠卿不能算圣约翰校友，他是该校教授，后任董事），施肇基出任驻英公使，吴仁基出任汉阳兵工厂督办，周贻春出任清华学堂校长，顾维钧出任外交部秘书长，随后又派驻墨西哥公使，王正廷为中国留美学生监督，余日章为驻美商务代表等。^②更多的圣约翰大学校友，散布在洋行、海关、邮局或官办企事业，充当买办或高级职员。

一九一三年二月，卜舛济曾邀请孙中山到圣约翰大学发表演说，受到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孙中山说：“你们从《圣经》里

①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29* 第11页。

② 同上书，1879—1951，第96页。

学到,你们有了光,就应该给别人照亮道路。所以,当你们接受知识之后,也就应该去教导别人。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就是教育。只要人民需要学习,你们就有责任去教育他们。你们要把所得到的给予他人。”^①当然,孙中山的愿望是,要求学生毕业后把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

一九一三年,也是卜舫济在“圣约翰”当校长二十五周年,他回顾了学校走过的历程:“当初只有八十名学生,今天我们已有五百余名学生。当初只有八名教师,现在已有四十名教师。当初只有一座简陋的校舍,而今已有五座漂亮、坚实的大楼。当初没有大学部,现在毕业班有二十一名大学生,即将授予学位,并可获得美国第一流大学的承认。”^②卜舫济这时是颇为踌躇满志的。

一九一八年,圣约翰大学把中学部分出去,成为独立的教会大学,同时决定把中文课改为选修课,撤销中文部,使圣约翰大学完全变成一所在中国土地上的美国学校。当时这件事曾遭到一些舆论的指责,为此卜舫济假惺惺地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请黄炎培出任主席。调查结果证实,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确实要变为不识中文的文盲,成为只会看洋书、说洋文的标准“洋人”了。为了装点一下门面,卜舫济决定聘请一九一八年“圣约翰”的毕业生孟宪承出任兼职的中文教师,规定学生每周选修三节中文课,另外还可选修三节法语或德语课,但仍以英语为主。^③这表明,卜舫济决心坚持要把圣约翰大学办成一个商业买办型的教会大学。

①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29*, 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76页。

③ 同上书,1879—1961,第88—89页。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的十年间，圣约翰大学因受到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冲击，校务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卜舫济被迫作了一些让步，但坚决不放弃当校长的职务，只是让沈嗣良当个挂名的副校长。沈嗣良原为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后被卜舫济资送美国，专学体育，回国后到该校任体育课主任。由于他颇得卜舫济的欢心，不久就升为教务主任，一九二九年提拔为副校长，充当他的代理人。

卜舫济在这十年里，并没有放松对学生的宗教灌输。相反，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除了宗教课和宗教崇拜外，还要求：一、聘请一位得力的中国驻校牧师主管宗教活动。二、聘请圣约翰神科毕业生轮流返校举行一星期的灵修会。三、增加教徒子弟入学率，因教徒子弟的家庭一般都不富裕，在圣约翰读不起书，常有转学到学费较低的官立学校去的现象。

据一九二六年统计：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的分布情况为：在中国政府做官的有四十三人，其中内阁部长级七人，局长级十六人，外交官六人，铁路官员十四人；在商界任职的有一百五十八人，其中经理二十四人，买办一百零七人，银行界二十七人；在教育界任职的有七十二人，其中大学校长二人，大学教师六十五人，中学校长五人。这个统计表明，圣约翰大学当时的毕业生，在商界任职的最多，占到百分之五十八以上。^①

从一九二九年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圣约翰大学，在国民党政府的扶持下，卜舫济继续贯彻美国圣公会定下的

^① The Christian College in the New China, Report of the 2d Biennial Conference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y in China, Feb. 2-16, 1926. 第203页。

办学方针，尽量在中国扩大“圣约翰”的影响。但毕竟它受到美国经济大危机的冲击，学校的经济常陷入困境。一九三一年，卜舫济回美国设法筹措经费，由沈嗣良代理校长。当然沈不过是一个代理人，一切还需听命于圣公会美国主教的摆布。

从一九三一年起，迫于形势，卜舫济表面上取消了曾经施行半个世纪的强迫宗教教育，凡是教徒学生，则不在取消之列，只有非教徒学生可以自由参加或不参加宗教课和宗教崇拜。另外，卜舫济让基督教青年会加强它在校内的各种活动，以吸引非教徒学生参加。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圣约翰大学举行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和庆祝卜舫济任校长四十周年，少不了一番热闹。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头面人物到校捧场，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汉代表美国政府也来祝贺。“圣约翰”校友之一的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另外几个非校友，也由卜舫济代表美国的一些大学，授予学位，其中有钟荣光（岭南大学校长）、吴贻芳（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会长）等人。胡适也专程自北京赶来祝贺，并发表演说。孔祥熙也从南京赶来参加盛会，他当时已任国民党政府的实业部长，他不是“圣约翰”校友，但因曾担任过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早已与基督教有密切关系。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华，北方时局愈来愈不稳定，本来打算投考北方一些大学的学生，改为投考圣约翰大学，一九三二年学校人数增加到七百余名。学生人数过多就难于控制，卜舫济对此并不高兴，特别是非教徒学生的猛增，使教徒学生仅占全校学生的四分之一。尽管卜舫济试图加强宗教影响和思想控制，也已显得无能为力。

一九三四年，卜舫济已是七十岁高龄，他大权在握，但岁月不饶人，所以他想把一部分实权交给大儿子卜其吉。卜其吉是一九二四年被圣公会差会调到圣约翰大学任职的，后来又送回美国深造，毕业后到中国“圣约翰”任教育系主任兼注册主任。

一九三六年秋，圣约翰大学打破它五十多年来只招收男生的传统，开始接纳圣玛利亚女中的毕业生进校念书。这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由圣约翰大学校务会议决定的。

卜舫济于一九三六年秋后再次回美国休假，沈嗣良再度代理校长，本拟筹备庆祝卜舫济来华五十周年，因卜舫济本人不在，沈嗣良也就无庸为此而张罗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华全面武装入侵，八月十三日又进犯上海，地处曹家渡乡间的圣约翰大学校舍充作难民营，经国民党政府宋子文出面，把南京东路上的大陆商场暂租给“圣约翰”作为临时教室，同年十月继续开学。当时，卜舫济仍在美国，上海方面的校务由圣公会主教控制，让沈嗣良支撑。到一九三九年学校迁回原址时，在校学生已达到约一千四百名。这年，卜舫济回到上海，主持“圣约翰”建校六十周年的简单庆祝仪式后，正式提出辞职。这时他已七十五岁。董事会决定卜舫济任名誉校长，^①沈嗣良为校长。卜舫济辞职后再次回美国，把大儿子卜其吉留在“圣约翰”控制校务。

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爱国运动

圣约翰大学尽管受到卜舫济严密控制，但是它并非真空地

^①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51. 第200页。

带,中国民族觉醒的浪潮,照样能冲进“圣约翰”的围墙,它的铁制的大门也关不住爱国的学生。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上海各学校于五月六日发电北京声援五四运动时,圣约翰大学已经签名。^①五月七日,上海各界二万人在西门外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并示威游行,“圣约翰”也派代表参加。^②五月十一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时,“圣约翰”也派代表出席并加入上海学联。^③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学生举行总罢课,圣约翰大学也参加了罢课斗争,齐集西门体育场宣誓并游行全城。^④

圣约翰中学部的传教士,首先干涉学生的爱国行动。五月六日晚,校部召开全体中学生大会,宣称“此校系美人设立,华人在此无自由权。”后卜舫济赶到,害怕出事,而勉强答应学生参加国民大会。但后来中学部校长竟开除学生一名,停学一名,结果引起中学生的公愤,决定全体退学。^⑤

五月下旬,圣约翰大学爱国学生组成宣讲团,共分八个队,分赴上海各镇宣讲,“宣讲资料系述外交失败之可痛,抵制日货之利益及爱国之真精神”。^⑥

从六月三日至六月十二日,上海人民实行罢市、罢工、罢课的三罢斗争,圣约翰大学学生不顾卜舫济的阻挠和破坏,也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卜舫济无奈,只得宣布放假一星期,但一星期过后,学生继续坚持斗争,而且决定不参加考试,不参加毕业典礼。卜舫济哀叹:“这是我校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放弃举行毕业

① 上海《申报》,1919年5月7日。

② 上海《时事新报》,1919年5月8日。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0、13日。

④ 上海《申报》,1919年5月27日。

⑤ 同上书,1919年5月10、13、22日;6月5日。

⑥ 同上书,1919年6月4日。

典礼。”

由于学生爱国运动正方兴未艾，卜舫济在一九二〇年召开的一次校务会议上提出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如下规定：

“鉴于：一，圣约翰大学是一所美国的教会大学，如果成为政治运动的发动中心，将会是违法的。二，学校对参加当前运动的学生无法保证其安全。为此，特通过下列决议：（1）大学部和中学部的负责人认定，凡欲参加罢课的学生可自行自由作出决定。（2）凡参加罢课的学生，应一律立即回家，罢课期间不准居住校内。（3）外地学生欲参加罢课，必须在校外另觅地方居住。（4）凡愿继续在校念书的学生仍住校内，并按时上课。（5）凡参加罢课的学生愿意回校时，只要肯按规定恢复上课，即可返校。”^①当时学生正值声援收回山东主权而举行罢课斗争，“圣约翰”公布这些规定时，在校学生只有八人，等于停办。虽然卜舫济一再声言决不能把圣约翰大学变为学生的“政治俱乐部”，但收效甚微。

一九二五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卜舫济从一开始就采取镇压手段，使他的真面目更加暴露无遗。五月三十日，外国巡捕在南京路上枪杀中国同胞的消息传入圣约翰大学后，爱国师生顿时群情激愤，当即召开全校学生紧急会议。正当一位同学在台上报告南京路惨案实况时，卜舫济突然来到会场，把演讲的同学赶下台去，并且宣布禁止学生集会。

五月三十一日清晨，“圣约翰”学生不顾校长禁令继续开会，一致通过参加上海学联，与全市学生共同斗争。六月一日，全校学生举行罢课，卜舫济竟然对学生说：“圣约翰大学属工部局管

^①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61. 第80—81页。

辖下之学校，学生无反抗工部局之权。”工部局即为上海公共租界的殖民政权。爱国学生不理睬卜舫济的恐吓，坚持罢课。六月二日，当学生列队准备出校宣传时，“校长亲自把守校门，不准学生外出，并面斥学生，谓本校误养一般强盗。学生受斥大愤，立即召集全体会议以谋应付。”^①卜舫济见无计可施，于是宣布学校放假七天，通知学生家长一律把学生领回，可是学生决定一律不回家。

六月三日，圣约翰大学爱国学生决定在校内旗杆上悬挂半旗，为五卅死难同胞志哀。卜舫济乘学生到礼堂开会之际，冲到操场上将半旗卸下。后来，学生发现，又取一面旗子准备升上旗杆，卜舫济竟然当场从学生手中夺下旗子。学生们愤慨不已，当即在礼堂举行全体紧急会议。卜舫济又冲入会场宣布大学和中学部全部停办，进行威胁。爱国学生忍无可忍，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当场“议决全体永远脱离该校，永不再来”。在决议上签名的学生共有五百五十三名，其中大学部学生二百六十三名，中学部学生二百九十名，还有一部分爱国教职工也签了名。

下午四时，全体签名脱离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怀着对帝国主义的满腔义愤，毅然决然地列队走出校门。他们的这场正义斗争，得到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他们纷纷控诉帝国主义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到八月间，在上海各界协助下，退出“圣约翰”的师生，成立了一所新型的大学——光华大学。^②

经过这次斗争，卜舫济连同他经营四十多年的圣约翰大学的名声一落千丈，学生寥寥无几，使得卜舫济无法支撑下去。他

^① 《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75—376页。

哀叹道：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是一场“悲剧”。^①

接踵而来的是中国人民开展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华许多教会学校，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应付，而卜舫济却表示坚决不在中国立案，借口要等“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最后确定了一个明确的教育政策”之后再行考虑。因为他自恃后台硬，又有学生在国民党政府做大官，毕业生不愁没有出路。当时在中国只有圣约翰大学和北京的燕京大学，仍是美国人当校长。一九三二年，“圣约翰”校务会议因受到各方压力再次讨论立案问题请示卜舫济时，他仍坚持不立案，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任何管辖，按既定方针办校，只接受美国差会和美国政府的命令。直到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政府临垮台前，圣约翰大学才向国民党政府草草立案了事。^②

一九二七年，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南京，再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传教士吓破了胆，纷纷撤回回国。圣约翰大学也无法再办下去，不得不宣布关门，只有一部分学生临时迁入租界继续上课，学校改名为丁卯学社，全部由中国教师授课。

由于国民党新军阀投靠帝国主义，一九二八年局势渐见平静，卜舫济再次筹划旧店新开，但遭到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反对。原“圣约翰”学生会向高等教育委员会呈上一份请愿书，要求该委员会接管这所学校。他们提出：“为了维护中国人的主权，必须撤消外国人对这所学校的管理权。圣约翰大学是在四十年前开办的，已有数千中国青年领到该校文凭，其结果是甘愿为洋人工作。他们被命令拿起《圣经》去劝人加入基督教会。学生要每

①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29. 第94页。

② 同上书，1879—1951，第106—109、150—163、234—235页。

天祈祷念经，处在那样的环境之中，他们不得不服从洋人的命令。……他们问道，如此下去，怎能拯救中国青年于水火呢？”^①这是上海英文《字林西报》的一段报道。虽然如此，圣约翰大学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经南京政府默许，未经立案又在原址开学。卜舫济把在国民党内任要职的宋子文、王正廷等拉进圣约翰大学的董事会，作为他的陪衬。

晚年的卜舫济

卜舫济在一九三九年到上海作短期逗留并提出辞职后，挂了个名誉校长的招牌，即回美国度晚年生活。当时，上海租界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但“圣约翰”仍得开学，这主要是校长沈嗣良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延请日本人、德国人到校授课和容许日帝插手干预校政。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八十二岁高龄的卜舫济又来上海，回到了他经营半个世纪的“圣约翰”校园，继续当他的名誉校长。他住进了专门为他盖的一座白色小洋房，人们都呼之为“白宫”。卜舫济继续掌握着校政大权，任命中国人涂羽卿担任校长，另外通过美国方面和国民党秘密接触，竟然把被指控为汉奸的沈嗣良从监狱里放出来，并且为他做了许多开脱罪责的活动。

但是，中国已在急剧地变，朝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在变，卜舫济的这所受治外法权保护的美国学校也在变，学生们变得都不那么听话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国军人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暴行发生后，激起了全国学生的反美

^① North China Daily News, 1928年6月20日。

怒潮，“圣约翰”校园里也爆发了反美示威。这年的圣诞节，卜舫济住在“白宫”里面，感到日子很不好过。他由此而病倒了。

一九四七年新年刚过，被卜舫济认为是所谓的坏消息一个紧接一个传到他的耳中。一月间，美国政府宣布退出军事调解处执行部，公然支持蒋介石扩大内战，而其结果却是对美蒋反动派愈见不利。卜舫济预感到一切都完了，包括他一手惨淡经营半个多世纪的美国大学——“圣约翰”。就在这年三月七日，卜舫济结束了他在世的生命，终年八十三岁。

卜舫济生前写的英文著作，有一九〇〇年出版的《中国的暴乱》，一九〇四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概要》，一九一三年出版的《中国的紧急关头》，和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上海简史》等。

卜舫济的第一个妻子是中国人黄素娥女士，一个牧师的女儿，圣玛利亚女中校长，生有三男一女，一九一八年因病去世。卜其吉就是她生的大儿子。卜舫济娶的第二个妻子，是英国人布朗女士，在卜舫济去世后仍住在圣约翰大学的“白宫”里，一九四九年四月回美，一九五〇年去世。

卜舫济去世后，他的大儿子卜其吉以美国圣公会代表的身份，继续控制圣约翰大学。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写给差会的报告中，称：

共产党的统治已扩大到象济南、天津、北平这样的城市，目前又明显地威胁着长江以南的关键性城市南京和上海，这一定会给所有的传教士提供大量思索的材料。一场彻底的革命正在进行，它必将影响所有的学校和大学，可能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所有的教会教育家都必须想方设法最好地应付即将来临的变化，在被迫作出抉择之前，预先把问题想好。……校董会和校务会议已作出决议，只要

能保持宗教自由和学术自由，大学仍要办下去。同时建议把学年的任务，在共产党人到来之前能尽快地完成。为此目的，我们缩短了第一学期，取消了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并且按计划提前一个月，即在一月十日就开始第二学期。现在我们已完成春季一半的任务，计划在五月初结束本学年，五月十二日举行毕业典礼。……本学年注册的学生共有一千三百三十名，教员有二百名。……今年是圣约翰大学建校七十周年，我们不应中止庆祝，而应在五月间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计划，用适当的方式举行庆祝活动。^①

这是在上海解放前夕卜其吉向差会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

卜舫济的后代，在国内外都有，他的学生在国内外也都有。卜舫济代表美国政府和圣公会差会的意志，主观上企图培植一批崇外势力，和为他们效劳的买办和新式文人。可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往往并不完全一致，甘心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或肄业生，都是爱国的。新中国成立后，圣约翰大学许多毕业生，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曾经作出过贡献，有的至今还在四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目前，许多仍在海外的“圣约翰”校友们，也愿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① Mary Lamberts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51. 第227—231页。

乐 灵 生

(Frank Joseph Rawlinson, 1871—1937)

乐灵生是美国传教士，曾因在上海长期担任英文《教务杂志》编辑而著名，他也是在华传教士中社会福音派的头面人物之一。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被国民党军用飞机掉下的炸弹，炸死在上海大世界附近。

从英国移民到美国

乐灵生的祖籍本属英国，他于一八七一年一月九日出生在英国拉特兰郡的兰姆镇。他父亲是普利茅斯兄弟会多年的义务传道人，因此，他从小就处在一个宗教的家庭环境之中。他最初是从一位内地会的传教士那里听到有关海外传教的事迹，他在家乡念完小学时，就梦想到新大陆去。中学没有毕业，他跟随一批英国人移民到了美国，当时，他才十八岁，身边只有五块美元。他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立足，并加入了美国浸礼会。以后，到弗吉尼亚州亚力山大里亚的布莱克本中学念书。二十岁那年中学毕业，考入巴克内尔大学，毕业后又转入罗彻斯特神学院攻读神学。他在神学院的最后一年，即一八九九年，与凯丽·戴兹小姐结婚，两人志同道合，决定在毕业之后申请前往中国当传教士。

乐灵生从神学院毕业后，先是向美国北浸礼会提出申请，但

未被批准，旋即又向美国南浸礼会提出申请，同时还申请加入美国籍。一九〇二年，乐灵生取得了美国国籍，南浸礼会也批准了他的申请。经过一番筹备，在纽约登上了开赴中国的轮船，于一九〇二年十月十六日抵达上海。

到中国后所担任的工作

乐灵生到达中国的时候，正值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六十年的外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清政府已逐步沦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风起云涌，到一九〇〇年达到了一个高潮——义和团反帝运动。面对人民群众的日益觉醒，帝国主义不得不改变一些手法，而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也相应地改变以往几乎是单纯传教，转而着眼于提出这样那样的帮助中国社会进步、增进人民福利的迷惑人的主张，并由此而产生了与基督派相对立的所谓社会福音派。

乐灵生到上海后，在学习中文的同时，被安排在美国南浸礼会开办的民强男塾教书，不久升任该校校长。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一九二一年因脱离南浸礼会加入公理会而辞职。在这期间，从一九〇九年起，乐灵生还兼任上海传教士子女学校董事会的主席。一九一二年在他筹划下，建成了上海美童公学。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他兼任上海道德福利协会的主席。这是一个上海外侨的福利团体。

乐灵生从一九一一年起担任上海基督教出版的英文《教务杂志》编委，一九一二年被任命为副主编，一九一四年起任主编，直至一九三七年去世时止，在《教务杂志》前后工作达二十五年。这是他在中国所从事的主要活动。

乐灵生在一九一七年返美度假期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一九二四年返美度假期间，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兼教课。

在二十年代的言论

乐灵生在华的经历比较简单。他一直住在上海，除了担任一个时期教会学校的工作外，主要从事于编辑出版基督教的英文刊物《教务杂志》。因此，通过他在该杂志上写的“社论”和文章，可以检验他对中国政治，和在华基督教事业的态度。

英文《教务杂志》，是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裴来尔牧师于一八六七年在福州创刊的一份基督教刊物。一八七〇年，改由美国传教士保灵牧师负责，一八七一年五月因保灵回国而停刊。一八七四年一月，《教务杂志》在上海复刊，出版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停刊。这期间先后担任该杂志编辑的，有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费启鸿，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贾腓力，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金多士和乐灵生等人。《教务杂志》是在华基督教各差会互通声气、交流经验、提出各种传教主张，和反映对中国政局不同看法的一份月刊。由于它出版时间长达七十余年，因此，对于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是一份不可忽视的和有参考价值的外文期刊。

乐灵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发表的言论很多，现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态度，对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的态度。

一、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

乐灵生从一九一一年任《教务杂志》编委后，就甚为注意中

国的政局。他亲眼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和人民革命的风起云涌。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担任副主编，在和主编费启鸿合写的一九一二年元旦“社论”中，说：

过去的一年，对中国来说是意义重大的，进步的波涛汹涌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过去数十年坚持不变的宣传，这一年所充满的重大事件，终于达到了顶峰，爆发了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是政治动乱的表现，也是道德觉醒的标志……因为一九一一年将以新中国的出现而载入中国的史册。斗争确实尚未过去，但是反动主义和中古思潮，现在已处于守势，它们的地盘正在迅速缩小。新中国终于掌权了！展望未来，我们比以往更有信心，光明必将战胜黑暗，正义必将支配强权。^①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乐灵生已是《教务杂志》的主编，他在七月号的“社论”中，以《中国的消极革命》为题，写道：“对于新近的民族运动，人们可以采取各种立场，……有人可以采取建设性的同情的立场，同时不鼓动抵货和暴力。”乐灵生声称，传教士应该采取这个立场，“因为我们相信，只要引导得法，这个运动有足够的要素可以克服任何过激的和仅仅是破坏性质的倾向，而使之向好的方而发展。”他说：

学生罢课在中国已是普通的事，但我们以为，全国性的罢工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中国跟其它世界学习使用的一件新式武器，而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替代的办法，使之减少“回冲力”和类似的“后院起火”的发生。……我们是要中国觉醒的。认识到罢工是一把双刃的剑，任何人都不能长久地安全使用它，更不要说所有的生手了。因此，我们

^① Chinese Recorder. 1912年1月，第1—2页。

希望一切年轻的和其他的爱国者，将能发明某些更加安全的办法，来帮助地方社团对公共事务问题，发表他们的意见。

乐灵生在这篇“社论”中最后主张，传教士不要直接卷入这个运动中去，但要同情中国人民，“传教士们可以促进在中国的民族正义，但不要以官方的身份参加。”^①

乐灵生对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颇表同情，对于中国的知识界对宗教的批评，他认为传教士不应只是来一个否认，而是需要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比起其他的宗教和哲学来，是否更加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乐灵生在一篇“社论”中论及中国的“文艺复兴”问题时，写道：

基督教徒们不应当断言他们通晓一切真理。不论如何，他们应决意否认人类除了物质的事情之外，别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信仰诚然是无法在试管内煮沸的，但是信仰是可以在试管之外，凭着经验进行试验的。在一个科学的世界里，宗教若能显示出它自己的生命，将可夺得和保持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②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乐灵生甚盼中国革命能有新的进展，他已经看出国民党内部的弱点。虽然如此，在《教务杂志》发表的社论中，他小心翼翼地避开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对中国的前途一直持乐观的态度。^③但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蒋介石篡夺政权之后，乐灵生觉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作出究竟拥护那个政府好的决定。军阀的势力使他担忧，因为

① Chinese Recorder, 1919年7月,第433—436页。

② 同上书,1923年3月,第137页。

③ 参阅 Chinese Recorder, 1927年上半年各期社论。

各系军阀都在企图保持和扩大他们统治的地盘。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乐灵生写给美国基督教领袖苑礼文的信中透露，据他获得的可靠情报，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消灭殆尽，在人民中间已经出现一股对国民党幻想破灭的思潮。他以极为乐观的态度预测，一种新的精神和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新的探索，正在兴起。^①

一九二八年三月，乐灵生在写给美国苑礼文的信中，进一步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他说：中国缺乏有经验和有威望的领袖，而中国人民则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包括爱国的基督教徒在内，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因为国民党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同年四月，乐灵生又写信给苑礼文说，虽然一般的中国人仍然赞成三民主义，但是对国民党已变得腐败起来，都感到失望。^②

一九二九年一月，国民党已在南京建立政权，实行独裁统治，乐灵生对国民党开始实行一党专政感到不安。他在给苑礼文的信中，颇有远见地写道：

当然，我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而把左派或政组后的共产党排除在外，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我可以在此大胆地作出一个或两个估计。共产党仍继续在隐蔽地积极活动着，这是无可置疑的。况且，左派力量是不满的，他们要在政府内有更直接的发言权。……我个人确信，左派分子终将在政府获得发言权，将来一定要有两党合作

① Rawlinson to Warnshuis, 1927年10月3日, 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 引自 J.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第323-324页。

② 同上书, 第324页, R. to W. 1928年3月2日。

而不是一党专政。^①

根据上述情况,乐灵生不主张传教士直接干预中国内政,但是对于中国的进步事业,出于一个基督教徒的正义感,觉得应该支持前进,反对倒退;拥护光明,反对黑暗。在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对中国革命能够持这种态度的人是很少的。但是,他也不可能摆脱他的局限性,竭力反对“暴力革命”。

二, 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态度。

一九二二年与一九二四年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主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侵略,它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正在逐步地提高。

非基督教运动的导火线,是美国帝国主义选定中国作为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地点。据这次大会的组织者美国人穆德宣称:选定在中国开会,是因为他们“认清当时的中国,是反基督教运动斗争的重要地点”。^②于是,他们有意识地到中国来挑战,并且决定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开会。

针对这场挑战,北京各学校的爱国学生,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开始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九日公开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种种罪行,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开会。紧接着,三月二十日北京又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著名革命家李大钊、邓中夏等十二人在北京《晨报》发表了《非宗教宣言》,于是全国各地特别是知识界,纷纷发出通电表示响应,并且集会抗

① Rawlinson to Warnshuis, 1927年10月3日, 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 引自 J.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引书第324页, R. to W. 1929年1月31日。

② 马褰士:《穆德传》,第378页。

议和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中国各地的侵略罪行。

一九二四年八月，第二次非基督教运动重新兴起，首先由上海爱国学生发难，成立“非基督教大同盟”，并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从八月十九日起出版“非基督教特刊”，指导和联络全国各地的非基督教运动。各地爱国学生也纷纷成立同样的组织。这次斗争的目标，集中在揭露帝国主义在华开设的教会学校上，并且首次提出收回教育权的主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一项《反对基督教运动决议案》^①和公布了《反基督教宣言》，^②以支持全国各地的非基督教运动，号召青年一致奋起声讨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六年。

乐灵生对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持何种态度呢？

乐灵生对一九二二年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最直接的反应是：“我们宁愿使宗教受到批评，而不是被忽视。”他相信非基督教运动至少表明，西方的冲击在中国已感觉到了，反对比漠视要好得多。^③

乐灵生抨击在华基督教于一九二二年印发的有关中国情报调查报告书《中华归主》（英文版），使用《基督教占领中国》的书名，和同年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大会，扩大基督教势力在中国的影响的宣传活动。他认为，这些做法都在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④

这次运动还明确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乐灵生表

①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年。

② 上海《民国日报》“非基督教特刊”，第22期。

③ Chinese Recorder, 1922年5月，第296页。

④ F. Rawlinson: Revolution and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第21页。

示赞同。一九二六年十月，乐灵生会同其他一些传教士，曾亲赴北京美国驻华公使馆，向马慕瑞公使请愿，要求取消美国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马慕瑞对此表示拒绝。乐灵生指出，这些美国驻华外交官，“对传教士所说的话，根本不予置理”。^①马慕瑞还借口中国没有一个政府可以与之打交道。乐灵生认为，美国公使是在强词夺理，要他对条约作出某些修改，就推说中国没有一个政府可以与之打交道；如果让他保持条约特权，则似乎又可责成中国政府履行条约义务。对此，乐灵生表示愤慨。

乐灵生认为，非基督教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旨在保护中国不受外来的政治和文化的侵略，使中国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上取得平等的地位。^②对基督教本身来说，他认为也是一次反省的机会。同时，由于这个运动所激起的逆反心理，在华各派宗教反而更加活跃起来。乐灵生还认为，这也是对基督教的一种竞争，可能使在华基督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他同其他许多在华传教士不同之处，在于能够看到中国人民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侵略，因而表示同情，并且亲赴北京要求美国公使向美国政府提出取消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些举动在当时传教士中，确实是罕见的。乐灵生希望基督教在华势力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这是符合他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的意图的。

三、对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的态度。

在中华民族日益觉醒、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风起云涌的影响

① Rawlinson to Warnshuis, 1927年10月8日, 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 引自 J. K.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引书第330页, R. to W. 1926年11月1日。

② F. Rawlinson: *Revolution and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第22页。

下,一部分有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的中国基督教徒,开展基督教的自立运动,希望教会能摆脱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地位,取消基督教被视为“洋教”的称号。

一九二二年五月,由美国帝国主义出钱和操纵的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上海举行,七十多个在华基督教(新教)差会的一千二百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外籍传教士与中国籍神职人员约各占半数,会上同时使用英语和华语,但中国人并无实权。会议开了八天,对传教、教育、出版、慈善、妇女等方面问题,都进行了讨论。重点是如何应付中国基督教徒的日益觉醒,和他们要求实现自立的问题。

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部设在上海,任务是“为在华基督教势力设置一个谘询和协调机构,其任务为消除壁垒,形成一种更紧密的团结精神。这个机构将作为一个中央情报局和一个新主意的交换场所,进一步加强研究,推进本色教会的成长,并作为发表团体意见的场所。”^①

这次会议还通过和发表了《教会的宣言》。这份宣言除了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进行辩护外,还着重提出所谓推进“本色教会运动”,以对付中国爱国教徒倡议的教会自立运动,企图欺骗和蒙蔽中国教徒(包括参加会议的中国人)。《教会的宣言》声称:

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所以,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

① C. L. and C. D. Boynton ed., *The Handbook of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Protestant Auspices*. 第146页。

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我们宣告时期已到,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①

美国人穆德是这次会议的直接指挥者。试想中国的基督教,在国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民族没有实现彻底解放以前,它怎么能够独立自主呢?传教士们抛出所谓“成立中国本色的教会”,目的是要抵制和取消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历史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直到一九四九年为止,除了极少数试图摆脱外国控制、成立一些规模很小的自立教会外,绝大多数教会和教会团体,都仍然处在外国势力的支配之下,根本没有实现过任何“三自”,即自治、自养和自传。

乐灵生对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乐灵生最初对于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的召开,和号召推行基督教“本色教会运动”,是赞成的,并且给予很高的评价:“也许一九二二年将作为宣布属灵上独立的一个显著的年代。”^②

但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从它成立之日起,就不是一个代表所有在华基督教差会的最高组织,美国南浸礼会就公开反对,不派代表参加。乐灵生本来属于南浸礼会,由于他本人同南浸礼会的意见相左,甚至宣布退出南浸礼会,加入了美国公理会。

① 《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1922年》。

② F. Rawlinson: *The Chinese Church as Revealed at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nference 1922*. 第11页。

可是,由于帝国主义决不肯放弃对中国基督教的控制,提倡了几年的“三自”,事实上都没有实现。先以“自养”而论,乐灵生也不得不承认,西方来的津贴将会无限期地接受和使用下去,要想结束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的,“自养”不过是一句空话,还是集中力量去解决别的急待解决的问题为是。^①

一九二七年,乐灵生编写出版《基督教在中国的归化》一书。这部书是他一九二五年以来在南京、北京、上海等神学院的一个演讲集,着重讲了“三自”中的“自传”问题,主张由中国人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基督教自身的经历,来传播基督教,建立完全由中国人“自传”的教会。

这个用心是好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人中有一部分人持有这种信仰,是正常的情况。可是在旧中国,帝国主义正利用这种意识形态为其侵略中国服务,在所传播的教义中,掺有许多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说教。在这种状况下,乐灵生所强调的,让中国基督教徒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自由地表达和解释(即自传)基督教,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②

至于所谓“自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曾经鼓吹逐步把中国人推向第一线,外国传教士们担任顾问或教会代表。在华大部分教会团体和教会附设的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在中国大革命高涨时期确也这样做了。乐灵生在《教务杂志》的社论中,也一再主张让中国人“自治”。但是事与愿违,帝国主义牢牢地控制在华基督教的经济权和人事权,虽然中国人被推到第一线,但是幕后操纵者仍然是外国传教士。所谓“自治”,只不过是一

① Chinese Recorder. 1928年7月,第400页。

② F. Rawlinson: The Natura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第56—60(175页)。

种烟幕而已。因此，乐灵生提出的使基督教在中国“归化”的主张，是落空的。

在三十年代的言论

三十年代的中国，除了各帝国主义侵华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终至在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使中国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三十年代在华的外国传教士，都面临着这个重大问题。

乐灵生认为中国被日帝蹂躏是不能容忍的；但他在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时，却又认为中国人民不应当用军事手段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①

那么，乐灵生有什么妙计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呢？他提出，希望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基督教徒联合起来，影响和说服各自的政府，不要诉诸武力。他写道：“作为基督教徒，我们的首要责任是推进和达到这两个国家实现基督化，使友爱和亲善能主宰国家的一切。”由此，他认为在教会学校内信奉基督教的爱国学生，若与公立学校爱国学生联合，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宣战，这是与“基督的精神相违背的”。中国如与日本作战，也无此经济实力。他建议，请求国际联盟来调解中、日争端，希望能获得和平解决，等等。^②

一九三二年六月，乐灵生发表上述观点，意味着什么呢？九个月之前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对中国东北

① F. Rawlinson: Untying the Sino-Japanese Knot, 原载上海出版的 China Weekly Review, 1928年12月5日, 第92页。

② Chinese Recorder, 1932年6月, 第334页。

的武装入侵，并迅速占领东北全境。五个月之前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四个月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一个月之前，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乐灵生要中、日两国的教徒去请求各自的政府不使用武力，是何等的不现实！他坚持“非暴力主义”，已为历史证明是非常错误的观点。

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发动全面的对华战争时，乐灵生才开始改变立场。他在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同年八月一日）中，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同时认为既然外国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包括所有爱国教徒，有权用武力还击入侵的日本侵略者，从而修正了他“非暴力主义”的观点。^①

三十年代在华传教士面临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由小到大，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坚强领导和核心。多数在华传教士是持反共的立场，而乐灵生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在二十年代，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但乐灵生在《教务杂志》的社论中并未予以注意。甚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乐灵生也未加评论。直至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工农政权后的一九三二年一月，乐灵生才在《教务杂志》上发表明显反共的评论。他声称，他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不主张经济决定论，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支配物。”他要求在华传教士接受所谓“共产党的挑战”，企图用他鼓吹的“社会福音”，在中国“成功地开展建立一个经过改造的社会秩序，使为贫困所苦恼的亿万中国人民，获得正当的机会，过丰裕的生活”。^②这当然是不

① 1937年8月1日乐灵生写给《基督教世纪》刊物的、发自中国的最后一封信。

② Chinese Recorder, 1932年1月,第4页。

可能的。因为乐灵生所代表的外国教会在华势力，是被帝国主义利用的侵华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企图用这种外来的侵略势力“改造”中国的“社会秩序”，只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愈陷愈深，决不可能“使为贫困所苦恼的亿万中国人民，获得正当的机会，过丰裕的生活”。乐灵生的这种反共立场，代表三十年代在华大部分外国传教士的立场，是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公然对抗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对上海的军事入侵。八月十四日，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的一颗炸弹，误扔在闹市区大世界附近。乐灵生适驾车经过，当场被炸死，后来被葬在虹桥公墓。终年六十六岁。

乐灵生的主要著作，有《世界基督教化的下一步骤》，一九二五年出版；《基督教在中国的归化》，一九二七年出版；《现代中国的革命与宗教》和《西方的金钱与中国的教会》，一九二九年出版。乐灵生除了主编《教务杂志》外，还负责编辑出版了《一九二二年基督教全国会议记录》和《基督教在华差会年鉴》（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各卷）。一九四三年，乐灵生夫人将乐灵生的遗存文稿和资料，捐赠给美国传教研究图书馆，称为《乐灵生文件》，共有五十余个条目。

穆 德*

(John R. Mott, 1865—1955)

在近代基督教发展史上，穆德是重要人物之一。他曾长期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的学生干事和总干事，担任过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会长，创立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他竭力提倡基督教各派之间的联合统一，提倡基督教团体和人士参加社会活动。为了实现“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产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他曾多次远涉欧、亚、非各国，为美帝国主义向外渗透和扩张尽心竭力。一八九五年以后，穆德曾多次来华活动，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学生运动的开展，和辛亥革命以后美国企图单独支配在华基督教势力，起过重要的作用。

北美青年会学生的干事

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穆德生在美国纽约州的沙利文一个农场主的家中。四个月后，他的父母带着他和两个姐姐向西搬到依阿华州居住。一八八一年，穆德中学毕业后考入依阿华大学，一八八五年转入康耐尔大学。从那年起，他开始参加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由于他具有演说和组织能力，在康耐

* 本篇合作者为上海复旦大学李璠玉同志。

尔大学期间曾被推举为该校青年会的副会长。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八四四年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斯在伦敦创立的一个以建立和开展社会福利及服务工作为特点的基督教外围团体,约在一八五一年传入美国,逐渐在一些大学和东部一些城市中建立起组织,并于一八五三年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一八五五年,在欧、美一些国家青年会组织和青年会活动的基础上,成立了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西部土地的开拓完毕和垄断组织经济力量的加强,美国大资产阶级向国外掠夺市场和原料的野心膨胀起来,积极设法向亚、非、拉美各国渗透和扩张侵略势力。一八八六年,基督教青年会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黑门山举办的“大学生暑期圣经学校”里,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大学生被鼓动“志愿”去海外传道,不久这类志愿活动风行各地。到一八八八年,在美国宣誓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大学生,已达到二千多人。^①该年底,以各学校青年会为基础,建立了组织机构,正式形成了“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

穆德参加了黑门山的“暑期圣经学校”,也是第一批宣誓志愿充当传教士的学生之一。回到学校后,他更积极从事青年会的工作,康耐尔大学在美国最先建立了专门的青年会会所。一八八八年六月,穆德获得康耐尔大学哲学学士和历史政治学士学位。同年九月一日,他正式受任北美大学青年会干事,并在由他组织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中任主席。他认为,这将是他的终身职业,“因为学生干事的工作性质,和任何牧师的影响差不多一样大,现今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千二百个大

^① John K. Fairbank: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第92页。

学中，大约只有三百处已经组织学校青年会。凡是它存在的地方，它所供给的一种需要是别的机关所不能提供的。”^①他的志向是，利用青年会学生干事的职位，“引导人们认识活的基督；……使各地大学成为合理的、生动的、勇进的基督教大本营与中心区；联合全世界的基督徒学生，使基督和他的主义统治一切人民和国家的关系；使国内与国外许多最能干的青年，致力于宣教工作，以扩大基督教服务事业的领袖人材；发展并训练广大的平信徒势力，使其和基督教会的建设计划发生关系。……”^②总之，一句话：“实现学生志愿传道团的口号——现代世界的福音化”。^③

为此目的，穆德首先到美国和加拿大各地游说，积极鼓动学生到国外传教，而且帮助各地学校建立基督教青年会，推动“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发展。这个运动一度成为当时北美影响最大的学生运动。到一八九一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学生，竟达六千二百余名，许多著名的来华传教士，如司徒雷登、赖德烈、卜凯、宓亨利等人，都是在读大学时听了穆德等的演讲受到感动，而签名志愿当传教士的。美、西战争前后，这个志愿国外传教运动迎合了美国当时的政治外交气候，于是提出了更富于侵略性的口号。穆德公开提出，要更加“耐心地，彻底地刷新异教徒的生活，包括个人、家庭、城市、种族、国家的实际生活，和倾向的各个方面，目标是要使异教国家的每一个异教徒，成为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④总计从一八八六年到一九

① 马泰士(张仕章译):《穆德传》，第62页。

② 同上书，第387页。

③ The Student Missionary Appeal: Addresses at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1891. 第185页。

一八年,美国从这个“志愿运动”中派往海外的传教士,共达八千多名。其中三分之一,二千五百多名,被派到中国。它反映了美国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重视。二十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在华势力的迅速发展,和基督教青年会运动的兴起,都是与此直接有关的。

出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主席

穆德并不满足发动北美大学生去做推广“天国”的工作,还想动员全世界各宗派的基督徒学生,“去征服世界”。为此,一八九一年起,他就在欧、美各国积极活动,筹备建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一八九五年八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瑞典宣告成立,穆德任主席。这个“同盟”的目标是:“一,联合全世界的基督教学生运动。二,搜集世界各国关于学生宗教活动的消息。三,推行下列各项工作:(1)领导学生承认耶稣基督为唯一救主与神,并成为他的信徒。(2)加深学生的精神生活。(3)征募学生往全世界去做推广‘天国’的工作。”^①不久,穆德启程到亚洲国家活动。他的任务是,“要到印度、日本和中国等地组织全国学运,并请他们加入同盟,要在未有学运的国家设立通讯会员,要在各国搜集各种关于学生宗教活动的消息,还要做一篇视察经过的报告”。^②

第一次来华

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在欧、美国家产生后不久,就被介绍到

① 马泰士(张仕章译):《穆德传》,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中国。一八七六年,上海有了第一个青年会。一八八五年,福州的英华书院和通州的潞河书院先后有了学校青年会。一八九〇年,杭州的泓道女校建立了第一个基督教女青年会。^①基于此,这一年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正式向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和北美协会请求援助。于是,一八九五年北美协会派遣出生于中国、在美国国内从事过学校青年会工作的来会理牧师,来华工作。^②来会理以天津为立足点,当年就在天津五所官立学校里建立了基督教学塾幼徒会,发展了五百多名会员。^③

穆德对中国很感兴趣,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从澳大利亚到达香港,八月初去广州作短期的观光,后来又从香港乘船往上海,转赴山东济南。接着去天津、北京、上海、福州、杭州、南京、宁波等地,于十一月七日从天津乘船离华去日本。在中国历时三个月中,穆德先后作了十几次演讲,差不多访问了中国所有高等教育机关,使中国学校青年会数增加了二十二个。十一月三日到六日,穆德召集来自全国二十八个“学塾幼徒会”的八名中国教徒,和二十四名外国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会议,产生中国基督教学塾幼徒会的全国性组织。由七名中国干事和七名外国干事组成,来会理任总干事,并决定用中、英文编辑出版《学塾月刊》,促进学生宗教活动。这个组织随即承认和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两个月后,穆德对人谈到他对中国的主要印象时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传教区域”,“那些经过科举考试的中国官立学校的学生,是世界学生中的直布罗陀”。

① 基督教女青年会 1855 年创立于伦敦,发起人为金纳德夫人,1866 年传入美国。1894 年在英国组成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

② 来会理(1870—1949),父亲是传教士。他出生在宁波,后迁至苏州。不久回美入学,毕业后出任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干事。1895 年来华组织基督教青年会,1934 年退休回美。

③ 此系最初在华基督教青年会名称。

因此，派出受过教育的传教士，“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①一八九八年，北美协会又派格林、路思义、巴乐满等人到中国，分别负责天津、上海和香港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第二和第三次来华

进入二十世纪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中国逐渐产生不同于旧式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基督教青年会以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作为对象，企图加以控制。一九〇〇年，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正式组成，一九〇一年全国已有市会三处，校会四十处，外籍干事六人，中国籍干事二人。一九〇二年，基督教青年会第四次全国会议在上海召开，成立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机构管辖范围扩大至朝鲜。^②会议决定，开展对知识界和非教会学校学生的工作，成立书报部，出版青年读物和《学生青年报》。一九〇六年，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建立；一九〇九年，中华基督教留美青年会建立。到一九一二年，全国共有市会二十五处，会员一万一千三百人；校会一百零五处，会员三千八百七十六人。基督教女青年会则有一个上海市会和二十二个校会。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在北京举行基督教青年会第六次全国会议，会议决定将总部名称确定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把朝鲜分出去单独成立青年会，由巴乐满为第一任全国协会的总干事。^③

① C. H. Hopkins: John R. Mott. 第185页。

② 这个组织于1912年改组，朝鲜单独成立基督教青年会，中国的改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915年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

③ 巴乐满（1867—1944），1890年大学毕业后任北美青年会协会学生干事，1898年来华，任学塾幼徒会干事，1900年任总干事，1915年回北美协会任副总干事，1928年辞职。

这期间，穆德曾经于一九〇一年和一九〇七年两度来华，进行大量的活动。一九〇一年，他在中国逗留一个月，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等地召集外国传教士和青年会干事会议，讨论在新时期如何引导青年接受基督教的“福音”，计划要“包围知识界”。^①他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所作的演讲《基督徒的现实》，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书报部出版。

一九〇七年，穆德再度来华，二十五天中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苏州、南京、汉口、北京和天津等八个城市演讲。因为当地青年会的积极宣传和准备，差不多每场演讲都是座无虚席，听众平均每次达千人以上。而且，与从前不同的是，穆德每到一处，都受到清政府官员的厚待，许多省的官员还亲自到会听演讲。在北京，清廷外务部破例设宴招待穆德和巴乐满等人，“这给穆德提供了一次以私人方式接近中华帝国最有权势阶层人物的机会”。^②在天津，穆德被邀请专门对三百名政府官员和各官办学校的一千七百名学生作题为《教育的目的》的演讲，会后还与当地巡抚等官员进行二小时的讨论；在南京，穆德单独与总督端方谈了有关教育、青年会和基督教会的问题。同年三月十九日到二十二日，中韩港青年会在上海召开全国大会，穆德应邀几次到会讲话，实际指导大会的进程，并在闭幕式上作了题为《前进的召唤》的演说。当时，有些青年在听了穆德等人的演讲后立志从教，或加入青年会组织。这使穆德沾沾自喜地认为：“青年协会运动已在中国成为本色化。我完全相信：如果青年会在美洲和欧洲消亡，那么以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存在的青年会运动，

① C. H. Hopkins: *Jone R. Mott*. 第259页。

② 同上书，第311页。

最终将从这国家传回到西方。”^①

穆德对中国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抱有极大希望，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有四万万人民的国家只有一个，那个国家进入现代的新潮流，也只有这第一批人。这第一批受着现代教育的学生，将来便成为新中国的领袖。他们要设立新的标准，并且走入新的途径。我以为，这些人受基督化而与基督教发生友谊的关系，实在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我常常有这样的渴望，因为恐怕我们失去这种卓绝的机会”。^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九一〇年为了让北美协会的对外部，在亚洲和拉丁美洲重点区域扩大工作和建立会所，穆德拟定了一个募集一百零八万美元款项的计划。该计划立刻得到美国垄断资本家洛克菲勒的响应，决定捐助其中的五十四万美元。同时，穆德以私人名义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塔夫脱汇报，并请求帮助。塔夫脱同意在白宫为此召开特别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美国财界、宗教界的重要人物，以及来访的其他国家青年会的代表，共二百人。塔夫脱在会上作了演讲，表明美国政府对青年会运动在国外发展的看法，他说：“通过我们的国务院，我们可以对其他国家在道德等方面的进步表示同情和关心。不过，国务院在这方面的工.作要受到限制，而且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没有人会认为，我们到中国去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是抱着任何占领他们土地或干涉他们国家内政的野心。我们可以提拔青年会的会员，使他们在本国政府内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他们这些人，我们就能够使这些落后国家，最终地接受我们的文明和道德标准。”^③结果，在会议结束后

^① C. H. Hopkins: *Jones R. Mott*, 第313页。

^② 马泰士(张仕章译):《穆德传》，第364页，Mott to A. C. Gossett, 1909年11月7日。

^③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96—299页。

的几个月中，穆德募得二百万美元，大大超过了原订计划。

第四次来华

一九一〇年六月，世界基督教宣教大会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穆德被选为大会主席。大会对世界传教事业作了新的部署，报告在谈到中国情况时，指出：“我们得悉，中国在短时间内即将要求，就象她过去一贯要求的那样，在思想、文化和宗教上，都要由本国人来领导。如果这一时刻来临，而基督教差会未能提供能在国家中和在哲学与宗教上领导中国的人物，基督教差会过去努力的成果，将在很大程度上付于流水。”^①为了有效地贯彻爱丁堡大会拟定的传教方针，大会决定建立续行委办以“延续它的思想和继续它的工作”，由穆德任主席。会后，穆德代表续行委办，并带了许多由塔夫脱总统写的介绍信，到亚洲各国巡视和开展工作，一九一三年一月，他再次到达中国。

当时，中国已发生辛亥革命，但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的位子。袁世凯表示欢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出所谓“全国将有宗教自由”。穆德首先在广州、上海、济南、北京、汉口和沈阳六大城市召开分区会议，与会者包括全国近二十个省份、七十多个传教团体。然后，在上海召集全国基督教会议，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虽然委办会冠以“中华”两字，但中国人仅占其中一半，并都是副职。委办会有成员五十一人，由其中的十五人组成执委，总干事是美国传教士罗炳生，任务是：一，以“中华续行委办会”作为在华各差会互通声气的机构；二，倡导各差会之间的

^① 侯外庐：《略论辛亥革命前后美帝国主义对华精神侵略》，载《新建设》1964年8、9期合刊。

合作；三，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作全面的调查。此外，在这次访华过程中，穆德还会同另一位美国“布道家”艾迪，到处做布道演讲。^①听讲人数累计达到十三万七千余人次，其中有一些还是政府官员。连袁世凯也曾慕名听讲，并在会后对穆德说：“我非常认真地听了你的演讲，孔子教给我们真理，你则告诉我们怎么做一个遵循真理的人”。^②黎元洪还特地请穆德给他的家属及宾客讲解基督教教义。于是，在短时期内，中国入教人数激增，一九〇四年基督教新教徒人数还只有十三万人，到一九一四年已达二十五万人，而且扩大了其中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

受到美国政府的器重

穆德在华活动颇得到美国政府的青睐，当时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打算任命穆德为驻华大使。威尔逊的指导思想，在他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致国务卿布赖安的信中，表达得很清楚：“……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目前在中国建设新政府的活动中，有许多是青年会的会员，并且有许多也是在美国大学里受过教育的人。在他们面前直接的或间接的基督教影响是很显著的，这种影响当然应当保存在那里。穆德先生是我素识的朋友，他所具有的政治家品德，也和我相识的任何人相等。他非但对中国的情形很熟悉，并且也为基督教世界里一切良善的人们所深为信任。我想拍电报给他（因为现在他在中

^① 艾迪是美国青年会干事、布道家，1907年首次来华，以后曾于1910、1913、1914、1918、1922、1929、1931、1934年多次来华活动，是一个反共骑士，1963年去世。

^② C. H. Hopkins: John R. Mott. 第394页。

国), 请他留在中国, 代表美国出任驻华大使。”^① 穆德接到美国政府电报后, 考虑到自己一生的目标将是整个“世界的福音化”, 如果任驻华大使会使他的活动局限于中国, 因而回电表示谢绝。但是尽管如此, 穆德此后并没有失去美国政府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后来, 美国政府改派具有“学者”和“正统的基督教徒”双重身份的芮恩施, 任驻华大使。

一九一四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穆德以世界基督教学生运动领袖的身份, 到战区活动。他接受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总干事之职, 发动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战地服务团, 并且建立众多的“军人俱乐部”。东线战事结束后不久, 威尔逊总统指令青年会去东欧各国, “改造风纪”。一九一七年, 穆德受聘为美国赴俄特别外交团的成员, 负责考察俄国的宗教和教育状况。穆德在俄国积极活动, 帮助俄国教会势力的恢复和青年会的建立。一九二一年, 在原爱丁堡大会续行委办的基础上, 国际宣教协会成立, 穆德被推为会长。他强调基督教各派的合一运动, 讨论了各国教会本色化、基督教福利工作、工业化及劳工等问题。会后, 穆德即启程到远东, 他为此行作了充分准备, 其中包括会晤当时的美国总统哈定和国务卿休斯, 向他们请示和汇报远东之行的计划, 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 共同讨论了国际局势。

第五次来华

一九二二年, 基督教青年会在华的发展达到鼎盛, 全国有市

^① 马泰士(张仕章译):《穆德传》, 第381页; Roy Curry: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 Policy, 1913-1921, 第96页。

会四十处，会员五万三千八百余人；校会二百处，会员二万四千一百余人；外籍干事九十五人，中国籍干事八十七人。女青年会也已有市会十二处，会员近三千人；校会八十处，会员近六千人；外籍干事八十七人，中国籍干事五十一人。^①从一九一五年起，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由中国人担任，第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是王正廷。但是他只当了一年，就到当时的北京政府去做外交官了，于是改由余日章代理。一九一七年，余日章正式就任总干事，直到一九三五年。女青年会形成之初，全国协会总干事是北美女青年会协会派来的美国女传教士顾思慈，一九二一年她去世后，由另一美国女传教士文自主担任，直到一九二三年才由中国人丁淑静担任。

为了鼓励中国基督教会和基督教青年会发展，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中国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大会。会议从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开幕至八日闭幕。穆德亲自来华主持大会，并作了讲话。参加者有三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四十六名代表，和中国的五百五十余名代表及列席代表，共七百多人。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到会场保护，四月七日总统曹锟还接见了全体代表。大会的格言是“天下一家”，大会的主题是“基督在世界重建中”，并分六个专题（国际与种族问题，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如何向现代学生宣传基督教，学生生活之基督化，学生在教会中的责任）进行了中心发言和讨论，尤其是对基督教与战争，基督教与社会、经济问题的关系，给予充分重视。

同年五月，穆德又到上海参加七十多个在华差会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大会”。该次大会参加者共一千二百人，其中

^① 参见朱胡彬夏：《中国女青年会会史》。

外籍传教士和中国籍神职人员各占一半。穆德在幕后操纵大会的议程和内容。会议开了八天，对传教、教育、出版、慈善、妇女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重点议论如何应付中国民族觉醒的问题，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最后，会议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表了《教会的宣言》。

这时，中国社会已与十年前不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开始冲击靠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各国基督教在华势力。一九二二年三月，针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开会一事，北京各学校的爱国学生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下，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公开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声讨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行径，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华开会，发动了非基督教运动。一九二四年八月，以上海为中心，非基督运动再度达到高潮，甚至教会学校的许多学生也行动起来，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的爱国学生，分别组成“非基督教大同盟”，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反对教会学校镇压爱国学生，并且首次提出收回一切外国人在华教育权的主张。一九二五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反基督教运动决议案”，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教会学校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罪恶及其本质，号召全国青年一致奋起，声讨帝国主义。因此，一九二二年以后，基督教青年会逐渐衰落，一九二七年全国青年会会员人数只及一九二〇年的百分之六十。参加青年会活动的人也日益减少，许多校会不得不停止活动。一九二八年后，美国的经济危机影响北美协会对青年会的经济支援，使得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一蹶不振。

第六和第七次来华

一九二五年底，穆德到太平洋地区活动，曾又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短短的二星期中，他召开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大会和几次学生座谈会，分析当时的中国形势，研究如何应付当时形势的办法，另外还就中国人民提出的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与在华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外籍干事和传教士们磋商。然而，他而面临着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并没有找出什么挽救基督教势力衰退趋势的办法来。

一九二八年，国际宣教协会在耶路撒冷召开大会，针对当时国际局势，提出在工厂和乡村的宣教工作中，强调基督教各派“合一”的问题。会后，穆德首先辞去他从一九二五年以来担任的美国青年会总干事的职务，接着又于该年十二月在印度迈索尔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上，辞去同盟主席的职务，但保留了于一九二六年起担任的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会长一职。他的意向在于，能有更多精力集中于从事世界性的基督教活动，扩大基督教在世界各国的活动领域和范围，将耶路撒冷大会的要求贯彻到世界各国。亚洲则仍然是他关注并重点进行工作的地区。

迈索尔大会一结束，穆德就动身来华。当时蒋介石已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对外国基督教在华发展，采取许可纵容的政策。这次，穆德取道南满铁路，先到中国北方城市活动。在沈阳，他向教会人员大会传这耶路撒冷大会的“精神”，由特地赶来迎候他到北京的余日章任翻译，又向教会学校的学生讲话，“指导”学生去对付所谓“外界的诱惑”。此外，他还抽空与张学良共进午餐。据说，他们“以亲密的方式讨论了各种问题”。中华基

督教协进会乘穆德在华期间，召集几次地区静修会，穆德受到邀请，先后到北京、武昌、杭州、南京和上海等地，并到处演讲。在武昌举行的华中地区静修会上，协进会会长诚静怡发出开展基督教“五年奋进运动”的号召，目标是在五年内使中国基督教徒增加一倍。穆德接着在会上作题为《扩大福音传布的召唤》的发言，不仅表示了他对五年奋进运动的支持，而且通过亲自宣教演讲，为五年奋进运动开了一个头。在南京，他拜会蒋介石、宋美龄和孔祥熙等人，和他们就国际国内问题进行讨论。在上海，他亲自召集基督教青年会中外干事会议，和基督教书报工作会议，讨论和研究青年会在五年奋进运动期间的工作。直到五月二十四日才离华回国。

三十年代，穆德陆续将他在过去多年的演讲整理成文，一九三一年出版了《当代基督教的世界使命》，次年出版了《解放基督教平信徒力量》，一九三五年为基督教学生运动写了题为《合作和世界使命》的小册子。这期间，他获得美国布朗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曾到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活动，而于一九三五年又来到了亚洲各国。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协进会在三十年代前期，依靠美国的人员和经济援助，各方面工作有所恢复。他们的活动重点都转到“社会服务”方面，在城市加强劳工工作，在农村搞农村事业实验点。九·一八事变以后，还在东北、北京、上海等地开展难民服务工作。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一九三五年有市会四十处，校会一百二十二处，会员总数二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非教徒。全国基督教徒人数自从一九三二年后迅速增加，到一九三七年达到六十五万人。无疑，穆德一九三五年的访华，对这种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建立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三十年代后期,穆德已七十几高龄,他开始致力于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建立,试图将基督教各派、各个组织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政治势力,以反对当时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斗争。为此,他通过各种基督教世界性的机构,举行一连串会议,如一九三七年夏天在英国牛津和爱丁堡召开的普世大会,一九三八年在印度马德拉斯召开的国际宣教大会,和一九三九年八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在这些会议上,他提出“普世教会”的主张,并筹备建立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原定的计划,大战期间只在美国存在一个由穆德主持的协进会的临时委员会,直到一九四八年阿姆斯特丹举行大会,才正式成立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穆德是协进会的名誉主席,一九四六年穆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

第九次来华

战后的亚洲,尤其是中国,是美帝国主义急于企图夺取作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地区。所以,在中国抗日战争还未完全停止时,美国教会界就派人到中国进行调查,制订战后复兴计划。中国抗战刚结束,那些在战争期间迁住内地的各基督教差会,以及各团体机构,就纷纷回到原地进行恢复工作。同时,从一九四六年起,一大批外国传教士和青年会干事涌到中国“协助复兴”,到一九四七年底,总人数已增加到三千五百名左右。其中,美国传教

士占百分之六十左右。

由于战后基督教的复兴，是在美帝国主义直接帮助下进行的，所以带有浓厚的扶蒋反共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倒行逆施和日益不得人心，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到一九四八年底，蒋介石政权灭亡的结局已经显而易见，因此中国基督教界也开始分化。在此情况下，美国教会配合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仍然企图保留在华的势力和影响。穆德亲自出场，以八十五岁的高龄，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最后一次来华。他在上海共耽了二十个小时，进行十分紧张的活动。首先，他听取留沪各基督教差会的主要传教士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外籍负责人汇报，指示他们强调基督教的“普世性”，稳住局面，而且要与世界的基督教保持联系，不能单独行事。然后，他让“协进会”出面，召集各差会中外领袖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基督教在上海解放后的活动方针和方法。穆德并对中国教会今后工作做了布置，他的讲话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现在看来已是无可阻挡的了，面对这种情势，必须准备在共产党新政权下尽最大的努力，继续推进“上帝的教会”。

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它所许诺的“宗教自由”可能是一种宣传攻势。教会必须准备接受共产党的挑战，甚至“迫害”。中国教会的领袖们，要有忍受苦难、坚守职责、和自我牺牲的十字架精神。

三，要尽可能地稳住教徒，不要让他们被共产党的宣传所“欺骗”，让他们永远忠于“上帝”，忠于“教会”。

四，你们若忠实执行以上三条，美国教会决定继续支持中国教会，包括道义上和财力上的支持。

五，美国不会容忍中国被“俄国所控制”，我们不会忘记中国教会。

会议结束后，穆德又到新天安堂公开讲了一次“道”，重述他在“紧急会议”上的滥调，想给在华的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打气。^①以上活动表明，穆德是一个反共、反华、反人民的帝国主义代理人。

穆德不可能达到他企图要达到的目的。一个多月后上海解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在党的统一战线和宗教政策感召下，一九五〇年七月以吴耀宗为首的基督教（新教）界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会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宣布割断与外国差会的关系，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实现自治、自养、自传。这一宣言，得到全国广大爱国教徒的拥护和响应，在基督教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三自爱国革新运动，并于一九五四年七月成立“中国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领导三自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②

曾经创立许多世界性基督教团体，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留下足迹，对在华外国基督教势力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起过作用的穆德，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美国华盛顿病逝，终年九十岁。穆德所以有相当大的能量，到世界各地，特别到中国来频繁地从事发展外国教会势力和进行反共活动，主要是有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做他的后台老板。据估计，穆德在数十年内至少获得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提供三亿多美元的活动经费，和房地产捐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28—429页。

② 参见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编：《回忆吴耀宗先生》有关各节。

助。^①美国历届政府的首脑，都曾公开支持他到世界各地活动，

穆德的第一个夫人是莉拉·怀特，他们在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结婚。莉拉于一九五二年去世，终年八十六岁。同年，穆德又与艾格尼丝·彼得结婚，当时穆德已是八十七岁高龄。据报道，穆德去世后，曾有人对他进行调查，但始终没有查清楚他是哪个教派的教徒，也可能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教徒。^②

① 马泰士(张仕章译):《穆德传》，第347页。

② C. H. Hopkins: John R. Mott. 第702页。

文 幼 章

(James Gareth Endicott, 1898—)

文幼章是加拿大传教士，一九二五年来华，长期在四川传教和教书，后以支持中国革命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著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称文幼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八十五岁高龄的文幼章在加拿大通过广州《羊城晚报》的记者，寄语我国人民：“请转达我向中国人民的问好。祝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①

青少年时期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幼章出生在四川嘉定白塔街二百十二号的教会宅院内。文幼章共有姐弟五人，他排行第三。他父亲文雅各是加拿大监理会牧师，一八九二年受该会派遣，带了结婚刚满两星期的妻子，前来中国四川嘉定传教。他父亲的祖籍是英国德文郡，十七岁那年（一八八二年）就离开英国到加拿大的安大略谋生，不久参加救世军到街头传教。他父亲有很好的男中音歌喉，一天他正在街头演唱赞美诗时，宏亮优美

① 广州《羊城晚报》1983年1月9日。文幼章写的原文是：“To Yang Cheng Wan Bao: Please give my greetings to the Chinese People. May you achieve even greater success in the mighty cau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James G. Endicott. Jan. 1, 1983”

的歌声吸引住一位美丽的爱尔兰姑娘，那姑娘就请他到监理会教堂参加唱诗班。不久，他就参加监理会，在接受大学神学教育后，被派到中国传教。跟他一起到中国的那位新娘，就是当初在街头和他认识的姑娘萨拉，也就是文幼章的母亲。

文幼章从小在中国生长，和中国孩子一起玩耍，说一口四川话。一九〇四年，他父亲奉调到成都负责该会的印刷所业务，全家跟着搬到成都，当时文幼章六岁。他在成都最欢喜和中国孩子一起放风筝。七岁时，他被送到重庆一家贵格会办的英语学校念书，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学年后又回到成都，不久转入加拿大人办的英语学校继续读书。他在家中，从小就接受父母亲的宗教灌输，和传教士对中国的传统看法。

一九一〇年，文幼章十二岁那年，父亲带了全家第一次回加拿大休假。由于他父亲将被推举担任加拿大监理会差会的总干事，不再到中国传教，于是全家搬到多伦多。文幼章进了公立学校读书。从这时起到十八岁那年，他一直在多伦多接受中等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拿大宣布参战，一九一六年年满十八岁的文幼章应征入伍，被送到渥太华接受军事训练，次年被送到法国和英国前线参战。一九一八年，又被调到在法国参战的中国劳工营担任译员，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大战结束后复员。

复员后，文幼章先被送到英国约克郡卡其学院进修，一九一九年夏天重返加拿大多伦多，考入维多利亚学院学习英语、历史和哲学，第二年加修神学课程。一九二一年，他成为监理会传道见习生，利用两个暑假到外地巡回讲道。他父亲希望他毕业后能继承父业，担任传教士，前往中国四川传教。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文幼章被封立为牧师。六月十九日，

他与玛利小姐结婚。监理会差会一致通过他的申请，决定派他们前往中国四川，担任传教士。

在华头七年的传教生涯

文幼章离开中国时十二岁，相隔十五年后，带了新婚夫人远涉重洋，于一九二五年底重新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四川。他和妻子先在重庆学习中文。当时，五卅运动反帝怒潮的余波已波及四川，人民对帝国主义恣意侵略中国表示极大的义愤，加上四川省内各派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十分痛苦。

传教士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力，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文幼章在次年二月间重庆举行的加拿大监理会年会上，曾经发表他对教会活动的看法，主张应该尊重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取消不平等条约。他说：“《圣经》里我从未见过有这段经文：‘你们往普天下去，把福音射击每一个受造的人。’《圣经》马可福音最后一部分的原话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是受造的人听。”文幼章讲话的意思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以及不平等条约给予在华外国人的特权。刚到中国还不满两个月的文幼章，就公开提出与一般在华传教士不同的看法，自然引起与会代表和差会当局的不满，有个传教士当即在会上宣布：“如果炮舰撤走，我就走。”结果差会决定不让文幼章留在重庆，派他到离重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小城忠州，一面学中文，一面传教。五月间，他带了妻子和刚刚满月的第一个孩子，前往忠州。

文幼章在忠州传教不到四个月，就发生英舰炮轰万县惨案，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反帝怒潮。文幼章一家在加拿大驻华使馆的

命令下，不得已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撤退到上海，暂时居住在法租界内，过了差不多有一年难民般的生活。三月间，他出席加拿大基督教华西差会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十一届年会，他父亲当时已任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的主席，并带了一个代表团从多伦多到上海来，参加这次会议。当时，文幼章对中国教徒的自主倾向表示支持，但是差会却并不赞同。

到一九二七年底时局较平静后，文幼章决定重返四川，他的夫人则带孩子暂时回到加拿大去。一九二八年二月，文幼章到达重庆，被派在重庆传教和在教会中学教书。他在教会中学教授英语时，试验采用直接教学法。他认为，学习外国语必须首先学会讲，给学生有机会听英语和模仿着讲英语，象孩子学话那样，然后教学生练习快速阅读课文，不要进行翻译。他的夫人从加拿大回来后，他俩就一起编写短篇英语读物。这种教法效果很好，学生学得快，记得牢。这事传到了重庆军阀刘湘的耳中，他批准把文幼章编的直接教学法英语课本交给重庆大学英文系出版，同时任命文幼章为该大学的英文讲师。后来，文幼章所编教材，陆续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书局曾给他一张面值五千四百万元的支票。但是，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急剧的通货膨胀，这张支票只值五十四美元，并未使文幼章成为“千万富翁”。文幼章在重庆传教和教书到一九三三年四月，按照差会规定，带了一家人首次回加拿大度假。

在担任“新生活运动”顾问的日子里

文幼章一家到加拿大休假一年后，于一九三四年又回到重庆，继续传教和在一所教会中学——精益中学教英文。他在精

益中学创办了一份《精益英文周报》，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停刊。在这份小报里，除了传授英语知识外，也刊登一些政治述评，抨击时弊，文幼章的名字因而逐渐为知识界所知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先是撤退到武汉，一九三八年十月又弃守武汉，跑到了重庆。为了粉饰后方“太平”和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又在重庆搞起了抗战以前即已声名狼藉的“新生活运动”，由宋美龄负责。当时，宋美龄要物色一个熟悉四川情况和有一定声望的外国传教士当顾问，基督教华西差会推荐了文幼章。一九三九年三月的一个早晨，文幼章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官邸召见。

蒋介石对文幼章说：“我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席，欢迎你担任新的顾问。”宋美龄在旁边问道：“要我翻译吗？”“不用，我听得懂。”文幼章答道。“我要你定期向我和我的夫人汇报，把你所听到、看到和感觉到的有关新生活运动的每一件事，报告我们。如果你听到有腐败和恶政也要报告，我们不要阿谀。”蒋介石对他作了上述指示后，还任命他为国民党军队的教官，要他负责鼓舞新兵的士气。

正是由于文幼章推受了这项新的任命，才使他有机会直接了解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消极抗战的实况。宋美龄向他解释了“新生活运动”的各级领导人员名额的分配，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共产党，三分之一基督教徒。但在具体做法上，国民党（加上三青团）的势力却竭力排挤打击共产党，对基督徒则是施行拉拢，使这个“运动”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和三青团控制的一个法西斯组织。从一九四〇年起，国民党公然利用该组织积极反共，并竭力打击民主力量。这年春天，文幼章为三青团的势力打入“新生活运动”同宋美龄进行激烈的争论。文幼章对宋美龄

说：“这是在搞法西斯主义，毫无价值可言。”

由于这个“运动”的反动性日益暴露，文幼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继续当顾问的价值。他写了封信给宋美龄，指责“新生活运动”已经成为国民党党派活动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是一个大错。宋美龄要文幼章把看法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这当然触怒了蒋介石。文幼章决意辞去这个顾问职务。一九四〇年夏天，他断然离开重庆，前往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英语系教书，同时担任成都华语学校主任。一九四一年七月，文幼章再次离开中国，回加拿大休假。

同情和支援中国革命

文幼章回到加拿大不久，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扩大了侵略战争。这就延长了他在加拿大逗留的时间。文幼章利用这个机会，在加拿大各地演说，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要求加拿大各界人士给予同情和支援。但是，重庆国民党当局从一九四三年以后却更加消极抗战，排挤打击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反对民主，全面实行法西斯专政，这使文幼章对中国的前途大为忧虑，急于想回到中国去，一看究竟。一九四四年七月，文幼章独自乘坐美国运输舰到加尔各答，再换乘飞机前往成都。

文幼章在九月间到成都后，除担负美国军方所派的一部分任务外，大部分时间仍在华西协和大大学教英文。这时，国民党当局已明目张胆地镇压民主运动，禁止一切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便衣特务到处抓人，尤其是对大学里的进步师生进行镇压。由于文幼章具有外国教授和曾经担任过“新生活运动”顾问的特殊身份，他经常被邀请到各大学、商会和学生团体去发表演讲。

当时，他演讲的主题是“民主救国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和压制民主，支持学生提出的给人民以民主，和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主张。因为文幼章在成都所作的许多演讲中，没有宣讲基督教教义，引起了基督教差会和一部分传教士对他的不满，有的传教士甚至指控他是共产党。

事实上，在一九四四年年底之前，文幼章除了一九三二年在重庆感化院内曾经见到一些遭到监禁的进步人士外，还没有接触过一个共产党人。一九四五年一月，一个偶然的机，文幼章出席了周恩来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美国记者询问有关国共谈判经过情况时，担任翻译的人译不出来，文幼章于是自告奋勇站起来帮助翻译，这使周恩来很为感激。会后，周恩来请文幼章留下来作了长谈，这是文幼章在以后两年半内与周恩来进行一系列谈话的开端。

在与周恩来第一次会晤中，文幼章介绍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他的观点，以及他在成都担任的工作。周恩来向他阐明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文幼章同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表示赞赏，并且答应以后可以保持经常的联系，提供他所需要的对外宣传材料，以便让外国友人正确了解中国的情况。

文幼章不仅同情中国的民主运动和革命事业，而且还积极支持中国革命。他在华西大学校园内的住宅——华西坝十一号，是进步学生经常集会的地方。文幼章用一壶热茶和一大碗花生，欢迎进步学生到他家聚会。当学生们剥着花生放入嘴里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开玩笑说：“我们是十一号的小耗子。”文幼章取得进步学生的信任，是他多次支持学生运动的结果。他们直截了当地向文幼章老师提出，要借他的家学习国民党禁止阅读的进步书刊，和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文幼章不但一口答应，而且还把

房门钥匙交给他们,即使自己不在家,也欢迎他们随时来。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人民的反对,决定发动内战。十二月,国民党政府首先对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昆明人民进行镇压,制造了“一二·一”惨案。成都学生决定举行集会、游行进行声援,并邀请文幼章到大会演说。文幼章过去虽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法西斯独裁不满,但却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他决定答应学生代表的请求,同时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写了一封信,给当时任西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信中告诉张群,成都学生将要在星期天举行集会,内容之一是抗议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昆明学生,二是反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文幼章要求张群同意举行这次集会,答应不使用武力。文幼章写了讲稿,内容主要有对昆明学生和教授们举起的和平、统一、民主的旗帜,表示支援和同情,他认为这面旗帜不论是机关枪或手榴弹都无法打掉。作为一个外国朋友,在中国历史的危急时刻,是应该发表他的感想的。因为中国的和平与民主,与全世界的进步事业息息相关,无法分割。他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全国团结一致,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

讲稿写好了,文幼章心潮澎湃。他回想自从二十五岁来中国后,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陷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情景,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外国传教士,难道不应该同情他们吗?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中国不应该实行民主团结,医治战争创伤,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吗?中国的稳定不是对全世界都有利吗?他还想到,如果自己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一定会遭到教会方面的反对,也会受到加拿大政府的压力和国民党的迫害。他在床上翻来复去,左思右想,怎么也睡不着,干脆起床给远在加拿大的妻子写一封长信。

告诉她,决定明天去参加大会,发表演说,公开支持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及所以要参加的原因。文幼章夫人也是一直同情中国人民的,她一向支持丈夫的正义行动。她收到这封信后,就为丈夫默默祈祷,祝他平安和成功。

第二天清晨,数千名大学生集合在华西大学校园内,先举行悼念昆明死难烈士的活动,然后列队走出校园游行,前往市中心的少城公园举行大会。在少城公园内,共会集了各界人士五千余人。文幼章到了那里,看到讲台被大约三十名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国民党警察围着。他们会让一个外国人上去吗?他不管这些,勇敢地冲了进去,登上讲台。据第二天出版的《燕京新闻》报道,当这位加拿大教授登上讲台时,群众顿时热烈欢呼,因为他们从文幼章教授身上,看到了全世界对中国人民为民主与和平所进行的斗争,是表同情的。当文幼章开始发表演说的时候,一名武装警察从身上抽出一枚手榴弹来进行恐吓,但文幼章这时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大声地向五千名群众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杀害昆明的无辜学生的暴行。他说,这些学生没有死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手里,却死在自己人手里,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争取民主、统一与和平。他向群众宣布,全世界人民都希望中国人民不要打内战。文幼章的简短而有力的演说,博得了与会群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文幼章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成都公开支持中国革命的行动,作为自己一生的转折点。

辞去教会职务

文幼章在成都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革命的行动,引起了她

所隶属的基督教华西差会当局的不满。华西协和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的领导对文幼章参与学生的反内战、要民主的斗争，既害怕，又恼怒，向差会埋怨文幼章的“越轨”行为。而文幼章则对教会和教会学校的立场和措施，也早已感到难以忍受。他不顾这些，除了教课外，竭尽全力继续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从一九四四年末至一九四五年初三、四个月里，由于劳累过度，他的体重一下子减轻三十磅。这时，文幼章已经看得十分清楚，腐败的国民党必定要垮台，生气勃勃的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必定要胜利。他与加拿大驻华大使多次辩论时，就是这样认为的。一九四五年五月，文幼章就预言：即使有大量美援，国民党也必将垮台，而共产党则将控制整个中国。文幼章认为，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人民，曾经经过千锤百炼，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社会最优秀的分子，有严明的纪律、坚定的信念和牺牲的精神，代表了中国的未来。文幼章就是本着这个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自觉地、毫无保留地、大无畏地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

由于教会当局和其他外国传教士，对文幼章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使他感到自己的行为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谅解。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决定辞去一切教会职务。为了慎重起见，他先把辞职信寄给在加拿大的妻子看，得到她的同意后，再送交上级差会。他仍然在成都教书，照样一往无前地支持中国革命。加拿大差会当局起初不同意文幼章辞职，但是当文幼章出席成都群众大会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尤其当他们听到南京国民党当局威逼文幼章离开中国的命令后，加拿大联合教会不得不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向他发出“非正式”信件，要他作出最后的抉择：要么留在教会，按照教会的规章制度办事；要么脱离教会，去追求他自己的目标。为此，文幼章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从

成都写了一封正式辞职信，给加拿大联合教会的负责人。信中说：“我非常遗憾，现在我感到有必要正式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的牧师之职。我不打算具体解释我是怎样逐步感到有必要作出这个决定的。……我现在感到我是受召，要为人类在社会和政治运动的领域中得到改善，而积极投入斗争。……”多伦多差会于一九四六年六月正式批准他的辞职请求。文幼章在寄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当我发出辞职信之后，我感到高度的满意。在我的一生当中，我第一次感到我自由了。这看来是决定得太晚了，但我们将尽力做得更好一些。”文幼章这时已是四十八岁的人了，他决定离开成都，回到加拿大去，与家人团聚后再作计议。

在上海编辑出版英文《上海通讯》刊物

文幼章在临行前，收到了一封周恩来给他的邀请信，请他在赴上海途中，到南京下船去会见他。周恩来对文幼章说：“你是不是可以推迟回加拿大，帮助我们做一点宣传工作？”周恩来向他解释，由于反动派的歪曲宣传，国外许多人不了解中国的现状，因此有必要编印一份英文刊物，把当前美国政府出钱、出枪支持中国反动派打内战的真实情况，向外国介绍。文幼章欣然答应下来，决定暂时不回加拿大，前往上海筹划出版事宜。考虑到国民党当局必定要扼杀这份刊物，文幼章不便暴露他是这个刊物的编辑，并要在上海谋求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文幼章到上海后，先写了封信给妻子，告诉她不回加拿大了，要在上海办报，请她设法买船票到上海来团聚，并协助工作。文幼章在上海，通过朋友的介绍，到圣约翰大学教授英语，同时在中华书局编辑英语读物。

英文《上海通讯》第一期，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出版的。每星期出版一次，由一家俄国人经营的印刷厂承印。通过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渠道，回避国民党的检查，而寄往国外。主要免费发给英语国家的政界、新闻界、宗教界、工商界和高等学校的知名人士阅读。这份英文刊物，对于及时向国外报道中国实际情况，揭露美、蒋联合镇压中国人民的罪行，起了应有的作用。

文幼章夫人于一九四六年年底到达上海，很快成为文幼章的重要助手。英文《上海通讯》一直出版到一九四七年春天，因为当时国共谈判已正式破裂，南京、上海的共产党办事处全部关闭，马歇尔在华的所谓“调停”已经结束，战火已燃遍华北平原。文幼章感到已没有必要再逗留在上海，于是和夫人一起，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乘船离开上海，返回加拿大。

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

文幼章回到加拿大后，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七一年，主要从事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一九四八年秋天，文幼章和其他几位热心和平的人士，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哥华同时发起组织和平运动委员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多伦多召开会议，成立加拿大保卫和平大会，文幼章被推举为主席。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他们首先要求加拿大政府停止援助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府。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加拿大和平运动委员会，最先向加拿大政府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先后在波兰、纽约、巴黎、墨西哥城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国际性会议中，文幼章代表加拿大和平

运动委员会出席了这些会议。他积极推动加拿大人民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宣言上签字。一九五三年三月，文幼章荣获斯大林和平奖金。文幼章还在百忙中从一九四八年一月起自编自印出版《加拿大远东通讯》月刊，他把这个刊物看作是英文《上海通讯》的延续，出版达三十年之久，到七十年代末停刊。一九五七年，文幼章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一九六六年，中国退出世界和平理事会后，文幼章逐渐看出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与五十年代不同，也在考虑退出这个运动。一九七〇年，加拿大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文幼章多年来一直为之奋斗的可喜成果，他高兴万分，特地拍发了一份贺电给周恩来总理，表示衷心的祝贺。文幼章夫人于一九六七年去世，一九七〇年九月，文幼章与他的女秘书爱拉小姐结婚。一九七一年，文幼章正式向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加拿大和平运动委员会提出了辞职申请，从此退出了这个组织。

他永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新中国成立后，文幼章夫妇曾多次访问我国，一九五二年二月，他们应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邀请，到达上海。原计划在访问北京和上海之后，前往他们的第二故乡四川省访问。但是，这时美国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公然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于是，文幼章决定改变原来计划，要求亲赴东北实地考察。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后，文幼章立即发了一份电报，给加拿大外交部长雷斯德·皮尔逊，证实美国正在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要求加拿大政府抗议这种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可耻罪行。同时，又把同样内容的电文，拍

发给加拿大新闻联合会和加拿大基督教团体。四月十日，文幼章在沈阳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他调查的结果，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暴行。但是，当文幼章回到加拿大时，却受到来自美国的粗暴压力，遭到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加拿大教会还通过一项决议，宣称：“文幼章不能代表教会讲话。”加拿大的一些有势力集团，甚至威胁不准他在加拿大立足。

一九五六年，文幼章夫妇访问我国时，周恩来总理请他出席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大会，并请他讲话。一九五九年，他以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身份，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文幼章在七十年代，又接连三次到我国访问。一九七二年，是他最后一次与周恩来总理见面。他始终关心他的第二故乡——四川。

一九八二年八月，加拿大基督教联合会和社会舆论的敦促下，一致通过决议，正式撤销三十多年前因文幼章支持中国革命而对他所作的指责，并对给他的名誉所造成的损坏表示道歉，确认他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赞扬他的远见卓识。我国记者曾专程到文幼章家里，代表中国人民向他祝贺。

当我国记者问到：为什么当年他要辞去传教士的职务？当时加拿大教会为何对他进行指责，而事隔多年，又向他道歉？已八十五岁高龄的文幼章明确回答说：当年教会反对我，原因是我揭露和谴责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文幼章用英文和带着四川乡音的普通话，谈到他当时的想法：“我完全看清了美国帝国主义的野心，也看到宗教的力量已被它利用。现实改变了我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这是促使我坚决地自愿辞去传教士职务的原因。”一九五二年，加拿大教会对他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他回忆这段往事，不禁大笑起来，说他早已脱离教会，这项决议对他

毫无约束力。但是尽管如此，这项决议还是给他造成了一些损失，这就是加拿大联合教会所以要向他道歉的原因之一。文幼章不愧为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国际友人。他现在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自己的家里，安度着晚年。^①

① 本文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文幼章儿子文忠志教授所著的英文《中国出的革命者——文幼章》一书，一九八〇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的英文原名为：James G. Endicott: Rebel Out of China. 作者原名为 Stephen Endicott.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

司徒雷登是美国传教士，长期在我国从事教育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一九四九年离开南京，一九六二年在美国去世。

童年和青年时期

司徒雷登于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在中国杭州的武陵门内美国南长老会的传教士住宅里。父亲司徒约翰为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一八六九年被派来中国传教，一八七四年回美国结婚，同年再到中国，定居在杭州。司徒雷登共有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他的童年是在杭州度过的，因常与中国儿童戏耍，能说一口杭州话；母亲又教他读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小学课程。

一八八七年，司徒雷登十二岁时随父母返美度假，被送入莫比尔一所公立学校插入五年级读书。他的父母为了要在美国教被中间引起对中国传教事业的兴趣和支援，常常让他们兄弟四人穿上中国服装，用竹子做的筷子吃饭，和用中国话（杭州方言）唱圣歌，到各处“巡回演出”。一年休假期满后，父母决定把他和老二留在美国亚拉巴马读书，寄住在姨母家里，过着严格的清

教徒式的家庭生活，只是在放暑假时可到另一位姨母家去轻松一下。

司徒雷登在年满十六岁时，考进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潘托普斯中学，在该校攻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课程，第一学年就取得了全班第一名。第二年，经老师推荐，转到汉普顿学院读书，成绩也经常是全班第一或第二名。一八九六年，他在该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十九世纪末，正值资本主义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美国已经出现了垄断资本集团，企图向东方扩张，开拓新的市场，美国的所谓“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即由此应运而生，积极到各大学征募学生到海外去当传教士，为美帝国主义效劳。“志愿传教运动”的鼓动者，也来到了司徒雷登的学校。他当时已是该校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人们了解他是在华传教士的后代，理所当然地应率先在“志愿卡”上签名，宣誓：“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国外的传教士。”响应“志愿传教运动”提出的野心勃勃的口号：“为基督征服世界！”

当时，司徒雷登实在不想当传教士，更不想到中国去接父亲的班，但是又碍于面子不得不在大学里表个态，带个头。到他大学毕业，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丹尼先生调到一所大学去教书，就推荐司徒雷登去接替自己的位置，要他到潘托中学去教拉丁文和希腊文。于是，司徒雷登在该校任教一年。

由于司徒雷登的家庭出身，幼时所受的宗教灌输，以及两次受到邀请参加由基督教青年会和“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召开的大会，和北美基督教差会主要负责人司弼尔的劝说，他又转向当初在大学所立的志愿。一八九九年，进了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

在神学院学习期间,司徒雷登正式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的组织。一九〇二年,司徒雷登自神学院毕业后,被封立为牧师,并被派出担任华盛顿第一长老会堂牧师。一九〇四年,司徒雷登与路爱玲女士结婚,同年受南长老会派遣来华当传教士,从纽约乘船于年底到达上海。他的父母亲特地从杭州赶到上海,把他和新媳妇接到杭州。这年,司徒雷登的年龄是二十九岁。

在杭州和南京的早期活动

司徒雷登自十二岁离开中国,在美国度过了学生时代,这次来华已相隔十七年,小时候在中国学的杭州话几乎已全部忘光。这次重来再行学习,并拜高敬甫先生为师,专门学习汉文,诵读经史子集。

这样经过两年学习,从一九〇六年起,司徒雷登正式开始传教,先是跟随父亲在杭州和四乡布道,后来就只身深入农村活动。在传教的同时,搜集中国农村情报和干预政治。司徒雷登不得不承认,当时外国在华活动的“传教士正滥用其所谓的幕后支持者政府的世俗权力。……教会滥用世俗权力所带来的问题,使人们信教并非出自真心。同时,由于中国官吏害怕得罪列强,因而常常不公平执法。……传教士们,特别是那些满脑子生意经、强调实惠的美国传教士,自然倾向于追求入教的人数,……传教士们并不察觉他们是在人为地追求教会的实际利益,还以为在揭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呢”。^①司徒雷登所说的“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就是殖民地的生活方式,企图使一部分入教者通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译本),第32—33页。

过宗教形式,更加对帝国主义就范而已。

一九〇八年,司徒雷登三十三岁,接受南京金陵神学院的邀请到该校教书,于是全家从杭州迁往南京。这所神学院先是由美国南北长老会两派合办,后来又有好几个新教差会加入,成为一所联合神学院。司徒雷登在神学院主要担任《圣经》“新约”希腊文讲座的课程。

一九〇九年,司徒雷登的弟弟司徒大卫被派到苏州担任传教医生,任职不久,带了猎枪下乡打猎。因猎枪走火,子弹反击,中弹丧命。

司徒雷登在金陵神学院教书,有十一年之久。在这期间,外国基督教在华势力发展迅速,各宗派有联合一致对付中华民族觉醒的趋势,重视社会福音和对知识界开展工作。司徒雷登无论在观念上或行动上,都是主张被他称之为“现代主义”的传教方式,即面向整个中国社会,不但干预社会的精神生活,也插手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反对老一辈传教士过于狭隘的传教方式。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金陵神学院暂告停办。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司徒雷登接受美国合众通讯社的约请,担任驻南京特约记者,开始接集南京政府的情报,每日发出电讯,报告中国政局的发展。由此而得以与孙中山、蔡子民、王儒堂、周寄梅等政界人物结识。这是司徒雷登插手中国政治的开始。

司徒雷登在南京教学期内,还编写了《希腊文初阶》两卷本,一九一六年出版,专供中国学生直接学习希腊文之用,一切解释均用汉文。

一九一四年,司徒雷登因妻子生病,送回美国去养病时,又

在欧朋神学院进修了半年。一九一五年，他到华盛顿访问，第一长老会堂邀请他讲道，美国总统威尔逊那天适在该堂礼拜，对司徒雷登讲道提及一些中国的情况，感到很有兴趣，于是请他第二天到白宫去作详细汇报。这是司徒雷登首次与美国政府直接接触。同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胁迫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司徒雷登再次到白宫晋谒威尔逊总统，公然要求美国政府出面干涉中国内政。

一九一六年，司徒雷登回到中国，仍在金陵神学院教书，并着手编纂《希华英辞典》。一九一七年编写《圣经·启示录新注释》和《四福音注释》等宗教课本。司徒雷登在神学院教书直到一九一八年底，因接受教会派遣到北京筹办燕京大学而辞职。当时他的年龄是四十三岁。

办理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成立于一九一六年，是五个基督教差会，即美国的长老会、美以美会、美以美妇女会、公理会和英国的伦敦会所合办。由以下几所教会学校合并组成：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和北京的一所神学院。一九一六年在纽约和北京分别成立“托事部”与“董事会”，因此一般都以这一年为创校年份。司徒雷登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被任命为燕京大学校长的，所以也有以一九一九年为“燕大”建校年份。原校址设在北京盔甲厂汇文大学内，女校部在灯市口，到一九二六年始全部搬到北京西郊海甸新址。

基督教各差会共同选中了司徒雷登，到北京出任燕京大学校长，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一般的教师，而是多年与中国和美国

的政界有接触,并熟悉中国情况的人。司徒雷登到任后,即着手选择新校址,筹建新校舍。他先后拜访北洋政府的首脑和许多大买办、大资本家,如段祺瑞、张作霖、孙传芳、汪精卫、孔祥熙、虞洽卿等人,为筹建“燕大”,向他们要钱,甚至委托他们代学校募捐。一九二〇年,司徒雷登看中了北京西郊海甸的一片土地,就亲自跑到西安去找业主陈树藩,经过讨价还价,只花四万元买下了海甸二百四十三亩土地。司徒雷登有一次去找孙传芳要钱,孙传芳还不知道他的底细,就问他“你来看我干什么?”司徒雷登回答他说:“我来看你是要你捐钱。”孙传芳只给了一百元,后来才得知此人不可怠慢,又连忙派人送去了二万元。^①

除了向中国各方面筹款外,司徒雷登几乎每年要回美国去要钱。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去世后,有一笔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司徒雷登通过关系与普林斯顿大学挂钩,陆续获得了相当一笔经费。另外,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经常给“燕大”津贴。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司徒雷登仅从这两家财团获得的津贴,就达四百万美元。纽约“托事部”也为“燕大”提供经济援助,此外,他还委托美国一家募捐公司代学校募捐。

经过司徒雷登多年奔走,在海甸一带共购买了七百多亩土地,陆续建造了八十八座大小建筑物,布置了一块非常美丽的校园。到三十年代,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司徒雷登也成了名噪一时的教会教育家。

司徒雷登根据差会和垄断资本家财团的意见所确定的“燕大”方针是:

^①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第108—109页。

燕京大学的成立是作为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的是给教徒的子女提供教育设施。或更多的是为训练教会的工作人员。这种辅助的功能，是它能够提出要求，在中国的土地上建校的唯一理由，也是获得财政支援的唯一指望。我要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成为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又不使人们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①

司徒雷登确实要比他的父辈们更聪明。这后两句话，就是他使“燕大”超过其他教会大学的诀窍，使“燕大”比其他教会大学更具有吸引力。为贯彻这个方针，司徒雷登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基督化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在于强迫学生信教和参加宗教仪式，而是制造一种气氛，使学生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学生毕业时能成为教徒固然好，但即使没有接受洗礼，也能对教会有好评，对母校有感情。

二，提高学校的学术标准并多开设提供就业机会的职业科目。这一方面是为了与官立学校竞争，一方面也是为了“燕大”毕业生可在国内一些关键性的部门占有位置，可以影响中国的政局。

三，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实的保证”。

四，不可使学校的经费来源中断，要使差会和财面满意，要使中国的名流也肯乐意捐输，要收高学费。^②

①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ne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第66页。

② 同上书，第65—66页。

上述四条措施中的第一条，司徒雷登于一九二七年先把原设的宗教学院，在名义上与“燕大”分开。另外，把教授宗教课的教员减少，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时占全体教员的四分之一，到一九二五年减少到五分之一，到一九三〇年又减到仅占十分之一。司徒雷登采用通过“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基督教青年会燕京大学校会”等组织，教员在课堂和在课外与学生的接触中灌输宗教，但并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当教徒，只要他出学校后不反对教会、不反对教会学校，就算已经达到目的。

司徒雷登的第二条措施，是提高“燕大”的学术标准，并多开设职业科。

在延聘教师方面，司徒雷登花了相当大的力气。一九一九年，一共只有二十九名教师，其中有四名中国籍人士，其余的都是外国传教士，有博士学位的只有司徒雷登，是神学博士。为了改变这个局面，司徒雷登到美国聘请了一些教授来执教，还请美国的大学教授到“燕大”进行短期讲学。在国内，他以“高薪”、“学术自由”和“稳定性”为钓饵，延揽各公私立大学的学者到“燕大”执教或兼课。由于当时公私立大学一般付不起高薪水，再加上国民党特务的恐怖行为，在学术研究上得不到保障，学校波动比较大，很不稳定。因此，确有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应聘到“燕大”教书。一九二二年，司徒雷登聘到前清的一位翰林吴雷川到校任国文教授，一九二六年提拔他为副校长，一九二九年任命他为校长。司徒雷登当校长的“校长”，即校务长，而实际上在纽约托事部登记的校长，仍是司徒雷登，吴雷川不过是挂个名。但吴雷川是一位爱国者，他拒不出席校董会，一九三一年就提出辞职，一直拖到一九三四年才正式辞去校长职务，后来由周诒春代理校长。经过司徒雷登多年擘划，到一九三四年“燕大”有了一支

实力相当强的教师队伍,共有一百一十一名正副教授,其中外籍教授四十四名,中国教授六十七名。其中文学院有六十四名教授(外籍三十名),理学院有三十名教授(外籍十名),法学院有十七名教授(外籍四名)。

在课程设置方面,一九二七年以前,重点是多开设一些职业科目,提供学生谋生机会。曾开设畜牧科、制革科、劳工调查统计科,这后一种职业科,专门培养搜集中国经济情报,包括各种统计资料的统计人才。司徒雷登的本意,是想把学生搜集到的经济资料,出售给国内外的有关单位,以弥补学校的一部分经费。同时又培养一批统计人才,让他们毕业后进入中外经营的企事业中谋生。后来因为纽约“托事部”不同意设置而停办。畜牧科于一九二八年移交给南京金陵大学,制革科则于一九二六年停办。

一九二七年以后,“燕大”的课程设置重点,放在文科上,延聘了国内外一些著名的教授执教,使学校的声誉日隆,投考的学生也大为增加。并采用了设置奖学金、工读计划和低价宿舍,扩大招收一些比较穷困但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入学。在工读计划中,学校方面帮助介绍到附近的中小学兼课,给外国人教汉语、打字、抄写、办合作社、充当导游、园丁、佣人等,解决一部分穷学生的学费。

“燕大”文学院设有新闻系、哲学系、国文系、英文系、社会学系、历史系、教育系、音乐系等专业。法学院设有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等专业。理学院设有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生物系、心理学系、家政学系等专业。

以新闻系为例,该系是从一九二四年开设的新闻科发展起来的。据司徒雷登声称:“我个人特别宠爱的,也许要算是新闻

事业了。”^①这是因为他自己当过新闻记者，晓得“无冕之王”的作用。培养一批新闻人才，将对中国起什么样的影响，他是心中有数。所以，他特别重视新闻系的建设。他到美国和美国最著名的宓苏里新闻学院挂钩，延聘一些有名的新闻学教授到校执教。著名的中国人民之友埃德加·斯诺，曾应聘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在“燕大”新闻系任教。新闻系负责人是伏龙·纳什，后由梁士纯接替。该系还设立了燕京通讯社，独立发稿，出版《燕京新闻》、《平西报》等。由于新闻系的名声大，毕业后出路有保证，所以报考的学生很多，到一九三六年，成为全校著名的系科之一。毕业生被介绍到国内许多重要新闻机构任职，有的被派赴国外。据司徒雷登说：“有一度，中国新闻机构派至世界各重要首都的代表，几乎都是我们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在中国各报馆任职的我校毕业生，也毫无愧色。”^②

第二个较大的系是社会学系。这个系是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挂钩的，得到了该校的基金补助。系主任是美国人甘博，他本来是美国“象牙”肥皂公司的老板，后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从事中国社会调查活动，公开发表的调查报告，有《北京调查》一书。后来被司徒雷登看中，请到“燕大”担任社会学系主任。

在华各教会大学，从一九二八年起都十分重视中国的农村。设有社会学系和农业专业的教会大学，都把重点放在中国的农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关心中国的农民疾苦，而是作为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农民的一种手段。“燕大”社会学系也不例外，

^{①②}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第70页。

它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在北京附近清河开设了一个农村实验站，训练社会系学生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推行平民教育和农业改良等活动。从一九三四年起，“燕大”社会学系增设农村社会学、农村教育、农村合作、现代欧洲农业经济、农村改良运动之比较等课程，并不断派送该系学生到各教会、青年会和国民党办的“乡村建设”基地去实习。一九三五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拨了一笔款子，指定由司徒雷登出面，组织华北乡村建设委员会。“燕大”的社会学系，也纳入该组织的活动中。

第三个重点，是加强国文系和汉学研究。司徒雷登于一九二六年回美国募款时，打听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还有一笔巨款拨给哈佛大学，于是便前往该校协商，并于一九二八年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以加强对汉学的研究。每年该社获得八、九万美元的经费，同时“燕大”的国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也获得津贴。后来，拨款范围扩大，在华的“金陵”、“岭南”、“华西”、“福建协和”等大学，都曾获得津贴。

哈佛燕京学社规定，在北京燕京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两校进行合作，并在美国出版英文《哈佛亚洲学报》，在中国出版《燕京学报》，并搜集中国文物图书资料。一九三〇年，又增设引得编纂处，编印《汉学引得丛刊》等。

一九二七年六月出版第一期《燕京学报》，按计划每年出版两期，到一九四一年共出版二十九期，由于战事停办。一九四六年六月重出。该刊内容基本上都是中国古代的文史资料或论文，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当时，司徒雷登与哈佛大学协商，确定该社以研究汉学、培养汉学人才为目的。它的根据是：一是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学者尊敬的传统；二是相信在高等教育中进行汉学的训练和研

究,是拯救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相信研究学问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壁垒,不仅是超越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壁垒,也包括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壁垒。^①

“燕大”毕业生的出路比较广阔,这与该校英语教学的严格,是分不开的。司徒雷登说:“我也要求改进英语教学,要把燕京大学的学生装备起来,把西方知识的各个方面传达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去。”他还说:“我们这些聪明的、能干的和可靠的青年男女学生,已经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不断地把从学校受到的影响和精神传播出去。”^②

司徒雷登提出的四条措施中的第三条,是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要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在使“燕大”具有中国化的环境方面,司徒雷登不但尽量在学校建筑方面中国化: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庙宇式的学校大门,并搞来一些华表、石狮之类中国式的艺术品装点门面,而且还竭力要求学生们熟读孔孟之道和国故。司徒雷登还把他“特别喜爱的一位哲学家”王阳明,推荐给学生,要他们向王阳明学习。^③

在使“燕大”具有“国际化”方面,司徒雷登要求学生们“消除种族之间的偏见,文化之间的隔阂,国际之间的不和”思想,使学生的头脑“国际化”。他的做法是,“使学生的头脑国际化,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国际化,这就是同时把几个国家的、具有同样头脑的人,集中在一个社团里,可使燕京大学的整个生活丰富和开阔起

① 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第187—189页。

②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第67页。

③ 同上书,第85页。

来。这样一种实验,应当在中国试行,我看是特别适当的。”为此目的,他同英、法、德、意、日、俄等国都进行接触。英国答应资助“燕大”实验“牛津导师制”,法国同意提供“燕大”学生留法助学金,德国政府决定每年津贴一部分钱给该校外文系,意大利政府答应提供留意助学金,等等。

第四条措施是关于学校经费的筹措和安排。其中学费一项,据一九三三年统计,收入约为十一万元。当时在校学生共七百八十八人,平均每人约交纳一百四十元,伙食费等都不计在内,如果加上伙食,一年最低限度要二百元,这在当时是相当高昂的。该校常年经费,一九三三年为八十三万元,一九三四年为九十二万六千元,一九三六年为八十七万元。这种经费,除学费收入外,其余都由纽约信托部、洛克菲勒财团、哈佛燕京学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拨款。铝业大王霍尔遗产捐款,一九二一年为五万美元,一九二六年为二十四万八千五百美元,一九二八年为一百万美元,同时从哈佛燕京学社拨款五十万美元(也是霍尔的遗产)。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哈佛燕京学社拨款,每年平均约十万美元。另一个大户头洛克菲勒财团,一九二一年捐助五万美元,另遗过洛氏医药基金拨给九万美元,以后每年拨给二万美元。而洛克菲勒财团则每年拨给燕京大学十余万至二十余万美元不等。到一九三七年,这两家财团共拨给燕京大学约四百万美元。中国方面募集得最多的一年为三十二万中国币,那是在一九二七年,其余年份每年募到五千至五万元不等。另外,国民党政府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也每年补助该校六万元,从“庚款”退款中每年拨给该校一万五千元。因此,从经费的情况看来,燕京大学在教会大学中,实力也是最雄厚的。

司徒雷登花了那么大的力气，使燕京大学成为旧中国的一所名牌大学，可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紧，“燕大”的爱国学生同样也投入了反帝爱国运动，司徒雷登感到，这是一种“不愉快的现象”。他多方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而手法却与当时一般教会学校不同，因此他曾吹嘘说：“在燕京大学，从来没有一次风潮是失去控制的。”^①

五四运动时，“燕大”刚建校不久，别的传教士都主张对教会学校参加运动的学生进行镇压，司徒雷登则说“不可”，要“同情”。“九一八事变”时，司徒雷登不但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大骂日本帝国主义，还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亲自带队上街游行示威，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结果，别的学校都闹罢课，“燕大”则照常上课。

一九三三年初，热河战事告急，“燕大”爱国学生一致决定罢课参加斗争，司徒雷登当时不在校内，代理行政职务的传教士开会，决定对学生采取强硬手段。双方正相持不下的时候，司徒雷登从外地赶回学校，闻讯之后，就给学生会的几个负责同学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到校内的临湖轩喝茶。学生会代表们到来，他笑咪咪地和代表们握手，和蔼的容貌上，“显着一团慈母对于儿女的爱意”。他亲切地问代表们停课、停考的理由，和办理爱国运动的一切经过。……最后，他诚恳地说：“让我们大家想想，怎么办对于中国有好处罢。只要想得出来，对于中国有益，我去请教职员和你们一道来做。”果然，一场风波平息了。^②

司徒雷登曾坦率地说过：“虽然我和学生们的接触是不多

①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第79页。

② 《燕大友声》第2卷第9期，1936年6月24日，第38—39页。

的,可是,我用了一些玄妙的办法,他们似乎理解我试图提出的主张,并能理解我对所有的同学是多么充满感情。对当时席卷学生界的接连不断的抗日和其他爱国暴动,以及别的种种因素,我通常都采用与学生领袖们结识的办法,而获得很妥善的处理。”^①

但是,司徒雷登对一九三五年北京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却失去了“控制”。一二九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要在北平成立投降日本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搞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激起了平津人民的义愤。北平各校爱国学生联合起来发表宣言,“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并决定在十二月九日上街游行,和向南京派来的何应钦请愿。“燕大”爱国学生积极参与这场抗日救亡的正义斗争,而且有几位同学还担任了这次斗争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十二月九日那天,由于北平所有的城门都被国民党军警封锁,“燕大”和清华大学因校址在郊外,大队学生未能冲进城去,只有少数学生领袖事先进城,在城内协同指挥。十二月十六日那天,又举行一次学生大示威,“燕大”、清华学生终于冲进城去,与全市六千多名爱国学生汇合。反动军警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使不少同学被捕和受伤。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救亡的高潮。“燕大”学生识破了传教士们的欺骗手法,不顾学校的阻挠,积极地投入这场运动,得到了锻炼。

“燕大”历届毕业生,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六年,共约一千七百名。其中在教育界工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四十;其次为

^①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第80页。

宗教界，约占百分之十三；政界在一九三一年以前约占百分之九，后来几年逐渐增多，约占百分之十六；在商界的约占百分之八点五；新闻界约占百分之三；出国留学或工作的，约占百分之二。如果拿这个比例同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的去向比较，就可看出：“燕大”侧重在培养教育、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人才，而“圣约翰”则侧重培养商界方面的人才。与“圣约翰”一样，“燕大”有许多中、外籍教师是认真教学的，对学生要求既严格，关系也比较密切。当然，在教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传入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了学生的思想。可是，燕京大学毕竟是一所教会大学，司徒雷登从来也没有忘记他的办学宗旨。美国差会、美国托事部和“慷慨解囊”的美国资本家，是牢牢掌握着它的。

从司徒雷登办理燕京大学，可以看出其为人：

一，政治方面，司徒雷登“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姿态，经常对“燕大”的师生们讲：“我爱美国，也爱中国。”“与其说我是一个美国人，还不如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这些话在当时确实迷惑了一部分人。他利用中、日矛盾，喊几句“反日”的口号，曾多次把“燕大”的学生运动扑灭下去。一九二七年，经孔祥熙介绍，他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一见钟情”，说蒋介石的“领袖式的人品和有吸引的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就一直支持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成为蒋介石的义务顾问。司徒雷登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彻底的蒋的人”（I am thoroughly a Chiang man）^①他回到美国时，不但与宗教界、财团人士接触，还经常与政界人士交往，要求美国政界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一九三三年，罗斯

^①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中译本），第115页。

福总统在白宫公开召见司徒雷登，听取他的汇报和对中国政局的看法。这样，司徒雷登不仅扮演了一个教育界的角色，而且成为三十年代中、美政治接触中的“无任所大使”。这种政治活动，反过来帮助他更能按照差会和美国财团的意图办理燕京大学。

二，学术方面，司徒雷登以“学术自由”、“超政治”、“稳定性”和高薪相标榜，使“燕大”在旧中国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和声誉。但是，不管怎样，“燕大”毕竟是一处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文化租界”，它只对美国“托事部”和大财团负责，在中国受到大财团撑腰，企图对中国青年进行宗教灌输和思想统治。

三，待人接物方面，他集传教士伪善面貌之大成。有十分清晰的双重性格，心底里对你恨之入骨，而表面上对你却是笑咪咪，“显着一团慈母对于儿女的爱意”。他吩咐学校的注册处，对各班比较突出的学生以及学生会的领袖的名单和他们的情况，要向他汇报，并在百忙中总要抽空去找他们或请他们到家思谈心，使得学生“觉得使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使采取欺骗手法使有些学生脱离了爱国的轨道。例如，有一位“燕大”同学回忆道：“老实说，我为了国事，也流过泪，贴过标语，喊过口号。”后来经过司徒雷登的欺骗，“这种感情为理智所克服，平静下去了。……”

司徒雷登对学校的教职员工也非常关心，每聘请到一位新教师，总是先请到家里款待一番，体贴入微，使新教师一进校就感到校长的亲切和温暖，从而为“燕大”尽心竭力地工作。“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人，这上千上万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孩施洗的是使，证婚的是使，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

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筒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①

抗战期间的活动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司徒雷登与北平日伪当局经过谈判取得“默契”，宣布燕京大学保持“中立”，保证不反日，日本占领军也答应不进校干涉校政。《燕京学报》曾报道说：“七七事变，本校巍然独存，弦歌不辍。且自由讲学，宗旨不变，不与敌伪发生任何关系。”^②这个报道是不真实的。燕京大学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实现过“自由讲学”。所谓“不与敌伪发生任何关系”，也是欺人之谈。日本虽有不进校干涉校政的保证，但并未执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方就去“燕大”找司徒雷登，提出要派日籍教授到该校教书。司徒雷登答应了，不过要求日方能派著名的东方学家白鸟库吉教授来校，日本军方不同意，改派一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到燕京大学。但是，这位日本教授后来逐渐识破日本侵华的罪恶，没有替日本帝国主义效劳。

不仅如此，当时司徒雷登还通过日本占领当局，又与德国法西斯接上线，要求德国政府继续给燕京大学的外文系拨款支援；他还同意大利法西斯取得联系，要求意大利政府继续提供该校留意学生助学金。燕京大学除了保持它原有的一套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外，同样地必须在校宣扬日本皇军的“恩泽”和“中日提携”、“共同防共反共”。

^① 《燕大友声》第2卷第9期，1936年6月24日，第38—39页。

^② 《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基督教在华办理的教会学校受到沉重打击，在日占区的英、美籍教师都被关进集中营，司徒雷登也不能幸免。

从一九四二年起，大批教会学校西迁到后方。四川成都的教会大学华西大学里，迁入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达三千余人。美国“联合托事部”每年拨款一百二十余万美元，维持这些大学的经费开支。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诱使蒋介石投降，曾命令北平日军司令官与司徒雷登接触，企图通过他与蒋介石会晤。为此目的，一九三八年春，司徒雷登借前往香港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便，从香港乘飞机到汉口，会见蒋介石。经过密谈，司徒雷登把条件带回到北平，交给日方，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后来，司徒雷登又为劝降蒋介石跑了四次，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月，一九四〇年四月，一九四一年四月。司徒雷登把与日蒋秘密会晤的经过，向美国方面作了详细的报告。据司徒雷登回忆说：“这些旅行有销魂夺魄的兴趣，我经常地同委员长(蒋介石)和各方面的政府官员举行会晤。”“在我最初几次从这些旅行回去之后，我把我所得的印象向王克敏报告了。他是华北临时政府的首脑。”“在以后的几次旅行中，我大胆地事先通知日军当局，问他们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事。”^①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抗日，蒋介石未能和日本帝国主义达成投降协议。

司徒雷登被关在日军集中营三年零八个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获得释放。他立即召集燕京大学同事商讨复校事宜，然后

^①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第131页。

乘飞机到成都和重庆，与在华西的燕京大学同事商讨迁校问题。十月间，他又回到北平，亲自参加燕京大学在原校址举行的开学典礼，然后飞返美国。

司徒雷登在美国逗留四个月，一面休养，一面为燕京大学继续募捐和聘请教员。一九四六年四月底，司徒雷登又从美国乘飞机回到中国。由于美国政府在七月间正式任命他为驻华大使，他向校董会提出辞呈，但没有获得批准，因此他仍以校务长名义控制燕京大学，由中国人陆志韦出任校务委员会主席，代行校长职务。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一年燕京大学改为国立，由陆志韦正式担任校长。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等校，结束了这所教会大学在华活动三十多年的历史。

出任驻华大使

一九四六年七月，美国政府正式任命长期在华从事传教和办燕京大学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蒋介石公然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自己的领导，要求全国基督教徒支持他的反动政策。当司徒雷登出任大使之前，蒋介石就在南京向司徒雷登“请教”，有什么办法应付当时国内的时局。司徒雷登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说：为了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挑战，除了加强军事攻势外，你本人“应当领导一次新的革命运动”。这样做，就可以再度把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集合到蒋介石的周围，“有他们作为义务宣传员，他（蒋介石）就可以挽回正在衰败中的公众威信，再一次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司徒雷登最后对蒋介石说：“这是战胜共产党威胁的唯一途径。”当司徒雷登正式当上美国驻华大使后，表示：

“我要从我们多年朋友的这个基础上来对待他(蒋介石),而不只是以我的新任命来对待他。”^①

基督教在战后中国的复兴计划,就是在司徒雷登的直接扶持下进行的。抗战刚一结束,在内地的各基督教差会及许多附属机构,即纷纷随国民党军队迁回沿海原址,进行恢复工作。从一九四六年初起,大批传教士涌到中国,到一九四七年底迅速增加到三千五百名左右。其中美国传教士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他们被分别派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沿海省份,执行复兴计划。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从重庆迁回上海后,立即派代表到南京去向司徒雷登请示机宜。司徒雷登“指示”在华基督教各差会,应当全力支持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积极执行基督教在华复兴计划,特别要重视在农村迅速恢复和发展教会势力。

司徒雷登一再“指示”在华基督教各差会,要加强在农村的活动,在农村中与共产党争夺农民,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教会。并以农村教会为中心,开展各种改良主义的活动。为此目的,司徒雷登决定把晏阳初找来,要他担负起所谓“乡村建设”的“重任”。一九四七年一月,当马歇尔“调停”失败回美国后不久,司徒雷登即同宋子文研究,对已经“收复”的地区如何推行防共、反共的问题。当时,司徒雷登最感兴趣的是把美援用于“乡村建设”,他说:“我就想到了晏阳初和他的平民教育。在马歇尔离任后不久,我就同宋子文商议,请晏阳初来担任这项特别的公民训练计划,把从共产党占领区夺回的地方,划一个指定的地区给他

①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第163,166页。

进行。我们的设想是：在模范的国民党还未能在那个区域重建，或共产党还不能重新占领那个区域之前，平民教育运动应派出它受过训练的人员进入该区域，组织居民进行自卫，反对任何对他们的压迫和苛政，以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原理教导他们。”^①宋子文对此表示赞成，于是他俩联名打电报请晏阳初到南京来。晏阳初来到南京，听了司徒雷登的计划后，认为在当时形势下难以实行，即表示无法效劳。

当时，蒋介石军队已节节败退，司徒雷登还是认为必须着眼于巩固农村基地。他要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夏天组织“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由美国出钱，并打电报再次叫晏阳初来主持此项活动。重点是巩固华南农村，计划通过这个组织，先在华南各省的农民中间进行“思想教育”，同时“改良华南的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村现状”，以一部分美援，专为华南的“农村复兴”之用。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这项计划，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横渡长江，并迅速向华南进军了。

司徒雷登还通过对基督教徒发表演说和为基督教的刊物写文章，推行教会复兴计划。例如，一九四七年二月，他在基督教刊物《天风》上撰文，要求“那些曾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和中国教会学校的毕业生，“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革命。他写道：“目前中国的真正敌人，是文盲、贫穷、疾病、假公济私，其中包括亲友的私利，以及狭隘而残酷的政党偏见。”^②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司徒雷登亲自出席上海的教会

①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第191—192页。

② 《天风》，1947年3月1日。

大学联合开学典礼，在会上大肆进行反共叫嚣，要求学生不要听共产党的话，要具有世界主义的头脑。他希望尽快组成基督教华东联合大学，以便集中教会人力、物力，继续维持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

一九四七年七月，司徒雷登又吩咐上海基督教方面派出“代表”，到南京去给蒋介石打气，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戡乱动员令”。蒋介石对基督教的“代表”们说：“你们基督教应和天主教一样，公开出来拥护戡乱动员令，天主教的于斌已表示拥护，希望基督教方面也要拥护。”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司徒雷登到上海国际礼拜堂发表演说，要求基督教徒“应该在此时此地发挥其特殊精神”。要求基督教方面支持美、蒋的反革命战争。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八日，司徒雷登又在上海沪江大学演讲，对这个政策进行阐述。他说：

今天我所要请你们注意的是，如何实践这一爱国目标，而渗入基督理想，使其适应贵国目前的需要。……目前中国国事危机，现在不需要抵抗外来侵略，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内部问题。……

关于施行这民主主义，有两点是我提请各位注意的：第一是自由。……你们这一代的学生，都应该坚持要获得这些权利。……对于自由最好的解释是，自由就是自动地服从合法的权力。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提出的是，民主政府的成功，尤其是在今日世界的潮流中，也须依靠国家平民经济幸福的供给。

中国现在需要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活动，以造成和平、统

一和生产的能Ⓐ力，而不是继续破坏性的煽动，或用有害于平民福利的消极方法，企图强使任何特别的观念。所以，我希望本大学的学生，将受到今日校庆影响，为政治民主及全民经济福利而奋斗，以追随本大学发起人和维持人的精神。^①

以上是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期间，直接扶植外国在华教会势力所作的种种努力。司徒雷登最后不得不承认，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全都遭到失败，并且认为：“共产党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其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党员缺乏这种精神。”^②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司徒雷登离开南京，返回美国。

晚年在美国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即在八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分别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美国总统杜鲁门，作中国局势的详细汇报。而美国政府当他还在回国的途中，已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接见之后，就命他暂时隐居，不要公开露面。同年十月，美国国务院召开秘密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司徒雷登也参加了。会上除了一片哀叹失败声之外，把怨气和责任都推到国民党身上，而司徒雷登因为与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有“交情”，在会上颇有不以为然的看法，^③但他同样认为是无可奈何的。

① 《天风》，1947年11月15日。

②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第240页。

③ 同上书，第264—265页。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司徒雷登突患严重的心脏病，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司徒雷登向美国总统正式辞去美国驻华大使的外交官职务，于十二月十一日得到美国政府批准。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向他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感谢你在最困难和最悲惨的情况下，如此优异和忠诚地代表我们美国所完成的杰出使命。……正是由于你对工作呕心沥血而积劳成疾，才使你返回美国后不幸长期卧病不起。……然而，我衷心地希望，当你病愈后，你将为增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贡献出你特有的才干。”^①司徒雷登这时已是七十六岁高龄的人了。

自此以后，司徒雷登一面养病，一面撰写回忆录。一九五四年出版了他写的英文版《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一书。在最后一章中，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反对中国革命的立场，要求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②

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在美国华盛顿寓所去世，终年八十六岁。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代表中国人民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这个长期在华活动的美国传教士，有很精辟的评价：“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

①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第275—276页。

② 同上书，第291—301页。

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①司徒雷登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并没有因美帝国主义侵华的彻底失败而有所转变，仍然坚持他的反共、反华的反动立场。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5页。

版权归作者所有

天主教在线

www.ccccn.org